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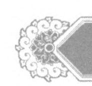
〔民〕李宗吾

黑厚学共分三步工夫。起初的脸皮，
好像一张纸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
就“厚如城墙”了；最初心子的颜色，作乳白状，
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蓝色，再进就“黑如煤炭”了。

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丛书

厚黑学

[民] 李宗吾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厚黑学/（民)李宗吾著. -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3. 5

（中国古典文化精华）

ISBN 7-5034-1359-2

Ⅰ. 厚… Ⅱ. 李… Ⅲ. 中国-通史-普及读物 Ⅳ. I27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93636号

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厚黑学 〔民〕李宗吾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　　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

责任辑编：张馨

印　　刷：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装　　订：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　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　　张：375 字数：6332千字

版　　次：2003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　　次：2003年5月第1次印刷

全套定价：568.00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出版前言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是全民族每个成员的共同财富。不了解中国古典文化，将无以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。故此，本套“中国古典文化精华” 丛书从历代帙牒盈积的著作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内容涵盖了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宗教、艺术、医药、民俗等各个领域，多方位、多角度地介绍了源远流长、内容宏富的中国古典文化宝库中之精华。

《四书》，宋代朱熹汇编的《四书集注》对中国文化、社会等领域影响达七百余年，为儒家经典集大成者。《老子》，道家经典之一，春秋思想家李耳著，数千年来对于中国历代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等诸多方面起着重大的影响。《庄子》，道家经典之一，战国哲学家庄周著，继承发展了老子“道法自然”的观点，主张齐物我、齐是非、齐大小、齐生死、齐贵贱，安常处顺，逍遥自得。《孙子》，兵家经典著作，十三篇，春秋孙武著，是中国第一部内容完备、论理精深的军事著作。《韩非子》，法家经典著作之一，对中国历代帝王“外儒内法”的统治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。《鬼谷子》，纵横家经典著作，《鬼谷子三卷》之一，是比较完整的纵横加理论著作。《孔子家语》，收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及言行，今本体例与《论语》相近，对孔子的先世、身世、言行，甚至孔门弟子的言行，都有大量的记录和介绍。

《小窗幽记》，清言小品，明末陈继儒辑，收录明代以前历朝名家名作之嘉言格论，共十二卷，每类一卷。《呻吟语》，清言小品，明代儒哲吕坤积三十年心血写成，包括修身、养生、处世、居家等等各个方面。

《颜氏家训》：中国最完整的家教著作之一，南北朝北齐颜之推著，是封建文人对子孙的家庭训诫，对中国传统思想教育影响颇大。

《帝王家训》包括清康熙帝《庭训格言》、唐太宗《帝范》、清雍正帝《圣谕广训》等三部完整的家训。《曾国藩家训》,清代曾国藩著,论述其庭训家教的方略。《曾国藩语录》,清代曾国藩著,精选其历年妙论警句。《曾国藩挺经》,清代曾国藩著,论述其为人处世的方略。《曾国藩冰鉴》,清代曾国藩著,论述其识人用人的方法,提出鉴别人才的各种方法和途径。《厚黑学》:民国李宗吾著,由性恶推演至厚黑,反映了对旧社会"成功人士"厚颜歹毒的烦懑和批判。《佛经》,包括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华严经》几部经典,以现代汉语加以注译,以飨读者。

《型世言》:明代崇祯年间刊行的优秀话本小说,明末清初失传,原本收藏于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。《太平广记》,小说总集,北宋李昉辑,五百卷,九十二类,录自汉代至宋代初年的小说、笔记等。《今古奇观》:明末清初抱瓮老人从"三言二拍"中选编的话本集,共计四十卷,并对于部分内容进行的增删和润饰。《智囊全集》,明代冯梦龙辑,全书共收上起先秦,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。《世说新语》,南朝刘义庆著,共分三十六篇,记录汉末、三国及两晋遗闻轶事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为吕不韦使宾客门人所著,共一百六十篇文章。《左氏春秋》是儒家经典之一,多以事实解释《春秋》,保留了大量的史料。《尚书》是儒家经典之一,为中国上古历史文件与部分追述古代事迹文件的汇编。

《中医四部经典》包括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和《温病条辨》,是中医必读之书。现根据各中医院校教学需要,将四部经典合订一册,供读者查阅之用。《衷中参西录》,民初名医张锡纯著,共七期三十卷,为其毕生中西医研究的结晶,其中许多精华至今仍为中医药工作者有所益助。

鉴于编写时间仓促,倘有不妥之处,敬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。

二〇〇三年五月

目　录

厚黑学

我对于圣人之怀疑

厚黑丛话

厚黑原理(心理与力学)

社会问题之商榷(节选)

中国学术之趋势



厚黑学

评李宗吾《厚黑学》

林语堂

近人有个李宗吾，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人，看穿世态，明察现实，先后发布《厚黑学》、《厚黑经》、《厚黑传习录》，著书立说，其言最为诙诡，其意最为沉痛。千古大奸大诈之徒，为鬼为蜮者，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。

世间学说，每每误人，惟有李宗吾铁论《厚黑学》不会误人。知己而又知彼，既知病情，又知药方，西洋镜一经拆穿，则牛渚燃犀，百怪毕现，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，实行厚黑者，无便宜可占，大诈大奸，亦无施其技矣！于是乎人与人之间，只得"赤诚相见"，英雄豪杰，攘夺争霸，机诈巧骗，天下攘攘，亦可休矣！亚李之《厚黑学》，有益于世道人心，岂浅鲜哉！读过中外古今书籍，而没有读过李宗吾《厚黑学》者，实人生憾事也！此时此境，我论此学，作此文，岂徒然耶?

李氏著述《厚黑学》，限于篇幅，择其最精警扼要处，介述于下：

李宗吾尚述及《厚黑传习录》："求官六字真言"、"办事二妙法"等，另著《心理与力学》一书，在此姑不多述。李氏于一九四二年冬抗战时期，死于成都。抗战时期，李氏著作，风行西南，人手"一册"。大家细妙阅读，咸谓意味无穷，全面妙言快语云。

李氏死了。要知李氏发布《厚黑学》，是积极的，并非消极的，不是只嘻笑怒骂而已；对社会人心，实有"建设性"。旨在"触破奸诈"，引人入正！他在《厚黑学》自序里有言；

"……最初民风浑朴，不厚不黑，忽有一人又厚又黑，众人必

为所制，而独占优势，众人看了，争相仿效，大家都是又厚又黑，你不能制我，我不能制你，独有一人，不厚不黑，则此人必为街人所信仰，而独占优胜。譬如商场，最初商人，尽是货真价实，忽有一卖假货者，参杂其间，此人必大赚其钱。大家争仿效，全市都是假货，独有一家货真价实（认清目标），则购者云集，始终不衰、不败……。”

世乱正殷，“英雄豪杰”满天下，出卖灵魂，认贼作父；表面糊上一层仁义道德，爱国救民，动人听闻，一究其实，心之黑，脸之厚，较三国时曹操、刘备、孙权，尤有过之。正义沦亡，是非不辨，无法无天以枪杆武器作后盾，大行其厚黑之道。小焉者，只图自已衣食，乃为人工具，为人傀儡，摇旗呐喊，人云亦云，厚颜事人，跟了人家亦步亦趋。帮凶与帮闲，不是黑，便是厚，天下扰攘，国乱民，厚黑猖獗。

李宗吾（别署“独尊”“蜀酋”）《厚黑学》之发布，已有三十多年，“厚黑学”一名词人多知之，试对人曰：“汝习厚黑学乎?”其人必勃然大怒，认为……。此即李宗吾发布厚黑学之精髓处，收效如何？不言可知！大哉孔子！三代上有圣人，三代下圣人绝了种，怪事也！然则近代之新圣人，其唯发布《厚黑学》之李宗吾乎！（拍桌）

厚黑学

自序

我于民国元年，曾写一文曰《厚黑学》，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，十六年汇刻一册，名曰《宗吾臆谈》，中有一文，曰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》。十七年扩大之为一单行本，曰《社会问题之商権》。近年复有些新感想，乃将历年所作文字，拆散之，连同新感想，用随笔体裁，融合写之，名曰《厚黑丛话》。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，每日写一二段，在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发表，以约有二万字为一卷，每两卷印一单行本，现已写满六卷。我本是闲着无事，随意写来消遣，究竟写若干长，写至何时止，我也无一定计划，如心中高兴，就长期写去，如不高兴，随时都可终止。惟文辞过放散漫，阅者未免生厌，而一般人所最喜欢者，是听我讲厚黑学，因将二十三年北平所印《厚黑学》单行本，略加点窜，重行付印，用供众览。

许多人劝我把《宗吾臆谈》和《社会问题之商権》重印，我觉得二书有许多地方，应该补充，叫我一一修改，又觉麻烦，因于丛话中，信笔写去，读者只读丛话，即无须再读二书，因二书的说法和应该补充之点，业已融化丛话中了。

十六年刊《宗吾臆谈》，李君澄波，周君雁翔，曾作有序。十七年刊《社会问题之商権》，吴君毓江，郝君德，姚君勤如，杨君仔耘，均作有序。一并刊列卷首，聊作《厚黑丛话提要》，俾读者知道丛话内容之大概，苟无暇晷，即无须再读丛话。

《宗吾臆谈》和《社会问题之商権》，业已各捡二本，寄存四川

图书馆，因忆自非家中尚有数本，摄取来一并邮寄南京、北平及其他图书馆存储，借表现在所写《厚黑丛话》与昔年思想仍属一贯也。

（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。）

一　绪论

我读中国历史，发现了许多罅漏，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，和史臣的论断，是完全相反的；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，也不符合。我很为诧异，心想古来成功的人，必定有特别的秘诀，出于史巨圣贤之外。我要寻它这个秘诀，苦求不得，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，不觉恍然大悟，古人成功的秘诀，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。

由此推寻下去，一部二十四史的兴衰成败，这四个字确可以包括无遗；我于是乎作一种诙谐的文字，题名《厚黑学》，分为三卷：上卷厚黑学，中卷厚黑经，下卷厚黑传习录。民国元年三月，在成都《公论日报》上披露出来。那个时候，这种议论，要算顶新奇了，读者哗然。中卷还未登完，我受了朋友的劝告就停止了。不料从此以后，“厚黑学”三字，竟洋溢乎四川，成为普通的名词；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就有人请讲《厚黑学》，我就原原本本的从头细述。听者无不点头领会，每每叹息道：“我某事的失败，就是不讲厚黑学的缘故。”又有人说：“某人声威赫赫，就是由于《厚黑学》研究得好。”有时遇了不相识的人，彼此问了姓名，他就用一种很惊异的声调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？”抑或旁人代为介绍道：“他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。”更可笑者：学生做国文的时候，竟有用这个名词的，其传播的普遍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
我当初本是一种游戏的文字，不料会发生这种影响，我自己也十分诧异，心想这种议论，能受众人的欢迎，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。我于是继续研究下去，才知道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，与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渊源于性善说，其价格是相等的。古人说：“仁义是天性

中固有之物。”我说：“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。”阳明说：“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。”说得头头是道，确凿不移。我说：“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，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，见他哥哥来了，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。”也说得头头是道，确凿不移。阳明讲学，受一般人欢迎，所以《厚黑学》也受一般人欢迎。

有孟子的性善说，就有荀子的性恶说与之对抗，有王阳明的“致知良”三字，这“厚黑学”三字，也可与之对抗；究竟人性是怎样做起的，我很想把他研究出来，寻些宋、元、明、清讲学的书来看，见他所说的道理，大都是支离穿凿，迂曲难通，令人烦闷欲死。我于是乎把这些书抛开，用研究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，才知道心理学与力学是相通的。我们研究人性，不能断定他是善是恶，犹之研究水火之性质，不能断定他是善是恶一样。

孟子的性善说，荀子的性恶说，俱是一偏之见，我所讲的《厚黑学》，自然是更偏了，其偏的程度，恰与王阳明“致知良”之说相等；读者如果不明了这个道理，认真厚黑起来，是要终归失败的，读者能把我著的《心理与力学》看一下，就自然明白了。但是我们虽不想实行厚黑，也须提防人在我们名下施行厚黑，所以他们的法术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

二　厚黑学

三国英雄，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长，全在心子黑：他杀吕伯奢，杀孔融，杀杨修，杀董承伏完，又杀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顾。他明目张胆的说：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。”他心子之黑，真是达于极点了。有了这样本事，当然称为一世之雄。

其次要算刘备，他的专长，全在脸皮厚：他依曹操，依吕布，依刘表，依孙权，依袁绍，东窜西走，寄人篱下，恬不为耻；而且

生平善哭，做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，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，对人痛哭一场，立即转败为功。所以俗语有云："刘备的江山，是哭出来的。"这也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，他和曹操可称双绝。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一个心子最黑，一个脸皮最厚，一堂对晤，你无奈我何，我无奈你何。环顾袁本初诸人，卑卑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说："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。"

此外还有一个孙权，他和刘备同盟，并且是郎舅之亲，忽然袭取荆州，把关羽杀了，心子之黑，仿佛曹操；无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请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。他与曹操比肩称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，脸皮之厚，仿佛刘备；无奈厚不到底，跟着与魏绝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。他虽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备，却是二者兼备，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。他们三个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来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时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为三。

后来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相继死了，司马氏父子乘时而起，他算是受了曹、刘诸人的薰陶，集厚黑学之大成。他能够欺人寡妇孤儿，心子之黑与曹操一样。能够受巾帼之辱，脸皮之厚，还更甚于刘备。我读史见司马懿受巾帼这段事，不禁拍案大叫："天下归司马氏矣！"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统一，这都是"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"。

诸葛武候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。他下了"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"的决心，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土地，竟至呕血而死，可见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。

我把他们几个人的事反复研究，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诀发现出来，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贯之。再举楚汉的事来证明一下。

项羽拔山盖世之雄，喑呜叱咤，千人皆废，为什么身死东城，为天下耻笑？他失败的原因，韩信所说"妇人之仁，匹夫之勇"两句话包括尽了。"妇人之仁"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"匹夫之勇"，是受不得气，其病根在脸皮不厚。鸿门之宴，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，项羽已经把剑拔出来了，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，"太祖高皇帝"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挂出。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刘邦

逃走。垓下之败，如果渡过乌江，卷土重来，尚不知“鹿死谁手”。他偏偏说：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这些话，真是大错而特错：他一则曰“无面见人”，再则曰“有愧于心”，究竟敌人的“脸”，是如何做起的？敌人的“心”，是如何生起的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说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。”恐怕上天不能任咎。

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。《史记》载，项王谓汉王曰：“天下匈匈数岁，徒以吾两人耳，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。”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不斗力。”请问“笑谢”二字从何生出？

刘邦见郦生时，使两女子洗脚，郦生责他倨见长者，他立即辍洗起谢。请问“起谢”二字，又从何生出？还有亲生的父亲，身在俎上，他要分一杯羹，亲生儿女，孝惠鲁元，楚兵追至，他能够推他下车；后来又杀韩信，杀彭越，“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”，请问刘邦的心子，是何状态？岂是那“妇人之仁，匹夫之勇”的项羽所能梦见？太史著本纪，只说刘邦隆准龙颜，说项羽是重瞳子，独于二人的脸皮之厚薄，心子之黑白，没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刘邦的脸，刘邦的心，比较别人特别不同，可称天纵之圣。黑之一字，真是“生知安行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至于厚字方面，还加了点学力，他的业师，就是三杰中的张良。张良的业师，是圯上老人，他们的衣钵真传，是彰彰可考的；圯上受书一事，老人种种作用，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。这个道理，苏东坡的《留侯论》说得很明白。张良是有“慧根”的人，一经指点，言下顿悟，故老人以“王者师”期之，这种无上妙法，断非“钝根”的人所能了解；所以《史记》上说：“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独沛公善之。良曰，沛公殆天授也。”可见这种学问，全是关乎资质，明师固然难得，好徒弟亦不容易寻找。韩信求封齐王的时候，刘邦几乎误事，全靠他的业师在旁指点，仿佛现在学校中，教师改正学生习题一般。以刘邦的天资，有时还有错误，这种学问的精深，就此可以想见了。

刘邦天资既高，学力又深，把流俗所传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五伦，一一打破，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，所以能够平荡

群雄，统一海内。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馀气，方才消灭，汉家的系统，于是乎才断绝了。

楚汉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脸皮最厚，心子不黑，终归失败。此人为谁？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。胯下之辱，他能够忍受，厚的程度，是不在刘邦之下；无奈对于“黑”字，欠了研究。他为齐王时，果能听蒯通的话，当然贵不可言，他偏偏系念着刘邦“解衣推食”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说：“衣人之衣者，怀人之忧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”后来长乐钟室，身首异处，夷及三族，真是咎由自取。他讥诮项羽是“妇人之仁”，可见“心子不黑，作事是要失败”这个大原则，他本来也是知道的，但他自己在这里失败。“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”，这也怪韩信不得。

同时又有一人，心子最黑，脸皮不厚，也归失败。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姓范名增。刘邦破咸阳，系子婴，还军坝上，秋毫不犯，范增千方百计，总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刘邦仿佛；无奈脸皮不厚，受不得气。汉用陈平计，间疏楚君臣，增大怒而去，归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大凡做大事的人，那有动辄生气的道理？“增不去，项羽不亡。”他若能隐忍一下，刘邦的破绽很多，随便都可以攻进去，他偏忿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；因小不忍，坏了大事，苏东坡还称他是“人杰”，未免过誉！

据上面的研究，《厚黑学》这种学问，法子很简单，用起来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。刘邦、司马懿把它学完了，就统一天下；曹操、刘备各得一偏，也能称孤道寡，割据争雄；韩信、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辰，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，以致同归失败。但，他们在生的时候，凭着一得之长，博取王侯将相，炫赫一时；身死之后，史传中也占了一席地；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，大家都津津乐道：可见厚黑学终是不负人的。

上天生人，给我们一张脸，而厚即在其中，给我们一个心，而黑即在其中。从表面上看去，广不数寸，大不盈掬，好像了无奇异，但，著精密的考察，就知道它的“厚”是无限的，它的“黑”是无比的。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贵，宫室妻妾，衣服舆马，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。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议；钝根众生，身有至

宝，弃而不用，可谓天下之大愚。

黑厚学共分三步工夫。起初的脸皮，好像一张纸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“厚如城墙”了；最初心子的颜色，作乳白状，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蓝色，再进就“黑如煤炭”了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只能算初步工夫。因为城墙虽厚，轰以大炮，还是有打破的可能；煤炭虽黑，但，颜色讨厌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，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。

第二步是“厚而硬，黑而亮”。深于厚学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点不动，刘备就是这类人，连曹操都把他没有办法；深于黑学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买主越多，曹操就是这类人。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，这就是退光漆的亮招牌，可以招到很多的买主。人能够造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，但还着了迹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、刘的本事，我们一着眼就看出来了。

第三步是“厚而无形，黑而无色”。至厚至黑，天下后世，皆以为不厚不黑，这个境界，很不容易达到，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。有人问：“这种学问，那有这样精深？”我说：“儒家的中庸，要讲到‘无声无臭’，方能终；学止佛的人，要到‘菩提无树，明镜非台’才算证果，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，当然要到‘无形无色’才算止境。”

总之，由三代以至于今，王侯将相，豪杰圣贤，不可胜数，苟共事之有成，何一不出于此？书册具在，事实难诬。读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径，自去搜寻，自然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

三　厚黑经

李宗吾曰："不薄之谓厚，不白之谓黑。厚者天下之厚脸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世人。其书始言厚黑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写厚黑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。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"

"天命之谓厚黑，率厚黑之谓道，修厚黑之谓教；厚黑也者，不得须臾离也，可离非厚黑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，恐惧乎其所不黑，莫险乎薄，莫危乎白，是以君子必厚黑也。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，发而无顾忌，谓之黑。厚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黑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厚黑，天地畏焉，鬼神惧焉。"

右经一章，宗吾述古人不传之秘以立言，首明厚黑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，其实厚黑备于己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厚黑之要，终言厚黑功化之极。盖欲学者于此，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仁义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。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。以下各章，杂引宗吾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。

宗吾曰："厚黑之道，易而难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曹、刘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曹、刘亦有所不能焉。厚黑之大，曹、刘犹有所憾，而况于世人乎！"

宗吾曰："人皆曰予黑，驱而纳诸煤炭之中，而不能一色也；人皆曰予厚，遇乎炮弹，而不能不破也。"

宗吾曰："厚黑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众人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"

宗吾曰："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厚黑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？"

宗吾曰："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厚黑者而从之，其不厚黑者而改之。"

宗吾曰："天生厚黑于予，世人其如予何?"

宗吾曰："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说也。"

宗吾曰："君子无终食之间违厚黑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"

宗吾曰："如有项羽之才之美，使厚且黑，刘邦不足观也已!"

宗吾曰："厚黑之人，能得千乘之国；苟不厚黑，箪食豆羹不可得。"

宗吾曰："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，苟为不熟，不如荑稗；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"

宗吾曰："道学先生，厚黑贼也。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曹、刘之道，故曰：厚黑之贼也。"

宗吾曰："无惑乎人之不厚黑也！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见人讲厚黑亦罕矣！吾退而道学先生至矣！吾其如道学先生何哉？今夫厚黑之为道，大道也，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。宗吾发明厚黑学者也，使宗吾诲二人厚黑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宗吾之为听，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道学先生将至，思窃圣贤之名而居之，则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！为其资质弗若欤？曰：非也。"

宗吾曰："有失败之事于此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厚；其自反而厚矣，而失败犹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黑；其自反而黑矣，其失败犹是也，君子曰：反对我者，是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！用厚黑以杀禽兽，又何难焉?"

宗吾曰："厚黑之道，高矣美矣？宜若登天然，而未尝不可几及也。譬如行远，必自迩，譬如登高，必自卑；身不厚黑，不能行于妻子，使人不以厚黑，不能行于妻子。"

我著厚黑经，意在使初学的人便于讽诵，以免遗忘。不过有些道理，太深奥了，我就于经文上下加以说明。

宗吾曰："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；不曰黑乎，洗而不白。"后来

我改为："不日厚乎，越磨越厚；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"有人问我："世间那有这种东西?"我说："手足的茧疤，是越磨越厚；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"人的面皮很薄，慢慢的磨练，就渐渐的加厚了；人的心，生来是黑的，遇着讲因果的人，讲理学的人，拿些道德仁义蒙在上面，才不会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体自然出现。

宗吾曰："厚黑者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天生烝民，有厚有黑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厚黑。"这是可以试验的。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，把她亲生孩子抱着吃饭，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，就伸手去拖，如不提防，就会被他打烂；母亲手中拿着糕饼，他一见就伸手来拿，如果母亲不给他，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，他就会伸手把母亲口中糕饼取出，放在他自已的口中。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，哥哥走至面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这些事都是"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"的，这即是"良知良能"了。把这种"良知良能"扩充出去，就可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。唐太宗杀他的哥哥建成，杀他的弟弟元吉，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儿于全行杀死，把元吉的妃子纳入后宫，又逼着父亲把天下让与他。他这种举动，全是把当小孩时，抢母亲口中糕饼和推哥哥、打哥哥那种"良知良能"扩充出来的。普通人，有了这种"良知良能"不知道扩充，惟有唐太宗把它扩充了，所以他就成为千古的英雄。故宗吾曰："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于至而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谓厚也，黑也。英雄特扩充我面与心之所同然耳。"

厚黑这个道理，很明白的摆在面前，不论什么人都可见到，不过刚刚一见到，就被感应篇、阴骘文或道学先生的学说压伏下去了。故宗吾曰："牛山之木尝美矣，斧斤伐之，非无萌孽之生焉；牛羊又从而牧之，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虽存乎人者，岂无厚与黑哉！其所以摧残其厚黑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则其厚黑不足以存。厚黑不足以存，则欲为英雄也难矣。二人见其不能为英雄也，而以为未尝有厚黑焉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养，厚黑日长；苟失其养，厚黑日消。"

宗吾曰："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，皆知抢而夺之矣，人能充其抢母亲口中糕饼之心，而厚黑不可胜用也，足以为英雄为豪杰。是之谓'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'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保身体，是之谓'自暴自弃'。"

有一种天资绝高的人，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实力奉行，秘不告人。又有一种人资质鲁钝的人，已经走入这个途径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故宗吾曰："行之而不著焉，习之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，而不知厚黑者众也。"

世间学说，每每误人，惟有厚黑学绝不会误人，就是走到了山穷水尽，当乞丐的时候，讨口饭吃，也比别人多讨点饭。故宗吾曰："自大总统以至于乞儿，壹是皆以厚黑为本。"

厚黑学博大精深，有志此道者，务须专心致志，学过一年才能应用，学过三年，才能大成。故宗吾曰："苟有学厚黑者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"

四　厚黑传习录

有人问我道："你发明厚黑学，为什么你做事每每失败，为什么你的学生的本领还比你大，你每每吃他的亏？"我说："你这话差了。凡是发明家，都不可登峰造极。儒教是孔子发明的，孔子登峰造极了，颜、曾、思、孟去学孔子，他们的学问，就比孔子低一层；周、程、朱、张去学颜、曾、思、孟，学问又低一层；后来学周、程、朱、张的，更低一层，愈趋愈下，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领太大了。西洋的科学则不然，发明的时候很粗浅，越研究越精深。发明蒸气的人，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；发明电气的人，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。后人继续研究下去，造出种种的机械，有种种的用途，这是发明蒸气、电气的人所万不逆料的。可见西洋科学，是后人胜过前人，学生胜过先生；我的"厚黑学"与西洋科学相类。我只能讲点

汽冲壶盖、死蛙运动，中间许多道理，还望后人研究，我的本领当然比学生小，遇着他们，当然失败；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，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。一辈胜过一辈，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！"

又有人问道："你把厚黑学讲得这样神妙，为什么不见你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?"我说道："我试问：你们的孔夫子，究竟做出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?"他讲的为政为邦，道千乘之国，究竟实行了几件？曾子著一部《大学》，专讲治国平天下，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？平的天下在哪里？子思著了一部《中庸》，说了些中和的话，请问他中和位育的实际安在？你不去质问他们，反来质问我，明师难遇，至道难闻，这种'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'你听了还要怀疑，未免自误。"

我把厚黑学发表出来，一般人读了，都说道："你这门学问，博大精深，难于领悟，请指示一条捷径。"我问他："想做什么?"他说："我想弄一个官来做，并且还要轰轰烈烈的做些事，一般人都认为是大政治家。"我于是传他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。

求官六字真言

求官六字真言："空、贡、冲、捧、恐、送"。此六字俱是仄声，其意义如下：

1）空

即空闲之意，分两种：一指事务而言，求官的人，定要把一切事放下，不工不商，不农不贾，书也不读，学也不教，一心一意，专门求官。二指时间而言，求官的人要有耐心，不能着急，今日不生效，明日又来，今年不生效，明年又来。

2）贡

这个字是借用的，是四川的俗语，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，"钻进钻出"，可以说"贡进贡出"。求官要钻营"这是众人知道的，

但是定义很不容易下。有人说："贡字的定义，是有孔必钻。"我说："我错了！只说得一半，有孔才钻，无孔者其奈之何？"我下的定义是："有孔必钻，无孔也要入。"有孔者扩而大之；无孔者，取出钻子，新开一孔。

3）冲

普通所谓之"吹牛"，四川话是"冲帽壳子"。冲的工夫有两种：一是口头上，二是文字上的。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峰的面前两种；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帖条陈两种。

4）捧

就是捧场的捧字。戏台上魏公出来了，那华欲歆的举动，是绝好的模范的人物。

5）恐

是恐吓的意思，是及物动词。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，我不妨多说几句。官之为物，何等宝贵，岂能轻易给人？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，还不生效，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；凡是当道诸公，都有软处，只要寻着他的要害，轻轻点他一下，他就会惶然大吓，立刻把官儿送来。学者须知，恐字与捧字，是互相为用的，善恐者捧之中有恐，旁观的人，看他在上峰面前说的话，句句是阿谀逢迎，其实是暗击要害，上峰听了，汗流侠背。善捧者恐之中有捧，旁观的人，看他傲骨棱棱，句句话责备上峰，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，骨节皆酥。"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"，"大匠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"，是在求官的人细心体会。最要紧的，用恐字的时候，要有分寸，如用过度了，大人们老羞成怒，作起对来，岂不就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？这又何苦乃尔？非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恐字不能轻用。

6）送

即是送东西，分大小二种：大送，把银元钞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；小送，如春茶、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。所送的人分两种，一是操用舍之权者，二是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。

这六字做到了，包管字字发生奇效，那大人先生，独居深念，自言自语说：某人想做官，已经说了许多（这是空字的效用），他和我有某种关系（这是贡字的效用），其人很有点才具（这是冲字的效

用），对于我很好（这是捧字的效用）。但此人有点坏才，如不安置，未必不捣乱（这是恐字的效用），想到这里，回头看见桌上黑压压的，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（这是送字的效用），也就无话可说，挂出牌来，某缺着某人署理。求官到此，可谓功行圆满了。于是走马上任，实行做官六字真言。

做官六字真言

做官六字真言："空、恭、绷、凶、聋、弄"。此六字俱是平声，其意义如下：

1）空

空即空洞的意思。一是文字上，凡是批呈词、出文告，都是空空洞洞的，其中奥妙，我难细说，请到军政各机关，把壁上的文字读完，就可恍然大悟；二是办事上，随便办什么事情，都是活摇活动，东倒也可，西倒也可，有时办得雷厉风行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，如果见势不佳，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，绝不会把自己牵挂着。

2）恭

就是卑躬折节，胁肩谄笑之类，分直接间接两种，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，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，丁役及姨太太等等而言。

3）绷

即俗语所谓绷劲，是恭字的反面字，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。分两种。一是仪表上，赫赫然大人物，凛不可犯；二是言谈上，俨然腹有经纶，桀桀大才。恭字对饭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上司；绷字对非饭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，有时甑子之权，不在上司，则对上司亦不妨绷；有时甑子之权，操诸下属或老百姓，又当改而为恭。吾道原是活泼泼地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4）凶

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，他人亡身灭家，卖儿贴妇，都不必顾忌；

但有一层应当注意，凶字上面，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。

5）聋

就是耳聋："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。"但，聋字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，文字上的低骂，闭着眼睛不看。

6）弄

即弄钱之弄，川省俗语读作平声。千里来龙，此处结穴，前面的十一个字，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。弄字与求官之送字是对照的，有了送就有弄。这个弄字，最要注意，是要能够在公事上通得过才成功。有时通不过，就自己垫点腰包里的钱，也不妨；如果通得过，任他若干，也就不用客气了。

以上十二个字，我不过粗举大纲，许多的精义，都没有发挥，有志于官者可按门径，自去研究。

办事二妙法

1）锯箭法

有人中了箭，请外科医生治疗，医生将箭干锯下，即索谢礼。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？他说：那是内科的事，你去寻内科好了。这是一段相传的故事。

现在各军政机关，与□□□□□都是用的这种方法。譬如批呈词："据呈某某等情，实属不合已极，仰候令饬该县知事，查明严办。""不合已极"这四个字是锯箭干，"该知事"是内科，抑或"仰候转呈上峰核办"，那"上峰"就是内科。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，我说："这个事情我很赞成，但是，还要同某人商量。""很赞成"三字是锯箭干，"某人"是内科。又或说："我先把某部分办了，其余的以后办。""先办"是锯箭干，"以后"是内科。此外有只锯箭干，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，也有连箭干都不锯，命其径寻内科的，种种不同，细参自悟。

2）补锅法

做饭的锅漏了，请补锅匠来补。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，一面对主人说："请点火来我烧烟。"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，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，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，及主人转来，就指与他看，说道："你这锅裂痕很长，上面油腻了，看不见，我把钢烟刮开，就现出来了，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。"主人埋头一看，很惊异的说："不错！不错！今天不遇着你，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！"及至补好，主人与补锅匠，皆大欢喜而散。

郑庄公纵容共叔段，使他多行不义，才举兵征讨，这就是补锅法了。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。有人说："中国变法，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。"这是变法诸公用的补锅法。在前清宦场，大概是用锯箭法，民国以来，是锯箭、补锅二者互用。

上述二妙法，是办事的公例，无论古今中外，合乎这个公例的就成功，违反这个公例的即失败。管仲是中国的大政治家，他办事就是用这两种方法。狄人伐卫，齐国按兵不动，等到狄人把卫绝了，才出来做"兴灭国继绝世"的义举，这是补锅法。召陵之役，不责楚国僭称王号，只责他包茅不贡，这是锯箭法。那个时候，楚国的实力，远胜齐国，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伐楚，可说是锅敲烂了来补。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，他立即锯箭了事。召陵一役，以补锅法始，以锯箭法终，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，所以称为"天下才"。

明季武臣，把流冠围住了，故意放他出来，本是用的补锅法，后来制他不住，竟至国破君亡，把锅敲烂了补不起，所以称为"误国庸臣"。岳飞想恢复中原，迎回二帝，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，就遭杀身之祸。明英宗也先被捉去，于谦把他弄回来，算是把箭头取出了，仍然遭杀身之祸，何以故？违反公例故。

晋朝王导为宰相，有一个叛贼，他不去讨伐。陶侃责备他，他复信说："我遵养时晦，以待足下。"侃看了这封信笑说："他无非是'遵养时贼'罢了。"王导"遵养时贼"以待陶侃，即是留着箭头，专等内科。请名士在新亭流涕，王导变色曰："当共戳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对泣？"他义形于色，俨然手执铁锤，要去补锅，其实说两句漂亮话就算完事，怀、愍二帝，陷在北边，永世不

返，箭头水未取出。王导这种举动，略略有点像管仲，所以历史上称他为“江左夷吾”。读者如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，包管成为管子而后的第一个大政治家。

五 结 论

说了一大堆的话，在这收头结大瓜的时候，不妨告诉读者一点秘诀：厚黑的施用，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，不能把它赤裸裸的表现出来。王莽的失败，就是由于露出了厚黑的原故。如果终身不露，恐怕王莽至今还在孔庙里吃冷猪肉。韩非子说：“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”这个法子，也是定要的。即如我著这本《厚黑学》，你们应当秘藏枕中，不可放在桌上。假如有人问你：“你认识李宗吾吗?”你就要做一种很庄严的面孔说：“这个人坏极了，他是讲厚黑学的，我认他不得。”口虽这样说，但，心里应当供一个“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”。你们能够这样做去，生前的事业，一定惊天动地，死后一定入孔庙吃冷猪肉无疑。所以我每听见人骂我，我非常高兴，说道：“吾道大行矣。”

还有一点，我前面说：“厚黑上面，要糊上一层仁义道德。”这是指遇着道学先生而言。假如遇着讲性学的朋友，你同他讲仁义道德，岂非自讨没趣?这个时候，应当糊上“仁爱神圣”四个字。若遇着了讲马克思的朋友，就糊上“阶级斗争，劳工专政”八个字，难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吗?总之，面子上应当糊以甚么东西，是在学者因时因地，神而明之，而里子的厚黑二字，则万变不离其宗。有志斯学者，细细体会!

我对于圣人之怀疑

自 序

我原来是孔子的信徒，小的时候父亲与我命的名，我嫌他不好，见《礼记》上孔子说，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，就自己改名世楷，字宗儒，表示信从儒教之意。光绪癸卯年，我从富顺赴成都读书，与友人雷君砻皆同路，每日步行百里，途中无事，纵谈时局，并寻些经史，彼此讨论。他对于时事，非常愤慨，心想铁肩担宇宙，就改字铁崖。我觉得儒家学说，有许多缺点，心想与其宗孔子，不如宗自己，因改字宗吾。从此之后，我的思想，也就改变，每读古人的书，就有点怀疑，对于孔子，虽未宣布独立，却是宗吾二字，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，二十多年前，已经树立了。

我见二十四史上一切是非都是颠倒错乱的，曾做了一本《厚黑学》，说古来成功的人，不过面厚心黑罢了，民国元年，曾在成都报纸上发表。我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分怀疑，做了一篇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。这篇文字，我从前未曾发表。

我做了那两种文字之后，心中把一部二十四史，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扫除干净，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，觉得人心的变化，处处是跟着力学轨道走的，从古人事迹上，现今政治上，日用琐事上，自己心坎上，理化数学上，中国古书上，西洋学说上，四面八方，印证起来，似觉处处可通。我于是创设了一条臆说：心理之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这是我一人的拘墟之见，是否合理，不得而知，特著《心理与力学》一篇，请阅者赐教。

我应用这条臆说，觉得现在的法令制度，很有些错误的地方，我置身学界把学制拿来研究，曾做了一篇《考试制之商榷》，又著了一篇《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》，曾在成都报纸发表，并经四川教育厅印行。那个时候，我这个臆说，还未发表，文中只就现在的学制陈说利弊，我的根本原理，未曾说出，诸君能把那两篇文字，与这篇《心理与力学》对看，合并赐教，更是感激。我近日做有一篇《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》，也附带请教。

我从癸卯年，发下一个疑问，孔孟的道理，既是不对，真正的道理，究竟在甚么地方？这个疑团，蓄在心中，迟至二十四年，才勉强寻出一个答案，真可谓笨极了，我重在解释这个疑问，很希望阅者指示迷途，我绝对不敢自以为是，指驳越严，我越是感激。如果我说错了，他人说得有理，我就抛弃我的主张，改从他人之说，也未尝不可。诸君有赐教的，请在报纸上发表，如能交成都国民公报社社长李澄波先生，或成都新四川日刊社社长周雁翔先生代转，那就更好了。

我从前做的《厚黑学》及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，两种文字的底稿，早已不知抛往何处去了，我把大意写出来，附在后面，表明我思想之过程。凡事有破坏，才有建设，这两篇文字，算是一种破坏，目的在使我自己的思想独立，所以文中多偏激之论，我们重在寻求真理，无须乎同已死的古人争闹不休。况且我们每研究一理，全靠古人供给许多材料，我们对于古人，只有感谢的，更不该吹毛求疵。这两篇文字的误点，我自己也知道，诸君不加以指正也使得。

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李世楷序于成都

我对于圣人之怀疑

我先年对于圣人，很为怀疑，细加研究，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，曾做了一篇《圣人的黑幕》。民国元年本想与《厚黑学》同时发表，因为《厚黑学》还未登载完，已经众议哗然，说我破坏道德，煽惑人心，这篇文字，更不敢发表了，只好藉以解放自己的思想。现在国内学者，已经把圣人攻击得身无完肤，中国的圣人，已是日暮途穷。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，本不该乘圣人之危，坠井下石，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，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，略说一下。

世间顶怪的东西，要算圣人，三代以上，产生最多，层见叠出，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。三代以下，就绝了种，并莫产出一个。秦汉而后，想学圣人的，不知有几千百万人，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，最高的，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。请问圣人这个东西，究竟学得到学不到？如说学得到，秦汉而后，有那么多人学，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；如果学不到，我们何苦朝朝日日，读他的书，拼命去学？

三代上有圣人，三代下无圣人，这是古今最大怪事，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。我们把他分析一下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余的圣人，尽是开国之君，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，他的破绽，就现出来了。

原来周秦诸子，各人特创一种学说，自以为寻着真理了，自信如果见诸实行，立可救国救民，无奈人微言轻，无人信从。他们心想，人类通性，都是惊幕权势的，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，人人都能够听从。世间权势之大者，莫如人君，尤莫如开国之君，兼之那个时候的书，是竹简做的，能够得书读的很少，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，我这种主张，是见之书上，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。于是道家托于黄帝，墨家托于大禹，倡并耕的托于神农，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，著医书的，著兵书的，俱托于黄帝。此外百家杂技，与夫各种发明，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。孔子生当其间，当然也

不能违背这个公例。他所托的更多，尧舜禹汤文武之外，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，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。周秦诸子，个个都是这个办法，拿些嘉言懿行，与古帝王加上去，古帝王坐享大名，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。

周秦诸子，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，聚徒讲授，各人的门徒，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。原来圣人二字，在古时并不算高贵，依《庄子·天下篇》所说，圣人之上，还有天人、神人、至人等名称，圣人列在第四等；圣字的意思，不过是闻声知情，事无不通罢了，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，都可呼之为圣人，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，人人都称得，后来把朕字、圣字收归御用，不许凡人冒称，朕字、圣字才高贵起来。周秦诸子的门徒，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，也不为僭妄。孔子的门徒，说孔子是圣人，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，老庄杨墨诸人，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表章六经，罢黜百家，从周秦诸子中，把孔子挑选出来，承认他一人是圣人，诸子的圣人名号，一齐削夺，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。孔子既成为圣人，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。所以中国的圣人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余的是开国之君。

周秦诸子的学说，要依托古之人君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这可举例证明。南北朝有个张士简，把他的文章拿与虞讷看，虞讷痛加诋斥。随后张士简把文改作，托名沈约，又拿与虞讷看，他就读一句，称赞一句。清朝陈修园，著了一本《医学三字经》，其初托名叶天士，及到其书流行了，才改归己名。有修园的自序可证。从上列两事看来，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，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，岂能传到今日？周秦诸子，志在救世，用了这种方法，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，后人受赐不少。我们对于他们是应该感谢的，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，他们的内幕，是不能不揭穿。

孔子之后，平民之中，也还出了一个圣人，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。凡人死了，事业就完毕，惟有关羽死了过后，还干了许多事业，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，又著有《桃园经》、《觉世真经》等书，流传于世。孔子以前，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，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。

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，讲因果的，就说他阴功积得多，讲堪舆的，就说他坟地葬得好，看相的，算命的，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。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，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，看见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，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，道德如何好，这些说法流传下来，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。兼之，凡人皆有我见，心中有了成见，眼中所见的东西，就会改变形象。带绿眼镜的人，见凡物皆成绿色；带黄眼镜的人，见凡物皆成黄色。周秦诸人，创了一种学说，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，古人自然会改形变相，恰与他的学说符合。

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。他胖无胈，胚无毛，忧其黔首，颜色黎墨，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。韩非子说："禹朝诸侯于会稽，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。"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。孔子说："禹，吾无间然矣。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"俨然是恂恂儒者，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。读魏晋以后禅让文，他的行径，又与曹丕、刘裕诸人相似。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，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。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，是个狐狸精，仿佛是《聊斋》上的公子书生；说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，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；又说他治水的时候，驱遣神怪，又有点像《西游记》上的孙行者，《封神榜》上的姜子牙。据著者的眼光看来，他始而忘亲事仇，继而夺仇人的天下，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，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。他这个人，光怪陆离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余的圣人，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。我们略加思索，圣人的内幕，也就可以了然了。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，各人的幻想不同，所以圣人的形状，有种种不同。

我做了一本《厚黑学》，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，又推到春秋战国，也是相合的，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，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。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，尽都是天理流行，惟精惟一，厚黑学是不适用的。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，仿佛三代上的人心，与三代下的人心，成为两截了，岂不是很奇的事吗？其实并不奇。假如文景之世，也像汉武帝的办法，

把百家罢黜了，单日老子一人，说他是个圣人，老子推崇的黄帝，当然也是圣人，于是乎平民之中，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，开国之君，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。老子的心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黄帝的心，也是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。黄帝而后，人心就不古，尧夺哥哥的天下，舜夺妇翁的天下，禹夺仇人的天下，成汤文武以臣叛君，周公以弟弑兄。我那本《厚黑学》，直可逆推到尧舜而止，三代上的人心，三代下的人心，就融成一片了。无奈再追溯上去，黄帝时代的人心，与尧舜而后的人心，还是要成为两截的。

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，成了御赐的圣人，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，一定会被庄子夺去，我们读的四子书，一定是老子、庄子、列子、关尹子，所读的经书，一定是灵枢、素问，孔孟的书，与管商申韩的书，一齐成为异端，束请高阁，不过遇着好奇的人，偶尔翻来看看，大学、中庸在礼记内，与王制、月令并列。人心惟危十六字，混在曰若稽古之内，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奥妙了。后世讲道学的人，一定会向道德经中，玄牝之门，埋头钻研，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，理牝欲牝种种名词，互相讨论。依我想，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是。

儒家的学说，以仁义为立足点，定下一条公例，行仁义者昌，不行仁义者亡。古今成败，能合这个公例的，就引来做证据，不合这个公例的，就置诸不论。举个例来说，太史公《殷本纪》说："西伯归，乃阴修德行善。"《周本纪》说："西伯阴行善。"连下两个阴字，其作用就可想见了。齐世家更直截了当说道："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，其事多兵权与奇计。"可见文王之行仁义，明明是一种权术，何尝是实心为民。儒家见文王成了功，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。徐偃王行仁义，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，荆文王恶其害己也，举兵灭之。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，儒者就绝口不提。他们的论调，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，见人富贵，就说他积得有阴德，见人触电器死了，就说他忤逆不孝。推其本心，固是劝人为善，其实真正的道理，并不是那么样。

古来的圣人，真是怪极了！虞芮质成，脚踏了圣人的土地，立即洗心革面。圣人感化人，有如此的神妙，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

人，母亲是圣人，哥哥弟弟是圣人，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，何以中间会产生鸱号。清世宗呼允祀为阿其那，允禟为塞思赫黑，翻译出来，是猪狗二字。这个猪狗的父亲也是圣人，哥哥也是圣人，鸱号猪狗，会与圣人错杂而生，圣人的价值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
李自成是个流贼，他进了北京，寻着崇帧帝后的尸，载轻宫扉，盛以柳棺，放在东华门，听人祭奠。武王是个圣人，他走至纣死的地方，射他三箭，取黄钺把头斩下来，悬在太白旗上。他们爷儿，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，做出这宗举动，他们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，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，真是妙极了。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，吴三桂投降了，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？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，他那闯太祖本纪，所载深仁厚泽，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。

大王实始翦商，王季、文王继之，孔子称武王缵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？所异者，一个生在孔子前，得了世世圣人之名，一个生在孔子后，得了世世逆臣之名。

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，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，到了证据确凿，无从开脱的时候，就说书上的事迹，出于后人附会。这个例是孟子开的，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，断不会有流血的事，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。我们从殷民三叛，多方大渚，那些文字看来，可知伐纣之时，血流漂杵不假，只怕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句话有点假。

子贡曰："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"我也说："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愿居上流，而天下之美皆归焉。"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，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，更觉确切。

古人神道设教，祭祀的时候，叫一个人当尸，向众人指说道："这就是所祭之神。"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。同时又以至道设教，对众人说："我的学说，是圣人遗传下来的。"有人问："哪个是圣人?"他就顺手指着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说道："这就是圣人。"众人也把你当如尸一般，朝着他磕头礼拜。后来进化了，人民醒悟了，祭扫的时候，就把尸撤消，惟有圣人的迷梦，数千年未醒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。

讲因果的人，说有个阎王，问阎王在何处，他说在地下；讲耶教的人，说有个上帝，问上帝在何处，他说在天上；讲理学的人，说有许多圣人，问圣人在何处，他说在古时。这三种怪物，都是只可意中想像，不能目睹，不能证实。惟其不能证实，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，信从的人就越是多。在创这种议论的人，本是劝人为善，其意固可嘉，无如事实不真确，就会生出流弊。因果之弊，流为拳匪圣人之弊，使真理不能出现。

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，天下的言论，都折衷于孔子，不敢违背。孔融对于父母问题，略略讨论一下，曹操就把他杀了。嵇康非薄汤武，司马昭也就把他杀了。儒教能够推行，全是曹操、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，后来开科取士，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，就莫得进身之路。一个死孔子，他会左手拿官爵，右手拿钢刀，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？宋、元、明、清学案中人，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，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，他们的议论，焉得不支离穿凿？焉得不迂曲难通？

中国的圣人，是专横极了，他莫有说过的话，后人就不敢说，如果说出来，众人就说他是异端，就要攻击他。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，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“格物致知”加一番解释，说他的学说，是孔子嫡传，然后才有人信从。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，也只好把“格物致知”加一番新解释，以附会己说，说朱子讲错了，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。本来朱、王二人的学说，都可以独树一帜，无须依附孔子，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，不依附孔子，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。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，还说是伪学，受重大的攻击。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，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出来？

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，郢人致书于燕相国，写书的时候，天黑了，喊“举烛”，写书的人，就写上“举烛”二字，把书送去。燕相得书，想了许久，说道：“举烛是尚明，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。”就对燕王说了。燕王听他的话，国遂大治。虽是收了效，却非原书本意，所以韩非说：“先王有郢书，后世多燕说。”究竟“格物致知”四字。作何解释，恐怕只有手著《大学》的人才明白，朱、王二人中，至少有一人免不脱毁书燕说的批评，岂但“格物致知”四

字，恐怕十三经注疏，皇清经解，宋元明清学案内面，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。

学术上的黑幕，与政治上的黑幕，是一样的。圣人与君主，是一胎双生的，处处狼狈相依。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，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；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，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。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，圣人就称起王来了；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，君主也称起圣来了。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，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。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，人民都要遵从；如果有人违背了，就算是大逆不道，为法律所不容。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，学者都要信从；如果有人批驳了，就算是非圣无法，为清议所不容。中国的人民，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，民意不能出现，无怪乎政治紊乱；中国的学者，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，思想不能独立，无怪乎学术销沉。因为学说有差误，政治才会黑暗，所以君主之命该革，圣人之命尤其该革。

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，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，我只说除了孔子，也还有人格，也还有学说。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，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，无如后来的人，偏要抬出孔子，压倒一切，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的范围之外。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，理应把他推开，思想才能独立，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。前几年，有人把孔子推开了，同时杜威、罗素就闯进来，盘踞学者心坎上，天下的言论，又热衷于杜威、罗素，成一个变形的孔子，有人违反了他的学说，又算是大逆不道，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。如果杜威、罗素去了，又会有人出来，执行孔子的任务。他的学说，也是不许人违反的。依我想，学术是天下公物，应该听人攻击，如果说错了，改从他人之说，于己也无伤，何必取军阀态度，禁人批评。

凡事以平为本。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，故政治上生纠葛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，故学术上生纠葛。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，与周秦诸子平列，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，与他们平坐一排，把杜威、罗素诸人欢迎进来，分庭抗礼，发表意见，大家磋商。不许孔子、杜威、罗素高踞我们之上，我们也不高踞孔子、杜威、罗素之上。人人思想独立，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。

我对于众人既已怀疑，所以每读古人之书，无在不疑，固定下读书三诀，为自己用功步骤。兹附录于下。

读书三诀：

第一步，以古为敌。读古人之书，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，有了他，就莫得我，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。逐处寻他缝隙，一有缝隙，即便攻入；又代古人设法抗拒，愈战愈烈，愈攻愈深。必要如此，读书方能入理。

第二步，以古为友。我若读书有见，即提出一种主张，与古人的主张对抗，把古人当如良友，互相切磋。如我的主张错了，不妨改从古人；如古人主张错了，就依着我的主张，向前研究。

第三步，以古为徒。著书的古人，学识肤浅的很多，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，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，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。说得对的，与他加几个密圈；说得不对的，与他划几根杠子。我想世间俚语村言，含有妙趣的，尚且不少，何况古人的书，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，我评阅越多，智识自然越高，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。如遇一个古人，智识与我相等，我就把他请出来，以老友相待，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。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，我又把他认为劲敌，寻他缝隙，看攻得进攻不进。

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，其实并莫有做到，自己很觉抱愧。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，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。至于第三步，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。譬如行路，虽然把路径寻出，无奈路太长了，脚力有限，只好努力前进，走一截，算一截。

厚黑丛话

自 序

民国十六年，我将历年作品汇刊一册，名曰《宗吾臆谈》，内容计：（1）厚黑学；（2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；（3）心理与力学；（4）考试制之商榷；（5）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。十七年，我把"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"扩大为一单行本，题曰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。第六章有云："我讨论这个问题，自有我的根据地，并未依傍孙中山，乃所得结果。中山已先我而言之，真理所在，我也不敢强自立异。于是把我研究所得，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资料"，云云。此书流传至南京，石青阳与刘公潜见之，曾电致四川省政府刘主席自乾，叫我入京研究党义，我因事未去。本年我到重庆，伍君心言对我说："你著的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曾揭登南京《民生报》，许多人说你对于孙中山学说，有独到之见。你可再整理一下，发表出来，大家讨论。"我因把原作再加整理，名曰《改革中国之我见》。

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理论多而办法少，我认为现在所需要者，是办法，不是理论，乃将原书大加删除，注重办法。原书偏于经济方面，乃再加入政治和外交，基于经济之组织，生出政治之组织，基于经济政治之方式，生出外交之方式。换言之，即是由民生而民权，而民族，三者联为一贯，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的东西了。书成拿到省党部，请胡素民、颜伯通二君批评。二君道："此书精神上，对于三民主义完全吻合，但办法上，有许多地方，孙中山未曾这样说，如果发表出来，恐浅见者流生出误会，你可以不必发表。"我因把原稿收藏

起。我是发明厚黑学的人，还是回头转来讲我的厚黑学，因此才写《厚黑丛话》。

我生平揭的标帜，是“思想独立”四字。因为思想独立，就觉得一部二十四史，和四书五经，与宋元明清学案，无处不是破绽。《厚黑学》一文，是揭穿一部二十四史的黑幕；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一文，是揭穿一部宋元明清学案的黑幕。马克思的思想，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；我的思想，可说是建筑在厚黑史观上。

我的思想，既以厚黑史观为基础，则对于人性不能不这样的观察，对于人性既这样观察，则改革经济、政治、外交等等，不能不有这样的办法。今之研究三民主义者，是置身三民主义之中，一字一句研究。我是把中国的四书五经，二十四史，和宋、元、明、清学案，与夫外国的……斯密士、达尔文、卢梭、克鲁泡特金、孟德斯鸠等等，一齐扫荡了，另辟蹊径，独立研究，结果与三民主义精神相合，成了殊途同归，由此可以证明孙中山学说是合真理的。

孙中山尝说：“主义不能变更，政策可因时势而变更。”主义者，精神也；政策者，办法也，我们只求精神上与三民主义相合，至于办法上，大家可提些出来，公开讨论……。办法生于理论，我的理论，以厚黑史观为基础，故从厚黑学讲起来。

此次所写《厚黑丛话》，是把我旧日作品和新近的感想糅合写之。我最近还做有一本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，曾拿与友人舒君实、官梦兰二君看，二君都说可以发表，我也把他拆散写入，将所有作品冶为一炉，以见思想之一贯。中间许多说法，已越出厚黑学范围，而仍名之为《厚黑丛话》者，因种种说法，都是从厚黑学生出来，犹之树上的枝叶花果，是从树干生出来，题以厚黑二字，示不忘本也。

我这《厚黑丛话》，从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，逐日在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发表，每日写一两段，每两个月合刊一册，请阅者赐教。旧著《宗吾臆谈》和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我送有两本在成都图书馆，读者可便中取阅。有不合处，一经指出，即当遵照修改。

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，李宗吾于成都

致读者诸君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

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，《成都快报》载有窦枕原君所写《读（厚黑丛话）与（厚黑学的基础安在）后的意见》，说道：“《厚黑丛话》是李先生按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。《厚黑学的基础安在》，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。我呢，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，不便有什么言论，来判定谁是谁非，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。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，按月刊成单行本，露布书店，使阅者得窥全豹，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。愚见如此，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?”窦君这种主张，我极端赞成，决定每两月刊一册，自八月一日至九月卅日，在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发表的《厚黑丛话》，业已加以整理，交付印刷局，不日即可出版，余者续出。

同日快报载客尘君《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》一文，内云：“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，最大的原因，便是囊空如洗，一钱莫名，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，异常拖沓拉杂……。”客尘君既不自出单行本，我打算纂一部《厚黑丛话之批评》，以若干页为一册，挨次出版，册数之多寡，视批评者之多寡为断。快报十一月十日所载窦君及客尘君两文，决定刊入。又成都《新四川日报》十月十三日载子健君《健斋琐录》，对于厚黑学亦有批评，亦当录入。至客尘君所著《厚黑学的基础安在》，我希望客尘加以整理，力求短简明洁，在报上重新发表，以便刊行。如或过长，只好仍请客尘君自印单行本。

客尘君在快报上宣言要向我总攻击，所谓总攻者，无所不攻之谓也。客尘君写了如许长的文字，只攻击我“厚黑救国”四字，拙作中类此四字者很多，请一一攻击，俾知谬点所在。我为客尘君计，可每文标一题目，直揭出攻击之点，简简单单的数百字，一日登完，庶阅者一目了然。不必用《厚黑学的基础安在》那种写法，定一个

大题目，每次登一两千字，几个星期都未登完，致流于拖沓拉杂之弊。客尘君以我的话为然否？并希望其他的批评者也这样办。

我这《厚黑丛话》，不断写去，逐日《华西日报》发表，究竟写好长，写好久，我也无一定计划。如无事故，而又心中高兴，就长期写去。凡批评的文字，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，无论赞成或反对，俱一一刊入；且反对愈烈者，我愈欢迎。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，常喜欢攻击他人，因之也喜欢他人攻击我。有能痛痛快快的攻击我，我就认他是我的同志，当然欢迎。惟文字冗长，词意晦涩者则不录。其直接寄我之信函，而未经报章杂志披露者亦不录。

我平居无事，即寻些问题来研究，研究所得，究竟合与不合，自己无从知道，特写出来，请求阅者指正。我研究这些问题，已闹得目迷五色，好像彷徨失路的人。诸君旁观者清，万望指我去路，我重再把这些道理研究明白。只要把真理寻出就好了，不必定要是我寻出的，犹之救国救民等事，只要人民的痛苦能够解除就好了，不必定要功自我出。我只埋头发表我的意见，或得或失，一任读者批评，自己不能置辩一字，我说错了，自当改从诸君之主张，不敢固执己见。

我这《厚黑丛话》，是把平日一切作品和重庆《新蜀报》发表的《□随录》，《济川报》发表的《汲心斋杂录》，连同近日的新感想，糅合写之，所讨论的问题，往往轶出厚黑二字之外。诸君可把这“厚黑丛话”四字当如书篇名目，如《容斋随笔》、《北梦琐言》之类，如把这四字，认为题目，则我许多说法，都成为文不对题了。

诸君批评的文字，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后，请惠赠一份，交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副刊部转交，无任感盼。

李宗吾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

厚黑丛话卷一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

著者于满清末年发明厚黑学，大旨言一部二十四史中的英雄豪杰，其成功秘诀不外面厚心黑四字，历引史事为证。民国元年，揭登成都《公论日报》，计分三卷，上卷厚黑学，中卷厚黑经，下卷厚黑传习录。发表出来，读者哗然。中卷仅登及一半，我受友人的劝告，也就中止。原文底稿，已不知抛弃何所。十六年，刊《宗吾臆谈》，把三卷大意摘录其中。去年舍侄等在北平，从《臆谈》中抽出，刊为单行本，上海某杂志，似乎也曾登过。

我当初本是随便写来开玩笑，不料从此以后，厚黑学二字，竟洋溢乎四川，成一普通名词。我也莫名其妙，每遇着不相识的朋友，旁人替我介绍，必说道："这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。"几于李宗吾三字和厚黑学三字合而为一，等于释迦牟尼与佛教合而为一，孔子与儒教合而为一。

有一次在宴会席上，某君指着我，向众人说道："此君姓李名宗吾，是厚黑学的先进。"我赶急声明道："你这话错了，我是厚黑学祖师，你们才是厚黑学的先进。我的位置，等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，儒教中的孔子，当然称为祖师。你们亲列门墙，等于释迦门下的十二圆觉，孔子门下的四科十哲，对于其他普通人，当然称为先进。"

厚黑学，是千古不传之秘，我把他发明出来，可谓其功不在禹下。每到一处，就有人请我讲厚黑学。我身抱绝学，不忍自私，只好勤勤恳恳的讲授，随即笔记下来，名之曰《厚黑丛话》。

有人驳我道："面厚心黑的人，从古至今，岂少也哉？这本是极普通的事，你何得妄窃发明家之名？"我说："所谓发明者，等于矿师之寻出煤矿铁矿，并不是矿师拿些煤铁嵌入地中，乃是地中原来有煤有铁，矿师把上面的土石除去，煤铁自然出现，这就谓之发明了。厚黑本是人所固有的，只因被四书五经、宋儒语录和感应篇、

阴骘文、觉世真经等等蒙蔽了，我把它扫而空之，使厚与黑赤裸裸的现出来，是之谓发明。”

牛顿发明万有引力，这种引力，也不是牛顿带来的，自开辟以来，地心就有吸力，经过了百千万亿年，都无人知道，直至牛顿出世，才把他发现出来。厚黑这门学问，从古至今，人人都能够做，无奈行之而不著，习矣而不察，直到李宗吾出世，才把他发现出来。牛顿可称为万有引力发明家，李宗吾当然可称厚黑学发明家。

有人向我说道：“我国连年内乱不止，正由彼此施行厚黑学，才闹得这样糟。现在强邻压迫，亡国在于眉睫，你怎么还在提倡厚黑学?”我说：“正因亡国在于眉睫，更该提倡厚黑学，能把这门学问研究好了，国内纷乱的状况，才能平息，才能对外。”厚黑是办事上的技术，等于打人的拳术。诸君知道：凡是拳术家，都要闭门练习几年，然后才敢出来与人交手。从辛亥至今，全国纷纷扰扰者，乃是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实地练习，他们师兄师弟，互相切磋。迄今二十四年，算是练习好了，开门出来，与人交手，真可谓“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；以此图功，何功不克。”我基于此种见解，特提出一句口号曰：厚黑救国。请问居今之日，要想抵抗列强，除了厚黑学，还有甚么法子？此《厚黑丛话》，所以不得不作也。

抵抗列强，要有力量，国人精研厚黑学，能力算是有了的。譬之射箭，射是射得很好，从前是关着门，父子弟兄，你射我，我射你；而今以列强为箭垛子，支支箭向同一之垛子射去。我所谓厚黑救国，如是而已。

厚黑救国，古有行之者，越王勾践是也。会稽之败，勾践自请身为吴王之臣，妻入吴宫为妾，这是厚字诀。后来举兵破吴，夫差遣人痛哭乞情，甘愿身为臣，妻为妾，勾践毫不松手，非把夫差置之死地不可，这是黑字诀。由此知：厚黑救国。其程序是先之以厚，继之以黑，勾践往事，很可供我们的参考。

项羽拔山盖世之雄，其失败之原因，韩信所说“匹夫之勇，妇人之仁”，两句话就断定了。匹夫之勇，是受不得气，其病根在不厚。妇人之仁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不黑。所以我讲厚黑学，谆谆然以不厚不黑为大戒。但所谓不厚不黑者，非谓全不厚黑，如

把厚黑用反了，当厚而黑，当黑而厚，也是断然要失败的。以明朝言之，不自量力，对满洲轻于作战，是谓匹夫之勇。对流寇不知其野性难驯，一意主抚，是谓妇人之仁。由此知明朝亡国，其病根是把厚黑二字用反了。有志救国者，不可不精心研究。

我国现在内忧外患，其情形很与明朝相类，但所走的途径，则与之相反。强邻压境，熟思审处，不悻悻然与之角力，以匹夫之勇为戒……明朝外患愈急迫，内部党争愈激烈。崇祯已经在煤山缢死了，福王立于南京，所谓志士者，还再闹党争。福王被满清活捉去了，辅立唐王、桂王、鲁王的志士，不在闹党争。我国迩来则不然，外患愈紧迫，内部党争愈消灭，许多兵戎相见的人，而今欢聚一堂。明朝的党人，忍不得气，现在的党人，忍得气，所走的途径又与明朝相反，这是更为可喜的。厚黑先生曰："知明朝之所以亡，则知民国之所以兴矣。"我希望有志救国者，把我发明的"厚黑史观"下细研究。

昨日我回到寓所，见客厅中坐一个很相熟的朋友，一见面就说道："你怎么又在报上讲厚黑学？现在人心险诈，大乱不已，正宜提倡旧道德，以图挽救，你发出这些怪议论，岂不把人心越弄越坏吗?"我说："你也太过虑了。"于是把我全部思想源源本本说与他听，直谈到二更，他欢然而去，说道："像这样说来，你简直是孔子信徒，厚黑学简直是救济世道人心的妙药。从今以后，我在你这个厚黑教主名下当一个信徒就是了。"

梁任公曾说："假令我不幸而死，是学术界一种损失。"不料他五十六岁就死了，学术界受的损失，真是不小。古来的学者如程明道、陆象山，是五十四岁死的。韩昌黎、周濂溪、王阳明，都是五十七岁死的。鄙人在厚黑界的位置，自信不在梁程陆韩周王之下，讲到年龄，已经有韩周王三人的高寿，要喊梁程陆为老弟，所虑者万一我一命呜呼，则是曹操、刘备诸圣人相传之心法，自我而绝，厚黑界受的损失，还可计算吗？所以我汲汲皇皇的写文字，余岂好厚黑哉？余不得已也。

马克思发明唯物史观，我发明厚黑史观。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，则成败兴衰，了如指掌；用厚黑史观去考察社会，则如牛诸

燃犀，百怪毕现。……我们又可用厚黑史观攻击达尔文强权竞争的说法，使迷信武力的人失去理论上的立场。我希望阅者耐心读去，不可先存一个心说：“厚黑学，是诱惑人心的东西。”更不可先存一个成见说：“马克思、达尔文是西洋圣人，李宗吾是中国坏人，从古至今，断没有中国人的说法，会胜过西洋人的。”如果你心中是这样想，就请你每日读华西副刊的时候，看见《厚黑丛话》一栏，就闭目不视，免得把你诱坏。

有天我去会一个朋友。他是讲宋学的先生，一见我，就说我不该讲厚黑学。我因他是个迂儒，不与深辩，婉辞称谢。殊知他越说越高兴，简直带出训饬的口吻来了。我气他不过，说道：“你自称孔子之徒，据我看来，只算是孔子之奴，够不上称孔子之徒。何以言之呢？你们讲宋学的人，神龛上供的是‘天地君亲师之位’。你既尊孔子为师，则师徒犹父子，也可说等于君臣。古云：‘事父母几谏’。又云：‘事君有犯而无隐。’你为甚么不以事君父之礼事孔子？明知孔子的学说，有许多地方，对于现在不适用，不敢有所修正，直是谄臣媚子之所为，非孔子家奴而何？古今够得上称孔子之徒者，孟子一人而已。孔子曰：‘我战则克。’孟子则曰：‘善战者服上刑。’依孟子的说法，孔子是该处以枪毙的。孟子曰：‘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。’又把管仲说得极不堪，曰：‘功烈如被其卑也。’而《论语》上明明载，孔子曰：‘齐桓公正而不谲。’又曰：‘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’又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’孟子的话，岂不显与孔子冲突吗？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以尊周为主，称周王曰‘天王’。孟子游说诸侯，一则曰：‘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’再则曰：‘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，必为政于天下。’未知置周王于何地，岂非孔教叛徒？而其自称，则曰：‘乃所愿则学孔子也。’孟子对于孔子，是脱了奴性的，故可称之曰孔子之徒，汉宋诸儒，皆孔子之奴也。至于你吗！满口程朱，对于宋儒，明知其有错误，不敢有所纠正，反曲为之庇，直是家奴之奴，称曰‘孔子之奴’，犹未免过誉。”说罢，彼此不欢而散。阅者须知，世间主人的话好说，家奴的话不好说，家奴之奴，更难得说。中国纷纷不已

者，孔子家奴为之也……达尔文家奴为之也，于主人何尤！

我不知有孔子学说，更不知有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，我只知有厚黑学而已。问厚黑学何用？曰用以抵抗列强。我敢以厚黑教主之资格，向四万万人宣言曰："勾践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？凡我同志，快快的厚黑起来！何者是同志？心思才力，用于抵抗列强者，即是同志。何者是异党？心思才力，用于倾陷本国人者，即是异党。"从前张献忠祭梓潼文昌帝君文曰："你姓张，咱老子也姓张，咱与你联宗罢。"我想，孔子在天之灵，见了我的宣言，一定说："咱讲内诸夏，外夷狄，你讲内中国，外列强，咱与你联合罢。"

梁任公曰："读春秋当如读楚辞，其辞则美人香草，其义则灵修也，其辞则齐桓、晋文，其义则素王制也。"呜呼，知此者可以读厚黑学矣！其词则曹操、刘备，其义则十年灭吴之勾践、八年血战之华盛顿也。师法曹操、刘备者，师法厚黑之技术，至曹刘之目的为何，不必深问。斯义也，恨不得起任公于九原，而一与讨论之。

我著厚黑学，纯用春秋笔法，善恶不嫌同辞，据事直书，善恶自见。同是一厚黑，用以图谋一己之私利，是极卑劣之行为，用以图谋众人之公利，是至高无上的道德。所以不懂春秋笔法者，不可以读厚黑学。

民国六年，成都国民公报社把厚黑学印成单行本，宜宾唐倜风作序，中江谢绶青作跋。绶青之言曰："宗吾发明厚黑学，或以为议评末俗，可以劝人为善，或以为凿破混沌，可以导人为恶。余则谓：厚黑学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亦视用之何如耳。如利刃然，用以诛叛逆则善，用以屠良民则恶。善与恶，何关于刃？故用厚黑以为善，则为善人，用厚黑以为恶，则为恶人，或善或恶，于厚黑无与也。"绶青这个说法，是很对的，与我所说春秋笔法，同是一意。

倜风之言曰："孔子曰：'谏有五，吾从其讽。'昔者汉武帝欲杀乳母，东方朔叱令就死。齐景公欲诛围人，晏子执而数其罪。二君闻言，惕然而止。宗吾此书，大有东方朔、晏子遗意，其言最诙谐，其意最沉痛，直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诈于一堂，而一一谳定其罪，所谓诛奸谀于既死者非欤！吾人熟读此书，即知厚黑中人比比皆是，庶几出而应世，不为若辈所愚。彼为鬼为蜮者，知人之烛破其隐，

亦将惶然思返，而不敢妄试其技。审如是也，人与人之间，不得不出于赤心相见之一途，则宗吾此书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也，岂浅鲜哉！厚黑学之发布，已有年矣，其名词人多知之。试执人而语之曰：'汝固素习厚黑学者。'无不色然怒，则此书收效为何如，固不俟辩也。"倜风此说固有至理，然不如缓青所说尤为圆通。

庄子曰："能不龟手，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讲僻光。呜呼！若庄子者，始可与言厚黑矣！禅让一也，舜禹行之则为圣人，曹丕、刘裕行之，则为逆臣。宗吾曰："舜禹之事，倘所谓厚黑，是耶非耶，余甚惑焉。倜风披览《庄子》不释手，而于厚黑学，犹一阅未达，惜哉！晚年从欧阳竟无，讲唯识学，回成都，贫病而死。夏斧私挽以联，有云："有钱买书，无钱买米。"假令倜风只买厚黑学一部，而以余钱买米，虽至今生存可也，然而倜风不悟也。厚黑救国中，失此健将，悲夫！悲夫！

我宣传厚黑学，有两种意思：（甲）即倜风所说，"聚千古大奸大诈于一堂，而谳定其罪"。民国元年发布的《厚黑传习录》所说求官六字真言、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等等，皆属甲种。（乙）即绶青所说："用厚黑以为善。"此次所讲厚黑救国等语，即属乙种。

阅者请君对于我的学问，如果精研有得，以后如有人对于你行使厚黑学，你一入眼就明白，可直告之曰："你是李宗吾的甲班学生，我与你同班毕业，你那些把戏，少拿出来耍些。"于是同学与同学辟诚相见，而天下从此太平矣，此则厚黑学之功也。有人说："老子云'邦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'你把厚黑学公开讲说，万一国中的汉奸，把他翻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外国文，传播世界，列强得着这种秘诀，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，还而施之于我，等于把我国发明的火药加以改良，还而轰我一般，如何得了？"我说：惟恐其不翻译，越翻译得多越好。宋朝用司马光为宰相，辽人闻之，戒其边吏曰："中国相司马公矣，勿再生事。"列强听见中国出了厚黑教主，还不闻风丧胆吗？孔子曰："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可行也。"我国对外政策，应该建筑在一个诚字上，今可明明白白告诉他："我国现遍设厚黑学校，校中供的是'大成至圣先师越王勾践

之神位’。厚黑教主开了一个函授学校，每日在报上发讲稿，定下十年灭吴的计划。这十年中，你要求什么条件，我国就答应什么条件，等到十年后，算帐就是了。”我们口中如此说，实际上即如此做，决不欺哄他。但要敬告翻译的汉奸先生，译厚黑学时，定要附译一段，说：“勾践最初对于吴王，身为臣，妻为妾。后来吴王清照样的身为臣，妻为妾，勾践不允，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，加了几倍的利钱。这是我们先师遗传下来的教条，请列强于头钱之外，多预备点利钱就是了。”从前王德用守边，契丹遣人来侦探，将士请逮捕之，德用说：“不消。”明日，大阅兵，简直把军中实情拿与他看。侦探回去报告，契丹即遣人来议和。假如外国人知道我国朝野上下，一致研究厚黑学，自量非敌，因而敛戢其野心，十年后不开大杀戒，则厚黑学之造福于人类者，宁有暨耶。此即汉奸先生翻译之功也。彼高谈仁义者，乌足知之？传曰：“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水懦弱，民押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”厚黑先生者，其我佛如来之化身欤！

友人雷民心，发明了一种最精粹的学说，其言曰：“世间的事，分两种，一种是做得说不得，一种是说得做不得。例如夫妇居室之事，尽管做，如拿在大庭广众中来说，就成为笑话，这是做得说不得。又如两个朋友，以狎亵语相戏谑，抑或骂人的妈和姐妹，闻者不甚以为怪。如果认真实现，就大以为怪了，这是说得做不得。”民心这个学说，凡是政治界学术界的人，不可不悬诸座右。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……”

做得说不得这句话，是《论语》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注脚，说得做不得这句话，是《孟子·井田章》和《周礼》一书的注脚。假令王莽、王安石聘民心去当高等顾问，决不会把天下事闹得那么坏。

辛亥年成都十月十八日兵变，全城秩序，非常之乱，杨莘友出来任巡警总监，捉着扰乱治安的人，就地正法；出的告示，摹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，连书斩斩斩，大得一般人的欢迎。全城男女长幼，提及杨总监之名，歌颂不已。后来秩序稍定，他发表了一篇《杨维（莘友名）之宣言》，说今后当行开明专制，于是物议沸腾，

报章上指责他，省议会也纠举他，说："而今是共和时代，岂能再用专制手段！"殊不知莘友从前用的手段，纯是野蛮专制，后来改行开明专制，在莘友算是进化了，只因把专制二字明白说出，所以大遭物议。民心说："天下事有做得说不得的。"莘友之事，是很好的一个例证。关于莘友之事，孔子所说："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"就算得了的解。

我定有一条公例："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，是极卑劣之行为；用厚黑以图谋众人公利，是至高无上之道德。"莘友野蛮专制，其心黑矣，而人反歌颂不已，何以故？图谋公利故。

厚黑救国这句话，做也做得，说也说得，不过学识太劣的人，不能对他说罢了。我这次把厚黑学公开讲说，就是想把他变成做得说得的科学。

胡林翼曾说："只要有利于国，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干。"相传林翼为湖北巡抚时，官文为总督。有天总督夫人生日，藩台去拜寿，手本已经拿上去了，才知道是如夫人生日，立将手本索回，折身转去。其他各官，也随之而去。不久林翼来，有人告诉他，他听了，伸出大拇指说道："好藩台！好藩台！"说毕取出手本递上去，自己红顶花翎的进去拜寿。众官听说巡抚都来了，又纷纷转来。次日官妾来巡抚衙门谢步，林翼请他母亲十分优待，官妾就拜在胡母膝下为义女，林翼为干哥哥。此后军事上有应该同总督会商的事，就请干妹妹从中疏通。官文稍一迟疑，其妾聒其耳曰："你的本事，哪一点比我们胡大哥？你依着他的话做就是了。"因此林翼办事，非常顺手。官、胡交欢，关系满清中兴甚巨。林翼干此等事，其面可谓厚矣，众人不推不说他卑鄙，反引为美谈，何以故？心在国家故。

严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，这是众人知道的，后来皇上把他拿下，丢在狱中，众臣合拟一奏折，历数其罪状，如杀杨椒山、沈炼之类，把稿子拿与宰相徐阶看。阶看了说道："你们还是想杀他？想放他？"众人说："当然想杀他。"徐阶说："你这奏折一上去，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，何以故呢？世蕃杀这些人，都是巧取上意，使皇上自动的要杀他。此折上去，皇上就会说：'杀这些人明明出自我的意思，怎么诬在世蕃身上？'岂不立把他放出吗？"众人请教如何

办。徐阶说："皇上最恨的是倭寇，说他私通倭寇就是了。"徐阶关着门把折子改了递上去。世蕃在狱中探得众人奏折内容，对亲信人说道："你们不必担忧，不几天我就出来了。"后来折子发下，说他私通倭寇，大惊道："完了，完了！"果然把他杀了。世蕃罪大恶极，本来该杀，独莫有私通倭寇，可谓死非其罪。徐阶设此毒计，其心不为不黑，然而后人都称他有智谋，不说他阴毒，何以故？为国家除害故。

李次青是曾国藩得意门生，国藩兵败靖港、祁门等处，次青与他患难相共。后来次青兵败失地，国藩想学孔明斩马谡，叫幕僚拟奏折严参他，众人不肯拟。叫李鸿章拟。鸿章说道："老师要参次青，门生愿以去就争。"国藩道："你要去，很可以，奏折我自己拟就是了。"次日叫人与鸿章送四百两银子去，"请李大人搬铺"。鸿章在幕中，有数年的劳绩，为此事逐出。奏折上去，次青受重大处分。国藩此等地方手段很辣，逃不脱一个黑字，然而次青仍是感恩知遇，国藩死，哭以诗，非常恳挚。鸿章晚年，封爵拜相，谈到国藩，感佩不已，何以故？以其无一毫私心故。

上述胡、徐、曾三事，如果用以图谋私利，岂非至卑劣之行为吗？移以图谋公利，就成为最高尚之道德。像这样的观察，就可把当伟人的秘诀寻出，也可说把救国的策略寻出。现今天下大乱，一般人都说将来收拾大局，一定是曾国藩、胡林翼一流人，但是要学曾、胡，从何下手？难道把曾、胡全集，字字读，句句学吗？这也无须，有个最简单的法子，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抵抗列强上面，目无旁视，耳无旁听，抱定厚黑二字，放手做去，得的效果，包管与曾、胡一般无二。如嫌厚黑二字不好听，你在表面上换两个好听字眼就是，不要学杨莘友把专制二字说破。你如有胆量，就学胡林翼，赤裸裸的说道："我是顽钝无耻。"列强其奈你何！是之谓厚黑救国。

我把世界外交史研究了多年，竟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，其方式不外两种，一曰劫贼式，一曰娼妓式。时而横不依理，用武力掠夺，等于劫贼之明火劫抢，是谓劫贼式的外交。时而甜言蜜语，曲结欢心，等于娼妓媚客，结的盟约，毫不生效，等于娼妓之海誓山盟，是谓娼妓式的外交。

人问列强以何者立国？我答曰："厚黑立国。"娼妓之面最厚，劫贼之以最黑，大概军阀的举动是劫贼式，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。劫贼式之后，继以娼妓式；娼妓式之后，继以劫贼式，二者循环互用。娼妓之面厚矣，毁弃盟誓则厚之中有黑。劫贼之心黑矣，不顾唾骂则黑之中有厚。我国自五口通商以来，直至今日，都是吃列强这两种方式的亏。我们把他的外交秘诀发现出来，就有对付的方法了。

人问："我国当以何者救国？"我答曰："厚黑救国。"他以厚字来，我以黑字应之；他以黑字来，我以厚字应之。娼妓艳装而来，开门纳之，但缠头费丝毫不能出。如服侍不周，把他衣饰剥了，逐出门去，是谓以黑字破其厚。如果列强横不依理，以武力压迫，我们就用张良的法子对付他。张良圯上受书，老人种种作用，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。苏东坡曰："高帝百战百败而能忍之，此子房所教也。"我们以对付项羽的法子对付列强，是谓以厚字破其黑。

全国人士都大声疾呼曰："救国！救国！"试问救国从何下手？譬诸治病，连病根都未寻出，从何下药？我们提出厚黑二字，就算寻着病根了。寒病当用热药，热病当用寒药，相反才能相胜。外人黑字来，我以厚字应；外人厚字来，我以黑字应。刚柔相济，医国妙药，如是而已。他用武力，我即以武力对付之，他讲亲善，我即与之亲善，是为医热病用热药，医寒病用寒药。以此等法医病，病人必死；以此等法医国，国家必亡。

《史记》：项王谓汉王曰："天下汹汹数岁者，徒以吾两人耳，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。"汉王笑谢曰："吾宁斗智不斗力。"笑谢二字，非厚而何？后来鸿沟划定，楚汉讲和了，项王把太公、吕后送还，引兵东归。汉王忽然败盟，以大兵随其后，把项王逼死乌江，非黑而何？我国现在对于列强，正适用笑谢二字，若与之斗力，就算违反了刘邦的策略。语曰："安不忘危。"厚黑经曰："厚不忘黑。"问："厚不忘黑奈何？"曰："有越王勾践之先例在，有刘邦对付项羽之先例在。"

我在民国元年，就把厚黑学发表出来，苦口婆心，谆谆讲说，无奈莫得一人研究这种学问，把一个国家闹成这样。今年石青阳死

了，重庆开追悼会，正值外交紧急，我挽以联云："哲人其萎乎，呜呼青阳，吾将安仰；斯道已穷矣，呼嗟黑厚，予欲无言。"袁随园谒岳王墓诗云："岁岁君臣拜诏书，南朝可谓有人无，看烧石勒求和币，司马家儿是丈夫。"吁嗟黑厚，予欲无言！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凡我同志，快快的厚黑起来，一致对外。

著者住家自流井。我尝说我们自流井的人，目光不出峡子口；四川的人，目光不出夔门口；中国的人，目光不出吴淞口。阿比西尼亚，是非洲弹丸大一个国家，阿皇敢于对意大利作战，对法西斯蒂怪杰墨索里尼作战，其人格较之华盛顿，有过之无不及，真古今第一流人杰哉！将来战争结果，无论阿国或胜或败，抑或败而至于亡国，均是世界史上最光荣的事。我们应当把把阿皇的谈话，当如清朝皇帝颁发的《圣谕广训》，楷书一通，每晨起来，恭读一遍，这就算目光看出吴淞口去了。

有人问我道："你的厚黑学，怎么我拿去实行，处处失败？"我问："我著的《宗吾臆谈》和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二书，你看过莫有？"答："莫有"。我问："《厚黑学》单行本，你看过莫有？"答："莫有。我只听见人说：'做事离不得脸皮厚，心子黑。'我就照这话行去。"我说："你的胆子真大，听见厚黑学三字，就拿去实行，仅仅失败，尚能保全生命而还，还算你的造化。我著《厚黑学》，是用厚黑二字，把一部二十四史一以贯之，是为'厚黑史观'。我著《心理与力学》，定出一条公例：'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'。是为'厚黑哲理'。基于厚黑哲理，来改良政治、经济、外交与夫学制等等，是为厚黑哲理之应用。其详俱见《宗吾臆谈》及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二书。你连书边边都未看见，就去实行，真算胆大。"

厚黑学这门学问，等于学拳术，要学就要学精，否则不如不学，安分守己，还免得挨打。若仅仅学得一两手，甚或拳师的门也未拜过，一两手都未学得，远远望见有人在习拳术，自己就出手伸脚的打人，焉得不为人痛打？你想：项羽坑降卒二十万，其心可谓黑到极点了；而我的书上，还说他黑字欠了研究，宜其失败。吕后私通审食其，刘邦佯为不知。后人诗曰："果然公大度，容得辟阳侯。"面皮厚到这样，而于厚字还是欠研究。韩信求封齐王时，若非有人

从旁指点，几乎失败。厚黑学有这样的精深，仅仅听见这个名词，就去实行，我可以说越厚黑越失败。

人问："要如何才不失败?"我说："你须先把厚黑史观、厚黑哲理与夫厚黑哲理之应用彻底了解，出而应事，才可免于失败。兵法：'先立于不败之地。'又曰：'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'厚黑学亦如是而已。"

孙子曰："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"处世不外厚黑，厚黑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用兵是奇中有正，正中有奇，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。处世是厚中有黑，黑中有厚，厚黑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。厚黑学与《孙子》十三篇，二而一，一而二。不知兵而用兵，必至兵败国亡。不懂厚黑哲理，而就实行厚黑，必至家破身亡。闻者曰："你这门学问太精深了，还有简单法子莫有?"我答曰："有。我定有两条公例，你照着实行，不须研究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，也就可以为英雄，为圣贤。如欲得厚黑博士的头衔，仍非把我所有作品穷年累月的研究不可。"

就人格言之，我们可下一公例曰："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，越厚黑，人格越卑污；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，越厚黑，人格越高尚。"就成败言之，我们可下一公例曰："用厚黑以图谋一己私利，越厚黑越失败；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，越厚黑越成功。"何以故呢？凡人皆以我为本位，为我之心，根于天性。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，势必妨害他人之私利，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越多，以一人之身，敌千万人之身，焉得不失败？人人既以私利为重，我用厚黑以图谋公利，即是替千万人图谋私利，替他行使厚黑，当然得千万人之赞助，当然成功。我是众人中之一分子，众人得利，我当然得利，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。例如曾、胡二人，用厚黑以图谋国家之公利，其心中无丝毫私利之见存，后来功成了，享大名，膺厚赏，难道私人所得的利还小吗？所以用厚黑以图谋国家之利，成功固得重报，失败亦享大名。无奈目光如豆者，见不及此。从道德方面说，攘夺他人之私利，以为我有，是为盗窃行为，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。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，则是牺牲我的脸，牺牲我的心，以救济世人。视人之饥，犹己之饥，视人之溺，犹己之溺，

即所谓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?”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尚。

人问：“世间有许多人，用厚黑以图谋私利，居然成功，是何道理?”我说：“这即所谓‘时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耳。’”与他相敌的人，不外两种：一种是图谋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，一种是图谋私利，而厚黑之技术不如他的人，故他能取胜。万一遇着一个图谋公利之人，厚黑之技术与他相等，则必败无疑。语云：“千夫所指，无病而死。”因为妨害了千万人之私利，这千万人中只要有一个觑着他的破绽，就要乘虚打他。例如《史记》项王谓汉王曰：“天下汹汹数岁者，徒以吾两人耳。”其时的百姓，个个都希望他两人中死去一个，所以项王迷失道，问于因父，田父给日左，左乃陷大泽中，致被汉兵追及而死。如果是救民水火之兵，田父方保持之不暇，何至会给他呢？我们提倡厚黑救国，这是用厚黑以保卫四万万人之私利，当然得四万万人之赞助，当然成功。

昔人云“文章报国”。文章非我所知，我所知者，厚黑而已。自今以往，请以厚黑报国。《厚黑经》曰：“我非厚黑之道，不敢陈于国人之前，故众人莫如我爱国也。”叫我不讲厚黑，等于叫孔孟不讲仁义，试问：能乎不能？我自问：生乎有功于世道人心者，全在发明厚黑学，抱此绝学而不公之于世，是为怀宝迷邦，岂非不仁之甚乎！李宗吾曰：“鄙人圣之厚黑者也。夫天未欲中国复兴也。如欲中国复兴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？吾何为不讲厚黑哉?”

昔人诗云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众人都说饭好吃，哪个知道种田人的艰难？众人都说厚黑学适用，哪个知道发明人的艰难？我那部《厚黑学》，可说字字皆辛苦。

我这门学问，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，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。我打算把发明之经过和我同研究的人写出来，后人如仿宋元学案、明儒学案，做一部厚黑学案，才寻得出材料，抑或与我建厚黑庙，才有配享人物。

旧友黄敬临，在成都街上遇着我，说道：“多年不见了，听说你要建厚黑庙。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，请把我写一段上去，

将来也好配享。”我说：“不必再写，你看《论语》上的林放，见着孔子，只问了‘礼之本’，三个字，直到而今，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。你既有志斯道，即此一度谈话，已足配享而有余。”敬临又说：“我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，因为钦佩你的学问，不惜拜在门下。”我说：“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，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？我把你收列门墙，就是你莫大之幸，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，写一笔‘吾师李宗吾先生’，也就比‘前清诰封某某大夫’，光荣多了。”

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：“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，我逢人辩白，说你不厚不黑。”我复信道：“我发明厚黑学，私淑弟子遍天下，我曰‘厚黑先生’，与我书者以作上款，我复书以作下款，自觉此等称谓，较之文成公、文正公光荣多矣。俯仰千古，常以自豪。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，我果何处开罪足下，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？呜呼伯康，相知有年，何竟自甘原壤，尚其留意尊胫，免遭尼山之杖！”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再讲厚黑学。嗟乎！滔滔天下，何原壤之多也！

从前发表的《厚黑传习录》，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，此次的丛话，是把传习录扩大之。我从前各种文字，许多人都未看过，今把他全行拆散来，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。此次的丛话，是随笔体裁，内容包含五种：（1）厚黑史观；（2）厚黑哲理；（3）厚黑学之应用；（4）厚黑学辩证法；（5）厚黑学发明史。我只随意写去，不过未分门类罢了。

人问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何不分类写之，何必这样杂乱无章的写？”我说：著书的体裁分两种，一是教科书体，一是语录体。凡一种专门学问发生，最初是语录体，如孔子之《论语》，释迦之佛经，六祖之坛经，朱明清儒之语录，都是门人就本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。老子手著之《道德经》，可说是自写的语录。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，才整理出来，分出门类，成为教科书方式。厚黑学是新发明的专门学问，当然用语录体写出。

宋儒自称：“满腔子是恻隐。”而我则：“满腔子是厚黑。”要我讲，不知从何处讲起，只好随缘说法，想说什么，就说什么，口中如何说，笔下就如何写。或谈古事，或谈时局，或谈学术，或追

述生平琐事，高兴时就写，不高兴就不写；或长长的写一篇，或短短的写几句，或概括的说，或具体的说，总是随其兴之所至，不受任何拘束，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得出来。

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，社会就成为透明体，既把社会真相看出，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。我对于经济、政治、外交，与夫学制等等，都有一种主张，而此种主张，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。我这个丛话，可说是拉杂极了，仿佛是一个大山，满山的昆虫鸟兽、草木土石等等，是极不规则的。惟其不规则，才是天然的状态。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序，极有规则，就成为公园的形式，好固然是好，然而参加了人工，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。我把我胸中的见解，好好歹歹，和盘托出，使山的全体表现，有志斯道者，加以整理，不足者补充之，冗芜者删削之，错误者改正之。开辟成公园也好，在山上采取木石，另建一个房子也好，抑或捉几个雀儿，采些花草，拿回家中赏玩也好。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。再不然，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，捡点牛犬粪去肥田，也未尝不好。我发明厚黑学，犹如瓦特发明蒸汽，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，行驶轮船、火车也好，开办任何工业都好。我讲的厚黑哲理，无施不可，深者见深，浅者见浅。有能得我之一体，引而伸之，就可独成一派。孔教分许多派，佛教分许多派，将来我这厚黑教，也要分许多派。

写文字，全是兴趣，兴趣来了，如兔起鹘落，稍纵即逝。我写文字的时候，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，而案头适无此书，就用苏东坡“想当然耳”的办法，依稀恍惚的写去，以免打断兴趣。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，平空白地，无从说起，只好借点事物来说，引用某事某说，犹如使用家伙一般，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，若无典故可用，就杜撰一个来用，也无不可。

庄子寓言，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，特借鲲鹏野马、渔父盗跖以写之，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。至鲲鹏野马，果否有此物，渔父盗跖，是否有此人，皆非所问。胸中所见者，主人也。鲲鹏野马，渔父盗跖，皆寓舍也。孟子曰：“说诗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意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读诗当如是，读庄子当如是，读厚黑学也当如是。

昔人谓："文王周公演易，彖辞爻辞，取其象，亦偶触其机，假令易，而为之，其机之所触少变，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。"达哉所言！战国策士，如苏秦诸人，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摩纯熟，其游说人主也，随便引一故事，或设一个比喻，机趣横生，头头是道，其途径与庄之寓言，易之取象无异。宋儒初读儒书，继则出入佛老，精研有得，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，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，借以明其胸中之理，于是孔门诸书，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，渔父盗跖。而清代考据家，乃据训诂本义，字字讥弹之，其解释字义固是，而宋儒所说之道理，也未尝不是。九方皋相马，在牝牡骊黄之外。知此义者，始可以读朱子之《四书集注》。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，刺刺不休。嗟乎！厚黑界中，九方皋何其少，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！

研究宋学者，离不得宋儒语录。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，有许多靠不住，前人已言之。明朝王学，号称极盛，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，欲求王氏之学，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，而天泉证道一夕话，为王门极大争点。我尝说"四有四无"之语，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，岂不少去许多纠葛。大学"格物致知"四字，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。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，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，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，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。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，对我说道："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，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，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。"我听了，大骇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！万一我门下出了一个曾子，摹仿大学那种笔法，简简单单的写出，将来厚黑学案中，岂不又要发生许多争执吗？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"聃大公"的办法，手写语录，名曰《厚黑丛话》，谢绝私人谈话，以示大道无私之意。将来如有人说"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"，你们万不可听信。经我这样的声明，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。我每谈一理，总是反反复复的解说，宁肯重复，不肯简略，后人再不会像"格物致知"四字，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。鄙人之于厚黑学也，可谓尽心焉耳矣。噫！一衣一钵，传之者谁乎！

厚黑丛话卷二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

有人问道："你这丛话，你说内容包含厚黑史观、厚黑哲理、厚黑学之应用、厚黑学辩证法及厚黑学发明史，共五部分，你不把他分类写出，则研究这门学问的人，岂不目迷五色吗？岂不是故意使他们多费些精神吗？"我说："要想研究这种专门学问，当然要用心专研，中国的十三经和二十四史，泛泛读去，岂不是目迷五色，纷乱无章吗？而真正之学者，就从这纷乱无章之中寻出头绪来。如果惮于用心，就不必操这门学问。我只揭出原则和大纲，有志斯道者，第一步加以阐发，第二步加以编纂，使之成为教科书，此道就大行了。所以分门别类，挨一挨二的讲，乃是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的任务，不是我的任务。"

我从前刊了一本《宗吾臆谈》。内面的篇目：（1）厚黑学；（2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；（3）心理与力学；（4）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；（5）考试制之商榷。后来我把"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"扩大成为一单行本，曰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这是业已付了印的。近来我又做有一本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，已脱稿，尚未发布。这几种作品，在我的思想上是一个系统，是建筑在厚黑哲理上，但每篇文字独立写去，看不出连贯性。因把他拆散来，在丛话中混合写去，一则见得各种说法互相发明，二则谈心理、谈学术是很沉闷的，我把他夹在厚黑学中，正论谐语错杂而出，阅者才不至枯燥无味。

我心中有种种见解，不知究竟对与不对，特写出来，请阅者指驳，指驳越严，我越是欢迎。我重在解释我心中的疑团，并不是想独创异说。诸君有指驳的文字，就在报上发表，我总是细细的研究。认为指驳得对的，自己修改了即是，认为不对，我也不回辩，免至成为打笔墨官司，有失研究学问的态度。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，

我的心坎上，绝不受任何人的压抑，同时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独立，所以驳诘我的文字，不能回辩。我倡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，倘被人推翻，我就把这厚黑教主让他充当，拜在他门下称弟子。何以故？服从真理故。

宇宙真理，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，无须请人替我研究。古今的哲学家，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，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，不可得知，应该离开了他们的说法，直接去研究一番。有个朋友，读了我所作的文字，说道："这些问题，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，未见你引用，并且学术上的专用名词你也少用，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少有研究。"我听了这个话，反把我所作的文字翻出来，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名词，尽量删去，如果名词不够用，就自己造一个来用，直抒胸臆，一空依傍。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，乃是用我的斗秤去衡量他的学说，不是以他的斗秤来衡量我的学说。换言之，乃是我去审判古今哲学家，不是古今哲学家来审判我。

中国从前的读书人，一开口即是诗云书云，孔子曰，孟子曰。戊戌政变以后，一开口即是达尔文曰，卢梭曰，后来又添些杜威曰，孟子曰，马克思曰，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。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，自己也不伸头去窥一下，未免过于懒惰了！假如驳我的人，引了一句孔子曰，即是以孔子为审判官，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，叫李宗吾来案候审。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，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，以他们的作品为新刑律，叫李宗吾来案候审。像这样的审判，我是绝对不到案的。有人问："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？"我说：你就可以审判我，以你自家的心为审判官，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。例如说道："李宗吾，据你这样说，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，今日看见一只狗，也不是这样？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。"如果能够这样的判断，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，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。

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学说，任人怀疑，任人攻击，未尝强人信从，结果反无人不信从。注《太上感应篇》的人说道："有人不信此书，必受种种恶报。"关圣帝君的《觉世真经》说道："不信吾教，请试

吾刀。”这是由于这两部书所含学理经不得研究，无可奈何，才出于威吓之一途。我在厚黑界的位置，等于科学界的牛顿和爱因斯坦，假如不许人怀疑，不许人攻击，即无异于说：“我发明的厚黑学，等于《太上老君感应篇》和关圣帝君的《觉世真经》。”岂不是我自己低毁自己吗？

有人说：假如人人思想独立，各创一种学说，思想界岂不成纷乱状态吗？我说：这是不会有的。世间的真理，只有一个，如果有两种或数种学说互相违反，你也不必抑制哪一种，只叫他彻底研究下去，自然会把真理发见出来。真理所在，任何人都不能反对的。例如穿衣吃饭的事，叫人人独立的研究，得的结果，都是饿了要吃，冷了要穿，同归一致。凡所谓冲突者，都是互相抑制生出来的。假如各种学说，个个独立，犹如林中树子，根根独立，有何冲突？树子生在林中，采用与否，听凭匠师。我把我的说法宣布出来，采用与否，听凭众人，哪有闲心同人打笔墨官司。如果务必要强天下之人尽从已说，真可谓自取烦恼，而冲突于是乎起矣。程伊川、苏东坡见不及此，以致洛蜀分党，把宋朝的政局闹得稀烂。朱元晦、陆象山风不及此，以致朱陆分派，一部宋元学案、明儒学案，打不完的笔墨官司。而我则不然，读者要学厚黑学，我自然不吝教，如其反对我，则是甘于自误，我也只好付之一叹。

拙著《宗君臆谈》，流传至北平，去岁有人把《厚黑学》抽出翻印，向舍侄征求同意，并说道：“你家伯父，是八股出身，而今凡事都该欧化，他老人家那套笔墨，实在来不得。等我们与他改过，意思不变更他的，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。”我闻之，立发航信说道：“孔子手著的《春秋》，旁人可改一字吗？他们只知我笔墨像八股，殊不知我那部《厚黑学》，思想之途径，内容之组织，完全是八股的方式，特非老于八股者，看不出来。宋朝一代讲理学，出了文天祥、陆秀夫人请人来结局，一般人都说可为理学生色。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，出了一个厚黑教主来结局，可为八股生色。我的厚黑哲理，完全从八股中出来，算是真正的国粹。我还希望保存国粹的先生，由厚黑学而上溯八股，仅仅笔墨上带点八股气，你们都容不过吗？要翻印，就照原文一字不改，否则不必翻印。”哪知后来书印

出来，还是与我改了些。特此声明，北平出版的《厚黑学》是赝本，以免贻误后学。

大凡有一种专门学问，就有一种专门文体，所以《论语》之文体与《春秋》不同，《老子》之文体与《论语》不同，佛经之文体与《老子》又不同。在心为思想，在纸为文字，专门学问之发明者，其思想与人不同，故其文字也与人不同。厚黑学是专门学问，当然另有一种文体。闻者说道："李宗吾不要自夸，你那种文字，任何人都写得出来。"我说："不错，不错，这是由于我的厚黑学，任何人都做得来的缘故。"

我写文字，定下三个要件：见得到，写得出，看得懂。只求合得到这三个要件就够了。我执笔时，只把我胸中的意见写出，不知有文法，更不知有文言白话之分，之字的字，乎字吗字，任便用之。民国十六年刊的《宗吾臆谈》，十八年刊的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都是这样。有人问我："是什么文体?"我说："是厚黑式文体。"近见许多名人的文字都带点厚黑式，意者中国其将兴乎！

有人说："我替你把《厚黑学》译为西洋文，你可把曹操、刘备这些典故改为西洋典故，外国人才看得懂。"我说："我的厚黑学，决不能译为西洋文，也不能改为西洋典故。西洋人要学这门学问，非来读一下中国书，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不可，等于我们要学西洋科学，非学英文德文不可。"

北平赝本《厚黑学》，有几处把我的八股式笔调改为欧化式笔调，倒也无关紧要，只是有两点把原文精神失掉，不得不声明：（1）我发明厚黑学，是把中外古今的事逐一印证过，觉得道理不错了，才就人人所知的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几个人，举以为例。又追溯上去，再举刘邦、项羽为例，意在使读者举一反三，根据三国和楚汉两代的原则，以贯通一部二十四史。原文有曰："楚汉之际，有一人焉，黑而不厚，卒归于败者，韩信是也……楚汉之际，有一人焉，黑而不厚，亦归于败者，范增是也……"这原是就楚汉人物，当下指点，更觉亲切。北平赝本，把这几句删去，径说韩信以不黑失败，范增以不厚失败。诸君试想：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，以不厚不黑失败者，岂少也哉！鄙人何至独举韩、范二人。北平赝本，

未免把我的本意失掉了。（2）《厚黑传习录》中，求官六字真言，先总写一笔曰："空、贡、冲、捧、恐、送"。注明此六字俱是反声。做官六字真言，总写一笔曰："空、恭、绷、凶、聋、弄"，注明此六字俱是平声，以下逐字分疏。每六字俱是叠韵，念起来音韵铿锵，原欲宦场中人朝夕持诵，用以替代佛书上唵嘛呢叭□吽六字，或南无阿弥陀佛六字。倘能虔诚持诵，立可到极乐世界，不比持诵经咒或佛号，尚须待诸来世。这原是我一种救世苦心。北平赝本把总写之笔删去，径从逐字分疏说起来，则读者只知逐字埋头工作，不能把六字作咒语或佛号虔诚讽诵，收效必鲜。此则北平赝本不能不负咎者也。

近有许多人，请我把《厚黑学》重行翻印，我说这也无须。所有民元发表的厚黑学，我把他融化于此次丛话中，遇有重要的地方，就把原文整段写出，读者只读丛话就是了，不必再读原本。至于北平赝本，经我这样的声明，也可当真本使用，诸君前往购买，也不会贻误。

厚黑学，共分三步工夫。第一步："厚如城墙，黑如煤炭。"人的面皮，最初薄如纸一般，我们把纸叠起来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厚如城墙了。心子最初作乳白状，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蓝色，再进就黑如煤炭了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只能算初步。何以故呢？城墙虽厚，轰炸得破，即使城墙之外再筑几十层城墙，仍还轰炸得破，仍为初步。煤炭虽黑，但颜色讨厌，众人不敢挨近他，即使煤炭之上再灌以几起垆墨水，众人仍不敢挨近他，仍为初步。

第二步："厚而硬，黑而亮。"深于厚学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丝毫不能动。刘备就是这样人，虽以曹操之绝世奸雄，都把他莫奈何，真可谓硬之极了。深于黑学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买主越是多，曹操就是这类人。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天下豪杰，奔集其门，真可谓黑得透亮了。人能造到第二步，较之第一步，自然有天渊之别。但还着了迹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刘的本事，我们一着眼就看得出来。

第三步："厚而无形，黑而无色。"至厚至黑，天下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，此种人只好于古之大圣大贤中求之。有人问："你讲厚

黑学，何必讲得这样精深?”我说：“这门学问，本来有这样精深。儒家的中庸，要讲到‘无声无臭’才能终止。学佛的人，要到“菩提无树，明镜非台”，才能证果。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，当然要到“无形无色”才算止境。

吾道分上中下三乘。前面所说，第一步是下乘，第二步是中乘，第三步是上乘。我随缘说法，时而说下乘，时而说中乘、上乘，时而三乘会通来说。听者往往觉得我的话互相矛盾，其实始终是一贯的，只要知道吾道分上中下三乘，自然就不矛盾了。我讲厚黑学，虽是五花八门，东拉西扯，仍滴滴归源，犹如树上千枝万叶，千花百果，俱是从一株树上生出来的，枝叶花果之外，别有树之生命在。《金刚经》曰：“若以色见我，若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诸君如想学厚黑学，须在佛门中参悟有得，再来听讲。

我民国元年发表《厚黑学》，勤勤恳恳，言之不厌其详，乃领者殊少。后阅《五灯会元》及论、孟等书，见诸宗教人以说破为大戒；孔子“举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”；孟子“引而不发，跃如也”；然后知禅学及孔孟之说盛行良非无因。我自悔教授法错误，故十六年刊《宗吾臆谈》，厚黑学仅略载大意，出言弥简，属望弥殷。噫！“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”世尊说法四十九年，厚黑学是内圣外王之学，我已说二十四年，打算再说二十六年，凑足五十年，比世尊多说一年。

有人劝我道：“你的怪话少说些，外面许多人指责你，你也应该爱惜名誉。”我道：“我有一自警之语：‘吾爱名誉，吾尤爱真理。’话之说得说不得，我内断于心，未下笔之先，退回审慎，既著于纸，听人攻击，我不答辩。但攻击者说的话。我仍细细体会，如能令我心折，即自行修正。”

有个姓罗的朋友，留学日本归来，光绪三十四年，与我同在富顺中学堂当教习。民国元年，他从懋功知事任上回来，我在成都学道街栈房内会着他，他把任上的政绩告诉我，颇为得意。后来被某事诖误，官失掉了，案子还未了结，言下又甚愤恨。随谈及厚黑学，我细细告诉他，他听得津津有味。我见他听入了神，猝然站起来，把桌子一拍，厉声说道：“罗某！你生平作事，有成有败，究竟你

成功的原因，有什么地方？失败的原因，在什么地方？你摸着良心说，究竟离脱这二字没有？速说！速说！不许迟疑！”他听了我的话，如雷贯耳，呆了许久，叹口气说道：“真是没有离脱这二字！”此君在吾门，可称顿悟。

我告诉读者一个秘诀，大凡行使厚黑学，外面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，不能赤裸裸的显露出来。王莽之失败，就是由于后来把它显露出来的原故。如果终身不露，恐怕至今孔庙中，还有王莽一席地。韩非子说：“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”这个法子，诸君不可不知。假如有人问你：“认得李宗吾否？”你须放出一种很庄严的面孔说道：“这个人坏极了，他是讲厚黑学的，我认他不得。”口虽如此说，心中却供一个“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。”果能这样做，包管你生前的事业惊天动地，死后还要在孔庙中吃冷猪肉。我每听见有人说道：“李宗吾坏极了！”我就非常高兴道：“吾道大行矣！”

还有一层，前面说“厚黑上面，要糊一层仁义道德”，这是指遇着道学先生而言，假如遇着讲性学的朋友，你向他讲仁义道德，岂非自讨莫趣？此时应当糊上“仁爱神圣”四字。若遇着讲马克思的朋友，就糊上“阶级斗争，劳工专政”八字，难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吗？总之，厚黑二字是万变不离其宗，至于表面上应该糊以什么，则在学者因时因地，神而明之。

《宗吾臆谈》中，载有求官六字真言、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，许多人问我是怎样的，兹把原文照录于下：

我把《厚黑学》发布出来，有人向我说：“你这门学问，博大精深，我们读了，不能受用，请你指示点切要门径。”我问：“你的意思打算做什么?”他说：“我想做官。”我于是传他求官六字真言：“空、贡、冲、捧、恐、送。”此六字俱是仄声，其意义如下：

1.空

即空闲之意，分两种：（1）指事务而言，求官的人，定要把诸事放下，不工，不商，不农，不贾，书也不读，学也不教，跑在成都住起，一心一意，专门求官；（2）指时间而言，求官要有耐心，着不得急，今日不生效，明日又来，今年不生效，明年又来。

2.贡

这个字是借用的，是我们川省的方言，其意义等于钻营之钻，钻进钻出，可说贡进贡出。求官要钻门子，这是众人都知道的，但定义很不好下。有人说："贡字的定义，是有孔必钻。"我说："错了，错了！你只说得一半，有孔才钻，无孔者其奈之何！"我下的定义是："有孔必钻，无孔也要入。"有孔者扩而大之，无孔者取出钻子，新开一眼。

3.冲

普通所说的吹牛，川省说是"冲帽壳子"。冲分为二，一口头上，二文字上。每门又分为二，口头上分普通场所及在上峰面前两种，文字上分报章杂志上及投递条陈说帖两种。

4.捧

即是捧场面那个捧字。戏台上魏公出来，那华歆的举动，是绝好的模范。

5.恐

是恐吓之意，是他动词。这个理很精深，我不妨多讲几句。官之为物，何等宝贵，岂能轻易给人？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，还不生效，就是少了恐字工夫。其方法是把当局的人要害寻出，轻轻点他一下，他就会惶然大骇，立把官儿送出来。学者须知：恐字与捧字，是互相为用的。善恐者捧之中有恐，旁观的人，见他在上峰面前，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，其实上峰听之，汗流侠背。善捧者恐之中有捧，旁观的人见他丰骨棱棱，句句话责备上峰，其实听之者满心欢喜，骨节皆酥。"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"，"大匠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"，是在求官者之细心体会。最要紧的，用恐字时，要有分寸，如用过度，大人先生老羞成怒，与我作起对来，岂不与求官之宗旨大背？这又何苦乃尔？非到无可奈何时，恐字不可轻用。切嘱！切嘱！

6.送

即是送东西，分大小二种：一大送，把银元一包一包的拿出来送；二小送，如送春茶、火肘及请上馆子之类。所送之人有二：一操用舍之权者，二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。

有人能把六字一一做到，包管字字发生奇效。那大人先生，独

居深念，自言自语道："某人想做官，已经说了许久（空字之效），他与我有某种关系（贡字之效），其人很有点才具（冲字之效），对于我也很好（捧字之效），但此人有坏才，如不安置，未必不捣乱（恐字之效）。想至此处，回顾室中，黑压压的，或白亮亮的，摆了一大堆（送字之效），也就无话可说，挂出牌来，某缺着某人署理。求官至此，功行圆满，于是能走马上任，实行做官六字真言。

做官六字真言："空、恭、绷、凶、聋、弄。"此六字俱是平声，其意义如下：

1.空

即空洞的意思，分二种。一，文字上：凡批呈词，出文告，都是空空洞洞的，其中奥妙，我难细说，读者请往各官厅，把壁上的文字从东辕门读到西辕门，就可恍然大悟。二，办事上，任办何事，都是活摇活动，东倒也可，西倒也可。有时办得雷厉风行，其实暗中藏得有退路，如果见势不佳，就从那条路抽身走，绝不会把自己牵挂着，闹出移交不清及撤任查办等笑话。

2.恭

即卑躬折节，胁肩谄笑之类。分直接间接两种：直接指对上司而言，间接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、丁役、姨太太等而言。

3.绷

即俗语所谓绷劲，是恭字的反面字，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。分两种：一，仪表上，赫赫然大人物，凛不可犯。二，言谈上：俨然腹有经纶，般般大才。

上述对上司用恭，对下属及老百姓用绷，是指普通而言。然亦不可拘定，须认清饭甑子所在地，看操我去留之权者，在乎某处。对饭甑子所在地用恭，非饭甑子所在地用绷。明乎这个理，有时对上司反可用绷，对下属及老百姓反该用恭。

4.凶

只要能达我之目的，就使人卖儿贴妇，亡身灭家，也不必管；但有一层要注意，凶字上面，定要蒙一层仁义道德。

5.聋

即耳聋，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。聋字包有瞎字之意，

文字上的低骂，闭目不视。

6.弄

即弄钱之弄，川省俗语，往往读作平声。千里来龙，此处结穴。前面十一字，都为此字而设。弄字与求官之送字相对，要有送，才有弄。但弄字要注意，看公事上通得过通不过。如果通不过，自己垫点腰包也不妨；如通得过，那就十万八万，都不谦虚。

以上十二字，我不过粗举大纲，许多精义，都未发挥有志于官者，可按着门类自去研究。

有人问我办事秘诀，我授以办事二妙法如下：

1.锯箭法

相传：有人中箭，请外科医生治疗，医生将箭干锯下，即索谢礼。问何不将箭头取出？答："这是内科的事，你去寻内科好了。"现在各官厅，与夫大办事家，都是用着这种方法。譬如批呈词云："据呈某某等情，实属不合已极，仰候令饬该县知事，查明严办"等语。"不合已极"四字是锯箭干，"该知事"已是内科。抑或云"仰候转呈上峰核办"，那"上峰"就是内科。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。我说："此事我很赞成，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。""很赞成"三个字是锯箭干，"某人"是内科。又或说："我先把某部分办了，其余的以后办。""先办"是锯箭干，"以后"是内科。此外有只锯箭干，并不命寻内科的，也有连箭干都不锯，命其径寻内科的。种种不同，细参自语。

2.补锅法

家中锅漏，请补锅匠来补。补锅匠一面用铁皮刮锅底煤烟，一面对主人说道："请点火来我烧烟。"乘着主人转背之际，用铁锤在锅上轻轻敲几下，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。主人转来，指与他看道："你这锅，裂痕很长，上面油腻了，看不见。我把锅烟刮开，就现出来了，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。"主人埋头一看，说道："不错！不错！今天不遇着你，我这锅恐怕不能用了。"及到补好，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。有人曾说："中国变法，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来医。"这即是用的补锅法。《左传》上郑庄公纵容共叔段，使他多行不义，才用兵讨伐，也是补锅法。历史上这类事很多，举不胜举。

大凡办事的人，怕人说他因循，就用补锅法，无中生有，寻些事办。及到事情棘手，就用锯箭法，脱卸过去。后来箭头溃烂了，反大骂内科坏事。我国的政治，大概前清宦场是用锯箭法，变法诸公是用补锅法，民国以来是锯箭、补钢二法互用。

上述二妙法，是办事公例，合得到这公例的就成功，违反这公例的就失败。我国政治家，推管子为第一，他的本事，就是把这两个法子用得圆转自如。狄人伐卫，齐国按兵不动，等到狄人把卫灭了，才出来做“兴灭国，继绝世”的义举。这是补锅法。召陵之役，不责楚国僭称王号，只责他包茅不贡。这是锯箭法。那个时候，楚国的实力远在齐国之上，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代楚，可说是把锅敲烂来补。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，他立即锯箭了事。召陵一役，以补锅法始，以锯箭法终。管仲把锅敲烂了，能把它补起，所以称为“天下才”。

明季武臣，把流寇围住了，故意放他出来，本是用的补锅法；后来制他不住，竟至国破君亡，把锅敲烂了补不起，所以称为“误国庸臣”。岳飞想恢复中原，迎回二帝，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，就遭杀身之祸。明英宗被也先捉去，于谦把他弄回来，算是把箭头取出了，仍遭杀身之祸。何以故？违反公例故。

晋朝王导为宰相，有一个叛贼，他不去讨伐，陶侃责备他。他复书道：“我遵养时晦，以待足下。”侃看了这封信，笑道：“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。”王导道养时贼，以待陶侃，即是留着箭头，以待内科。诸名士在新亭流涕，王导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国对泣？”他义形于色，俨然手执铁锤要去补锅，其实说两句漂亮话，就算完事。怀、愍二帝陷在北边，永世不返，箭头水未取出。王导此等举动，略略有点像管仲，所以史上称他为“江左夷吾”。读者如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，包管成为管子而后第一个大政治家。

我著的《厚黑经》，说得有：“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。不曰黑乎，洗而不白。”后来我改为：“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。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”有人问我：“世间哪有这种东西？”我说：“手足的茧疤，是越磨越厚；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”人的心，生

来是黑的，遇着讲因果的人，讲理学的人，拿些仁义道德蒙在上面，才不会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体自然出现。

中国幅员广大，南北气候不同，物产不同，因之人民的性质也就不同。于是文化学术，无在不有南北之分。例如：北有孔孟，南有老庄，两派截然不同。曲分南曲北曲，字分南方之帖、北方之碑，拳术分南北两派，禅宗亦分南能北秀，等等尽是。厚黑学是一种大学问，当然也要分南北两派。门人问厚黑，宗吾曰：南方之厚黑欤？北方之厚黑钦，任金革，死而不愿，北方之厚黑也，卖国军人居之。革命以教，不循轨道，南方之厚黑也，投机分子居之。人问："究竟学南派好，还是学北派好？"我说："你何糊涂乃尔！当讲南派，就讲南派；当讲北派，就讲北派。口南派而实行北派，是可以的；口北派而实行南派，也是可以的，纯是相时而动，岂能把南北成见横亘胸中。民国以来的人物，有由南而北的，有由北而南的，又复南而北，北而南，往返来回，已不知若干次，独你还徘徊歧路，向人问南派好吗？北派好呢？我实在无从答复。"

有人问我道："你既自称厚黑教主，何以你做事每每失败？何以你的学生本事比你大，你每每吃他的亏？"我说："你这话差了。凡是发明家，都不可登峰造极。儒教是孔子发明的，孔子登峰造极了，颜曾思孟去学孔子，他们的学问，就比孔子低一层；周程朱张去学颜曾思孟，学问又低一层；后来学周程朱张的又低一层，一辈不如一辈。老子发明道教，释迦发明佛教，其现象也是这样，这是由于发明家本事太大了的原故。惟西洋科学则不然，发明的时候很粗浅，越研究越精深。发明蒸汽的人，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，发明电气的人，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。后人继续研究下去，造出种种机械，有种种用途，为发明蒸汽电气的人所万不及料。可见西洋科学，是后人胜过前人，学生胜过先生。我的厚黑学，与西洋科学相类，只能讲点汽冲壶盖、死蛙运动，中间许多道理，还望后人研究。我的本事，当然比学生小，遇着他们，当然失败。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，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，一辈胜过一辈，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。

又有人问我道：你既发明厚黑学，为什么未见你做些轰轰烈烈

的事?”我说道:“你们的孔夫子,为什么未见他做些轰轰烈烈的事?他讲的为政为邦,道千乘之国,究竟实行了几件?曾子著一部《大学》,专讲治国平天下,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?平的天下在哪里?子思著一部《中庸》,说了些中和位育的话,请问他中和位育的实际安在?你去把他们问明了,再来同我讲。”

世间许多学问我不讲,偏要讲厚黑学,许多人都很诧异。我可把原委说明:我本来是孔子信徒,小的时候,父亲与我命的名,我嫌它不好,见《礼记》上孔子说:“儒有今人与居,古人与稽,今世行之,后世以为楷。”就自己改名世楷,字宗儒表示信从孔子之意。光绪癸卯年冬,四川高等学堂开堂,我从自流井赴成都,与友人雷袭皆同路,每日步行百里,途中无事,纵谈时局,并寻些经史来讨论。聋皆有他的感想,就改字铁崖。我觉得儒教不能满我之意,心想与其宗孔子,不如宗我自己,因改字宗吾。这宗吾二字,是我思想独立之旗帜。今年岁在乙亥,不觉已整整的三十二年了。自从改字宗吾后,读一切经史,觉得破绽百出,是为发明厚黑学之起点。

及入高等学堂,第一次上讲堂,日本教习池水先生演说道:“操学问,全靠自己,不能靠教师。教育二字,在英文为 Education,照字义是‘引出’之意。世间一切学问,仅是我脑中所固有,教师不过‘引之使出’而已,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,按入学生脑筋内。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,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,只有越倾越少的,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。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,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。脑如一个囊,中贮许多物,教师把囊口打开,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。”他这种演说,恰与宗吾二字冥合,于我印象很深,觉得这种说法,比朱子所说“学之为言效也”精深得多。后来我学英文,把字根一查,果然不错。池水先生这个演说,于我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。我近来读报章,看见日本二字就刺眼,凡是日本人的名字,都觉得讨厌,独有池水先生,我始终是敬佩的。他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,至今还常在我脑中。

我在学堂时,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,书面大书“囚囊”二字。许多同学不解,问我是何意义?我说:“并无意义,是随便写的。这囚囊二字,我自己不说明,恐怕后来的考古家,考过一百

年，也考不出来。囚囊者，脑是一个囊，副本上所写，皆囊中固有之物也。”题此二字，聊当座右铭。

池水先生教理化数学，开始即讲水素酸素，我就用“引而出之”的法子，在脑中搜索，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，看还可以引出点新鲜的东西否。以后凡遇他先生所讲的，我都这样的工作。哪知此种工作，真是等于王阳明之格竹子，干了许久许久，毫无所得。于是废然思返，长叹一声道：“今生已过也，再结后生缘。”我从前被八股缚束久了，一听见废举，兴学堂，欢喜极了，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，与夫诗文集等等，一火而焚之。及在学堂内住了许久，大失所望。有一次，星期日，在成都学道街买了一部《庄子》。雷民心见了诧异道：“你买这些东西来做什么?”我说：“雷民心，科学这门东西，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?”他是茫茫大海的，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，也莫得器械来试验，还不是等于空想罢了。在学堂中，充其量，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智识，有何益处？只好等儿子儿孙再来研究，你我今生算了。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上寻一条路来走。”他听了这话，也同声叹息。

我在高等学堂的时候，许多同乡同学的朋友都加入同盟会。有个朋友曾对我说：“将来我们起事，定要派你带一支兵。”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心想古来当英雄豪杰，必定有个秘诀，因把历史上的事汇集拢来，用归纳法搜求他的秘诀。经过许久，茫无所得。宣统二年，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（其时校长名曰监督）。有一夜，睡在监督室中，偶然想到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几个人，不禁捶床而起曰：“得之矣！得之矣！古之所谓英雄豪杰者，不外面厚心黑而已！”触类旁通，头头是道，一部二十四史，都可一以贯之。那一夜，我终夜不寐，心中非常愉快，俨然像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，发明格物致知之理一样。

我把厚黑学发明了，自己还不知这个道理对与不对。我同乡同学中，讲到办事才，以王简恒为第一，雷民心尝呼之为“大办事家”。适逢简恒进富顺城来，我就把发明的道理，说与他听，请他批评。他听罢，说道：“李宗吾，你说的道理，一点不错。但我要忠告你，这些话，切不可拿在口头说，更不可见诸文字。你尽管照你

发明的道理埋头做去，包你干许多事，成一个伟大人物。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，不但终身一事无成，反有种种不利。”我不听良友之言，竟自把它发表了，结果不出简恒所料。诸君！诸君！一面读《厚黑学》，一面须切记简恒箴言。

我从前意气甚豪，自从发明了厚黑学，就心灰意冷，再不想当英雄豪杰了。跟着我又发明“求官六字真言”、“做官六字真言”及“办事二妙法”。这些都是民国元年的文字。反正后许多朋友，见我这种颓废样子，与从前大异，很为诧异，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假使我不讲厚黑学，埋头做去，我的世界或许不像现在这个样子。不知是厚黑学误我，还是我误厚黑学。

《厚黑学》一书，有些人读了，慨然兴叹，因此少出了许多英雄豪杰。有些人读了，奋然兴起，因此又多出了许多英雄豪杰。我发明厚黑学，究竟为功为罪，只好付诸五殿阎罗裁判。

我发表《厚黑学》的时候，念及简恒之言，迟疑了许久。后来想到朱竹诧所说：“宁不食两庑无豚肩，风怀一诗，断不能删。”奋然道：“英雄豪杰可以不当，这篇文字不能不发表。”就毅然决然，提笔写去，而我之英雄豪杰的希望，从此就断送了，读者只知厚黑学适用，那知我是牺牲一个英雄豪杰掉换来的，其代价不为不大。

其实朱竹诧删去风怀一诗，也未必能食“两庑豚肩”，我把厚黑学秘为独得之奇，也未必能为英雄豪杰。于何征之呢？即以王简恒而论，其于吾道算是独有会心，以他那样的才具，宜乎有所成就，而孰知不然。反正时，他到成都，张列五委他某县知事，他不干，回到自井。民国三年，讨袁之役，熊杨在重庆独立，富顺响应，自并推简恒为行政长。事败，富顺廖秋华、郭集成、刁广孚被捕到泸州，廖被大辟，郭、刁破家得免，简恒东藏西躲，昼伏夜行，受了雨淋，得病，缠绵至次年死，身后非常萧条。以简恒之才具之会心，还是这样的结果，所以读我厚黑学的人，切不可自命为得了明人的指点，即便自满。民国元年，我到成都，住童子街公论日报社内，与廖绪初、谢绶青、杨仔耘诸人同住，他们再三怂恿我把《厚黑学》写出来。绪初并说道：“你如果写出来，我与你做一序。”我想：“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，绳趋矩步，朋辈呼之为‘廖大圣人’，他都

说可以发表，当然可以发表，我遂逐日写去，我用的别号，是独尊二字，取‘天上地下，惟我独尊’之意，络初用淡然的别号作一序曰：‘吾友独尊先生，发明厚黑学，成书三卷，上卷厚黑学，中卷厚黑经，下卷厚黑传习录，嬉笑怒骂，亦云苛矣。然考之中外古今，与夫当世大人先生，举莫能外，诚宇宙至文哉！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，当不乏人，特劝先生登诸报端，以饷后学，他日更刊为单行本，普渡众生，同登彼岸，质之独尊，以为何如’？民国元年，月日，淡然。”哪知一发表，读者哗然。说也奇怪，我与络初同是用别号，乃廖大圣人之称谓，依然如故，我则博得李厚黑的徽号。

绪初办事，富有毅力，毁誉在所不计。民国八年，他当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，其时校长县视学（县视学即后来之教育局长）任免之权，操诸教育科。杨省长对于给初，倚畀甚殷，绪初签呈任免之人，无不照准。有时省长下条子任免某人，络初认为不当者，将原条退还，杨省长不以为忤，而信任益坚。最奇的，其时我当副科长，凡是得了好处的人，都称颂曰：“此廖大圣人之赐也。”如有倒甑子的，被记过的，要求不遂的，预算被核减的，往往对人说道：“这是李厚黑干的。”成了个“善则归廖绪初，恶则归李宗吾”。绪初今虽死，旧日教育科同事诸人，如侯克明、黄治教等尚在，请他们当天说，究竟这些事，是不是我干的？究竟绪初办事，能不能受旁人支配？我今日说这话，并不是卸责于死友，乃是举出我经过的事实，证明简恒的话是天经地义，厚黑学三字，断不可拿在口中讲。我厚爱读者诸君，故敢掬诚相告。

未必绪初把得罪人之事向我推卸吗？则又不然。有人向他说及我，绪初即说道：“某某事是我干的，某人怪李宗吾，你可叫某人来，我当面对他说，与宗吾无干。”无奈绪初越是解释，众人越说绪初是圣人，李宗吾干的事，他还要代他受过，非圣人而何？李宗吾能使绪初这样做，非大厚黑而何？雷民心曰：“厚黑学做得说不得。”真绝世名言哉！后来我也挣得圣人的徽号，不过圣人之上，冠有厚黑二字罢了。

圣人也，厚黑也，二而一，一而二也。庄子说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”圣人与大盗的真相，庄子是看清楚了。跖之徒问于跖

曰："盗有道乎？"跖曰："奚啻其有道也，夫妄意关内中藏，圣也，入先，勇也，出后，义也，知时，智也，分均，仁也。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无有。"圣勇义智仁五者，本是圣人所做的，跖能窃用之，就成为大盗。反过来说，厚黑二者，本是大奸大诈所做的，人能善用之，就可成大圣大贤。试举例言之，胡林翼曾说："只要于公家有利，就是顽钝无耻的事，我都要干。"又说："办事要包揽把持。"所谓顽钝无耻也，包揽把持也，岂非厚黑家所用的技术吗？林翼能善用之，就成为名臣了。

王简恒和廖绪初，都是我很佩服的人。绪初办旅省叙属中学堂和当省议会议员，只知为公二字，什么气都受得，有点像胡林翼之顽钝无耻。简恒办事，独行独断，有点像胡林翼之包揽把持。有天我当着他二人说道："绪初得了厚字诀，简桓得了黑字诀，可称吾党健者。"历引其事以证之。二人欣然道："照这样说来，我二人可谓各得圣人之一体了。"我说道："百年后有人一与我建厚黑庙，你二人都是有配享希望的。"

民国元年，我在成都公论日报社内写《厚黑学》，有天绪初到我室中，见案上写有一段文字："楚汉之际，有一人焉，厚而不黑，卒归于败者，韩信是也。胯下之辱，信能忍之，面之厚可谓至矣。及为齐王，果从蒯通之说，其贵诚不可言，独奈何倦倦于解衣推食之私情，贸然曰：'衣人之衣者，怀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'卒至长乐钟室，身首异处，夷及三族，谓非咎由自取哉！楚汉之际，有一人焉，黑而不厚，亦归于败者，范增是也……"绪初把我的稿子读了一遍，转来把韩信这一段反复读之，默然不语，长叹一声而去。我心想道："这就奇了，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，范增黑有余而厚不足，我原是二者对举，他怎么独有契于韩信这一段？"我下细思之，才知绪初正是厚有余而黑不足的人。他是盛德夫子，叫他忍气，是做得来，叫他做狠心的事，他做不来。患寒病的人，吃着滚水很舒服；患热病的人，吃着冷水很舒服；绪初所缺乏者，正是一黑字，韩信一段，是他对症良药，故不知不觉，深有感触。

中江谢绶青，光绪三十三年，在四川高等学堂与我同班毕业。其时王简恒任富顺中学堂监督，聘绶青同我当教习。三十四年下学

期，绪初当富顺视学，主张来年续聘，其时薪水以两计。他向简恒说道："宗吾是本县人，核减一百两，绶青是外县人，薪仍旧。"他知道我断不会反对他，故毅然出此。我常对人说："绪初这个人万不可相交，相交他，银钱上就要吃亏，我是前车之鉴。"有一事更可笑，其时县立高小校校长姜选臣因事辞职，县令王琰备文请简恒兼任。有天简恒笑向我说道："我近日穷得要当衣服了，高小校校长的薪水，我很想支来用。照公事说，是不生问题。像顺这一伙人，要攻击我，我倒毫不睬他，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说道：'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。'你叫我这个脸放在何处？只好仍当衣服算了。"我尝对人说："此虽偶尔谈笑，而绪初之令人敬畏，简恒之勇于克己，足见一斑。"后来我发明《厚黑学》，才知简恒这个谈话，是厚黑学上最重要的公案。我尝同雷民心批评：朋辈中资质偏于厚字者甚多，而以绪初为第一。够得上讲黑字者，只有简恒一人。近日常常有人说："你叫我面皮厚，我还做得来，叫我黑，我实在做不来，宜乎我作事不成功。"我说："特患你厚得不彻底只要彻底了，无往而不成功。你看绪初之厚，居然把简恒之黑打败，并且厚黑教主还送了一百银子的贽见。世间资质偏于厚字的人，万不可自暴自弃。"

相传凡人的颈子上，都有一条刀路，刽子手杀人，顺着刀路砍去，一刀就把脑壳削下。所以刽子手无事时，同人对坐闲谈，他就要留心看你颈上的刀路。我发明厚黑学之初，遇事研究，把我往来的朋友作为实验品，用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，很发见些重要学理。滔滔天下，无在非厚黑中人。诸君与朋辈往还之际，本我所说的法子去研究，包管生出无限趣味，比读四书五经、二十五史受的益更多。老子曰："邦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"老夫耄矣，无志用世矣，否则这些法子，我是不能传授人的。

我遇着人在我名下行使厚黑学，叨叨絮絮，说个不休。我睁起眼睛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他忽然脸一红，噗一声笑道："实在不瞒你先生，当学生的实在没法了，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。"我说道："可以！可以！我成全你就是了！"语云："对行不对货。"奸商最会欺骗人，独在同业前不敢卖假货。我苦口婆心，劝人研究厚黑学，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，假如有人要使点厚黑学，硬是说

明了来干，施者受者，大家心安理顺。

我把厚黑学发明过后，凡人情冷暖，与夫一切恩仇，我都坦然置之。有人对我说："某人对你不起，他如何如何。"我说："我这个朋友，他当然这样做。如果他不这样做，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？我所发明的是人类大原则，我这个朋友，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。"

辛亥十月，张列五在重庆独立，任蜀军政府都督，成渝合并，任四川副都督，嗣改民政长。他设一个审计院，拟任绪初为院长。绪初再三推辞，乃以尹仲锡为院长。绪初为次长，我为第三科科长。其时民国初成，我以为事事革新，应该有一种新学说出现，乃把我发明的厚黑学发表出来。及我当了科长，一般人都说："厚黑学果然适用，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长官来了。"相好的朋友，劝我不必再登。我就停止不登。于是众人又说道："你看李宗吾，做了科长官，厚黑学就不登了。"我气不过，向众人说道："你们只羡我做官，须知奔走宦场，是有秘诀的。"我就发明求官六字真言、做官六字真言，每遇着相好的朋友，就尽心指授。无奈我那些朋友资质太钝，拿来运用不灵，一个个官运都不亨通，反是从旁窃听的和间接得闻的，倒还很出些人才。

在审计院时，绪初寝室与我相连，有一日下半天，听见绪初在室内拍桌大骂，声震屋瓦，我出室来看，见某君仓皇奔出，绪初追而骂之："你这个狗东西！混帐……"直追至大门而止（此君在绪初办旅省叙属中学时曾当教职员）。绪初转来，看见我，随入我室中坐下，气忿忿道："某人，真正岂有此理！"我问何事，绪初道："他初向我说：某人可当知事，请我向列五介绍。我唯唯否否应之。他说：'事如成了，愿送先生四百银子。'我桌子上一巴掌道：'胡说！这些话，都可拿来向我说吗？'他站起来就走，说道：'算了，算了，不说算了。'我气他不过，追去骂他一顿。"我说："你不替他说就是了，何必为此已甚。"绪初道："这宗人，你不伤他的脸，将来不知还要干些甚么事。我非对列五说不可，免得用着这种人出去害人。"此虽寻常小事，在厚黑学上却含有甚深的哲理。我批评绪初"厚有余而黑不足，叫他忍气是做得来"。叫他做狠心的事做不来，何以此事忍不得气？其对待某君，未免太狠，竟自侵入黑字范

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反复研究，就发见一条重要公例。公例是什么呢？厚黑二者，是一物体之两方面，凡黑到极点者，未有不能厚，厚到极点者，未有不能黑。举例言之：曹操之心至黑，而陈琳作檄，居然容他得过，则未尝不能厚；刘备之面至厚，刘璋推诚相待，忽然举兵灭之，则未尝不能黑。我们同辈中讲到厚字，既公推绪初为第一，所以他逃不出这个公例。

古人云："夫道一而已矣。"厚黑二者，根本上是互相贯通的，厚字翻过来，即是黑，黑字翻过来，即是厚。从前有个权臣，得罪出亡。从者说道："某人是公之故人，他平日对你十分要好，何不去投他?"答道："此人对我果然很好。我好音，他就遗我以鸣琴，我好佩，他就造我以玉环。他平日既见好于我，今日必以我见好于人。如去见他，必定缚我以献于君。"果然此人从后追来，把随从的人捉了几个去请赏。这就是厚脸皮变而为黑心子的明证。人问：世间有黑心子变而为厚脸皮的没有？我答道：有！有！《聊斋》上马介市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，就是由黑心子一变而为厚脸皮。

绪初辱骂某君一事，询之他人，迄未听见说过，除我一人而外，无人知之，后来同他相处十多年，也未听他重提。我尝说："绪初辱骂某君，足见其人刚正，虽暗室中，亦不可干以私，事后绝口不言，隐人之恶，又见其盛德。"但此种批评，是站在儒家立场来说，若从厚黑哲学上研究，又可得出一条公例："黑字专长的人，黑者其常，厚者其哲；厚字专长的人，厚者其常，黑者其哲。"绪初是厚字专长的人，其以黑字对付某君，是暂时的现象；事过之后，又回复到厚字常轨，所以后此十多年隐而不言。我知他做了此等狠心事，必定于心不安，故此后见面，不便向他重提此事。他办叙属学堂的时候，业师王某来校当学生，因事犯规，绪初悬牌把他斥退。后来我曾提起此事，他蹙然道："这件事我疚心。"这都是做了狠心的事，要恢复常轨的明证。因知他辱骂某君一定很疚心，所以不便向他重提。

绪初已经死了十几年，生平品行，粹然无疵。凡是他的朋友和学生，至今谈及，无不钦佩。去岁我做了一篇《廖张轶事》，叙述绪初和列五二人的事迹，曾登诸《华西日报》。绪初是国民党的忠实信

徒，就是异党人，只能说他党见太深，对于他的私德，仍称道不置。我那篇《廖张轶事》，曾胪举其事，将来我这《厚黑丛话》写完了，莫得说的时候，再把他写出来，充塞篇幅。一般人呼绪初为廖大圣人，我看他，得力全在一个厚字。我曾说："用厚黑以图谋公利，越厚黑人格越高尚。"续初人格之高尚，是我们朋辈公认的。他的朋友和学生存者甚多，可证明我的话不错，即可证明我定的公例不错。

我发表《厚黑学》，用的别号是独尊二字，与朋友写信也用别号，后来我改写为"蜀酋。"有人问我蜀酋作何解释？我答应道：我发表《厚黑学》，有人说我疯了，离经叛道，非关在疯人院不可。我说：那么，我就成为蜀中之罪首了。因此名为蜀酋。我发表《厚黑学》过后，许多人实力奉行，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。有人向我说道：国中首领，非你莫属。我说：那么，我就成为蜀中之首长了。因此又名蜀酋。再者，我讲授厚黑学，得我真传的弟子，本该授以衣钵，但我的生活是沿门托钵，这个钵要留来自用，只有把我的狗皮褂子脱与他穿。所以"獨"字去了犬旁，成为蜀字。我的高足弟子很多，弟子之足高，则先生之足短，弟子之足高一寸，则先生之足短一寸。所以尊字截去才字，成为酋字。有此原因，我只好称为蜀酋了。

世间的事，有知难行易的，有知易行难的，惟有厚黑学最特别，知也难，行也难。此道之玄妙，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，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，黄石老人因张良身有仙骨于半夜三更传授他，张良言下顿悟，老人以王者师期之。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，所以《史记》上说："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独沛公善之。"良叹曰："沛公殆天授也。"可见这门学问不但明师难遇，就遇着了，也难于领悟。苏东坡曰："项籍百战百胜，而轻用其锋。高祖忍之，养其全锋而待其敝，此子房教之也。"衣钵真传，彰彰可考。我打算做一部《厚黑学师承记》，说明授受渊源，使人知这门学问，要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，要张良、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。我近倡厚黑救国之说，许多人说我不通，这也无怪其然，是之谓知难。

刘邦能够分杯羹，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，其心之黑还了得吗？独至韩信求封假齐王，他忍不得气，怒而大骂，使非张良从旁指点，

几乎误事。勾践入吴，身为臣，妻为妾，其面之厚还了得吗？沼吴之役，夫差遣人痛哭求情，勾践心中不忍，意欲允之。全亏范蠡悍然不顾，才把夫差置之死地。以刘邦、勾践这类人，事到临头，还须军师临场指挥督率才能成功，是之谓行难。

苏东坡的《留侯论》，全篇是以一个厚字立柱。他文集中，论及沼吴之役，深以范蠡的办法为然。他这篇文字，是以一个黑字立柱。诸君试取此二字，细细研读，当知鄙言不谬。人称东坡为坡仙，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，才能揭出此种妙谛。诸君今日，听我讲说，可谓有仙缘。噫，外患迫矣，来日大难，老夫其为黄石老人乎！愿诸君以张子房自命。

厚黑从话卷三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十月

有人读《厚黑经》，读至“盖欲学者于此，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仁义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”，发生疑问道：“李宗吾，你这话恐说错了。孟子曰：‘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’可见仁义是本然的。你怎么把厚黑说成本然，把仁义说成外诱？”我说：“我倒莫有说错，只怕你们那个孟子错了。孟子说：‘孩提之重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’他这个话究竟对不对，我们要实地试验。就叫孟子的夫人把他亲生小孩抱出来，由我当着孟子试验。母亲抱着小孩吃饭，小孩伸手来拖，如不提防，碗就会落地打烂。请问孟子，这种现象是不是爱亲？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，小孩伸手来索，母亲不给他，放在自己口中，小孩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，放在他口中。请问孟子，这种现象是不是爱亲？小孩在母亲怀中食乳，食糕饼，哥哥走近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请问孟子，这种现象是不是敬兄？只要全世界寻得出一个小孩，莫得这种现象，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，既是全世界的小孩无一不然，可见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，我的厚黑学当然成立。

孟子说："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，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"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，就伸手去夺，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，哥哥近前，就推他打他，都是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。依孟子所下的定义，都该认为良知良能。孟子教人把良知良能扩而充之，现在许多官吏刮取人民的金钱，即是把小孩时夺取母亲口中糕饼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。许多志士，对于忠实同志，排挤倾轧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即是把小孩食乳食糕饼时推哥哥、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扩充来的。孟子曰："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"现在的伟人，小孩时那种心理，丝毫莫有失掉，可见中国闹到这么糟，完全是孟子的信徒干的，不是我的信徒干的。

我民国元年发表《厚黑学》，指定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刘邦几个人为模范人物。迄今廿四年并莫一人学到。假令有一人像刘备，过去的四川，何至成为魔窟？有一人像孙权，过去的宁粤，何至会有裂痕？有一人像曹操，伪满敢独立吗？有一人像刘邦，中国会四分五裂吗？吾尝曰："刘邦吾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曹操斯可矣，曹操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刘备、孙权斯可矣。"所以说中国闹得这么糟，不是我的信徒干的。

汉高祖分杯羹，是把小孩夺母亲口中糕饼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。唐太宗杀建成、元吉，是把小孩食乳食糕饼时推哥哥、打哥哥那种良知能扩充出来的。这即是《厚黑经》所说："充其本然之厚黑。"昔人咏汉高祖诗云："咀上肉，杯中羹，黄袍念重而翁轻。缭羹嫂，羹颉侯，一饭之仇报不休……君不见汉家开基四百明天子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乃如此。"汉高粗把通常所谓五伦与夫礼义廉耻扫荡得干干净净，这即是《厚黑经》所说："去夫外诱之仁义。"

有人难我道："孟子曰：'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'据你这样说，岂不是应该改为'恻隐之心人皆无之'吗？我说："这个道理，不能这样讲。孟子说：'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'明明提出怵惕恻隐四字。下文忽言'无恻隐之心非人也。''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'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，请问是何道理？再者孟子所说：'乍见孺子将入于井'，这是孺子对于井发生了死生

存亡的关系，我是立在旁观地位。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请问孟子，此心作何状态？此时发出来的第一念，究竟是怵惕，是恻隐？不消说，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，只能顾我之死，不暇顾及孺子之死。非不爱孺子也，事变仓卒，顾不及也。必我心略为安定，始能顾及孺子，恻隐心乃能出现。我们这样的研究，就可把人性真相看出。怵惕是为我的念头，恻隐是为人的念头。孟子曰：'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'李宗吾曰：'怵惕之心，厚黑之端也。'孟子讲仁义，以恻隐为出发点。我讲厚黑，以怵惕为出发点。先有怵惕，后有恻隐，孟子的学说是第二义，我的学说才是第一义。"

成都属某县，有曾某者，平日讲程朱之学，品端学粹，道貌岩岩，人呼为曾大圣人，年已七八十岁，当县中高小学校校长。我查学到校，问："老先生近日还看书否？"答："现正纂集宋儒语录。"我问："孟子说：'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'何以下文只说：'无恻隐之心非人也。''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'把怵惕二字置之不论，其意安在？"他听了沉吟思索。我问："见孺子将入于井，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，究竟是怵惕，是恻隐？"他信口答道："是恻隐。"我听了默然不语，他也默然不语。我本然想说；第一念既是恻隐，何以孟子不言"恻隐怵惕"而言"怵惕恻隐"？因为他是老先生，不便深问，只问道："宋儒之书，我读得很少，只见他们极力发挥恻隐二字未知对于怵惕二字，亦会加以发挥否？"他说："莫有。"我不便往下再问，就谈别的事去了。

《孟子》书上，孩提爱亲章，孺子将入井章，是性善说最根本的证据。宋儒的学说，就是从这两个证据推阐出来的。我对于这两个证据，根本怀疑，所以每谈厚黑学，就把宋儒任意抨击。但我生平最喜欢怀疑，不但怀疑古今人的说法，并且自己的说法也常常怀疑。我讲厚黑学，虽能自圆其说，而孟子的说法，也不能说他莫得理由。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？孟子所说：孩提知爱和恻隐之心，又从何处生出来呢？我于是又继续研究下去。

中国言性者五家，孟子言性善，荀子言性恶，告子言性无善无恶，杨雄言善恶混，韩昌黎言性有三品。这五种说法，同时并存，竟未能折衷一是。今之政治家，连人性都未研究清楚，等于医生连

药性都未研究清楚。医生不了解药性，断不能治病；政治家不了解人性，怎能治国？今之举世纷纷者，实由政治家措施失当所致。其措施之所以失当者，实由对于人性欠了精密的观察。

中国学者，对于人性欠精密的观察，西洋学者，观察人性更欠精密。现在的青年，只知来儒所说“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这个道理讲不通……这都是对于人性欠了研究，才有这类不通的学说。学说既不通，基于这类学说生出来的措施，遂无一可通，世界乌得不大乱？

从前我在报章杂志上，常见有人说：“中国的礼教，是吃人的东西。”殊不知西洋的学说，更是吃人的东西。阿比西尼亚被墨索里尼摧残蹂躏，是受达尔文学说之赐，将来算总帐，还不知要牺牲若干人的生命。我们要想维持世界和平，非把这类学说一律肃清不可。要肃清这类学说，非把人性彻底研究清楚不可。我们把人性研究清楚了，政治上的设施，国际上的举动，才能适合人类通性，世界和平才能维持。

我主张把人性研究清楚，常常同友人谈及。友人说：“近来西洋出了许多心理学的书，你虽不懂外国文，也无妨买些译本来看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话太奇了！我说个笑话你听：从前有个查学员视察某校，对校长说：‘你这个学校，光线不足。’校长道：‘我已派人到上海购买去了。’人人有一个心，自己就可直接研究，本身就是一副仪器标本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试验，朝夕与我往来的人，就是我的试验品，你叫我看外国人著的心理学书，岂不等于到上海买光线吗？”闻者无辞可答。

我民国元年著的《厚黑学》，原是一种游戏文字，不料发表出来，竟受一般人的欢迎，厚黑学三字，在四川几乎成一普通名词。我以为此种说法能受人欢迎，必定于人性上有关系，因继续研究。到民国九年，我想出一种说法，似乎可以把人性问题解决了，因著《心理与力学》一文，载入《宗吾臆谈》内。我这种说法，未必合真理，但为研究学术起见，也不妨提出来讨论。

西洋人研究物理学研究得很透彻，得出来的结论，五洲万国无有异词，独于心理学却未研究透彻，所以得出来的结论，此攻彼讦。

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研究物理，乃是以人研究物，置身局外，冷眼旁观，把真相看得很清楚，毫无我见，故所下判断最为正确。至于研究心理学，则研究者是人，被研究者也是人，不知不觉就参入我见，下的判断就不公平。并且我是众人中之一人，古人云："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"即使此心放得至公至平，仍得不到真相。因此我主张：研究心理学，应当另辟一个途径来研究。科学家研究物理学之时，毫无我见，等他研究完毕了，我们才起而言曰："人为万物之一，物理与人事息息相通，物理上的公例也适用于人事。"据物理的公例，以判断人事，而人就无遁形了。声光磁电的公例，五洲万国无有异词。人之情感，有类磁电，研究磁电，离不脱刀学公例，我们就可以用力学公例以考察人之心理。

民国九年，我家居一载，专干这种工作，用力学上的公例去研究心理学，觉到许多问题都涣然冰释。因创一公例曰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从古人事迹上，现今政治上，日用琐事上，自己心坎上，理化数学上，中国古书上，西洋学说上，四面八方印证起来，似觉处处可通。有了这条公例，不但关于人事上一切学说若网若纲，有条不紊，就是改革经济政治等等，也有一定的轨道可循，而我心中的疑团，就算打破，人性问题就算解决了。但我要声明：所谓疑者，是我心中自疑，非谓人人俱如是疑也。所谓解决者，是我自谓解决，非谓这个问题果然被我解决也。此乃我自述经过，聊备一说而已。

本来心理学是很博大精深的，我是个讲厚黑学的，怎能谈这门学问？我说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"，等于说"水之波动，循力学公例而行"。据科学家眼光看来，水之性质和现象，可供研究者很多，波动不过现象中之一小部分。所以我谈心理，只谈得很小很小一部分，其余的我不知道，就不敢妄谈。

为甚力学上的公例可应用到心理学上呢？须知科学上许多定理，最初都是一种假说，根据这种假说，从各方试验，都觉可通，这假说就成为定理了。即如地球这个东西，自开辟以来就有的，人民生息其上，不知经过了若干万万年，对于地球之构成就无人了解。距今二百多年以前，出了个牛顿，发明万有引力，说"地心有吸力，

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，成为地球。”究竟地心有无吸力，无人看见，牛顿这个说法，本是假定的。不过根据他的说法，任如何试验，俱是合的，于是他的假说就成了定理。从此一般人都知道：“凡是有形有体之物，俱要受吸力的吸引。”到爱因斯坦出来，发明相对论，本牛顿之说扩大之，说：“太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，经过其他星球，也要受其吸引。因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，于是以直线进行之光线，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。”他这种说法，经过实地测验，证明不错，也成为定理。从此一般人又知道，有形无体之光线，也要受吸力的吸引。我们要解决心理学上的疑团，无妨把爱因斯坦的说法再扩大之，说：“我们心中也有一种引力，能把耳闻目睹、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。心之构成，与地球之构成相似。”我们这样的设想，牛顿的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，而人事上一切变化，就可用力学公例去考察他了。

通常所称的心，是由于一种力，经过五官出去，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，集合而成的。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，我注目视之，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，与那个物连结；我将目一闭，能够记忆那物的形状，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。听人的话能够记忆，即是把那人的话拖进来绾住了。由这种方式，把耳濡目染与夫环境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，集合为一团，就成为一个心。所以心之构成。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似。

一般人都说自己有一个心，佛氏出来，力辟此说，说：“人莫得心，通常所谓心，是假的，乃是六尘的影子。”圆觉经曰：“一切众生，无始以来，种种颠倒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”我们试思，假使心中莫得引力，则六尘影子之经过，亦如雁过长空，影落湖心一般，雁一去，影即不存。而吾人见雁之过，其影能留在心中者，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把雁影绾住的原故。所以我们拿佛家的话来推究，也可证明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是相似的。

佛家说：“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，成为种子，永不能去。”这就像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，成为种子一般。我们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，是由于地心有引力，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，是由于人心有引力。因为有引力绾住，所以谷子豆子在田土中永不能去，六

尘影子在八识田中也永不能去。

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——考察其来源，即知其无一不从外面进来。其经过的路线，不外眼耳鼻舌身。虽说人能够发明新理，但仍靠外面收来的智识作基础，犹之建筑房屋，全靠外面购来的砖瓦木石。假如把心中各种智识的来源考出了，从目进来的，命他仍从目退出去，从耳进来的，令他仍从耳退出去，其他一一俱从来路退出，我们的心即空无所有了。人的心能够空无所有，对于外物无贪恋，无嗔恨，有如湖心雁影，过而不留，这即是佛家所说“还我本来面目”。

地球之构成，源于引力，意识之构成，源于种子。试由引力再进一步，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；由种子再进一步，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，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，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。由寂兮寥兮生出引力，而后有地球，而后有物。由寂兮寥兮，生出种子，而后有意识，而后有人。由此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，物理与人事相通，故物理学的规律可适用于心理学。

心理的现象，与磁电现象很相像。人有七情，大别之，只有好、恶二种。心所好的东西，就引之使近；心所恶的东西，就推之使远。其现象与磁电相同。人的心，分知、情、意三者，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，其元素只有知、情二者。磁电同性相推，异性相引，他相推相引的作用，是情的现象。能够判别同性异性，又含有知的作用。可见磁电这个东西，也具有知、情，与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。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，忽然来了一个阳电，要分他的阴电，他当然把他推开。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，忽然来了一个阴电，要分他的阳电，他当然也把他推开。这就像小儿食乳食糕饼的时候，见哥哥来了，用手推他打他一般，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。至于磁电异性相引，犹如人类男女相爱，更是不待说的。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学，可当如磁电学研究。

佛说：“真佛法身，映物现形。”宛然磁电感应现象。又说：“本性圆融，用遍法界。”又说：“非有非无。”宛然磁电中和现象。又说：“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”简直是物理学家所说“能力不灭”。因此之故，我们用力学公例去考察人性，想来不会错。

孟子讲性善，说："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。"我讲厚黑学，说："小儿见母亲口中有糕饼，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。小儿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，见哥哥走近来，就用手推他打他。"这两种说法，岂不是极端相反吗？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？我们下细观察，即知小儿一切动作，都是以我为本位，各种现象，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。将母亲与己身比较，小儿更爱己身，故将母亲口中糕饼取出，放入自己口中。母亲是怀抱我、哺乳我的人，拿母亲与哥哥比较，母亲与我更接近，故更爱母亲。大点的时候，与哥哥朝夕一处玩耍，有时遇着邻人，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，自然更爱哥哥。由此推之，走到异乡，就爱邻人；走到外省，就爱本省人；走到外国，就爱本国人。其间有一定之规律，其规律是："距我越近，爱情越笃，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。"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相像的。我们把他绘出来，如甲图，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亲，第三圈是兄，第四圈是邻人，第五圈是本省人，第六圈是本国人，第七圈是外国人。这个图是人心的现象，我们详加玩索，就觉得这种现象很像讲堂上试验的磁场一般。距磁石越近的地方，铁屑越多，可见人的情感与磁力相像。我们从甲图研究，即知我说的小儿抢母亲口中糕饼，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，原是一贯的事，俱是以我字为出发点，性善说与厚黑学就可贯通为一。

上面所绘甲图，是否真确，我们可再设法证明：假如暮春三月的时候，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去游玩，走至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心中觉得非常愉快；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，心中就戚然不乐。这是甚么缘故呢？因为山水是物，我也是物，物与我本是一体，所以物类好，心中就愉快，物类不好，心中就不愉快。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，见地上许多碎石，碎石之上，落花飘零，我们心中很替落花悲戚，对于碎石不甚动念。这是甚么缘故？因为石是无生之物，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，所以对于落花更觉关情。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，哀鸣宛转，那种声音，入耳惊心。骤闻之下，就会把悲感落花之心移向犬方而去了。这是甚么缘故？因为花是植物，犬与我同是动物，自然会起同情心。我们游毕归来，途中见一只犬拦住一个行人，狂跳狂吠，那人持杖乱击，人犬相争，难解难分。我们看见，总是帮

人的忙，不会帮犬的忙。因为犬是兽类，那人与我同是人类，对乎人的感情，当然不同。假如我们回来，一进门就有人来对我说：某个友人，因为某事，与人发生绝大冲突，胜负未分，我就很替这个友人关心，希望他得胜。虽然同是人类，因为有交情的关系，不知不觉就偏重在我的友人方面去了。我把朋友邀入室中，促膝谈心，正在尔我忘情的时候，陡然房子倒下来，我们心中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，是防卫自己，第二个念头，才顾及友人。我们把各种事实、各种念头、汇合拢来，搜求他的规律，即知每起一念，都是以我字为中心点。我们步步追寻，层层剥剔，逼到尽头处，那个我字，即赤裸裸的现出来了。我们可得一个结论：凡有两个物体，同时出现于我的面前，我无须计较，无须安排，心中自然会有亲疏远近之分。其规律是："距我越远，爱情越减，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。"终不外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。我们把它绘出图来，如乙图：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友，第三圈是他人，第四圈是犬，第五圈是花，第六圈是石。它的现象仍与磁场一般。我们绘这乙图，是舍去了甲图的境界，凭空另设一个境界，乃绘出之图与中图无异，可知甲图是合理的，乙图也是合理的。这两个图，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，既是与磁场相像，与地心引力相像，即可说心理变化不外力学公例。

孟子讲性善，有两个证据，第一个证据是："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。"前已绘图证明，是发源于为我之心，根本上与厚黑学相通。他第二个证据是："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"我们细细推求，仍是发源于为我之心，仍与厚黑学相通。兹说明如下：

怵惕是惊惧的意思，是自己畏死的表现。假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，陡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，我们一齐吃惊，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。这个现象，即是怵惕。这是因为各人都有畏死的天性，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，所以心中会跳，所以会怵惕。我略一审视，晓得不是杀我，是杀别人，登时就会把畏死的念头放大，化我身为被迫的人，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，就想救护他。这就是恻隐。先有怵惕，后有恻隐，是天然的顺序，不是人力安排的。由此可知：恻隐是从怵惕生出来的，莫得怵惕，就不会恻隐，可以

说恻隐二字，仍发源于我字。

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，共有三物，一曰我，二曰孺子，三曰井。我们把他绘为图：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孺子，第三圈是井。我与孺子同是人类，井是无生之物，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，我当然对孺子表同情，不能对井表同情。有了第一圈的我，才有第二圈的孺子。因为我怕死，才觉得孺子将入井是不幸的事；假如我不怕死，就叫我自己入井，我也认为不要紧的事，不起怵惕心。看见孺子将入井，也认为不要紧的事，断不会有恻隐心。莫得我，即莫得孺子，莫行怵惕，即莫得恻隐，道理本是极明白的。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，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。孟子看见怵惕心能放大而为恻隐心，就叫人把恻隐心再放大起来，扩充到四海，道理本是对的，只因少说一句："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。"就生出宋儒的误会。宋儒言性，从恻隐二字讲起走，舍去怵惕二字不讲，成了有恻隐无怵惕，知有第二圈之孺子，不知有第一圈之我。宋儒学说，许多迂曲难通，其病根就在这一点。

我们把甲乙两图详加玩味，就可解决孟、荀两家的争执。甲图是层层放大，由我而亲，而兄，而邻人，而本省人，而本国人，而外国人，其路线是由内向外，越放越大。孟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，就想利用他，创为性善说。所以他说：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……举斯心，加诸彼……推恩足以保四海。"力劝人把圈子放大点。孟子喜言诗，诗是宣畅人的性情，含有利导的意思。乙图是层层缩小，由石而花，而犬，而人，而友，而我，其路线是由外向内，越缩越小。荀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，就想制止他，创为性恶说。所以他说："妻子具而孝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，爵禄盈而忠衰于君。"又说："拘木待隐括蒸矫然后直，钝金待砻厉然后利，人待师法然后正，得礼义然后治，"生怕人把圈子缩小了。荀子习于礼。礼是范围人的行为，含有制裁的意思。甲乙两图，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，甲图是离心力现象，乙图是向心力现象。从力学方面说，两种现象俱不错，即可说孟、荀二人的说法俱不错。无奈他二人俱是各说一面，我们把甲乙二图一看，孟、荀异同之点就可了然了。事情本是一样，不过各人的看法不同罢了。我们详玩甲

乙二圈，就可把厚黑学的某础寻出来。

王阳明讲的致良知，是从性善说生出来的。我讲的厚黑学，是从性恶说生出来的。王阳明说："满街都是圣人。"我说："滔滔天下，无在非厚黑中人。"此两说何以会极端相反呢？因为同是一事，可以说是性善之表现，也可说是性恶之表现。举例言之：假如有个友人来会我，辞去不久，仆人来报道："刚才那个友人，出门去就与人打架角孽，已被警察将双方捉去了。"我听了，就异常关心，立命人去探听。听说警察判友人无罪，把对方关起了，我就很欢喜。倘判对方无罪，把友人关起，我就很优闷。请问我这种心理，究竟是善是恶？假如我去问孟子，孟子一定说："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，何以故呢？你的朋友与人相争，与你毫无关系，你愿你的朋友胜，不愿他败。这种爱友之心，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。此种念头，是人道主义的基础。所谓博施济众，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，所谓民胞物与，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，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，就须把他扩充起来。"假如我去问荀子，荀子一定说："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。何以故呢？你的朋友是人，和他打架的也是人，人与人相争，你不考察是非曲直，只是愿友胜不愿友败；这种自私之心，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。此种念头，是扰乱世界和平的根苗。日本以武力占据东北四省，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，墨索里尼用飞机轰炸阿比西尼亚，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。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，即须把他制伏下去。"我们试看上面的说法，两边都有道理，却又极端相反，这是甚么缘故呢？我们要解决孟、荀两家的争执，只消绘图一看，就自然明白了。如图：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友，第三圈是他人，此心愿友得胜，即是第二圈。请问这第二圈，是大是小呢？孟子寻个我字，与友字比较，即是在外面画个小圈来比较，说第二圈是个大圈。荀子寻个人字，与友字比较，即是在外面画个大圈来比较，说第二圈是个小圈。孟子以为第二圈是第一圈放大而成，其路线是向人字方面扩张出去，故断定人之性善。荀子以为第二圈是由第三圈缩小而成，其路线是向我字方面收缩拢来，故断定人之性恶。其实第二圈始终只有那么大，并未改变。单独画一个圈，不能断他是大是小；单独一种爱友之心，不能断他是善是

恶。画了一圈之后，再在内面或外面画一圈，才有大小之可言。因爱友而做出的事，妨害他人，或不妨害他人，才有善恶之可言。

愿友胜不愿友败之心理，是一种天然现象，乃人类之通性，不能断他是善是恶，只看如何应用就是了。本此心理，可做出相亲相爱之事，也可做出相争相夺之事，犹之我们在纸上画了一圈之后，可以在内面画一小圈，也可以在外面画一大圈。孟子见人画了一圈，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张开点，在外面画一个较大之圈。荀子见人画了一圈，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收拢点，在内面画一个较小之圈。若问他二人的理由，孟子说："这个圈，明明是由一个小圈放大而成。依着它的趋势，当然会再放大，在外面画一个更大之圈。"荀子说："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大圈缩小而成。依着它的趋势，当然会再缩小，在内面画一个更小之圈。"这些说法，真可算无谓之争。

我发表厚黑学后，继续研究，民国九年，创出一条公例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并绘出甲乙二图，因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，都带有点诡辩的性质。同时悟得：我民国元年讲的厚黑学，和王阳明讲的致良知，也带有点诡辩的性质。甚么是诡辩呢？把整个的道理蒙着半面，只说半面，说得条条有理，是之谓诡辩。战国策士，游说人主，即是用的此种方法。其时，黑白异同之说甚盛，孟、荀生当其时，染得有点此种气习，读者切不可为其所愚。我是厚黑先生，不是道学先生，所以我肯说真话。

力有离心、向心两种现象，人的心理也有这两种现象。孟、荀二人，各见一种，各执一词。甲乙两图，都与力学公例不悖，故孟、荀两说，能够对峙二千余年，各不相下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孟、荀两说就可合而为一了。孟、荀两说合并，就成为告子的说法。告子说："性无善无不善。"任从何方面考察，他这个说法都是对的。

人性本是无善无恶，也可说是：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。孟子出来，于整个人性中裁取半面以立说，成为性善说。遗下了半面，荀子取以立论，就成为性恶说。因为各有一半的真理，故两说可以并存。又因为只占得真理之一半，故两说互相攻击。

有孟子之性善说，就有荀子之性恶说与之对抗。有王阳明的致

良知，就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与之对抗。王阳明说："见父自然知孝，见见自然知梯。"把良知二字讲得头头是道。李宗吾说："小孩见着母亲口中糕饼，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。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，见哥哥近前，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。"我把厚黑二字也讲得头头是道。有人呼我为教主，我何敢当？我在学术界，只取得与阳明对等的位置罢了。不过阳明在孔庙中配享，吃冷猪肉，我将来只好另建厚黑庙，以廖大圣人和王简恒、雷民心诸人配享。

我的厚黑学，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，何以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，我受一般人的訾议呢？因为自古迄今，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。这种黑幕，只许彼此心心相喻，不许揭穿，揭穿了，就要受社会的制裁。这算是一种公例。我每向人讲厚黑学，只消连讲两三点钟，听者大都津津有味，说道："我平日也这样想，不过莫有拿出来讲。"请问：心中既这样想，为甚么不拿出来讲呢？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例支配的原故。我赤裸裸的揭穿出来，是违反了公例，当然为社会不许可。

社会上何以会生出这种公例呢？俗语有两句："逢人短命，退货添钱。"诸君都想知道，假如你遇着一个人，你问他尊齿？答："今年五十岁了。"你说："看你先生的面貌，只像三十几的人，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。"他听了，一定很欢喜，是之谓"逢人短命"。又如走到朋发家中，看见一张桌子，问他买成若干钱？他答道："买成四元。"你说："这张桌子，普通价值八元，再买得好，也要六元，你真是会买。"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。是之谓"遇货添钱"。人们的习性，既是这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例。主张性善说者，无异于说："世间尽是好人，你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。"说这话的人，怎么不受欢迎？主张性恶说者，等于说："世间尽是坏人，你是坏人，我也是坏人。"说这话的人，怎么不受排斥？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，后来因为他言性恶，把他请出来，打脱了冷猪肉，就是受了这种公例的制裁。于是乎程朱派的人，遂高坐孔庙中，大吃其冷猪肉。

《孟子》书上有"阉然媚于世也"一句话，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，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。何以故呢？性恶说是箴世，

性善说是媚世。性善说者曰：你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，此妾妇媚语也。性恶说者曰：你是坏人，我也是坏人，此志士箴言也。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，箴言为举世所厌闻，荀子之逐出孔庙也宜哉。呜呼！李厚黑，真名教罪人也！

近人蒋维乔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》说："荀子在周末，倡性恶说，后儒非之者多，绝无一人左担之者，历一千九百余年，俞曲园独毅然赞同之……我国主张性恶说者，古今只有荀俞二氏。"云云。俞曲园是经学大师，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，他著的性说上下二篇，若存若亡，可以说中国言性恶之书，除荀子而外，几乎莫有了。箴言为举世所厌闻，故敢于直说的人，绝无仅有。

滔滔天下，皆是讳疾忌医的人，所以敢于言性恶者，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，非舍得牺牲者不能。荀子牺牲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，才敢于言性恶。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，才敢于讲厚黑学。将来建厚黑庙时，定要在后面与荀子修一个启圣殿，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，每年春秋二祭，也吃吃冷猪肉。

常常有人向我说道："你的说法，未免太偏。"我说：诚然，惟其偏，才医得好病，芒硝大黄，姜桂附片，其性至偏，名医起死回生，所用皆此等药也。药中之最不偏者，莫如泡参甘草，请问世间的大病，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？自孟子而后，性善说充塞天下，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，非得痛痛的打几针，烧几文不可。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，当说道："你的议论，很痛快。"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，针之灸之，才觉得痛；针灸后，全体畅适，才觉得快。

有人读了《厚黑丛话》，说道："你何必说这些鬼话？"我说：我逢着人说人话，逢着鬼说鬼话。请问当今之世，不说鬼话，说甚么？我这部《厚黑丛话》，人见之则为人话，鬼见之则为鬼话。

我不知过去生中，与孔子有何冤孽，他讲他的仁义，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，我讲我的厚黑，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。我们两家的学说，极端相反，永世是冲突的。我想："冤家直解不宜结。"我与孔子讲和好了。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，提出两句口号："厚黑为里，仁义为表。"换言之，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，案头

上放一部四书五经；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，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信徒，即是孔子的信徒，孔子的信徒，即是我的信徒，我们两家学说，永世不会冲突了。千百年后，有人出来做一篇《仲尼宗吾合传》，一定说道："仁近于厚，义近于黑。宗吾引绳墨，切事情，仁义之弊，流于麻木不仁，而宗吾深远矣。"

讳疾忌医，是病人通例，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。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，医界就哗然，说他违反了公例，把他逐出医业公会，把招牌与他下了，药铺与他关了。李宗吾出来，大讲厚黑学，叫把衣服脱了，赤条条的施用刀针。这是自荀子而后，二千多年，都莫得这种医法，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。

昨有友人来访，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、明儒学案一类书，诧异道："你怎么看这类书？"我说："我怎么不看这类书？相传某国有一井，汲饮者，立发狂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，全国人皆狂。独有一人，自凿一井饮之，独不狂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，捉他来，针之灸之，施以种种治疗。此人不胜其苦，只得自汲狂泉饮之。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，道：'我们国中，从此无一狂人了。'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，针之灸之，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，自己治疗。"

人性是浑然的，仿佛是一个大城，王阳明从东门攻入，我从西门攻入，攻进去之后，所见城中的真相，彼此都是一样。人性以告子所说，无善无不善，最为真确。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，是主张性善的，而他教人提出："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"等语，请问此种说法，与告子何异？我民国元年发表《厚黑学》，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。民国九年，我创一条公例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这种说法，即是告子的说法。告子曰："性犹湍水也。"湍水之变化，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，所以"性犹湍水也"五个字，换言之，即是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

有人难我道："告子说：'性无善无不善。'"阳明说：'无善无恶心之体。'一个言性，一个言心体，何能混为一谈？至于你说的'心理变化'，则是就用上言之，更不能牵涉到体上。"我说：我的话不足为凭，请看阳明的话。阳明曰："心统性情，性，心体也，情，

心用也，夫体用一源也，知体之所以为用，则知用之所以为休矣。”心体即是性，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。我说：“阳明的说法，即是告子的说法。”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?

告子曰：“性犹湍水也。”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，请问东流西流，是不是就用上言之?请问水之流东流西，能否逃出力学公例?我说：“‘性犹湍水也’五个字，换言之，即是‘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’似乎不是穿凿附会。”

阳明曰：“性，心体也，情，心用也。”世之言心言性者，因为体不可见，故只就用上言之；因为性不可见，故只就情上言之。孟子曰：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。”又曰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皆是就情上言之。也即是就用上言之。由此而知：孟子所谓性善者，乃是据情之善，因以断定性之善。试问人与人的感情，是否纯有善而无恶?所以孟子的话，就会发生问题，故阳明易之曰：“有善有恶意之动。”意之动即用也，即情也。阳明的学力，比孟子更深，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。

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，我从性恶说悟入，同到无善无恶而止。我同人讲厚黑学，等于用手指月。人能循着手看去，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；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，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。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，同我喋喋不休，等于在我手上寻月，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。我的厚黑学，拿与此等人读，真是罪过。

厚黑从话卷四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

两月前成都某报总编辑对我说：“某君在宴会席上说道：李宗吾做了一篇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，把孔子的面子太伤了，我当著一文痛驳之。”静待至今，寂然无闻。究竟我那篇文字，对于孔子的面子，伤莫有伤，尚待讨论。原文于民国十六年载入拙著《宗吾臆谈》内，某君或许只听人谈及，未曾见过，故无从着笔。兹特重揭报端，

凡想打倒厚黑教主者，快快的联合起来。原文如下：

我先年对于圣人，很为怀疑，细加研究，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，曾做了一篇《圣人之黑幕》。民国元年，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，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，已经众议哗然，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，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。现在国内学者，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，中国的圣人，已是日暮途穷。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，本不该乘圣人之危，坠井下石，但我要表明我思想之过程，不妨把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。底稿早不知抛往何处，只把大意写出来。

世间顶怪的东西，要算圣人，三代以上，产生最多，层见叠出，同时可以产出许多圣人；三代以下，就绝了种，并莫产生一个。秦汉而后，想学圣人的，不知有几千百万人，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，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。请问圣人这个东西，究竟学得到学不到？如说学得到，秦汉而后，有那么多人学，至少也该出一个圣人。如果学不到，我们何苦朝朝日日，读他的书，拚命去学。

三代上有圣人，三代下无圣人，这是古今最大怪事。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，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。我们把他分析一下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余的圣人，尽是开国之君，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，他的破绽，就现出来了。

原来周秦诸子，各人特创一种学说，自以为寻着真理了，自信如果见诸实行，立可救国救民。无奈人微言轻，无人信从。他们心想，人类通性，都是惊慕权势的，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，人人都肯听从。世间权势之大者，莫如人君，尤莫如开国之君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，是竹简做的，能够得书读的很少，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：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，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。于是道家托于黄帝，墨家托于大禹，倡并耕的托于神农，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，著医书的、著兵书的，俱托于黄帝。此外百家杂技，与夫各种发明，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。孔子生当其间，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。他所托的更多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外，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，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。周秦诸子，每人都是这个办法，拿些嘉言懿行，与古帝王加上去。古帝王坐享大名，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。

周秦诸子，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，聚徒讲授，各人的门徒，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。原来圣人二字，在古时并不算高贵，依《庄子·天下篇》所说，圣人之上，还有天人、神人、至人等名称，圣人列在第四等。圣字的意义，不过是“闻声知情，事无不通”罢了，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，都可呼之为圣人，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，人人都称得。后来把朕字、圣字收归御用，不许凡人冒称，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。周秦诸子的门徒，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，也不为僭妄。孔子的门徒，说孔子是圣人，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，老、庄、杨、墨诸人，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表章六经，罢黜百家，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，承认他一人是圣人，诸子的圣人名号，一齐削夺，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。孔子既成为圣人，他所尊崇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当然也成为圣人。所以中国的圣人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。

周秦诸子的学说，要依托古之人君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这可举例证明：南北朝有个张士简，把他的文字拿与虞讷看，虞讷痛加诋斥。随后士简把文改作，托名沈约，又拿与虞讷看，他就读一句，称赞一句。清朝陈修园，著了一本《医学三字经》，其初托名叶天士，及到其书流行了，才改归己名，有修园的自序可证。从上列两事看来，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，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，岂能传到今日？周秦诸子，志在救世，用了这种方法，他们的学说，才能推行，后人受赐不少。我们对于他是应该感谢的，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，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。

孔子之后，平民之中，也还出了一个圣人，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。凡人死了，事业就完毕。惟有关羽死了过后，还干了许多事业，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，又著有《桃园经》、《觉世真经》等书，流传于世。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，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。

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，讲因果的，就说他阴功积得多；讲堪舆的，就说他坟地葬得好；看相的、算命的，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。我想古时的人心，与现在差不多，大约也有

讲因果的人，看见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，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，道德如何好。这些说法流传下来，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。兼之，凡人皆有我见，心中有了成见，眼中所见东西，就会改变形象。带绿色眼镜的人，见凡物皆成绿色；带黄眼镜的人，见凡物皆成黄色。周秦诸子，创了一种学说，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，古人自然会改变形象，恰与他的学说符合。

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。他腓无胈，肢无毛，尤其黔首，颜色黎墨，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。韩非子说："一禹朝诸侯于会稽，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。"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。孔子说："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。"俨然是恂恂儒者，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。读魏晋以后禅让文，他的行径，又与曹丕、刘裕诸人相似。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，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。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，是个狐狸精，仿佛是《聊斋》上的公子书生。说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，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。又说他治水的时候，驱遣神怪，又有点像《西游记》上的孙行者、《封神榜》上的姜子牙。据著者的眼光看来，他始而忘亲事仇，继而夺仇人的天下，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，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。他这个人，光怪陆离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余的圣人，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。我们略加思索，圣人的内幕，也就可以了然了。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，各人的幻想不同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。

我做了一本《厚黑学》，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，又逆推到春秋战国，也是相合的。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，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。再追溯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；尽都是天理流行，惟精惟一，厚黑学是不适用的。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，仿佛三代上的人心，与三代下的人心，成为两截了，岂不是很奇的事吗？其实并不奇。假如文景之世，也像汉武帝的办法，把百家罢黜了，单留老子一人，说他是个圣人，老子推崇的黄帝，当然也是圣人。于是乎平民之中，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；开国之君，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。老子的心，"微妙玄通，

深不可识”。黄帝的心，也是“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”。“其政闵闵，其民淳淳”。黄帝而后，人心就不古了，尧夺哥哥的天下，舜夺妇翁的天下，禹夺仇人的天下，成汤、文、武以臣叛君，周公以弟杀兄。我那本《厚黑学》，直可逆推到尧、舜而上。三代上的人心，三代下的人心，就融成为一片了。无奈再追溯上去，黄帝时代的人心，与尧、舜而后的人心，还是要成为两截的。

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，成了御赐的圣人，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，一定会被庄子夺去，我们读的四子书，一定是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关尹子》，所读的经书，一定是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，孔孟的书与管、商、申、韩的书，一齐成为异端，束诸高阁，不过遇着好奇的人，偶尔翻来看看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礼记内，与王制、月令并列。人心推危十六字，混在曰若稽古之内，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奥妙了。后世讲道学的人，一定会向《道德经》中，玄牝之门，埋头钻研，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、理牝欲牝种种名词，互相讨论。依我想圣人的真相，不过如是（著者按：后来我偶翻《太玄经》，见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词，惟理牝欲牝的名词，我还未看见）。

儒家的学说，以仁义为立足点，定下一条公例：“行仁义者昌，不行仁义者亡。”古今成败，能合这个公例的，就引来做证据，不合这个公例的，就置诸不论。举个例来说，太史公《殷本纪》说：“西伯归，乃阴修德行善。”《周本纪》说：“西伯阴行善。”连下两个阴字，其作用就可想见了。齐世家更直截了当的说道：“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，其事多兵权与奇计。”可见文王之行仁义，明明是一种权术，何尝是实心为民？儒家见文王成了功，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。徐偃王行仁义，汉东诸侯，朝者三十六国，荆文王恶其害己也，举兵灭之。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，儒者就绝口不提。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，见人富贵，就说他积得有阴德，见人触电器死了，就说他忤逆不孝。推其本心，因是劝人为善，其实真正的道理，并不是那么样。

古来的圣人，真是怪极了，虞芮质成，脚踏了圣人的土地，立即洗心革面，圣人感化人，有如此的神妙。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

人，母亲是圣人，哥哥弟弟是圣人，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，何以中间会产生鸱鸮？清世宗呼胤禩为阿其那，胤禟为塞思赫（黑），翻译出来，是猪狗二字。这个猪狗的父亲是圣人，哥哥是圣人，侄儿也是圣人。鸱鸮猎狗，会与圣人错杂而生，圣人的价值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
李自成是个流贼，他进了北京，寻着崇祯帝后的尸，载以宫扉，盛以柳棺，放在东华门，听人祭奠。武王是个圣人，他走至纣死的地方，射他三箭，取黄钺把头斩下来，悬在太白旗上。他们爷儿，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，做出这宗举动，他的品行，连流贼都不如，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，真是妙极了。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，吴三桂投降了，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？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，他那间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，恐怕比《周本纪》要高几倍。

大王实始翦商，王季、文王继之，孔子称武王缵太工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其实与司马炎，缵懿、师、昭之绪何异？所异者：一个生在孔子前，得了世世圣人之名；一个生在孔子后，得了世世逆臣之名。

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，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。到了证据确凿，无从开脱的时候，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。这个例是孟子开的。他说：以至仁伐至不仁，断不会有流血的事，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。我们从殷民三叛，多方大诰，那些文字看来，可知代纣之时，血流漂杵不假，只怕“以至仁代至不仁”那句话有点假。

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我也说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愿居上流，而天下之美皆归焉。”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，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，更觉确切。

古人神道设教，祭祀的时候，叫一个人当尸，向众人指说：“这就是所祭之神。”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。同时又以圣道设教，对众人说：“我的学说，是圣人遗传来的。”有人问：“哪个是圣人？”他就顺手指着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说道：“这就是圣人。”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，朝着他磕头礼拜。后来进化了，人

民醒悟了，祭祀的时候，就把尸撤消，惟有圣人的迷梦，数千年未醒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。

讲因果的人，说有个阎王，问“阎王在何处?”他说：“在地下。”讲耶教的人，说有个上帝，问“上帝在何处?”他说：“在天上。”讲理学的人，说有许多圣人，问“圣人在何处?”他说：“在古时。”这三种怪物，都是只可意中想象，不能目睹，不能证实。惟其不能证实，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，信从的人就越是多。在创这种议论的人，本是劝人为善，其意固可嘉，无如事实不真确，就会生出流弊。因果之弊，流为拳匪，圣人之弊，使真理不能出现。

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，天下的言论，都折衷于孔子，不敢违背。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，曹操就把他杀了。嵇康非薄汤武，司马昭也把他杀了。儒教能够推行，全是曹操、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。后来开科取士，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，就莫得进身之路。一个死孔子，他会左手拿官爵，右手拿钢刀，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？宋元明清学案中人，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，他们的心坎上，受了圣人的摧残，他们的议论，焉得不支离穿凿？焉得不迂曲难通?

中国的圣人，是专横极了，他莫有说过的话，后人就不敢说，如果说出来，众人就说他是异端，就要攻击他。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，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，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，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，然后才有人信从。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，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，以附会己说，说朱子讲错了，他的学说，才是孔子嫡传。本来朱、王二人的学说，都可以独树一帜，无须依附孔子，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。不依附孔子，他们的学说，万万不能推行。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，当时的人，还说是伪学，受重大的攻击，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，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?

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：“郢人致书于燕相国，写书的时候，天黑了，喊：‘举烛。’写书的人，就写上举烛二字，把书送去。燕相得书，想了许久，说道：‘举烛是尚明，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。’以此说进之燕王。燕王用他的话，国遂大治。虽是收了效，却非原

书本意。”所以韩非说：“先王有郢书，后世多燕说。”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，恐怕只有手著《大学》的人才明白，朱、王二人中，至少有一人免不脱“郢书燕说”的批评。岂但格物致知四字，恐怕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皇清经解》、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，也逃不脱“郢书燕说”的批评。

学术上的黑幕，与政治上的黑幕，是一样的。圣人与君主，是一胎双生的，处处狼狈相依。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，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。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，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。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。圣人就称起王来了。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，君主也称起圣来了。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，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。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，人民都要遵从；如果有人违背了，就算是大逆不道，为法律所不容。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，学者都要信从；如果有人批驳了，就算是非圣无法，为清议所不容。中国的人民，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，民意不能出现，无怪乎政治紊乱。中国的学者，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，思想不能独立，无怪乎学术消沉。因为学说有差误，政治才会黑暗，所以君主之命该革，圣人之命尤其该革。

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，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，我只说除了孔子，也还有人格，也还有学说。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，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，无如后来的人，偏要抬出孔子，压倒一切，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。学者心坎上，被孔子盘踞久了，理应把他推开，思想才能独立，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。前时，有人把孔子推开了，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，盘踞学者心坎上，天下的言论，又热衷于达尔文诸人，成一个变形的孔子，执行圣人的任务。有人违反了他们的学说，又算是大逆不道，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。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，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。他的学说，也是不许人违反的。依我想，学术是天下公物，应该听人批评，如果我说错了，改从他人之说，于我也无伤，何必取军阀态度，禁人批评。

凡事以平为本。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，故政治上生纠葛。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，故学术上生纠葛。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，与周秦

诸子平列，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，与他们平坐一排，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，分庭抗礼，发表意见，大家磋商，不许孔子、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，我们也不高踞孔子、达尔文诸人之上，人人思想独立，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。

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，所以每读古人之书，无有不疑。因定下读书三决，为自己用功步骤。兹附录于下：

第一步，以古为敌：读古人之书，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，有了他，就莫得我，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。逐处寻他缝隙，一有缝隙，即便攻入；又代古人设法抗拒，愈战愈烈，愈攻愈深。必要如此，读书方能入理。

第二步，以古为友：我若读书有见，即提出一种主张，与古人的主张对抗，把古人当如良友，互相切磋。如我的主张错了，不妨改从古人；如古人主张错了，就依着我的主张，向前研究。

第三步，以古为徒：著书的古人，学识肤浅的很多。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，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，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。说得对的，与他加几个密圈；说得不对的，与他划几根杠子。世间俚语村言，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，何况古人的书，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。我评阅越多，智识自然越高，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。如遇一个古人，智识与我相等，我就把他请出来，以老友相待，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。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，我又把他认为劲敌，寻他缝隙，看攻得进攻不进。

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，其实并莫有做到，自己很觉抱愧。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，想达第二步，还未达到。至于第三步，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。譬如行路，虽然把路径寻出，无奈路太长了，脚力有限，只好努力前进，走一截算一截。

以上就是《我对圣人之怀疑》的原文。这原是我满清末年的思想，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，刊入《宗吾臆谈》内。因为有了这种思想，才会发明厚黑学。此文同《厚黑学》，在我的思想上，算是破坏工作。自民国九年著《心理与力学》起，以后的文字，算是我的建设工作。而《心理与力学》一文，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。

民国九年，我定出一条公例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

又绘出甲乙两图，以后一切议论，都以之为出发点。批评他人的学说，就以之为基础，合得到这个方式的，我就说他对，合不到的，我就说他不对。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，用以度量万事万物。我也自知不脱我见，但我开这间铺子，是用的这把尺子，不能不向众人声明。

我们试就甲乙两图，来研究孟、荀、杨、墨四家的学说：孟子讲“差等之爱”，层层放大，是很合天然现象的，但他言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与夫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”一类话，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，对于第一圈之我，则浑而不言。杨子主张为我，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，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，第二以下各圈，置之不论。墨子摩顶放踵，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，他主张“爱无差等”，是不分大圈小圈，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。杨子有了小圈，就不管大圈；墨子有了大圈，就不管小圈。他两家都不知：天然现象，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。孟、荀二人，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，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，荀子说是层层缩小，就不免流于一偏了。我们取杨子的我字，作为中心点，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，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。孟言性善，荀言性恶，杨子为我，墨子兼爱，我们只用“扩其为我之心”一语，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。

孟子言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。怵惕是自己畏死，恻隐是悯人之死。孟子知道人之天性，能因自己畏死，就会悯人之死，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，因教人再扩大之，推至于四海。道理本是对的，只因少说了一句：“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”，又未把“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此心作何状态”提出来讨论，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，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，就是恻隐，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。一部宋元明清学案，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，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，就流弊百出了。

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，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。怵惕扩大即为恻隐，利己扩大即为利人。荀子知人有利己心，故倡性恶说；孟子知人有利人心，故倡性善说。我们可以说：荀子的学说，以怵惕为出发点；孟子的学说，以恻隐为出发点。譬如竹子，怵惕是第一节，恻隐是第二节。孟子的学说，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，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发叶。荀子的学说，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，是怕他在第一

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，以致生不出第二节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，各有见地，宋儒扬孟而抑荀，未免不对。我解释厚黑经，曾经“汉高祖之分杯羹，唐太宗之杀建成、元吉，是充其本然之厚黑。”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，就生枝发叶横起长。

王阳明传习录说：“孟子从源头上说来，荀子从流弊说来。”荀子所说，是否流弊，姑不深论，怵惕之上，有无源头，我们也不必深求，惟孟子所讲之恻隐，则确非源头。怵惕是恻隐之源，恻隐是怵惕之流。阳明所下流源二字，未免颠倒了。

孟子的学说，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，但人有为我之天性，他是看清了的，怵惕二字，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。他对齐宣王说：“王如好货，与民同之。”又说：“王如好色，与民同之。”知道自己有一个我，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，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。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，是对时君而言，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，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，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，反去攀援绝壁，另寻飞空鸟道来走。

孟子说：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”又说“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吾字其字，俱是我字的代名词。孟子讲学，不脱我字；宋儒讲学，舍去我字。所以孟子的话，极近人情；宋儒的话，不近人情。例如程子说：“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”这是舍去了我字。韩昌黎麦里操说：“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。”程子很为叹赏，这也是舍去了我字。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，未能彻底研究，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，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。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《读史管见》读之，处处可见。

孟子的学说，不脱我字，所以孟子说：“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孟子说：“君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宋儒的学说，舍去我字，不得不说：“臣罪当诛，天王圣明。”

宋儒创出“去人欲存天理”之说，天理隐于恻隐二字，把他存起，自是很好，惟人欲二字，界说不清。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，想尽法子去铲除，甚至有身蹈危阶，练习不动心，这即是铲除

怵惕的工作。于是"去人欲，存天理"变成了"去怵惕，存恻隐"。试思：怵惕为恻隐的来源，把怵惕去了，怎样会有恻隐？何以故呢？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。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，我者圆心也，圆心既无，圆形安有？怵惕既无，恻隐安有？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，安坐轿中，漠然不动。张魏公荷离之败，死人三十万，他终夜鼾声如雷，其子南轩，还夸其父心学很精。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，孟子曰："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，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。"吕希哲的轿夫、张魏公的部下，当然要算同室之人，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，未免显违孟氏家法。大凡去了怵惕的人，就会流于残忍，杀人不眨眼的恶匪，身临刑场，往往谈笑自若，就是明证。

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，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，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，所以他的学说，才有这样的主张。把他学说的出发点寻出了，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。

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，共有三个场所：（1）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，一个外人，同在一处，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。这个时候，可以说小孩爱亲；（2）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，同在一处，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。这个时候，可以说小孩爱亲；（3）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，同在一处，发生了利害冲突，例如：有一块糕饼，母亲吃了，小孩就莫得吃，母亲放在口中，小孩就伸手取来，放在自己口中。这时候，断不能说小孩爱亲。

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，忘了第三种，故创性善说。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，故创性恶说。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，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，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，隐指第三种现象；又用义理之性四字，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。人的性只有一个，宋儒又要顾孟子，又要顾事实，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，越讲得精微，越纠葛不清。

孟子创性善说，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，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。荀子创性恶说，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，主张设法制裁，使不至为害人类。譬诸治水，孟子说水性向下，主张疏瀹，使之向下流去。孟子喜言时，使亡宜导人之意志，此疏瀹之说也。荀子说水会旁溢，主张筑堤，免得漂没人畜。荀子喜言礼，礼者约

束人之行止，此筑堤之说也。告子曰：“性犹湍水也。”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。我们如奉告子之说，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。

苏东坡作《荀卿论》，以为：荀卿是儒家，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，很为诧异，其实不足怪。荀卿以为人之性恶，当用礼以制裁之。其门人韩非，以为礼之制裁力弱，不若法律少制裁力大，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，主张严刑峻法，以制止轨外的行动。李斯与韩非同门，故其政见相同。我们提出性恶二字，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，原是一贯的事。所以说：要批评他人的政见，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。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，论古人，俱有卓见，独于这篇文字，未免说外行话。

学问是进化的。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，孟子只看见前两种，故倡性善说；荀子生在孟子之后，看见第三种，故倡性恶说；宋儒生在更后，看得更清楚，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，故倡物欲说。这物欲二字，是从《礼记》上“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”两句话生出来的。物者何？母亲口中糕饼是也。感于物而动，即是看见糕饼，即伸手去抢也。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，真算特识。所以朱子注孟子，朱子说：“以事理考之，程子较孟子为密。”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，发明了一个气字，说道“论性不论气不备。”问：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？”曰：“气为之也，气质之性为之也。”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，惜乎不能贯通为一。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，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，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。

宋儒造出物欲的名词之后，自己细思之，还是有点不妥，何也？小儿见母亲口中糕饼，伸手去抢，可说感于物而动，但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此时只有赤裸裸一个怵惕之心，孟子所谓恻隐之心，忽然不见，这是甚么道理呢？要说是物欲出现，而此时并无所谓物，于是又把物欲二字改为人欲。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欲，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我心只有怵惕而无恻隐，也是人欲，在宋儒之意，提出人欲二字，就可把二者贯通为一了。他们这种组织法，很像八股中做截搭题的手笔。我辈生当今日，把天理人欲物欲气质等字念熟了，

以为吾人心性中，果有这些东西，殊不知这些名词，是宋儒平空杜撰的。著者是八股先生出身，才把他们的手笔看得出来。

宋儒又见《伪古文尚书》上有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二语，故又以人心二字替代人欲，以道心二字替代天理。朱子《中庸章句》序曰：“人莫不有是形，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，亦莫不有是性，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”无异于说：当小孩的时候，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，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。何以故？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故。因为凡人必有这种天性，故生下地才会吃乳，井在我面前，才不会跳下去。朱子曰：“人莫不有是形，虽上智不能无人心。”换言之，即是人若无此种心，世界上即不会有人。道理本是对的，无奈这种说法，已经侵入荀子学说范围去了。据阎百诗考证：人心惟危十六字，是摆《伪古文尚书》者，窃取荀子之语，故曰侵入荀子范围。因为宇宙真理，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，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，俱见得到，荀子见得到，朱子也见得到，故不知不觉与之相合。无如朱子一心一意，想上继孟子道统，研究出来的道理，虽与荀子暗合，仍攻之不遗余力，无非是门户之见而已。

细绎朱子之意，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心，爱亲敬兄是道心。人心是气，是人欲，道心是性，是天理，人心是形气之私，道心是性命之正。这些五花八门的名词，真把人闹得头闷眼花。奉劝读者，与其读宋元明清学案，不如读厚黑学，详玩甲乙二图，则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也，爱亲敬兄也，均可一以贯之，把天人理气等字一扫而空，岂不大快！

最可笑者，朱子《中庸章句》序又曰：“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。”主者对仆而言，道心为主，人心为仆。道心者，为圣为贤之心，人心者，好货好色之心，听命者，仆人职供驱使，唯主人之命是听也。细绎朱子之意，等于说，我想为圣为贤，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，我想吃饭，抑或想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”，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。必如此方可曰：“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。”总而言之，宋儒有了性善说横亘胸中，又不愿抹煞事实，故创出的学说，无非迂曲难通。此《厚黑丛话》之所以以不得不作也。予岂好讲厚黑哉，予不得已也。

怵惕与恻隐，同是一物，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，犹之煮饭者是火，烧房子者也是火。宋明诸儒，不明此理，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，创出去人欲之说，其弊往往流于伤害天理。王阳明传习录说："无事时，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，逐一追究搜寻出来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鼠，一眼看着，一耳听着，才有一念萌动，即与克去，斩钉截铁，不可姑容，与他方便，不可窝藏，不可放他出路，方是真实用功，方能扫除廓清。"这种说法，仿佛是：见了火会烧房子，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，立即扑灭，断绝火种，方始为快。传习录又载："一友问：欲于静坐时，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，逐一搜寻出来，扫除廓清，恐是剜肉做疮否？先生正色曰：这是我医人的方子，真是去得人病根。更有大本事人，过了十数年，亦还用得着。你如不用，且放起，不要作坏我的方法，是友愧谢。"少间曰："此量非你事，必吾门稍知意思者，为此说以误汝，在坐者皆惊然。"我们试思：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，他平日讲学，任人如何问难，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，从未动气？何以门人这一问，他会动气，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误点指出？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，是稍知意思者呢？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，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，能把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五者看作一事，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。这是他学说的缺点，他的门人这一问，正击中他的要害，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。究竟剜肉做疮四字，怎样讲呢？肉喻天理。疮喻人欲，剜肉做疮，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，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。门人的意思，即是说："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，即把他扑灭，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，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？换言之，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，人就不会吃饭，岂不饿死吗？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，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，人类岂不灭绝吗？"这个问法何等利害！所以阳明无话可答，只好忿然作色。宋明诸儒主张去人欲存天理，所做的即是剜肉做疮的工作。其学说之不能餍服人心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
以上一段，是从拙作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第三章"人性善恶之研究"中录出来的，我当日深疑阳明讲学极为圆通，处处打成一片，何至会把天理、人欲歧而为二，近阅《龙溪语录》所载"天泉证道

记”，钱绪山谓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四语，是师门定本。王龙溪谓：“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，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，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，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。”时阳明出征广西，晚坐天泉桥上，二人因质之。阳明曰：“汝中（龙溪字）所见，我久欲发，恐人信不及，徒增躐等之弊，故含蓄到今。此是传心秘藏，颜子明道所不敢言，今既是说破，亦是天机该发泄时，岂容复秘。”阳明至洪都，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，阳明曰：“吾有向上一机，久未敢发，以待诸君自悟。近被王汝中拈出，亦是天机该发泄时。”明年广西平，阳明归，卒于途中。龙溪所说，即是把天理、人欲打成一片。阳明直到晚年，才揭示出来，由此知：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，阳明忿然作色，正是恐增门人躐等之弊。传习录是阳明早年的门人所记，故其教法如此。

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的神秀，王龙溪极似慧能，德洪所说，时时勤拂拭也，所谓渐也。龙溪所说，本来无一物也，所谓顿也。阳明曰：“汝中须用德洪工夫，德洪须透汝中本旨，二子之见，止可相取，不可相病，”此顿悟渐修之说也。《龙溪语录》所讲的道理，几与《六祖坛经》无异，成了殊途同归，何也？宇宙真理，只要研究得彻底，彼此所见，是相同的。

就真正的道理来说，把孟子的性善说、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，理论就圆满了。二说相合，即成为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。人问：孟子的学说，怎样与荀子学说相合？我说：孟子曰：“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艾。”荀子曰：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。”请问二人之说，岂不是一样吗？孟子曰：“大孝终身慕父母，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据孟子所说：满了五十岁的人，还爱慕父母，他眼中只看见大舜一人。请问人性的真相，究是怎样？难道孟、荀之说不能相合吗？

性善说与性恶说，既可合而为一，则王阳明之致良知，与李宗吾之厚黑学，即可合而为一。人问：怎么可合为一？我说：“孟子曰：‘大孝终身慕父母。’”《厚黑经》曰：“大好色终身慕少艾。”孟子曰：“五十而慕父母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，”《厚黑经》曰：“八百岁而慕少艾者，予于彭祖见之矣。”爱亲是不学而能，不虑而

知的，好色也是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的。用致良知的方法，能把孩提爱亲的天性致出来，做到终身慕父母。同时就可把少壮好色的天性致出来，做到终身慕少艾。昔人说：王学末流之弊，至于荡检逾闲，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，把厚黑学致出来的原故。

依宋儒之意，孩提爱亲，是性命之正，少壮好色，是形气之私。此等说法，真是穿凿附会。其实孩提爱亲，非爱亲也，爱其饮我食我也。孩子生下地，即交乳母抚养，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，是其明证。爱乳母，与慕少艾，慕妻子，其心理原是一贯的，无非是为我而已。为我为人类天然现象，不能说他是善，也不能说他是恶，故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，最为合理。告子曰："食、色性也。"孩提爱亲者，食也，少壮慕少艾慕妻子者，色也。食、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，求生存者，人类之天性也。故告子又曰："生之谓性"。

告子观察人性，既是这样，则对于人性之处置，又当怎样呢？于是告子设喻以明之曰："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。"又曰："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杯卷也，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杯卷"，告子这种主张，是很对的。人性无善无恶，也即是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。譬如深潭之水，平时水波不兴，看不出何种作用。从东方决一个口，则可以灌田亩，利行舟；从西方决一个口，则可以漂房舍，杀人畜。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。又譬如一块木头，可制为棍棒以打人，也可制为碗盏装食物。我们把他制为碗盏好了。这个说法，真可合孟荀而一之。

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：曰性犹杞柳也，曰性犹湍水也，曰生之谓性，曰食色性也，曰性无善无不善也，此五者原是一贯的。朱子注食色章曰："告子之辩屡屈，而屡变其说以求胜。"自今观之，告子之说，始终未变，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。朱子注杞柳章，以为告子言仁义，必待矫揉而后成，其说非是。而注公诸子章则曰："气质所禀，虽有不善，而不害性之本善。性虽本善，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。"忽又提出矫揉二字，岂非自变其说乎？

朱子注"生之谓性"章曰："杞柳湍水之喻，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，纵横缪戾，纷纭舛错，而此章之误，乃其本根。"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，原是一贯说下，并无所谓纵横缪戾，绘纭舛错。"生之

谓性”之生字，作生存二字讲，生存为人类重心，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。告子言性，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，由是而有“食色性也”之说，有“性无善无不善”之说，又以杞柳湍水为喻，其说最为合理。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，一切说法，离开生存立论，所以才有“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一类怪话。然朱子能认出“生之谓性”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，亦不可谓非特识。

宋儒崇奉儒家言，力辟释、道二家之说，在《尚书》上寻得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四语，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，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。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，这四句出诸伪古文尚书，作伪者系采自荀子，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。阎氏的说法，在经学界中，算是已定了的铁案。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，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，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，借孟子以排荀子，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。朱子曰：“气质所禀，虽有不善，而不害性之本善。性虽本善，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”又要顾事实，又要回护孟子，真可谓“纵横缪戾，纷纭舛错”也。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，明白简易，何啻天渊。

告子不知何许人，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，我看不错。孔子赞易，说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告子以生字言性，可说是孔门嫡传。孟子学说，虽与告子微异，而处处仍不脱生字。如云：“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又云：“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，于王何有?”仍以食色二字立论，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，等于子夏、子张论交之异同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。孟子与告子之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之交谊，平日辨疑析难，互相质证。孟子曰：“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，交谊之深可想。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胸，左袒孟子，力告诋子为异端，而其自家之学说，则截去生字立论，叫妇人饿死，以殉其所谓节，叫臣子无罪受死，以殉其所谓忠。孟子有知，当必引告子为同调，而斥程朱为叛徒也。

孟子说：“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艾，有妻子则慕妻子，仕则慕君。”全是从需要生出来的。孩提所需者食也，故慕饮我食我之父母；少壮所需者色也，故慕能满色欲之少艾与妻子，出仕所需

者功名也，君为功名所自出，故慕君。需要者目的物也，亦即所谓目标，目标一定，则只知向之而趋，旁的事物，是不管的。目标在功名，则吴起可以杀其妻，汉高祖可以分父之羹，乐羊子可以食子之羹。目标在父母，则郭巨可以埋儿，姜诗可以出妻，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尸。目标在色欲，则齐襄公可以淫其妹，卫宣公可以纳其媳，晋献公可以烝父妾。著者认为：人的天性，既是这样，所以性善性恶问题，我们无须多所争辩，负有领导国人之责者，只须确定目标，纠正国人的目标就是了。我国现在的大患，在列强，压迫，故当提出列强为目标，手有指，指列强，口有道，道列强，使全国人之视线集中在这一点。于是乎吴起也、汉高祖也、乐羊子也、郭巨也、姜诗也、伍子胥也、齐襄公也、卫宣公也、晋献公也，一一向目标而趋。救国之道，如是而已。全国四万万人，有四万万根力线，根根力线，直达列强。根根力线，挺然特立，此种主义，可名之曰“合力主义”，而其要点。则从人人思想独立开始。

有人问我道：“你既自称厚黑教主，当然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。据你说：你不懂外国文，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译本，你也不看，像你这样的孤陋寡闻，怎么够得上称教主？”我说道：“我试问，你们的孔夫子，不惟西洋译本未读过，连西洋这个名词，都未听过，怎样会称至圣先师？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打来烧了，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，立即登报取消。我再问：西洋希腊三哲，不惟连他们西洋大哲学家康德诸人的书一本未读过，并且恐怕现在英法德美诸国的字，一个也认不得，怎么会称西洋圣人？更奇者：释迦佛，中国字、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，中国人的姓名，西洋人的姓名，一个都不知道，他之孤陋寡闻，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，居然成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，这又是甚么道理？吁，诸君休矣！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，建立厚黑哲学，我行我是，固不暇同诸君哓哓置辩也。”

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，生平所知者，八股而已。常常有人向我说道：“可惜你不懂科学，所以你种种说法，不合科学规律。”我说：“我在讲八股，你怎么同我讲起科学来了？找正深恨西洋的科学家不懂八股，一切著作，全不合八股义法。我把达尔文的《种源

论》，斯密士的《原富》，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，以评八股之法评之，每书上面，大批二字，曰："不通。"

天下文章之不通，至八股可谓至矣尽矣，蔑以加矣，而不谓西洋科学家文章之不通，乃百倍于中国之八股。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，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酿出来的。因为达尔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，世界才会第一次大战，第二次大战。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，我国过去廿四年，才会四分五裂，中央政府，才会组织不健全。人问："这部书也不通，那部书也不通，要甚么书才通?"我说："只有厚黑学，大通而特通"。

幸哉！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也！如果我懂了科学，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的喊："达尔文圣人也，斯密士圣人也，孟德斯鸠圣人也，墨索里尼，希特勒，无一非圣人也。怎么会写《厚黑丛话》呢！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，除非以我这《厚黑丛话》为新刑律，把古之达尔文、斯密士、孟德斯鸠，今之墨索里尼、希特勒，一一处以枪毙，而后国际上、经济上、政治上，乃有曙光之可言。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，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，如李宗吾一类人是也。如果把西洋科学家，达尔文诸人的学说研究好了，立即要"尸骨成山，血水成河"。等我把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，再来怀疑西洋圣人。

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者，得力处全在不肯读书，不惟西洋译本不喜读，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。凡与我相熟的朋友，都晓得我的脾气，无论甚么书，抓着就看，先把序看了，或只看首几页，或从末尾倒起看，或随在中间乱翻来看，或跳几页看，略知书中大意就是了。如认为有趣味的几句，我就细细的反复咀嚼，于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就想到别个地方去了。无论甚么高深的哲学书，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，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视之，都是一样读法。

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种，一为宇宙自然的书，二为我脑中固有的书，三为古今人所著的书。我辈当以第一种、第二种融合读之，至于第三种，不过借以引起我脑中蕴藏之理而已，或供我之印证而已。我所需于第三种看，不过如是。中国之书，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，安用疲憊精神，读西洋译本为?

我读书的秘决，是"跑马观花"四字，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。

中国的花圃，马儿都跑不完，怎能说到外国？人问："你读书既是跑马观花，何以你这《厚黑丛话》中，有时把书缝缝里细微事说得津津有味?"我说："说了奇怪！这些细微事，一触目即刺眼。我打马飞跑时，瞥见一朵鲜艳之花，即下马细细赏玩。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，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，所以书缝缝里细微事，也会跳入《厚黑丛话》中来。

我是懒人，懒则不肯苦心读书，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。古今善用兵者，莫如项羽，七十余战，战无不胜，到了乌江，身边只有二十八骑，还三战三胜。然而他学兵法，不过略知其意罢了。古今政治家，推诸葛武侯为第一，他读书也是只观大略。陶渊明在诗界中，可算第一流，他乃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。反之，熟读兵书者莫如赵括，长平之役，一败涂地。读书最多者莫如刘歆，辅佐王莽，以周礼治天下，闹得天怒人怨。注《昭明文选》的李善，号称书簏，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。书这个东西，等于食物一般，食所以疗饥，书所以疗愚。饮食吃多了不消化，会生病，书读多了不消化，也会作怪。越读得多，其人越愚，古今所谓书呆子是也。王安石读书不消化，新法才行不走。程伊川读书不消化，才有洛、蜀之争。朱元晦读书不消化，才有庆元党案，才有朱、陆之争。

世界是进化的，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，进化到项羽和诸葛武侯，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。夫所谓略观大意者，必能了解大意也。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。再进化到厚黑教主，不求甚解，进化了到了陶渊明，好读书不求甚解，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。再进化到厚黑教主，不求甚解，而并且不好读书。将来再进化，必至一书不读，一字不识，并且无理可解。呜呼，世无慧能，斯言也，从谁印证?

我写《厚黑丛话》，遇着典故不够用，就杜撰一个来用。人问：何必这样干？我说：自有宇宙以来，即应该有这种典故，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，自是宇宙之罪，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。人说：这类典故，古书中原有之，你书读少了，宜乎寻不出。我说：此乃典故之罪，非我之罪。典故之最古者，莫如天上之日月，昼夜摆在面前，举目即见。既是好典故，我写《厚黑丛话》时，为甚躲在书

堆中，不会跳出来？既不会跳出，即是死东西，这种死典故，要他何用！

近日有人向我说："你主张思想独立，讲来讲去，终逃不出孔子范围。"我说：岂但孔子，我发明厚黑学，未逃出荀子性恶说的范围；我说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，"未逃出告子"性犹湍水也"的范围；我做有一本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，未逃出我家聃大公的范围；格外还有一位说法四十九年的先生，更逃不出他的范围。

宇宙真理，明明摆在我们面前，任何人只要能够细心观察，得出的结果，俱是相同。我主张思想独立，提出宗吾二字，以为标帜，一切道理，经我心考虑而过。认为对的即说出，不管人曾否说过。如果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了，因古人曾经说过，我就别创异说，求逃出古人范围。则是：非对古人立异，乃是对我自己立异，是为以吾叛吾，不得谓之宗吾。孔子也、荀子也、告子也、老子也、释迦也，甚至村言俗语，与夫其他等等也，合一炉而冶之，无畛域，无门户，一一以我心衡之，是谓宗吾。

宗吾者，主见之谓也。我见为是者则是之，我见为非者则非之。前日之我以为是，今日之我以为非，则以今日之我为主。如或回护前日之我，则今日之我，为前日之我之奴，是曰奴见，非主见，仍不得谓之宗吾。

老子曰："上士闻道，堇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大笑之，弗笑不足以为道。"滔滔天下，皆周、程、朱、张信徒也，皆达尔文诸人信徒也，一听见厚黑学三字，即破口大骂。吾因续老子之语曰："下下士闻道则大骂，不骂不足以为道。"

日前我同某君谈话，引了几句孔子的话。某君道："你是讲厚黑学的，怎么讲起孔子的学说来了？"我说：从前孔子出游，马吃了农民的禾，农民把马捉住。孔子命子贡去说，把话说尽了，不肯把马退还。回见孔子，孔子命马夫去，几句话说得农民大喜，立即退还。你想：孔门中，子贡是第一个会说的。当初齐伐鲁，孔子命子贡去游说，子贡一出而却齐存鲁，破吴霸越。以这样会说的人，独无奈农民何。其原因是子贡智识太高，说的话，农民听不入耳，马夫的智识与之相等，故一说即入。观世音曰：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

现宰官身而为说法。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。你当过厅长，我现厅长身而说法，你口诵孔子之言，我现孔子身而说法。一般人都说："今日的人，远不如三代以上。"果然不错。鄙人虽不才，自问可以当孔子的马夫，而民国时代的厅长，不如孔子时代的农民。

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谈话，旁有某君警告之曰："你少同李宗吾谈话谨防把你写入《厚黑丛话》!"我说："两君放心，我这《厚黑丛话》中人物，是预备将来配享厚黑庙的，两君自问，有何功德，可以配享？你怕我把你们写入《厚黑丛话》，我正怕你们将来混入厚黑庙。"因此我写这段文字，记其事而隐其名。

我生怕我的厚黑庙中，五花八门的人，钻些进来，闹得来如孔庙一般。我撰有敬临食谱序一篇，即表明此意，录之如下：

我有个六十二岁的老学生，黄敬临，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，我业已允许，写入《厚黑丛话》，第一卷。读者想还记得，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。备具极精美的肴撰，招徕顾主，读者或许照顾过。昨日我到他公馆，见他正在凝神静气，楷书《资治通鉴》。我诧异道："你怎么干这个事?"他说："我自四十八岁以后，即矢志写书，已手写十三经一通，补写新旧唐书合钞，李善注文选，相台礼记、坡门唱和集各一通，现打算再写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孙。"我说："你这种主意就错了。你从前历任射洪、巫溪、荣经等县知事，我游踪所至，询之人民，你政声很好，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，干一番惊人事业。归而询知，退为庖师，自食其力，不禁大赞曰：'真吾徒也。'特许入厚黑庙配享，不料你在干这个生活。须知：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，车载斗量，有你插足之地吗？庖师是你特别专长，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，何若乃尔！鄙人所长者厚黑学，故专读厚黑学。你所长者庖师，不如把所写十三经与夫《资治通鉴》等等，一火而焚之，撰一部食谱，倒还是不朽的盛业。"

敬临闻言，颇以为然，说道："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烹饪教师，曾分'薰、蒸、烘、爆、烤、酱、酢、卤、铰、糟'十门教授学生，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，作为一种教科书。但滋事体大，苦无暇晷，奈何!"我说："你又太拘了，何必一做就

想做完善。我为你计，每日高兴时，任写一二段，以随笔体裁出之，积久成帙，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，如不暇，既有底本，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。倘不及早写出，将来老病侵寻，虽欲写而力有不能，悔之何及?”敬临深感余言，乃着手写去。

敬临的烹饪学，可称家学渊源。其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，精于治馔，为其子聘妇，非精烹饪者不合选。闻陈氏女，在室，能制咸菜三百余种，乃聘之，即敬临母也。于是以黄、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。清末，敬临宦游北京，慈禧后赏以四品衔，供职光禄寺三载，复以天厨之味。融合南北之味。敬临之于烹饪，真可谓集大成者矣。有此绝艺，自己乃不甚重视，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，不亦大可惜乎？敬临勉乎哉!

古者有功德于民则把之。我尝笑：孔庙中七十子之徒，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外，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，遑论功德?徒以依附孔子末光，高坐吃冷猪肉，亦可谓僭且滥矣。敬临撰食谱嘉惠后人，有此功德，自足庙食千秋，生前具美误以食人，死后人具美撰以祀之。此固报施之至平，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。人贵自立，敬临勉乎哉!

孔子平日饭蔬饮水，后人以其不讲肴撰，至今以冷猪肉祀之，腥臭不可向迩。他日厚黑庙中，有敬临配享，后人不敢不以美撰进，吾可做于众曰：吾门有敬临，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！是为序。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，李宗吾，于成都。

近有某君发行某种月刊，叫我做文一篇。我说：我做则做，但有一种条件，我是专门讲厚黑学的，三句不离本行，文成直署我名，你则非刊不可。他惶然大吓，婉言辞谢。我执定非替他做不可，他没法，只好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读者只知我会讲厚黑学，殊不知我还会作各种散文。诸君如欲表章先德，有墓志传状等件，请我作，包管光生泉壤，绝不会蹈韩昌黎谀墓之嫌。至于作寿文，尤是我的拿手好戏，寿星老读之，必多活若干岁。君如不信，有谢慧生寿文为证。寿文曰：

慧生谢兄，六旬大庆，自撰征文启事云：“知旧矜之而锡之以言，以纠过去六十年之失，乃所愿承。苟过爱而望其年之延，多为

之辞，乃多持（慧生名）之惭且焕，益不可仰矣。”等语。慧生与我同乡，前此之失，惟我能纠之，若欲望其年之延，我也有妙法。故特撰此文以献。

民国元年二三月，我在成都报上发表《厚黑学》。其时张君列五，任四川副都督，有天见着我，说道：“你疯了吗？甚么厚黑学，天天在报上登载，成都近有一伙疯子，巡警总监杨莘友，成都府知事任怒刚，其他如卢锡卿、方琢章等，朝日跑来伺我吵闹。我将修一疯人院，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。你这个乱说大仙，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。”我说：“噫！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，你把他认为疯子，我很替你的甑子担忧。”后来列五改任民政长，袁世凯调之进京，他把印交了。第二天会着我，说道：“昨夜谢慧生说：‘仔细想来，李宗吾那个说法，真是用得着。’”我拍案叫道：“田舍奴，我岂妄哉！疯子的话，都听得吗？好倒好，只是甑子已经倒了。今当临别赠言，我告诉你两句：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哪知他信道不笃，后在天津织袜，被袁世凯逮京枪毙。他在天牢内坐了几个月，不知五更梦醒之时，会想及四川李疯子的学说否？宣布死刑时，列五神色夷然，负手旁立，作微笑状。同刑某君，呼冤忿骂。列五呼之曰：“某君！不说了！今日之事，你还在梦中。”大约列五此时，大梦已醒，知道今日之死，实系违反疯子学说所致。

同学雷君铁崖，留学日本，卖文为活，满肚皮不合时宜，满清末年跑在西湖白云寺去做和尚。反正时，任孙总统秘书，未几辞职。作诗云：“一笑飘然去，霜风透骨寒。八年革命党，半月秘书官。稷下竽方滥，邯郸梦已残。西湖山色好，莫让老憎看。他对时事非常愤懑，在上海，曾语某君云：“你回去告诉李宗吾，叫他厚黑学少讲些。”旋得疯癫病，终日抱一酒瓶，逢人即乱说，常常独自一人，倒卧街中，人事不省。警察看见，把他弄回，时愈时发，民国九年竟死。我这种学说，正是医他那种病的妙药，他不惟不照方服药，反痛诋医生，其死也宜哉！

列五、铁崖，均系慧生兄好友，渠二人反对我的学说，结果如此。独慧生知道，疯子的学说，用得着，居然活了六十岁。倘循着这条路走去，就再活六十岁也是很可能的。我发明厚黑学二十余年，

私淑弟子遍天下，尽都轰轰烈烈，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偏偏同我讲学的几个朋友，列五、铁崖而外，如廖君绪初、杨君泽博、王君简恒、谢君绶青、张君荔丹，对于吾道，均茫无所得，先后憔悴忧伤以死。慧生于吾道似乎有明了的认识了，独不解何以蛰居海上，寂然无闻？得非过我门而不入我室耶？然因其略窥涯涘，亦获享此高寿，足征吾道至大，其用至妙，进之可以干惊天动地的事业，退之亦可延年益寿。今者远隔数千里，不获登堂拜祝，谨献此文，为慧生兄庆，兼为吾党劝。想慧生兄读之，当亦掀髯大笑，满饮数觞也。民国二十四年元月，弟宗吾拜撰。

后来我在重庆，遇着慧生侄又华新自上海归来，说道："家叔见此文，非常高兴，说道：'李先生说我，还要再活六十岁，那个时候，你们都八九十岁了，恐怕还活我不赢！'"子章骷髅不过愈疟疾而已，陈琳檄文不过愈头风而已，我的学说，直能延年益寿。诸君试买一本读读，比吃红色补丸、参茸卫生丸，功效何啻万倍！

民国二年，讨袁失败后，我在成都会着一人，瘦而长，问其姓名，为隆昌黄容九。他问了我的姓名，而现惊愕色，说道："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？"我说："是的，你怎么知道？"他说："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。"我想：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吾道，一定研究有得，深为之庆幸。民三下半年，我在中坝省立第二中校，列五由天津致我一信，历叙近况及织袜情形，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与他为难，中有云："复不肯沁沁坝坝，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！"我读了，失惊道："噫！列五死矣，知而不行，奈何！奈何！"不久，即闻被逮入京。此信我已裱作手卷，请名人题跋，以为信道不笃者戒。

列五是民国四年一月七日在天津被逮，三月四日在北京枪毙，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。我这疯子的徽号，最初是他喊起的。诸君旁观者清，请批评一下："究竟我是疯的，他是疯的？"宋朝米芾，人呼之为"米癫"。一日苏东坡请客，酒酣，米芾起言曰："人呼我为米癫，我是否癫？请质之子瞻。"东坡笑曰："吾从众。"我请诸君批评，我是不是疯子？诸君一定说："吾从众。"果若此，吾替诸君危矣！且替中华民国危矣！何以故？曰：有张列五的先例在，有民国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在。

厚黑丛话卷五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月

去岁元旦，华西报的元旦增刊上，我作有一篇文字，题曰《元旦预言》。我的预言，是“中国必兴，日本必败”八个字，这是从我的厚黑史观推论出来，必然的结果，不过其中未提明厚黑二字罢了。今年华西报发元旦增刊，先数日总编辑请我做篇文字。我说：做则必做，但我做了，你则非刊上不可，我的题目，是“厚黑年”三字。他听了默然不语，所以二十五年华西报元旦增刊，诸名流都有文字，独莫得厚黑教主的文字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我认为民国廿五年。是中国的厚黑年，也即是一千九百三十六年，为全世界的厚黑年。诸君不信；且看事实之证明。

昔人说：“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。”我民国元年发表《厚黑学》，至今已二十五年，遗臭万年的工作，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，俯仰千古，常以自豪。所以民国二十五年，在我个人方面，也可说是厚黑年，是应该开庆祝大会的。我想我的信徒，将来一定会仿耶稣纪年的办法，以厚黑纪年，使厚黑学三字与国同体，每二十五年，开庆祝大会一次，自今以后，再开三百九十九次，那就是民国万年了。我写至此处，不禁高呼曰：中华民国万岁！厚黑学万岁！

去年吴稚晖在重庆时，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，约我同去会他。我说：“我何必去会他呢？他读尽中外奇书，独莫有读过厚黑学。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，此次由重庆，到成都，登峨眉，游嘉定，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独于大观园外面，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，他却未见过。欢迎吴先生，我也去了来，他的演说，我也听过，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，刘姥姥独未看见石狮子！我不去会他，特别与他留点憾事。”

有人听见厚黑学三字，即骂曰："李宗吾是坏人！"我即还骂之曰："你是宋儒。"要说坏，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，要说好，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。就来学言之，宋儒是圣人，李宗吾是坏人，就厚黑学言之，李宗吾是圣人，宋儒是坏人。故骂我为坏人者，其人即是坏人，何以故？是宋儒故。

我所最不了解者，是宋儒去私之说。程伊川身为洛党首领，造成洛、蜀相攻，种下南渡之祸，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？宋儒讲性善，流而为洛党，在他们目中视之，人性皆善，我们洛党，尽是好人，惟有苏东坡，其性与人殊，是一个坏人。王阳明讲致良知，满街都是圣人，一变而为东林党。吾党尽是好人，惟有力抗满清的熊廷弼是坏人，是应该拿来杀的。清朝的皇帝，披览廷弼遗疏，认为他的计划实行，满清断不能入关，悯其忠而见杀，下诏访求他的后人，优加抚恤。而当日排挤廷弼最力，上疏请杀他的，不是别人，乃是至今公认为忠臣义士的杨涟、左光斗等。这个道理，拿来怎讲？呜呼洛党！呜呼东林党！我不知仓颉夫子，当日何苦造下一个党字，拿与程伊川、杨涟、左光斗一般贤人君子这样用！奉劝读者诸君，与其研究宋学，研究王学不如切切实实的研究厚黑学。研究厚黑学，倒还可以做些福国利民的事。

宋儒主张去私，究竟私是个甚么东西，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。私字的意义，许氏说文，是引韩非子之语来解释。韩子原文，是"仓颉作书，自环者谓之私，背私谓之公。"环即是圈子。私字古文作厶，篆文是厶，画一个圈圈。公字，从八从厶，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，故八者背也。"背私谓之公"，即是说：把圈子打破了，才谓之公。假使我们只知有我，不顾妻子，这是环吾身画一个圈；妻子必说我徇私，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子撤去，环妻子画一圈；但弟兄在圈之外，弟兄又要说我徇私，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，环弟兄画一个圈；但邻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，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，环国人画一个圈；但他国人在圈外，又要说我徇私，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撤了，环人类画一个大圈，才可谓之公。但还不能谓之公。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，禽兽一定说：你们人类为甚么要宰杀我们？未免太自私了！草木同禽兽道：你为甚么要吃

我们？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问木道：你为甚么要吸取我的养料？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同地心道；你为甚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？你地心也未免自私。地球又问太阳道：你为甚么把我向你牵引？你未免自私。太阳又可问地球道；我牵引你，你为甚么不拢来！时时想向外逃走，并且还暗暗的牵引我？你也未免自私。再反过来说：假令太阳怕地球说他徇私，他不牵引地球，地球也不知飞向何处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，也不牵引了，这泥土沙石，立即灰飞而散，地球也就立即消灭。

我们从上项推论，绘图如雨，就可得几个要件如下：

（1）遍世界寻不出公字。通常所谓公，是画了范围的，范围内人谓之公，范围外人，仍谓之私。

（2）人心之私，通于万有引力，私字除不掉，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掉，如果除掉了，就会无人类，无世界。无怪宋儒去私之说，行之不通。

（3）我们讨论人性善恶问题，曾绘出甲乙两图，说："心理的现象，与磁场相象，与地心引力相象。"现在讨论私字，绘出丙图，其现象仍与甲乙两图相合。所以我们提出一条原则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"，想来不会错。

我们详玩内丙图，中心之我，仿佛一块磁石，周围是磁场，磁力之大小，与距离成反比例。孟子讲的差等之爱，是很合天然现象的。墨子讲兼爱，只画一个人类的大圈，主张爱无差等，内面各小圈俱无之，宜其深为孟子驳斥。

墨子志在救人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。杨、朱主张为我，叫他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他都不肯。在普通人看来，墨子的品格，宜乎在杨、朱之上，乃孟子曰："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。"认为杨子在墨子之上，去儒家为近，岂非很奇的事吗？这正是孟子的卓见，我非宜仔细研究。

凡人在社会上做事，总须人己两利，乃能通行无碍。孔孟的学说，正是此等主张。孔子所说："己立立人，己达达人。"《大学》所说："修齐治平。"孟子所说："王如好货，与民同之。""王如好色，与民同之"等语，都是本着人己两利的原则立论。叫儒家损

人利己，固然绝对不做，就叫他损己利人，他也认为不对。观于孔子答宰我“井有人焉”之间，和孟子所说“君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等语，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来，此等主张，最为平正通达。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，舍去我字，成为损己利人之行为，当然为孔门所不许。

杨子为我，是寻着了中心点，故孟子认为他的学说，高出墨子之上。杨子学说中最精粹的，是“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；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”四语（见《列子》）。他知道自己有一个我，把他存起；同时知道，他人也有一个我，不去侵犯他。这种学说，真是精当极了，然而尚为孟子所斥，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儒家的学说，是人己两利，杨子只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，失去人我之关联。孔门以仁字为主，仁字从二人，是专在人我间做工作，以我之所利，普及于人人。所以杨子学说，亦为孟子所斥。

我因为穷究厚黑之根源，造出甲乙丙三图，据三图以评判各家之学说，就觉得若网在纲，有条不紊了。即如王阳明所讲的“致良知”，与夫“知行合一”，都可用这图解释。把图中之我字作为一块磁石，磁性能相推用引，是具有离心向心两种力量。阳明所说的良知，与孟子所说的良知不同：孟子之良知，指仁爱之心而言，是一种引力；阳明之良知，指是非之心而言，是者引之使近，非者推之使远，两种力量俱具备了的。故阳明的学说，较孟子更为圆通。阳明所谓致良知，在我个人的研究，无非是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事事物物上罢了。

王阳明讲“知行合一”，说道：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这个道理，用力学公例一说就明白了。例如我闻友人病重想去看他，我心中这样想，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，直射到友人方面。我由家起身，走到病人面前，即是沿着这根力线一直前进。知友人病重，是此线之起点，走到病人面前，是此线的终点，两点俱一根直线上，故曰：“知行合一”。一闻友病，即把这根路线画定，故曰“知是行的主意”。画定了，即沿着此线走去，故曰：“行是知的工夫”。阳明把明德亲民二者合为一事，把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五者合为一事，把格致诚正、修

齐治平八者合为一事，即是用的这个方式，都是在一根直线上，从起点说至终点。

王阳明解释《大学诚意章》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”二句，说道：“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好色时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恶臭时，已自恶了，不是闻后别立一个心去恶。”他这种说法，用磁电感应之理一说就明白了。异性相引，同性相推，是磁电的定例。能判别同性异性者知也，推之引之者行也。我们在讲室中试验，即知磁电一遇异性，立即相引，一遇同性，立即相推，并不是判定同性异性后，才去推之引之，知行二者，简直分不出来，恰是阳明所说“即知即行”的现象。

历来讲心学者，每以镜为喻，以水为喻，我们用磁电来说明，尤为确切。倘再进一步，说：“人之性灵，与地球之磁电同出一源。”讲起来更觉圆通。人事与物理，就可一以贯之。科学家说：“磁电见同性自然相推，见异性自然相引。”王阳明说：“凡人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。”李宗吾说：“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，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亲怀中吃乳吃糕饼，见哥哥近前来，自然会推他打他。”像这样的讲，则致良知也，厚黑学也，就成为一而二，二而一了。

万物有引力。万物有离力。引力胜过离力，则其物存，离力胜过引力，则其物毁。目前存在之物，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，故有“万有引力”之说。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，早已消灭，无人看见，所以“万有离力”一层，无人注意。地球是现存之物，故把外面的东西向内部牵引；心是现存之物，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。小儿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见外面的东西，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；人类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见有利之事，即牵引到自己身上。我们旷观宇宙，即知天然现象，无一不是向内部牵引，地球也，心也，小儿也，人类也，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的作用，消归乌有的，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，他那向内牵引之力，无论如何是不能除去的。宋儒去私之说，等于想除去地心吸力，怎能办得到？只好承认其私，提出生存二字为重心，人人各遂其私，使人人能够生存，天下自然太平。此鄙人之厚

黑学所以不得不作，阅者诸君所以不得不研究也。

人人各进其私，可说是私到极点。也即是公到极点。杨朱的学说，即是基于此种学理生出来的。他说道："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"，即是"各遂其私"的说法；同时他又恐各人放纵其私，妨害他人之私，所以跟着即说："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"这种学说，真是精当极了，施之现今，最为适宜，我们应当特别阐扬。所以研究厚黑学的人，同时应当研究杨朱的学说。杨氏之学，在吾道虽为异端，然亦可借证，对钝根人不能说上乘法，不妨谈谈杨、朱学说。

地球是一个大磁石，磁石本具有引之推之两种力量，其被地球所推之物，已不知推到何方去了，出了我们视觉之外，只能看见他引而向内的力量，看不出推而向外的力量，所以只能说地球有引力，不能说地球有推力。人心犹如一块磁石，是具备了引之推之两种力量，由这两种力相推相引，才构成一个社会，其组织法，绝像太空中众星球之相推相引一般。人但知人世相贼相害，是出于人心之私。不知人世相亲相爱，也出于人心之私，人但知私心扩充出来，可以造成战争，扰乱世界和平；殊不知人类由渔猎，而游牧，而农业，而工商业，造成种种文明，也由于一个私字在暗中鼓荡。斯义也，彼程朱诸儒，乌足知之！此厚黑学所以为千古绝学也。

厚黑二字，是从一个私字生出来的，不能说他是好，也不能说他是坏，这就是我那个同学朋友谢绶青跋《厚黑学》所说的："如利刃然，用以诛盗贼则善，用以屠良民则恶，善与恶何关于刃，故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，用厚黑以为恶，则为恶人……。"我发明厚黑学，等于瓦特发明蒸汽，无施不可。利用蒸汽，造成火车，驾驶得法，可以日行千里，驾驶不得法，就会跌下岩去。我提出"厚黑救国"的口号，就是希望司机生驾驶火车，向列强冲去，不要向前日朝岩下开，也不要在街上横冲直撞，碾死行人。

物质不灭，能力不灭，这是科学家公认的定律。吾人之性灵，算是一种能力，请问：其生也从何而来，其死也从何而去，岂非难解的问题吗？假定：吾人之性灵，与地球之磁电，同出而异名，这个问题，就可解释了。其生也，地球之物质，变为吾身之毛发骨血，同时地球之磁电，变为吾之性灵；其死也，毛发骨血，退还地球，

仍为泥土，是谓物质不灭。同时性灵退还地球，仍为磁电，是谓能力不灭。我们这样的解释，则昔人所谓“浩气还太虚”，所谓“天地有正气，下为河岳，上为日星，于人曰浩然”，所谓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？”种种说法，就不是得空谈了。倘有人问，灵魂是否存在？我们可以说：“这是在各人的看法：吾人一死，此身化为泥土，性灵化为磁电，可谓之灵魂消灭。然吾身虽死，物质尚存，磁电尚存，即谓之灵魂尚存，亦无不可。性灵者吾人之灵魂也，磁电者地球之灵魂也，性灵与磁电，同出一源。我所绘甲乙丙三图，即基于此种观察生出来的，是为厚黑哲学的基础。至于实际的真理是否如此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自己认为合理，就写出来，是之谓宗吾。

我虽讲厚黑学，有时亦涉猎外道诸书，一一以厚黑哲理绳之。佛氏说：佛性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无边际，无终始；楞严七处征心，说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我认为吾人之性灵，与地球之磁电，同出而异名，则佛氏所说，与太空磁电何异？佛说：“本性圆融，周遍法世。”又说：“非有非无。”推此与磁电中和现象何异？黄宗羲著《明儒学案》自序，开口第一句曰：“盈天下皆心也。”高攀龙自序为学之次弟云：“程子谓：‘心要在腔子里’，不知腔子何所指，果在方寸间否耶？觅注不得，忽于小学中见其解曰：‘腔子犹言身子耳’，以为心不专在方寸，浑身是心也。”我们要解释黄高二氏之说，可假定宇宙之内，有一至灵妙之物，无处不是灌满了的。就其灌满全身躯壳言之，名之曰心，就其灌满宇宙言之，名之曰磁电，二者原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佛氏研究心理，西人研究磁电，其途虽殊，终有沟通之一日。佛有天眼通，天耳通，能见远处之物，能闻远处之语。西人发明催眠术，发明无线电，也是能见远处之物，能闻远处之语，这即二者沟通之初基。

我们把物质的分子加以分析，即得原子，把原子再分析，即得电子。电子是一种力，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。我们的身体，是物质集合而成，也即是电子集合而成。身与心本是一物，所以我们心理的变化，逃不出磁电学的规律，逃不脱力学的规律。

人类有夸大性，自以为万物之灵，仿佛心理之变化，不受物理

学的支配。其实只能说，人是物中之较高等者，终逃不出物理学的大原则。我们试验理化，温度变更，或参入他种药品，形状和性质均要改变。吾人遇天气大热，心中就烦燥，这是温度的关系。饮了酒，性情也会改变，这是参入一种药品，起了化学作用。从此等地方观察，人与物有何区别？故物理学中的力学规律，可适用到心理学上。

王阳明说“知行合一”，即是“思想与行为合一”。如把知字改作思想二字，更为明了。因为人的行为，是受思想的支配，所以观察人的行为。即可窥见其心理，知道他的心理，即可预料其行为，古人说：“诚于中，形于外。”又说：“中心达于面目。”又说：“根于心，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。”这都是心中起了一个念头，力线一发动，即依着直线进行的公例，达于面目，跟着即见于行事了。但有时心中起了一个念头，竟未见诸实行，这是甚么缘故呢？这是心中另起一种念头，把前线阻住了，犹如我起身去看友人之病，行至中途，因事见阻一样。

阳明说的“知行合一”，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行，只要动了看病人的念头，即算行了。他说：“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知。”普通心理学，分知、情、意三者，这“好好色”，明明是情，何以谓之行呢！因为一动念，这力线即注到色字上去了，已经是行之始，故阳明把情字看作行字。他说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可说是“知情合一”。

人心如磁石一般。我们学过物理，即知道：凡是铁条，都有磁力，因为内部分子凌乱，南极北极相消，才显不出磁力来。如用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一下，内部分子，南北极排顺，立即发出磁力。我国四万万人，本有极大的力量，只因内部凌乱，致受列强的欺凌。我们只要把内部力线排顺，四万万人的心理，走在同一的线上，发出来的力量，还了得吗？问：内部分子，如何才能排顺？我说：你只有研究厚黑学，我所写的《厚黑丛话》，即是引导铁条的磁石。

我国有四万万人，只要能够联为一气，就等于联合了欧洲十几国。我们现受日本的压迫，与其哭哭啼啼，跪求国联援助，跪求英美诸国援助，毋宁哭哭啼啼，跪求国人，化除意见，协助中央政府，先把日本驱逐了，再说下文。人问：国内意见，怎能化除？我说：

你把厚黑学广为宣传，使一般人了解厚黑精义及厚黑学使用法，自然就办得到了。

我发明厚黑学，一般人未免拿来用反了，对列强用厚字，摇尾乞怜，无所不用其极；对国人用黑字，排挤倾轧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。我主张翻过来用，对国人用厚字，事事让步，任何气都受，任何旧帐都不算；对列强用黑字，凡可以破坏帝国主义者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一点不让步，一点气都不受，一切旧帐，非算清不可。然此非空言所能办到，其下手方法，则在调整内部，把四万万根力线排顺，根根力线，直射列强，这即是我说"厚黑救国"。

人问我：对外的主张如何？我说：我无所谓主张，日本是入室之狼，俄国是当门之虎，欧美诸强国，是宅左宅右之狮豹，请问诸君，处此环境，室内人当如何主张？

世界第二次大战，迫在眉睫，有主张联英美以抗日本的，有主张联合日本以抗俄国的，又有主张如何如何的，若以我的厚黑哲学推论之，都未免错误。我写的《厚黑丛话》第二卷内面，曾有"厚黑国"这个名词，迩来外交紧急，我主张将"厚黑国"从速建立起来，即以厚黑教主兼充厚黑国的国王，将来还要钦颁厚黑宪法。此时东邻日本，有甚么水鸟外交、啄木外交，我先把我的厚黑外交提出来，同我的厚黑弟子讨论一下：

我们学物理化学，可先在讲室中试验。惟有国家这个东西，不能在讲室中试验，据我看来，还是可以试验，现在五洲之中，各国林立，诸大强国，互相竞争，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说：现在的五洲万国，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，当日的春秋战国，即是我们的试验品。

春秋战国，贤人才士最多，他们研究出来的政策，很可供我们的参考。那个时候，共计发生两大政策：第一是春秋时代，管仲"尊周攘夷"的政策。第二是战国时代，苏秦"联六国以抗强秦"的政策。自从管仲定下"尊周攘夷"的政策，齐国遂崛起为五霸之首；后来晋文称霸，也沿袭他的政策；就是孔子修春秋，也不外"尊周攘夷"的主张。这个政策，很值得我们的研究。战国时，苏秦倡

"联六国以抗强秦"之议，他的从（纵）约成功，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，这政策，更值得研究。我国现在情形，既与春秋战国相似，我主张把管仲、苏秦的两个法子融合为一，定为厚黑国的外交政策。管仲的政策，是完全成功的，苏秦的政策，是始而成功，终而失败。究竟成功之点安在？失败之点安在？我们可以细细讨论。

春秋时，周天子失了统驭能力，诸侯互相攻伐，外夷乘间侵入，弱小国很受蹂躏，与现在情形是一样的。楚国把汉阳诸姬灭了，还要问鼎中原，与日本灭了琉球、高丽，进而占据东北四省，进而占据平津，是一样的。那个时候，一般人正寻不着出路，忽然跳出一个大厚黑家，名曰管仲，霹雳一声，揭出"尊周攘夷"的旗帜，用周天子的名义驱逐外夷，保全弱小国家的领土，大得一般人的欢迎。他的办法，是纠合诸侯，把弱小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，向外夷攻打，伐山戎以救燕，伐狄以救卫邢。这是用一种合力政策，把外夷各个击破。以那时国际情形而论，楚国是第一强国，齐虽泱泱大国，但经襄公荒淫之后，国内大乱。桓公即位之初，长勺之战，连鲁国这种弱国都战不过，其衰弱情形可想。召陵之役，竟把楚国屈伏，全由管仲政策适宜之战。我国在世界弱小民族中，弱则有之、小则未也，绝像春秋时的齐国，天然是盟主资格。当今之世，"管厚黑"复生，他的政策，一定是："拥护中央政府，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，然后进而联合弱小民族，把全世界力量集中起来，向诸大强国攻打。"基于此种研究，我国当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早就该使下厚黑学，退出国际联盟，另组一个"世界弱小民族联盟"，与那个分赃集团的国联成一个对抗形势，由我国出来，当一个齐桓公，领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，对诸大强国奋斗。

到了战国，国际情形又变，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，七雄并立，周天子已经扶不起来，纸老虎成了无用之物，尊周二字，说不上了。秦楚在春秋时，为夷狄之国，到了此时，攘夷二字更不适用。七国之中，秦最强，骎骎乎有并吞六国之势，于是第二个大厚黑家苏秦，挺身出来，倡议联合六国，以抗秦国，即是联合众弱国，攻打一强国，仍是一种合力政策，可说是"管厚黑政策的变形"。基于此种研究，我们可把日、俄、英、美、法、意、德诸国，

合看为一个强秦，把全世界弱小民族看作六国，当然组织一个“弱小民族联盟”，以与诸强国周旋。

诸君莫把苏秦的法子小视了，他是经过引锥刺股的工夫，揣摹期年，才研究出来。他这个法子，含有甚深的学理。他读的是太公阴符，阴符是道家之书。古阴符不传，现行的阴符，是伪书。我们既知是道家之书，就可借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来说明。《老子》一书，包藏有很精深的厚黑原理。战国时厚黑大家文种、范蠡，汉初厚黑大家张良、陈平等，都是从道家一派出来的。管子之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道家，所以管仲的内政外交，暗中以厚黑二字为根据。鄙人发明厚黑学，进一步研究，创一条定理：“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还读老子之书，就觉得处处可用力学公例来解释，将来我讲“中国学术”时，才来逐一说明。此时谈厚黑外交，谈到苏秦，我只能说，苏大厚黑的政策，与老子学说相合，与力学公例相合。

老子曰：“天之道，其犹张弓欤？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”这明明是归到一个平字上。力学公例，两力平衡，才能稳定。水不平则流，人不平则鸣。苏秦窥见这个道理，游说六国，抱定一个平字立论，与近世孙中山学说相合。他说六国，每用“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”和“称东藩，筑帝宫，受冠带，词春秋”一类话，激动人不平之气。孙中山说：中国人，连高丽、安南等亡国人都不如，位置在“殖民地”之下，当名曰“次殖民地”。其论调是一样的，无非是求归于平而已。苏秦的对付秦国的法子，是“把六国联合起来，秦攻一国，五国出兵相救”。此种办法，合得到克鲁泡特金“互助”之说。秦虽强，而六国联合起来，力量就比他大，合得到达尔文“强权竞争”之说。他把他的政策定名为“合纵”，更可寻味。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六国，发出六根力线，联纵的方向，向强秦攻打，明明是力学上的合力方式。他这个法子，较诸管仲政策，含义更深，所以必须揣摹期年，才研究得出来。他一研究出来，自己深信不疑的说道：“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果然一说就行，六国之君，都听他的话。《战国策》曰：“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决于苏秦之策。”又曰：“廷说诸侯之王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抗。”你想；战国时

候，百家争鸣，是学术最发达时代，而苏厚黑的政策，能够风靡天下，岂是莫得真理吗？

管、苏两位大厚黑家定下的外交政策。形式虽不同，里子是一样的，都是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，都是合力政策，然而管仲之政策成功，苏秦之政策终归失败，纵约终归解散，其原因安在呢？管仲和苏秦，都是起的联军，大凡联军，总要有负责的首领。唐朝九节度相州之败，中有郭子仪、李光弼诸名将，卒至溃败者，就由于莫得负责的首领。齐国是联军的中坚分子，战争责任，一肩担起。其他诸国，立于协助地位。六国则彼此立于对等地位，不相统辖，缺乏重心。苏秦当纵约长，本然是六国的重心，无奈他这个人，莫得事业心，当初只因受了妻不下机，嫂不为炊的气，才发愤读书，及佩了六国相印，可以骄傲父母妻嫂，就志满意得，不复努力。你想当首领的人，都这个样子，怎能成功？假令管大厚黑来当六国的纵约长，是决定成功的。

苏秦的政策，确从学理上研究出来，而后人反鄙视之，其故何也？这只怪他早生了二千多年，未克复领教李宗吾的学说。他陈书数十箧，中间缺少了一部《厚黑丛话》，不知道“厚黑为里，仁义为表”的法子。他游说六国，纯从利害上立论，赤裸裸的把厚黑表现出来，忘却在上面糊一层仁义，所以他的学说，就成为邪说，无人研究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我们用厚黑史观的眼光看去，他这个人，学识有余，实行不足，平生事迹，可分两截看：从刺股至当纵约长，为一截，是学理上之成功；当纵约长以后，为一截，是实行上之失败。前一截，我们当奉以为师；后一截，当引以为戒。

我们把春秋战国外交政策研究清楚了，再来研究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外交政策。三国中，魏最强，吴、蜀俱弱。诸葛武侯，在隆中，同刘备定的大政方针，是东联孙吴，北攻曹魏，合两弱国以攻一强国，仍是苏大厚黑的法子。史称：孔明自比管、乐。我请问读者一下：孔明治蜀，略似管仲治齐，自比管仲，尚说得去，惟他平生政绩，无一点与乐毅相似，以之自比，是何道理？这就很值得研究了。考之《战国策》：燕昭王伐齐，是合五国之兵，以乐毅为上将军。他是联军的统帅，与管仲相桓公，帅诸侯之兵以攻楚是一样。燕昭王

欲伐齐，乐毅献策道："夫齐霸国之余教，而聚胜之遗事也，闲于兵甲，习于战攻，王若欲攻之，则必举天下而图之。"因主张合赵、楚、魏、宋以攻之。孔明在隆中，对刘先帝说道："曹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"因主张：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东联孙权，然后北伐曹魏，其政策与乐毅完全一样。乐毅曾奉昭王之命，亲身赴赵，把赵联好了，再合楚、魏、宋之兵，才把齐打破。孔明奉命入吴，说和孙权，共破曹操于赤壁，其举动也是一样，此即孔明自比乐毅所由来也。至于管仲纠合众弱国，以讨伐最强之楚，与孔明政策相同，更不待言。由此知孔明联吴伐魏的主张，不外管仲、乐毅的遗策。

东汉之末，天子失去统驭能力，群雄并起，与春秋战国相似。孔明隐居南阳时，与诸名士讨论天下大势，大家认定：曹操势力最强，非联合天下之力，不能把他消灭，希望有春秋时的管仲和战国时的乐毅这类人才出现。于是孔明遂自许：有管仲、乐毅的本事，能够联合群雄，攻打曹魏。这是所谓"自比管乐"了。不过古史简略，只记"自比管仲乐毅"一句，把他和诸名士的议论概行删去了，及到刘先帝三顾草庐时，所有袁绍、袁术、吕布、刘表等，一一消灭，仅剩一个孙权，所以隆中定的政策，是东联孙吴，北攻曹魏。这种政策，是同诸名士细细讨论过的，故终身照着这个政策行去。

"联合众弱国攻打强国"的政策，是苏秦揣摹期年研究出来的，是孔明隐居南阳，同请名士讨论出来的，中间含有绝大的道理。人称孔明为王者之才，殊不知：孔明澹泊宁静，颇近道家，他生平所读的，是最粗浅的两部厚黑教科书，第一部是《韩非子》，他治国之术，纯是师法申、韩，曾手写申韩以教后主，申子之书不传，等我讲厚黑政治时再谈。第二部是《战国策》，他的外交政策，纯是师法苏秦。《战国策》载：苏秦说韩王曰："臣闻鄙谚曰：'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'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以异于牛后乎？"韩王忿然作色，攘臂按剑，仰天太息曰："寡人虽死，必不能事秦。"《三国志》载：孔明说孙权，叫他案兵束甲，北面降曹，孙权勃然曰："吾不能举全吴之地，十万之众，受制于人！"我们对照观之，孔明的策略，岂不是与苏厚黑一样？

“联众弱国，攻打强国”的政策，非统筹全局从大处着眼看不出来。这种政策，在蜀只有孔明一人能了解，在吴只有鲁肃一人能了解。鲁肃主张舍出荆州，以期与刘备联合，其眼光之远大，几欲驾孔明而上之。蜀之关羽，吴之周瑜，吕蒙、陆逊，号称英杰，俱只见着眼前小利害，对于这种大政策全不了解。刘备孙权有相当的了解，无奈认不清，拿不定，时而联合，时而破裂，破裂之后，又复联合。最了解者，莫如曹操。他听见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，二人实行联合了，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落了。其实孙刘联合，不过抄写苏厚黑的旧文章，曹操是千古奸雄，听了都要心惊胆战，这个法子的厉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从上面的研究，可得一结论曰：“当今之世，诸葛武侯复生，他的政策，决定是：退出国联，组织世界弱小民族联盟，向诸大强国进攻。”

我们倡出“弱小民族联盟”之议，闻者必惶然大骇，以为列强势力这样的大，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岂不触列强之怒，岂不立取灭亡？这种疑虑。这一般人所有的。当时六国之君，也有这样疑虑。张仪知六国之君胆怯，就乘势恐吓之，说道：“你们如果这样子，秦国必如何如何的攻打你。我劝你还是西向事秦，将来有如何的好处。”六国听他的话，遂连袂事秦，卒至一一为秦所灭。历史俱在，诸君试取战国策细读一过，看张仪对六国的话，像不像拿现在列强势力，去恐吓弱小国一般？六国信张仪的话而灭亡，然则为小民族计，何去何从，不言而决。

苏秦说六国联盟，是从利害立论，说得娓娓动听；张仪劝六国事秦，也是从利害立论，也是说得娓娓动听。同是就利害立论，二说极端相反，何以俱能动听呢？其差异之点：苏秦所说利害，是就大者远者言之，张仪是就小者近者言之。常人目光短浅，只看到眼前利害，虽以关羽、周瑜、吕蒙、陆逊这类才俊之士，尚不免为眼前小利害所惑，何况六国昏庸之主？所以张仪之言，一说即入。由后日的事实来证明，从张仪之说而亡国，足知苏秦之主张是对的。今之论者，怕触怒列强，不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恰走入张仪途径。愿读者深思之！深思之！

苏秦与张仪同学，自以为不及仪，后来回到家中，引锥刺股，揣摹期年，加了一番自修的苦功，其学力遂超出张仪之上，说出的话，确有真理。孟子对齐宣王曰："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，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"这种说法，宛然合纵声口。孟子讥公孙衍、张仪以顺为正，是妾妇之道，独未说及苏秦。我们细加研究，公孙衍、张仪教六国事秦，俨如妾妇事夫，以顺为正，若苏秦之反抗强秦，正是孟子所谓"威武不能屈"之大丈夫。

孟子之学说，最富于独立性。我们读孟子答滕文公"事齐事楚"之问，答"齐人筑薛"之问，答"事大国则不得免焉"之问，独立精神，跃然纸上。假令孟子生今之世，绝不会仰承列强鼻息，绝不会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。

宇宙真理，只要能够彻底研究，得出的结果，彼此是相同的，所以管仲"尊周攘夷"的政策，律以孔子的《春秋》是合的，苏秦"合众弱国以抗一个强国"的政策，律以孟子的学说，也是合的，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，也说合纵是六国之利，足征苏秦的政策是对的。我讲厚黑学有两句秘诀：厚黑为里，仁义为表。"假令我们明告于众曰："我们应当师法苏秦联合六国之法，联合世界弱小民族。"一般人必诧异道："苏秦是讲厚黑学的，是李疯子一流人物，他的话都信得吗？信了立会亡国。"我们改口说道："此孔孟遗意也，此诸葛武侯之政策也，此司马温公之主张也。"听者必欢然接受。

大丈夫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，宁为玉碎，无为瓦全。我国以四万万民众之国，在国联中求一理事而不可得，事事惟列强马首是瞻，亡国之祸，迫于眉睫。与其坐以待毙，孰若起而攻之？与其在国联中仰承列强鼻息，受列强之宰割，易若退而为弱小民族之盟主，与列强为对等之周旋？春秋之义，虽败犹荣，而况乎断断不败也。

晋时李特入蜀，周览山川形势，叹曰："刘禅有如此江山而降于人，岂非庸才？"我国有这样的土地人民，而受制于东邻三岛，千秋万岁后，读史者将谓之何！余岂好讲厚黑哉，余不得已也，凡我四万万民众，快快的厚黑起来，一致对外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，快快的厚黑起来，向列强进攻。

孙中山演说集，载有一段故事，日俄战争的时候，俄国把波罗

的海的舰队调来，绕过非洲，走入日本对马岛，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。这个消息传出来，孙中山适从苏彝士河经过，有许多土人，看见孙中山是黄色人，现出很喜欢的样子来问道："你是不是日本人呀?"孙中山说道："我是中国人。你们为甚么这样的高兴呢?"他答应道："我们东方民族，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，总是受痛苦，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。这次日本打败俄国，我们当如自己打胜仗一样，这是应该欢喜的，所以我们便这样的高兴。"我们试想：日本打败俄国，与苏彝士河边的土人何关？日本又从莫说过要替他们解除痛苦的话。他们现出这种样子，世界弱小民族心理，也就可想见了。威尔逊提出"民族自决"的口号，大受弱小民族的欢迎。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于"民族自决"之外，再加以"弱小民族互助"的口号，对内自决，对外互助，当然更受欢迎。且威尔逊不过徒呼口号而已，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有特设之机关提挈之，更容易成功。

威尔逊"民族自决"之主张，其所以不能成功者，由于本身上是矛盾的。弱小民族，是被压迫者，威尔逊代表美国，美国是列强之一，是站在压迫者方面。威尔逊个人虽有这种主张，其奈美国之立场不同何？我国与弱小民族是站在一个立场，出来提倡民族自决，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彼此互助，是决定成功的。

至于和会上威尔逊之所以失败者，则由威尔逊是教授出身，不脱书生本色，未曾研究过厚黑学。美国参战之初，提出十四条原则，主张民族自决。巴黎和会初开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把威尔逊当如救世主一般，以为他们的痛苦可以在和会上解除了。哪知英国的路易·乔治，法国的克利满梭，都是精研厚黑学的人，就说克利满梭，绰号"母大虫"，尤为凶悍，初闻威尔逊鼎鼎大名，见面之后，才知黔驴无技，时时奚落他，甚至说道："上帝只有十诫，你提出十四条，比上帝还多了四条，只好拿在天国去行使。"威尔逊只好忍受。后来意大利全权代表下旗归国，日本全权代表也要下旗归国，就把威尔逊吓慌了，俯首贴耳，接受他们要求，而民族自决四字遂成泡影。

假令我这个厚黑教主是威尔逊，我就装痴卖果，听凭他们奚落，坐在和会席上，一言不发，直待意大利下旗归国，日本下旗归国，已经出了国门，猝然站起来，在席上一巴掌说道："你们要这样干

吗？我当初提出十四条原则，主张民族自决，你们认了可，我美国才参战，而今你们这样干，使我失信于美国人民，失信于全世界弱小民族，而今只好领率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向你们英、法、意、日四国决一死战，才可见应谅于天下后世。你母大虫说我这十四条应拿在天国行使，你看我于一个星期内，用鲜血将这个地球染红，就从这鲜血中现出一个天国，与你母大虫看！”说毕，退出和会，应用我的补锅法，把锅敲破了再说，三十分钟内，通电全世界，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来，对列强反戈相向，由美国指挥作战。这样一来，请问英、法敢开战吗？当日事实俱在，我们不妨研究一下，德国战斗力并未损失，最感痛苦者，食料被列国封锁耳。只要接济他的粮食，单是一个德国，已够英、法对付。大战之初，英、法许殖民地许多权利，弱小民族抛弃旧日嫌怨，一致赞助。印度甘地，也叫他的党徒帮助英国，原想战胜之后，可以抬头，那知和会上，列强食言，弱小民族，正在含血喷天。有了威尔逊这样的主张，他们在战地，还有不立即倒戈吗？兼之美国是生力军，国家又富，英、法已是精疲力偿，如果实行开战，可断定：一个星期，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。这个战火，请问英法敢打吗？如果要我美国不打，除非十四条，条条实行，并须加点利息，格外增加两条。何以放呢？因为你英、法诸国，素无信义，明明白白的承认了的条件，都要翻悔，所以十四条之外，非增加两条，以资保障不可。威尔逊果然这样干，难道民族自决之主张，不能实现吗？无奈威尔逊一见意大利和日本的使臣下旗归国，就手忙脚乱，用“锯箭法”了事，竟把千载一时之机会失去，惜哉！惜哉！不久箭头在内面陆续发作，我国东北四省，无端失去，阿比西尼亚，无端受意大利之摧残。世界第二次大战，行将爆发。凡此种种，都由威尔逊在和会席上少拍了一巴掌之故。甚矣，厚黑学之不可不讲也！

上述的办法，以威尔逊的学识，难道见不到吗？就说威尔逊是书呆子，不懂厚黑学，同威尔逊一路到和会的，有那么多专门人才，那么多外交家，一个个都是在厚黑场中来来往往的人，难道这种粗浅的厚黑技术都不懂得，还待李疯子来说吗？他们懂是懂得的，只是不肯这样干，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压迫者，美国是压迫者之

一，根本上有了这种大矛盾，美国怎能这样干呢？

威尔逊提出“民族自决”四字，与他本国的立场是矛盾的。日本是精研厚黑学的，窥破威尔逊有此弱点，就在和会上提出“人种平等”案，朝着他的弱点攻去，意若曰：“你会唱高调，等我唱个高调，比你更高。”这本是厚黑学的妙用，果然把威尔逊制住了。然而威尔逊毕竟是天禀聪明，他并莫有读过《厚黑学》译本，居然懂得厚黑哲理，他明知民族自决之主张，为列强所不许，为本国所不许，竟大吹大擂起来，闹得举世震惊，此即是鄙人“办事二妙法”中之“补锅法”也，把锅之裂痕，敲得长长的，乘势大出风头，迨至意大利和日本全权代表要下旗归国，他就马马虎虎了事，此“办事二妙法”中之“锯箭法”也。威尔逊可以昭告世界曰：“民族自决之主张，其所以不能贯彻者，非我不尽力也，其奈环境不许何！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赞成何”。是无异外科医生对人说道：“我之只锯箭干而不取箭头者，非外科医生不尽力也，其奈内科医生袖手旁观何！”噫，威尔逊真厚黑界之圣人哉！

中国八股先生有言曰：“东海有圣人，西海有圣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。”鄙人发明补锅法锯箭法，此先知先觉之东方圣人也。威尔逊实行补锅法、锯箭法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虽欲不谓之西方圣人，不可得已。

我当日深疑：威尔逊是个老教书匠出身，是一个书呆子，何以会懂得补锅法，锯箭法？后来我多方考察，才知他背后站有一位军师，豪斯大佐，是著名的阴谋家，是威尔逊的脑筋。威尔逊之当总统，他出力最多。威尔逊的阁员，大半是他推荐的。所有美国绝交参战也，山东问题也，都是此公的主张。他专门唱后台戏，威尔逊不过登场之傀儡罢了。威尔逊听信此公的话，等于刘邦之听信张子房。我们既承认刘邦为厚黑圣人，就呼威尔逊为厚黑圣人，也非过誉。

一般人都以为巴黎和会，威尔逊厚黑学失败，殊不知威尔逊之失败，即是威尔逊之成功；他当美国第二十八代的总统，试问：从前二十七位总统，读者诸君，记得几人姓名？我想除了华盛顿、林肯二人，鼎鼎大名而外，第三恐怕要数威尔逊了。任人如何批评，

他总算是历史上有名人物。问其何修而得此，无非是善用补锅法、锯箭法罢了，假使他不懂点厚黑学，不过混在从前二十七位总统中间，姓名若有若无，威尔逊三字，安能赫赫在人耳目？由是知：厚黑之功用大矣哉！成则建千古不朽之盛业，败亦留宇宙大名，读者诸君快快的与我拜门，只要把脸儿弄得厚厚的，心儿弄得黑黑的，跳上国际舞台，包管你名垂宇宙，包管你把世界列强打得弃甲曳兵而逃。

巴黎和会，聚世界厚黑家于一堂，钩心斗角，仿佛一群拳术家在擂台上较技。我们站在台下，把他们的拳法看得清清楚楚，当用何种拳法才能破他，台下人了了然然，台上人反漠然不觉。当初威尔逊提出"民族自决"之主张，大得弱小民族之欢迎，深为英、法、意、日所不喜，可知"民族自决"四字，可以击中列强的要害。及后日本提出"人种平等"案，威尔逊就哑口无言，而"民族自决"案就无形打消，可知"人种平等"四字，可以击中欧美人的要害。我国如出来提倡"弱小民族联盟"，把威尔逊的"民族自决"案和日本的"人种平等"案合一炉而冶之，岂不更足以击中他们的要害吗？

美国和日本，是站在压迫者方面的，威尔逊主张的"民族自决"，日本主张的"人种平等"，不过口头拿来说说，并无实行的决心，已经闹得举世震惊，列强大吓；我国是站在被压迫者方面，循着这个路子做去，口头这样说，实际上就这样做，并且猛力做，当然收很大的效果。

譬之打战，先要侦探一下，再用兵略略攻打一下，才知敌人某处虚、某处实，既把虚实明了了，然后才向着他的弱点猛攻。陆逊大破刘先帝，就是用的这个法子。刘先帝连营七百里，陆逊先攻一营不利，对众人说道："他的虚实，我已知道了，自有破之之法。"于是纵火烧之，刘先帝遂全军溃败。威尔逊提出"民族自决"案，举世震动，算替弱小民族侦探了一下，日本提出"人种平等"案，就把威尔逊挟持着了，算是向列强略略攻了一下。他们几位厚黑家，把自家的弱点尽情暴露，我们就向着这个弱点猛力攻去，他们的帝国主义，当然可以一举而摧灭之。

刘先帝之失败，是由于连营七百里，战线太摆宽了。陆逊令军

士每人持一把茅，隔一营，烧一营，同时动作，刘先帝首尾不能相顾，遂至全军溃败。列强殖民地太宽，仿佛刘先帝连营七百里一般。我们纠约世界弱小民族，同时动作，等于陆逊烧连营，遍地是火，列强首尾不能相顾，他们的帝国主义，当然溃败。英国自夸：凡是太阳所照之地，都有英国的国旗。我们把“弱联会”组织好了，可说：凡是太阳所照之地，英国人都该挨打。

刘先帝身经百战，矜骄极了，以为陆逊是个少年，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不知陆逊能够忍辱负重，是厚黑界后起之秀，猝然而起，出其不意，把这位老厚黑打得一败涂地。列强自恃军械精利，把我国看不在眼，矜骄极了。我国备受欺凌，事事让步，忍辱负重，已经到了十二万分，当然学陆逊，猝然而起，奋力一击。

有人谓：弱小民族，极形涣散，不易联合。这也不必虑，以历史证之；嬴秦之末，天下苦秦苛政，陈涉振臂一呼，山东豪俊，群起响应，立即嬴秦灭了。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人人积恨嬴秦已久，人人都想推倒他，心中发出的力线，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，所以陈涉起事之初，并未派人去联络山东豪俊，而山东豪俊，自然与之行动一致。现在列强压迫弱小民族，苛虐情形，较诸嬴秦，有过之无不及，嬴秦亡国条件，列强是具备了的。我国出来，当一个陈涉，振臂一呼，世界当然闻风响应。

刘备、孙权两位厚黑家，本是郎舅之亲，大家的眼光注射在荆州上，刘备把他向西拖，孙权把他向东拖，力线相反，其图如（A）。于是郎舅决裂，夫妇生离，关羽被杀，七百里之连营被烧，刘先帝东征兵败，身死白帝城，吴蜀二国，几成了不共戴天之仇。后来诸葛亮遣邓芝人吴，约定同齐伐魏，目标一变，心理即变，其图如（B）。于是仇雠之国，立即和好。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（A）图力线，是横的方向，彼此是冲突的，（B）图的力线，是纵的方向，是合力的方式。彼此不生冲突。

我国连年内乱。其原因是由国人的目光注射在国内之某一点，彼此的力线，成了横的方向，当然生冲突。我们应当师法诸葛武侯，另提目标，使力线成纵的方向，国内冲突，立即消灭。问：“提甚么目标？”答曰：提出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之主张，全国人一致去干这

种工作。譬之射箭，以列强为箭垛，四万万人，有四万万支箭，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，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每支箭是不生冲突的。于是安内也，攘外也，就成为二而一、一而二了。奉劝读者诸君，如果有志救国，非研究我的厚黑学不可。

我们学过物理学，即知道凡是铁条，都有磁力。只因内部分子凌乱，南极北极相消，才显不出磁力来。如用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了一下，内部分子，南北极排顺，立即发出磁力。我国四万万人，本有极大的力量，只因内部凌乱，故受外人的欺凌。我们只要把内部排顺了，四万万人的心理，走在同一的线上，发出来的力量，还了得吗？问："四万万人的心理，怎能走在同一的线上呢？"我说：我发明的厚黑学，等于一块磁石，你把他向国人宣传，就等于在铁条上引导了一下，全国分子，立可排顺，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？以此图功，何功不克？只要把厚黑学研究好了，何畏乎日本？何畏乎列强？

日本的厚黑家，可以反法我道：据你说，吴蜀二国结下不解之深仇，诸葛武侯提出伐魏之说，以魏为目标，二国立即和好。而今你们中国人仇视日本，我日本提出"中日联合，抵抗苏俄"的主张，以苏俄为目标，岂不与诸葛武侯联吴伐魏的政策一样吗？怎么你这个厚黑教主，还说要攻打日本呢？我说：你这话可谓不通之极！荆州本是孙权借与刘备的，孙权取得荆州，物归原主，吴蜀二国，立于对等地位，故能说联合伐魏的话。日本占据东四省，进窥平津，纯是劫贼行为，世间哪有同劫贼联合之理？必须恢复了九一八以前的状况，荆州归还了孙权，才能说联合对俄的话。日本是入室之狼，俄国是卧门之虎，欧美列强，是宅左宅右之狮豹，必须把室中之狼驱逐出去了，才能说及门前之虎，才能说及宅左宅右之狮豹。

厚黑丛话卷六

成都《华西日报》二十五年三月四月

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，中国的八股，博大精深，真所谓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我寝馈数十年，只能说是修业。不敢言毕业。我作八股有两个秘诀：一曰：抄袭古本；二曰：作翻案文字。先生出了一道题，寻一篇类似的题文，略略改换数字，沐手敬书的写去，是曰抄袭古本。我主张弱小民族联盟，这是抄袭管仲、苏秦和诸葛亮三位的古本。人说冬瓜做不得甑子，我说，冬瓜做得甑子并且冬瓜做的甑子，比世界上任何甑子还要好些。何以故呢？世界上的甑子，只有里面蒸的东西吃得，甑子吃不得，惟有冬瓜做的甑子，连甑子都可以当饭吃。此种说法，即所谓翻案文字也。我说：厚黑可以救国，等于说冬瓜可以做甑子，所以我的学说最切实用，是可以当饭吃的。

剿袭陈言，为作文之大忌，俾斯麦唱了一出铁血主义的戏，全场喝采，德皇维廉第二，重演一出，一败涂地，日本接着再演，将来决定一败涂地。诸君不信，请拭目以观其后。

抄袭古本，总要来得高明，诸葛武侯，治国师法申、韩，外交师法苏秦，明明是纵横杂霸之学，后人反说他有儒者气象，明明是霸佐之才，反说他是王佐之才。此公可算是抄袭古本的圣手。

剿写文字的人，每喜欢剿写中式之文，殊不知应当剿写落卷，铁血主义四字，俾斯麦中式之文也，我们万不可剿写，民族自决四字，是威尔逊的落卷，人种平等四字，是日本的落卷，如果沐手敬书出来，一定高高中式。九一八这类事，与其诉诸国联，诉诸英、美，无宁诉诸非洲澳洲那些野蛮人，诉诸高丽、台湾那些亡国民，表面看去，似是做翻案文字，实在是抄写威尔逊的落卷，抄写日本的落卷。

川省未修马路以前，我每次走路，见着推车的、抬轿的、邀驮马的、挑担子的，来来往往，如蚂蚁一般，宽坦的地方，安然过去，

一到窄路，就彼此大骂，你怪我走得不对。我怪你走得不对。我心中暗暗想道：何尝是走得不对，无非是路窄了的关系。我国组织、政权集中在上面，任你有何种抱负，非握得政权施展不出来，于是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不对。其实非不对也，政治舞台，地位有限，容不了许多人，等于走入窄路一般。无怪乎全国中志士和志士，吵闹不休。

以外交言之，我们当辟一条极宽的路来走，不能把责任属诸当局的几个人。甚么是宽路呢？提出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的主张，这个路子就极宽了，舞台就极大了，任有若干人，俱容得下。在国外的商人、留学生和游历家，可以直接向弱小民族运动；在国内的，无论在朝在野，无论哪一界，都可担任种种工作。四万万人的目标，集中于弱小民族联盟之一点，根根力线，不相冲突，不言合作，而合作自在其中。有了这种竞坦的大路可走，政治舞台，只算一小部分，不须取得政权，救国的工作，也可表现出来，在野党、在朝党，也就无须吵吵闹闹的了。

民主国人民是皇帝，无奈我国四万万人，不想当英明的皇帝，大家都以阿斗自居，希望出一个诸葛亮，把日本打倒，把列强打倒，四万万阿斗，好坐享其成。我不禁大呼道：陛下误矣！阿斗者，亡国之主也！有阿斗就有黄皓，诸葛亮千载不一出，且必三顾而后出，黄皓则遍地皆是，不请而自来。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，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。我只好照抄一句《出师表》曰："陛下不宜妄自菲薄。"我们何妨自己就当一个诸葛亮，自己就当一个刘先帝。我这个厚黑教主，不揣冒昧，自己就当起诸葛亮来，我写的《厚黑丛话》，即是我的"隆中对"。我希望读者诸君，大家都来当诸葛亮，各人提出一种主张，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篇"隆中对"。同时我们又化身为刘先帝，成了四万万刘先帝，把四万万篇"隆中对"加意选择。假令把李厚黑的"弱小民族联盟"选上了，我们四万万刘先帝，就亲动圣驾，做联吴伐魏的工作，想出种种法子，去把非洲澳洲那些野蛮国，与夫高丽、台湾、安南、缅甸那些亡国民联为一气，向世界列强进攻。

欲求我国独立？必先求四万万人能独立，四万万根力线挺然特

立，根根力线，直射列强，欲求国之不独立，不可得已。问：四万万力线何以能独立？曰：先求思想独立。能独立乃能合作，我国四万万人不能合作者，由于四万万人不能独立之故。不独立则为奴隶，奴隶者，受驱使而已，独立何有！合作何有！

野心家办事，包揽把持，视众人如奴隶，彼所谓抗日者，率奴隶以抗日以谓也。日本在东亚，包揽把持，视中国人如奴隶，被所谓抗俄者，率奴隶以抗俄之谓也。既无独立的能力，哪有抵抗的能力，所以我们要想抵抗日本，抵抗列强，当培植人民的独立性，不当加重其奴隶性。我写这部《厚黑丛话》，千言万话，无非教人思想独立而已。故厚黑国的外交，是独立外交，厚黑国的政策。是合力政策。军商政学各界的厚黑家，把平日的本事直接向列强行使，是之谓厚黑救国。

孔子谓子夏曰："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"我教门弟子曰："汝为大厚黑，无为小厚黑。"请问大小厚黑，如何分别？张仪教唆六国互相攻打，是小厚黑。孙权和刘备，互争夺荆州，是小厚黑。要管仲和苏秦的法子，才算大厚黑。日本占据东北四省，占据平津，是小厚黑。欧美列强，掠夺殖民地，是小厚黑。鄙人主张运动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反抗日本和列强，才算大厚黑。孟子曰："小固不可以敌大。"我们的大厚黑成功，日本和列强的小厚黑，当然失败。

我国只要把弱小民族联盟明定为外交政策，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，全国总动员，一致去做这种工作，全国目光，注射国外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，不但内争消灭，并且抵抗日本和列强，也就绰绰然有余裕了，开战也可，不开战也可。惜乎诸葛武侯死了，恨不得起斯人于地下，而与之细细商榷。

我们一谈及弱小民族联盟，反抗列强，闻者必疑道：列强有那样的武力，弱小民族如何敌得过？殊不知战争的方式最多，武力只占很小一部分。以战争之进化言之，最初只有戈矛弓矢，后来进化，才有枪弹，这是旧式战争。再进化有飞机炸弹，这是日本在淞沪之役用以取胜的，是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用以取胜的。再进化则为化学战争，有毒瓦斯、毒菌、死光等等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一般人所凛凛畏惧的。再进化则为经济战争，英国对意制裁，即算是

用这种战术。人问：经济战争之上，还有战术莫得？我答道：还有，再进化则为心理战争。三国时马谡曾说："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"这即是心理战争。心理战争的学说我国发明最早。战国时，孟子说："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"此心理战争之说也。又云："……则邻国之民，仰之若父母矣，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能济者也，如此则无敌于天下。"此心理战争之说也。我们从表面上看去，这种说法，岂非极迂腐的怪话吗？而不知这是战术中最精深的学说，一般人特未之思耳。

现在列强峙立的情形，很像春秋战国时代。春秋战国，为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，贤人才士最多。一般学者所倡的学说，都是适应环境生出来的，都是经过苦心研究，想实际的解决时局，并不是徒托空谈，所以他们的学说很可供我们今日之参考。即以兵争一端而论，春秋时战争剧烈，于是孙子的学说应运而生，他手著的十三篇，所谈的是军事上最高深的学理。这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。到了战国时代，竞争更激烈，孙子的学说已经成了普通常识。于是孟子的学说，又应运而生，发明了心理战争的原则，说道："可使制挺，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。"无奈这种理论太高深了，一般人都不了解，以为世间哪有这类的事！哪知孟子死后，未及百年，陈涉揭竿而起，立把强秦推倒，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，岂非很奇的事吗？

现在全世界兵争不已，识者都认为非到世界大同，人民是不能安定的。战国时情形也是这样，所以梁襄王问："天下恶乎定？"孟子对曰："定于一。"也认为：非统一是不能安定的。然则用何种方法来统一呢？现今的人，总是主张武力统一，而孟子的学说则恰恰相反。梁襄王问："孰能一之？"孟子曰："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"主张武力统一者，正是用杀字来统一，孟子的学说，岂非又是极迂腐的怪话吗？后来秦始皇并吞六国，算是用武力把天下统一了，迨至汉高入关，除秦苛政，约法三章，从"不嗜杀"三字做去，竟把秦的天下夺了。孟子的学说，又居然实现，岂不更奇吗？楚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，又屠咸阳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绝，其手段之残酷，岂不等于淞沪之役，日本用飞机炸弹任意轰炸吗？岂不等于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种种暴行吗？然而项羽武力统一的

迷梦，终归失败，死在汉高祖手里。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高祖的谋臣，是张良、陈平，他二人是精研厚黑学的，懂得心理战争的学理，应用最高等战术，故把项羽杀死。这是历史上的事实，很可供我们的研究。

秦始皇和楚项羽，纯恃武力，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；汉高祖不嗜杀人，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。生与杀二者，极端相反，然而俱有统一之可能，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凡人皆怕死，你不服从我，我要杀死你，所以杀字可以统一；凡人皆贪生，你如果拥护我，我可以替你谋生路，所以生字也可以统一。孟子说的："不嗜杀人者能一之"，完全是从利害二字立论，律以我的厚黑学，是讲得通的，所以他的学说，能够生效。

当举世战云密布的时候，各弱小国的人民，正在走投无路，不知死所，忽然有一个国家，定出一种大政方针，循着这个方针走去，是谁一的生路，这个国家，岂不等于父母替子弟谋生路吗？难道不受弱小国的人民热烈拥戴吗？孟子说："邻国之民，仰之若父母，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能济者也。"就是基于这种原则生出来的。不过我这种说法，道学先生不承认的，他们认为："孟子的学说，纯是道德化人，若参有利害二字，未免有损孟子学说的价值。"这种说法，我也不敢深辩，只好同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研究研究！

秦始皇、楚项羽，用杀字镇慑人民，汉高祖用生字欲动人民，人之天性，好生而恶死，故秦皇、项羽为人民所厌弃，汉高祖为人民所乐戴。秦项败，而汉独成功，都是势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由此知杀字政策，敌不过生字政策。日本及列强，极力扩张军备，用武力镇压殖民地，是走的秦皇、项羽的途径。大战爆发在即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正在走投无路，我们趁此时机，提倡弱小民族联盟，向他们说道："这是谁一的生路，所谓民族自决也，人种平等也，扫灭帝国主义也，谁有走这条路，才能实现。你们如果跟着列强走，将来大战爆发，还不是第一次大战一样，只有越是增加你们的痛苦的。"我们倡出这种论调，弱小民族还有不欢迎的吗？我们获得弱小民族的同情，把弱联会组织起，以后的办法就很多很多，外交方面，

就进退裕如了。

楚汉相争，项羽百战百胜，其力最强，高祖百战百败，其力最弱，而高祖卒把项羽打败者，他有句名言："吾宁斗智不斗力。"这即是楚汉成败的关键。汉高祖是厚黑界的圣人，他的圣训，我们应该细细研究。日本和欧美列强，极力扩张军备，是为斗力，我们组织世界弱小民族联盟，采用经济战争和心理战争，是为斗智。我们也不是废去武力不用，只是专门研究经济和心理两种战争的方术，辅之以微弱的武力，就足以打倒帝国主义而有余了。

请问：汉高祖斗智，究竟用的甚么法子呢？他从彭城大败而回，问群臣有甚么策略，张良劝他把关以东之地捐与韩信、彭越、黥布三人，信为齐王，越为梁王，黥布为九江王。高祖联合他们，仍是一种联军方式。高祖用主力兵，在荥阳城，与项羽相持，而使信、越等三人。从他方面进攻，项羽遂大困。鸿门议和后，项羽引兵东还，高祖追之，项羽还击，高祖大败，乃用张良之计，把睢阳以北之地划归彭越，陈以东之地划归韩信，于是诸侯之师，会于垓下，才把项羽杀死。由是知：汉高祖所谓斗智者，还不是袭用管厚黑、苏厚黑的故智，起一种联军罢了。

我们从历史上研究，得出一种公例："凡是列国纷争之际，弱国惟一的方法，是纠合众弱国，攻打强国。"任是第一流政治家，如管仲、诸葛武侯诸人，第一流谋臣策士，如张良、陈平诸人，都只有走这一条路，已成了历史上的定例。然而同是用这种法子，其结果则有成有败，其原因安在呢？我们可再加研究。

我们在前面，曾举出五个实例：（一）管仲纠合诸侯，以伐狄，伐戎，伐楚，这是成了功的。（二）乐毅合五国之兵以伐齐，这是成了功的。（三）苏秦联合六国以攻秦，卒之六国为秦所灭，这是失败了的。（四）汉高祖合诸侯之兵以攻项羽，这是成了功的。（五）诸葛亮倡吴蜀联盟之策，诸葛亮和孙权在时，尚能支持曹魏，他二人死后，后人秉承遗策做去，而吴蜀二国，终为司马氏所灭，这也算是失败了的。我们就这五种实例推求成败之原因，又可得出一种公例："各国联盟，中有一国为主干，其余各国为协助者，则成功；各国立于对等对位，不相统属者，则失败。"齐之称霸，是齐

为主干，其他诸侯则为协助；燕之伐齐，燕为主干，其他四国则为协助；汉之灭楚，汉高祖为主干，众诸侯为协助，所以皆能成功。六国联盟，六国不能统属；吴蜀联盟，二国也不相统属，所以俱为敌人所灭。我国组织弱联会，我国当然是主干，当然成功。

现在国际的情形，既与春秋战国相似，我们就应该把春秋时管厚黑的方法和战国时苏厚黑的方法，融合为一而用之，管仲的政策，是尊周攘夷，先揭出尊周的旗帜，一致拥护周天子，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，然后才向外夷攻打，伐狄，伐戎，伐楚，各个击破。苏秦的政策，是合六个弱国，攻打一个强秦。我们可把全世界弱小民族，看作战国时之六国，把英法德美意俄日诸强国，合看为一个强秦，先用管仲的法子，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，拥护中央政府，以整个的中国与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，组织一个联盟会；迨至这种联盟组织成功，即用堂堂之鼓，正正之旗，向列强一致进攻，他们赤白两色帝国主义，自然崩溃。

有人问：中国内部这样的涣散，全国力量，怎能集中起来？我说：我所谓集中者，是思想集中，全国人的心理，走在一条线上，不必定要有何种形式。例如：我李疯子提出“弱小民族联盟”之主张，有人说：这种办法是对的，又有人说不对，大家著些文字，在报章杂志上讨论，结果一致认为不对，则不用说，如一般人认为对，政府也认为对，我们就实行干去。如此，则不言拥护中央政府，自然是拥护中央政府，不言全国力量集中，自然是全国力量集中。所以我们要想统一全国，当先统一全国思想。所谓统一思想者，不是强迫全国人之思想必须走入某一条路，乃是使人人思想独立，从学理上、事势上彻底研究，大家公认为某一条路可以走，才谓之思想统一。

有人难我道：你会讲厚黑学，联合弱小民族，向列强进攻，难道列强不能讲厚黑学，一齐联合起来，向弱小民族进攻吗？我说：这是不足虑的，证以过去的历史，他们这种联合，是不能成功的。

战国时，六国联盟，有人批评他：“连鸡不能俱飞。”六国之失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列强想联合起来，对付弱小民族，恰犯了连鸡不能俱飞之弊。语曰：“蛇无头而不行。”列强不相统属，寻不出首领，是谓无头之蛇。我们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我国是天然

的首领，是谓有头之蛇。列强与列强，利害冲突，矛盾之点太多，步调断不能一致，要联合，是联合不起的。弱小民族，利害共同，彼此之间，寻不出丝毫冲突之点，一经联合，团体一定很坚固。

前次大战，列强许殖民地许多权利，战后食言，不惟所许利益不能得，反增加许多痛苦。殖民地含恨在心，如果大战重开，断难得殖民地之赞助，且或乘机独立，这是列强所深虑的。日本精研厚黑学，窥破此点，所以九一八之役，悍然不顾，硬以第二次大战相威胁，列强相顾失色。就中英国殖民地更宽，怕得更厉害，因此国联只好牺牲我国的满州，任凭日本为所欲为。德国窥破此点，乘机撕毁和约，英法也无如之何。墨索里尼窥破此点，以武力压迫阿比西尼亚，英国也无如之何。其惟一之方法，无非是以第二次大战相威胁而已，无非是实厚黑学而已。

世界列强，大讲真厚黑学，看这个趋势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断不能避免的。战争结果，无论谁胜谁负，弱小民族总是供他们牺牲的。我们应该应用厚黑哲理，趁大战将发未发之际，赶急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，乘机予列强一种威胁，这个大战，与其由列强造成，弱小民族居于被动动地位，毋宁由弱小民族造成，使列强居于被动地位。明明白白告诉列强道："你不接受我们弱小民族的要求，我们就把第二次大战与你们造起来。"请问世界弱小民族，哪个敢谈这个话呢？这恐怕除了我中华民国，再莫有第二个。请问我中国怎敢谈这类强硬话呢？则非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为后盾不可。

从前陈涉起事，曾经说过："逃走也死，起事也死，同是一死，不如起事好了。"弱小民族今日所处地位，恰与陈涉相同，大战所以迟迟未发者，由于列强内部尚未准备完好，我们与其坐受宰割，毋宁先发制人，约集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死中求生。不然他们准备好了，大战一开，弱小民族就永无翻身之日了。

全世界已划为两大战线，一为压迫者，一为被压迫者，孙中山讲民族主义，已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，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对二万万五千万人作战，无奈……日本人口，除去台湾、高丽而外，全国约计六千万，也辜负孙中山之期望，变为明火劫抢之恶贼。所以我们应当秉承孙中山遗教，纠集被压迫之十

万万四千万人，向赤白两色帝国主义四万万六千万人作战，才算顺应进化之趋势。现在这伙强盗，互相火并，乃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同时起事的好机会，我们平日练习的厚黑本事，正好拿出来行使，以大厚黑破他的小厚黑。不然，第二次大战：仍是列强与列强作战，弱小民族，牵入漩涡，受无谓之牺牲，岂不违反中山遗训吗？岂不违反进化公例吗？

我讲厚黑学，分三步工夫，诸君想还记得。第一步：面皮之厚，厚如城墙；心子之黑，黑如煤炭。第二步；厚而硬，黑而亮。第三步：厚而无形，黑而无色。日本对于我国，时而用劫贼式，武力侵夺，时而用娼妓式，大谈亲善，狼之毒，狐之媚，二者俱备。所谓厚如城墙，黑如煤炭，他是做到了的，厚而硬，也是做到了的，惟有黑而亮的工夫，他却毫未梦见。曹操是著名的黑心子，而招牌则透亮，天下豪俊奔集其门，明知其为绝世奸雄，而处处觉得可爱，令人佩服。日本则“心子与招牌同黑”，成了世界公敌，如蛇蝎一般，任何人看见，都喊“打！打！”所以日本人的厚黑学越讲得好，将来失败越厉害。何以故？黑而不亮故。它只懂得厚黑学的下乘法，不懂上乘法，他同不懂厚黑学的人交手，自然处处获胜，若遇着名手，当然一败涂地。

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向列强攻打，用以消灭赤白两色帝国主义，本是用的黑字诀，然而这种方法，是从威尔逊“民族自决”四字抄袭出来，全世界都欢迎，是之谓黑而亮。闻者必起来争辩道：“威尔逊主义，是和平之福音，是大同主义之初基，岂是面厚心黑的人干得来吗？实行这种主义，尚得谓之厚黑吗？”李疯子闻而叹曰：“然哉！然哉！是谓‘厚而无形，黑而无色’”。

有人难我道：“你主张联合弱小民族，向列强攻打。我请问，一个日本，我国都对付不了，何敢去惹世界列强？日本以武力压迫我国，欧美列强，深抱不平，很同情于我国，我们正该联合他们，去攻打日本，你反要联合世界弱小民族，去攻打列强，这种外交，岂非疯子外交吗？你这类话，前几年说可以，再过若干年后来说也可以，现在这样说，真算是疯子。”我说：我历来都是这样说，不是今日才说，数年前我写有一篇《世界大战：我国应走的途径》，即是

这样说的。四川省立国书馆，存有原印本，可资考证。这个话，前几年该说，现在更该说，再过若干年，也就无须说。你说是疯子外交，这是由于你不懂厚黑学的原故。我讲厚黑学，不是有锯箭法和补锅法吗？我们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了，就应用补锅法中之敲锅法，手执铁锤，向某某诸国说道："信不信，我这一锤敲下去，叫你这锅立即破裂，再想补也补不起！"口中这样说，而手中之铁锤则欲敲下不敲下，这其间有无限妙用。如列强不睬，就略略敲一下，使锅上裂痕增第一点；再不睬，再敲一下。如果日本和列强，要倒行逆施，宰割弱小民族，供他们的欲壑，我们就一锤下去，把裂痕增至无限长纠合全世界被压迫人类，一齐暴动起来，十万万四千万被压迫者，对四万万六千万压迫者作战，而孙中山先生之主张，于是乎实现。但是我们着手之初，则在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把弱联会组织好，然后铁锤在手，操纵自如，在国际上才能平等自由。

敲锅要有艺术，轻不得，重不得。轻了锅上裂痕不能增长，是无益的；敲重了，裂痕太长补不起。要想轻重适宜，非精研厚黑学不可。戏剧中有《补缸》一出，一锤下去，把缸子打得粉碎。这种敲法，未免太不高明。我们在国际上，如果这样干，真所谓疯子外交，岂足以言厚黑学！

我讲厚黑学，曾说："管仲劝齐桓公伐楚，是把锅敲烂了来补。"他那种敲法，是很艺术的，讲到楚之罪名共有二项，一为周天子在上，他敢于称王；二为汉阳诸姬，楚实尽之，这本是彰彰大罪。乃楚遣使问出师理由，桓公使管仲对曰："尔贡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征。"又曰："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"舍去两大罪，而责问此极不要紧之事，岂非滑天下之大稽？昭王渡汉水，船覆而死，与楚何关？况且事隔数百年，更是毫无理由。管子为天下才，这是他亲自答复的，难道莫得斟酌吗？他是厚黑名家，用补锅法之初，已留锯前法地步。假令把楚国真实罪状宣布出来，叫他把王号削去，把汉阳诸姬的地方退出来，楚国岂不与齐排命血战吗？你想长勺之役，齐国连鲁国这种弱国都战不过，他敢与楚国打硬战吗？只好借周天子之招牌，对楚国轻轻敲一下罢了。楚是堂堂大国，管仲不敢伤他的面子，责问昭王不复一事，故意使楚国有

抗辩的余地。楚王可以对臣下说道："他责问二事，某一事，我与他骂转去，骂得他哑口无言，包茅是河边上芦苇一类东西，周天子是我的旧上司，砍几捆送他就是了。"这正是管仲的妙用，口骂无凭，贡包茅有实物表现，齐桓公于是背着包茅，进之周天子，作为楚国归服之实证。古者国之大事惟祀与戎，周天子祭祀的时候，把包茅陈列出来，贴一红纸签，写道："这是楚国贡的包茅"。助祭的诸侯看见，周天子面上岂不光辉光辉？楚国都降伏了，众小国敢有异议吗？我写《厚黑传习录》曾说："召陵一役，以补锅法始，以锯箭法终。"其妙用如是如是。我们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了，就用铁锤在列强的锅上轻轻敲他一下，到达相当时机，就锯箭干了事。到某一时期，再敲一下，箭干出来一截，又锯一截。像这样不断的敲，不断的锯，待到终局，箭头退出来了，轻轻用手拈去，于是乎锯箭法告终，而锅也补起了。

外交上，原是锯箭法、补锅法二者互用，如车之双轮，鸟之双翼，不可偏废。我国外交之失败，其病根在专用补箭法。自五日通商以来，所有外交，无一非锯箭干了事。九一八以后，尤为显著。应该添一个补锅法，才合外交方式。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即是应用补锅法的学理产生出来的。

现在日本人的花样，层出不穷，杀得我国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兵之力，并且欲招架而不能。我们就应该还他一手，揭出"弱小民族联盟"的旗帜。你会讲"大亚细亚主义"，想把中国吞下去，进而侵略亚洲各国，进而窥伺全世界，我们就进"弱小民族联盟"，以中国为主干，而台湾，而琉球，而高丽，而安南、缅甸，而暹罗、印度，而澳洲、非洲一切野蛮民族。日本把一个大亚细亚主义大吹大擂，我们也把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大吹大擂，这才是旗鼓相当，才足以济补锅法之穷。

民国二年，我在某机关任职，后来该机关裁撤，我与同乡陈健人借银五十元，以作归计。他回信说道："我现无钱，好在为数无多，特向某某人转借，凑足五十元，与你送来。"信末附一诗云："五十块钱不为多，借了一扁又一坡，我今专人送与你，格外再送一道歌。"我读了，诗兴勃发，不可遏止，立复一信道："捧读佳作，大发诗

兴。奉和一首，敬步原韵。辞达而已，工拙不论。君如不信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‘厚黑先生手艺多，哪怕甑子滚下坡。讨口就打莲花落，放牛我会唱山歌。”诗既成，余举未已，又作一首：“大风起兮甑滚坡，收拾行李兮回旧窝，安得猛士兮守沙锅。”我出东门，走至右桥赶船，望见江水滔滔，诗兴又来了，又作一首曰：“风萧萧兮江水寒，甑子一去兮不复还。”千古倒甑子的人，闻此歌，定当同声一哭。

近来军政各机关，常常起大风，甑子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滚去，许多朋友，向我叹息道：“安得猛士兮守沙锅。”我说道：我的学问，而今长进了，沙锅无须守，也无须请猛士，只须所你的手杖向对方的沙锅一敲，他的沙锅打破，你的沙锅遂岿然独存。你如果莫得敲破对方沙锅的本事，自己的沙锅断不能保存。

东北四省，被日本占去，国人都有“甑子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感想，见日本在华北华南积极进行，又同声说道：“安得猛士兮守沙锅。”这都是我先年的见解，应当纠正。甑子与沙锅，是一物之二名，日本人想把我国的甑子打破，把里面的饭贮入他的沙锅内，国人只知双手把甑子掩护，真是干的笨事！我们四万万人，每人拿一根打狗棒，向日本的沙锅敲去，包管发生奇效。问：“打狗棒怎样敲法?”曰：组织弱小民族联盟。

我们对于日本，应该取攻势，不该取守势，对于列强，取威胁式，不取乞怜式。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即是对日本取攻势，对列强取威胁式。日本侵略我国，列强抱不平，对我国表同情，难道是怀好意吗？岂真站在公理立场上吗？日本希望的是独占，列强希望的是共管，方式虽不同，其为厚黑则一也。为我国前途计，应该极力联合世界弱小民族，努力促成世界大战，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同齐暴动，把列强的帝国主义打破，即是把列强的沙锅打破，弱小民族的沙锅，才能保存。

威尔逊播下“民族自决”的种子，一天一天的潜滋暗长，现在快要成熟了。我国出来当一个陈涉，振臂一呼，揭出弱小民族联盟的兴。奉和一首，敬步原韵。辞达而已，工拙不论。君如不信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‘厚黑先生手艺多，哪怕甑子滚下坡。讨口就打莲花落，放牛我会唱山歌。”诗既成，余举未已，又作一首：“大风

起兮甑滚坡，收拾行李兮回旧窝，安得猛士兮守沙锅。”我出东门，走至右桥赶船，望见江水滔滔，诗兴又来了，又作一首曰：“风萧萧兮江水寒，甑子一去兮不复还。”千古倒甑子的人，闻此歌，定当同声一哭。

近来军政各机关，常常起大风，甑子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滚去，许多朋友，向我叹息道：“安得猛士兮守沙锅。”我说道：我的学问，而今长进了，沙锅无须守，也无须请猛士，只须所你的手杖向对方的沙锅一敲，他的沙锅打破，你的沙锅遂岿然独存。你如果莫得敲破对方沙锅的本事，自己的沙锅断不能保存。

东北四省，被日本占去，国人都有“甑子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感想，见日本在华北华南积极进行，又同声说道：“安得猛士兮守沙锅。”这都是我先年的见解，应当纠正。甑子与沙锅，是一物之二名，日本人想把我国的甑子打破，把里面的饭贮人他的沙锅内，国人只知双手把甑子掩护，真是干的笨事！我们四万万人，每人拿一根打狗棒，向日本的沙锅敲去，包管发生奇效。问：“打狗棒怎样敲法?”曰：组织弱小民族联盟。

我们对于日本，应该取攻势，不该取守势，对于列强，取威胁式，不取乞怜式。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即是对日本取攻势，对列强取威胁式。日本侵略我国，列强抱不平，对我国表同情，难道是怀好意吗？岂真站在公理立场上吗？日本希望的是独占，列强希望的是共管，方式虽不同，其为厚黑则一也。为我国前途计，应该极力联合世界弱小民族，努力促成世界大战，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同齐暴动，把列强的帝国主义打破，即是把列强的沙锅打破，弱小民族的沙锅，才能保存。

威尔逊播下“民族自决”的种子，一天一天的潜滋暗长，现在快要成熟了。我国出来当一个陈涉，振臂一呼，揭出弱小民族联盟的旗帜，与威尔逊主义遥遥相应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当然闻风响应。嬴秦亡国条件，列强是具备了的，而以日本具备尤多。一般人震于日本和列强之声威，反抗二字，生怕出诸口，这是由于平日不研究厚黑学，才会这样的畏惧。如果把我的《厚黑学》单行本熟读一万通，立即发生一种勇气来，区区日本和列强，何足道哉！他们都是

外强中干，自身内部，矛盾之点太多，譬诸筑墙，基础莫有稳固。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直向墙脚攻打，“弱联”一成功，日本和列强的帝国主义，当然崩溃。

我们联合弱小民族之初，当取甘地不抵抗主义，任他何种压迫俱不管，只埋头干“弱联”的工作，并且加紧工作，哪有闲心同他开战？等到“弱联”组织成功了，任何不平等条约，撕了即是，到了那时，他们敢于不接受我们的要求，就纠合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同时动作，以武力解决，由我国当主帅，指挥作战，把苏秦的老法子拿来行使，“秦攻一国，五国出兵助之，或出兵挠秦之后”。像这样干去，赤白两色帝国主义，哪有不崩溃之理！以英国言之，他自夸凡是太阳所照之地，都有英国人的国旗，我们的“弱联”组织成功，可以说；凡是太阳所照之地，英国人都有挨打的资格。这样干，才是图谋和平的根本办法。机会一成熟，立把箭头取出，无须再用锯箭法。我们不从此种办法着手，徒悻悻然对日作战，从武力上同他决胜负，真是苏东坡所说的：“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”了，律以我的厚黑哲理，是违反的。日本倡言亲善，如果就同他亲善，事事仰承日本鼻息，不敢反抗，不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更是厚黑界之小丑，够不上谈厚黑哲理。

日本是我国室中之狼，俄国是门前之虎，欧美列强，是宅左宅右之狮豹。日本是我国的仇国，当然无妥协余地，其他列强，为敌为友，尚不能预定，何也？因其尚在门前，尚在宅左宅右也。

威尔逊倡民族自决，想成一个国际联盟，以实现他的主张。哪知一成立，就被列强利用，成为分赃的集团，与威尔逊主义背道而驰。孙中山曾讲过大亚细亚主义，意在为黄种人吐气，哪知日本就想利用这种主张，以送他独霸东亚之野心。所以我们成立弱小民族联盟，首先声明，英美德法意俄日等国永无入会之资格，日本不用说了。我们把英美等国划在会外，也不一定视为敌人，为敌为友，视其行为而定。如能赞助弱联，我们也可视为良友，但只能在会外，不能在会中说话，使他莫得利用操纵之机会。

我们对日抗战，当发挥自力，不能依赖某某强国，请他帮助。就使有时想列强帮助，也不能向他作乞怜语，更不能许以丝毫权

利，只是埋头干“弱小民族联盟”的工作，一眼觑着列强的沙锅，努力攻打。要我不打破你的沙锅，除非帮助我把日本驱出东北四省，恢复九一八以前状况，我们也可以锯箭干了事。因为九一八之变，是国联不能执行任务酿出来的，当然寻国联算帐，当然成一个“弱联”，推翻现在的“国联”。所以对付列强，当如对付横牛，牵着鼻子走，不能同他善说。问：列强的鼻子，怎能受我们的牵？曰努力的联合弱小民族，即是牵列强的鼻子，如列强扭着鼻子不受我们牵，我们就实行把沙锅与他打烂，实现孙中山之主张，十万万四千万被压迫者，对四万万六千万压迫者实行作战，忍一下痛苦，硬把箭头取出，废去锯箭法不用，更是直截了当。我认为这种办法，是我国推一的出路，请全国厚黑同志研究研究。

和平是整个的，现在世界关联密切，一处发生战事，就波动全世界，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。列强殖民地太宽，弱小民族受了威尔逊的宣传，早已蠢蠢欲动，大战争一发生，列强的沙锅就有破裂的危险。这一层，日本和列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。日本自九一八以后，一切事悍然不顾，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，也悍然不顾，都是看清此点，以世界大战相威胁，料定国联不敢动作。果然国联顾忌此点，不敢实行制裁，只好因循敷衍，牺牲弱小民族利益，以饱横暴者之贪囊，暂维目前状况，于是国际联盟，就成为列强的分赃集团。我们看清此点，知道“国联”已经衰朽不适用了，就乘机推翻他，新兴一个“弱联”，以替代“国联”这种机构，催促威尔逊之主张早日实现。这种办法，才适合时代之要求。这种责任，应由我国出来担负，除了我国，其他国家是担负不起的。

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把甘地办法扩大之，改良之，当然发生绝大的效果。印度是亡了国的，甘地是赤手空拳，尚能有那样的成绩。我国是堂堂的独立大国，有强大的战斗力，淞沪之役，已经小小的表现一下，有这样的战斗力，而却不遽然行使，只努力干“弱联”工作，所得效果，当然百倍甘地。这种办法，我想一般厚黑同志，决定赞成的。

我是害了两重病的，一曰疯病，二曰八股病，而我之疯病，是从八股病生出来的。八股家遇着长题目，头绪纷繁，抑或合数章为

一题，其作法，往往取题中一字，或一句，或一章作主，用以贯穿全题。曾国藩者，八股之雄也，其论作文之法曰："万山磅礴，必有主峰，龙衮九章，但挚一领。"斯言也，通于治国，通于厚黑学。我国内政外交，处处棘手，财政军政，纷如乱丝，这就像八股家遇着了合数章书的长题目，头绪纷繁，无从着笔。如果枝枝节节而为之，势必费力不讨好，所以我们解决时局，就该应用八股，寻出问题之中心点，埋头下去，纷乱的时局，自必厘然就绪。我们做这篇八股，应该提出抗日二字为中心点，基于抗日之主张，生出内政外交之办法。内政外交的方针既定了，一切措施，都与这个方针适应，是之谓："万山磅礴，必有主峰，龙衮九章，但挈一领"。我以后所写文字，就本此主张写去，但我从满清末年，就奔走宦场，发明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八股一道，荒废已久，写出的文字，难免不通，希望八股老同志纠正纠正。

科举时代的功令，作八股必遵朱注，试场中片纸不准夹带，应考的人，只好把朱子的《四书集注》读来背得，所以朱子可称为八股界之老祖宗。而他解决时局的办法，是很合八股义法的。他生当南宋，初见宋孝宗即说道："当今之世，要首先认定：金人是我不共戴天之敌，断绝和议，召还使臣，这层决定了，一切事才有办法。一般怀疑的人，都说根本未固，设备未周，进不能图恢复，退不能谋防御，故不得已而暂与金人讲和，以便从容准备，殊不知这话大错了。其所以根本不固，设备不周，进不能攻，退不能守者，正由有讲和之说的原故。一有讲和之说，则进无决死之心，退有迁延之计，其气先馁，而人心送涣然离沮。故讲和之说不罢，天下事无一可成。为今之计，必须闭门绝和，才可激发忠勇之气，才可言恢复。"这是朱子在隆兴元年对孝宗所说的话。他这篇文字，很合现在的题目，我们可以全部抄用。首先认定日本是仇国，使全国人有了公共的目标，然后才能说"对内团结，对外抵抗"的话。我国一般人，对于抗日，本下了最大决心，不过循着外交常轨，口头不能不说说亲善和调整这类话，不知亲善和调整这类名词，是西洋的八股话，对于中国全不适用，其弊害，朱子说得很明白。

国人见国势日危，主张保存国粹，主张读经，这算是从根本上

治疗了。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，我的厚黑学，是从八股出来的，算是根本之根本。我希望各校国文先生，把朱子对孝宗说的这段文字选与学生读，培养点中国八股智识，以便打倒西洋八股。

中国的八股，有甚深的历史，一般文人，涵濡其中，如鱼在水，所以今人文字，以鼻嗅之，大都作八股气，酸溜酸溜的。章太炎文字，韩慕庐一类八股也；严又陵文字，管韫山一类八股也；康有为文字，“十八科闱墨”一类八股也；梁启超文字，“江汉炳灵”一类八股也；鄙人文字，小试场中，截搭题一类八股也；当代文豪，某某诸公，则是《聊斋》上的贾奉雉，得了仙人指点，高中经魁之八股也。“诸君莫笑八股酸，八股越酸越革命。”黄兴、蔡松坡，秀才也；吴稚晖、于右任，举人也；谭延闿；蔡元培，进士翰林也。我所知的同乡同学，几个革命专家，廖绪初举人也；雷铁崖、张列五、谢彗生，秀才也；曹叔实，则是一个屡试不售的童生。猗欤！盛哉！八股之功用大矣哉！满清末年，一伙八股先生，起而排满革命，我甚愿今之爱国志士，把西洋八股一火焚之，返而研究中国的八股，才好与我们的仇国日本奋斗到底。

唐宋八家中，我最喜欢三苏，因为苏氏父子，俱懂得厚黑学。老泉之学，出于申韩。申子之书不传，老泉《嘉右集》，一切议论，极类韩非，文笔之峭厉深刻，亦复相似。老泉喜言兵，他对于孙子也很有研究。东坡之学，是战国纵横者流，熟于人情，明于利害，故辩才无碍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其为文诙诡恣肆，亦与战国策文字相似。子由深于老子，著有《老子解》。明李卓吾有言曰：“解老子者众矣，而子由独高。”子由文汪洋淡泊，在八家中，最为平易。渐于黄老者深，其文回应尔尔。《孔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和《战国策》，可说是古代厚黑学教科书。《老子》一书，包涵厚黑哲理，尤为宏富。诸君如想研究孔子的学说，则孔子所研习的诗经书经易经，不可不熟读；万一想研究厚黑学，只读我的作品，不过等于读孔子的《论语》，必须上读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和《战国策》诸书，如儒家之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诸书，把这些书读熟了，参之以廿五史，和现今东西洋事变，融会贯通，那就有得厚黑博士之希望了。

有人问我：厚黑学三字，宜以何字作对？我说：对以道德经三

字。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的厚黑学，不但字面可以相对，实质上，二者原是相通，于何征之呢？有朱子之言可证。《朱子全书》中有云："老氏之学最忍，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，莫教紧要处，发出来，更教你支格不住，如张子房是也。子房皆老氏是学，如峣关之战，与秦将连和了，忽乘其懈击之。鸿门之约，与项羽讲和了，忽回军杀之。这个便是他卑弱之发处，可畏可畏。他计策不须多，只消两三处如此，高祖之业成矣。"依朱子这样说：老子一部《道德经》，岂不明明是一部厚黑学吗？我在《厚黑丛话》卷二之末，曾说："苏东坡的《留侯论》，全篇是以一个厚字立柱。"朱子则直将子房之黑字揭出，并探本穷源，说是出于老子，其论尤为精到。朱子认为峣关、鸿沟，这些狠心事，是卑弱之发处，足知厚黑二者，原是一贯之事。

厚与黑，是一物体之二面，厚者可以变而为黑，黑者亦可变而为厚。朱子曰："老氏之学最忍。"他以一个忍字，总括厚黑二者。忍于己之谓厚。忍于人之谓黑。忍于己，故闭时虚无卑弱；忍于人，故发出来教你支持不住。张子房替老人取履，跪而纳之，此忍于己也；峣关鸿门，败盟弃约，置人于死，此忍于人也。观此则知厚黑同源，二者可以互相为变。我特告诉读者诸君，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胁肩馅笑，事事要好，你须谨防他变而为黑。你一朝失势，首先坠井下石，即是这类人。又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肆意凌侮，诸多不情，你也不须怨恨，你若一朝得志，他自然会变而为厚，在你面前，事事要好。历史上这类事很多，诸君自去考证。

我发明厚黑学，进一步研究，得出一条定理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有了这条定理，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。水之变化，纯是依力学公例而变化。有时徐徐而流，有物当前，总是避之而行，总是向低处流去，可说是世间卑弱之物，无过于水。有时怒而奔流，排山倒海，任何物不能阻之，阻之则立被摧灭，又可说世间凶悍之物，无过于水。老子的学说，即是基于此种学理生出来的。其言曰："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。"诸君能把这个道理会通，即知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和鄙人的《厚黑学》，是莫得甚么区别的。

忍于已之谓厚，忍于人之谓黑，在人如此，在水亦然。徐徐而

流，避物而行，此忍于己之说也；怒而奔流，人物阻挡之，立被摧灭，此忍于人之说也。避物而行和摧灭人物，现象虽殊，理实一贯，人事与物理相通，心理与力学相通，明乎此，而后可以读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而后可以读李疯子的《厚黑学》。

老子学说，纯是取法于水，《道德经》中，言水者不一而足，如曰："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"又曰："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"水之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，老子深有契于水，故其学说，以力学公例绳之，无不一一吻合。惟其然也，宇宙事事物物，遂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。

老子曰："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"这几句话，简直是他老人家替厚黑学做的赞语。面厚心黑，哪个不知道？哪个不能做？是谓"甚易知，甚易行"。然而"厚黑学"三字，载籍中绝未一见，必待李疯子出来才发明，岂非"天下莫能知"的明证吗？我国受日本和列强的欺凌，管厚黑、苏厚黑的法子俱在，不敢拿来行使，厚黑圣人勾践和刘邦对付敌人的先例俱在，也不一加研究，岂非"天下莫能行"的明证吗？

我发明的厚黑学，是一种独立的科学，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绝不相类，但是会通来看，又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不与厚黑学相通。我所讲一切道理，无一不经别人说过，我也莫有新发明。我在厚黑界的位置，只好等于你们儒家的孔子。孔子祖述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他也莫得甚么新发明。然而严格言之，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，又绝不相类；我之厚黑学，亦如是而已。孔子曰："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"鄙人亦曰："知我者，其惟厚黑学乎！罪我者，其惟厚黑学乎！"

老子也是一个"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"的人，他书中如"建言有之，"如"用兵有言"，如"古所谓"……一类话，都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古书。依朱子的说法，《老子》一书，确是一部厚黑学，而老子的说法，又是古人遗传下来的。可见我发明的厚黑学，真是贯通古今，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

据学者的考证，周秦诸子的学说，无一人不渊源于老子，因此周秦诸子，无一不带点厚黑气味。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，当以老子

为总代表。老子之前，如伊尹，如太公，如管子诸人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都把他列入道家，所以前乎老子和后乎老子者，都脱不了老子的范围。周秦诸子中，最末一人，是韩非子。与非同时，虽有《吕览》一书，但此书是吕不韦的食客纂集的，是一部类书，寻不出主名，故当以韩非为最末一人。非之书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两篇，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解释，呼老子为圣人。他的学问，是直接承述老子的，所以说："刑名原于道德。"由此知周秦诸子，彻始彻终，都是在研究厚黑这种学理，不过莫有发明厚黑这个名词罢了。

韩非之书，对于各家学说俱有批评，足知他于各家学说，都一一研究过，然后才独创一派学说。商鞅言法，申子言术，韩非则合法、术而一之，是周秦时代法家一派之集大成者。据我看来，他实是周秦时代厚黑学之集大成者。不过其时莫得厚黑这个名词，一般批评者，只好说他惨刻少恩罢了。

老子在周秦诸子中，如昆仑山一般，一切山脉，俱从此处发出；韩非则如东海，为众河流之总汇处。老子言厚黑之体，韩非言厚黑之用，其他诸子，则为一支山脉或一支河流，于厚黑哲理，都有发明。

道法两家的学说，根本上原是相通，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，发之则为韩非之惨刻少恩，其中关键，许多人都看不出来。朱子是好学深思的人，独看破此点。他指出张子房之可畏，是他卑弱之发处，算是一针见血之语。卑弱者，敛之之时也，所谓厚也；可畏者，发之之时，所谓黑也。即厚即黑，原不能歧而为二。

道法两家，原是一贯，故史迁修《史记》，以老庄、申、韩合为一传，后世一孔之儒，只知有一个孔子，于诸子学术源流，茫乎不解，至有谓李耳与韩非同传，不伦不类，力诋史迁之失，真是梦中呓语。史迁父子，是道家一派学者，所著《六家要旨》，字字是内行话。史迁论大道则先黄老，老子是他最崇拜的人。他把老子与韩非同列一传，岂是莫得道理吗？还待后人为老子抱不平吗？世人连老子与韩非的关系都不了解，岂足上窥厚黑学？宜乎李厚黑又名李疯子也。

厚黑这个名词，古代莫得，而这种学理，则中外古今，人人郡见得到。有看见全体的，有看见一部分的，有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看得依稀恍惚的，所见形态千差万别。所定的名词，亦遂千差万别。

老子见之，名之曰道德，孔子见之，名之曰仁义，孙子见之，名之曰庙算，韩非见之，名之曰法术，达尔文见之，名之曰竞争，俾斯麦见之，名之曰铁血，马克思见之，名之曰唯物，其信徒威廉氏见之，名之曰生存，其他哲学家，各有所见，各创一名，真所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无一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有人诘问我道：“你主张‘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向列强攻打。’这本是一种正义，你何得呼之为厚黑？”我说：这无须争辩，即如天上有两个亮壳，从东边溜到西边，从西边溜到东边，溜来溜去，昼夜不停。这两个东西，我们中国人呼之为日月，英国人则呼之为Sun为Moon，名词虽不同，其所指之物则一。我们看见英文中之Sun Moon二字，即译为日月二字。读者见了我的厚黑二字，把他译成正义二字可也，即译之为道德二字或仁义二字，也无不可。

周秦诸子，无一人不是研究厚黑学理，惟老子窥见至深，故其言最为玄妙。非有朱子这类好学深思的人，看不出老子的学问。非有张子房这类身有仙骨的人，又得仙人指点，不能把老子的学问用得圆转自如。

周秦诸子，表面上，众喙争鸣，里子上，同是研究厚黑哲理，其学说能否适用，以所含厚黑成分多少为断。《老子》和《韩非》二书，完全是谈厚黑学，所以汉文行黄老之术’，致治为三代下第一；武侯以申、韩之术治蜀，相业为古今所艳称。孙、吴、苏、张，于厚黑哲理，俱精研有得，故孙吴之兵，战胜攻取，苏秦、张仪，出而游说，天下风靡。由是知：凡一种学说，含有厚黑哲理者，施行出来，社会上立即发生重大影响。儒家高谈仁义，仁近于厚，义近于黑，所得者不过近似而已。故用儒术治国，不痒不痛，社会上养成一种大肿病，儒家强为之解曰：“王道无近功。”请问汉文帝在位，不过二十三年，武侯治蜀，亦仅二十年，于短时间收大效，何以会有近功？难道汉文帝是用的霸术吗？诸葛武侯，岂非后儒称为王佐之才吗？究竟是甚么道理？请儒家有以语我来，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，周秦诸子无一不窥见此点。我也不能说儒家莫有窥见，惜乎窥见太少，此其所以“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也。此其所以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也。

老、庄、申、韩，是厚黑学的嫡派。孔、孟是反对派。吾国二千余年以来，除汉之文景、蜀之诸葛武侯、明之张江陵而外，皆是反对派执政，无怪乎治日少而乱日多也。

我深恨厚黑之学不明，把好好一个中国闹得这样糟，所以奋然而起，大声疾呼，以期唤醒世人。每日在报纸上，写厚黑丛话一二段，等于开办一个厚黑学的函授学校。经我这样的努力，果然生了点效。许多人向我说道："我把你所说的道理，证以亲身经历的事项，果然不错。"又有个朋友说道："我把你发明的原则，去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读了几本，觉得处处俱合。"我听见这类话，知道一般人已经有了厚黑常识，程度渐渐增高，我讲的学理，不能不加深点，所以才谈及周秦诸子，见得我发明的厚黑学，不但证以一部二十五史，处处俱合，就证以周秦诸子的学说，也无一不合。读者诸君，尚有志斯学，请细细研究。

教授学生，要用启发式、自修式，最坏的是注入式。我民国元年发表《厚黑学》，只举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刘邦、马司懿几人为例，其余的，叫读者自去搜寻；我写的《厚黑经》和《厚黑传习录》，也只简简单单的举出纲要，不一一详说，恐流于注入式，致减读者自修能力。此次我说：周秦诸子的学说，俱含厚黑哲理，也只能说个大概，让读者自去研究。

诗经、书经、易经、周礼、仪礼等书，是儒门的经典，凡想研究儒学的，这些书不能不熟读。周秦诸子的书，是厚黑学的经典，如不能遍读，可先读《老子》和《韩非子》二书，知道了厚黑的体用，再读诸子之书，自然头头是道。凡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人，开口即是"诗曰、书曰"，鄙人讲厚黑哲理，不时也要说几句"老子曰、韩非曰"。

四书五经，虽是外道的书，苟能用正法眼读之，也可寻出许多厚黑哲理。即如孟子书上的"孩提爱亲"章、"孺子将入井"章，岂非儒家学说的基础吗？鄙人就此两章书，绘出甲乙两图，反成了厚黑学的哲学基础，这是鄙人治厚黑学的秘诀。诸君有志斯学，不妨这样地研究。

厚黑原理

自序一

民国元年，我在成都《公论日报》上发表一文，题日《厚黑学》，谓：古今成功之英雄，无一非面厚心黑者。这本是一种游戏文字，不料自此以后，厚黑学三字，遂传播四川，成一普通名词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心想：此等说法，能受一般人欢迎，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，继续研究下去，始知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，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，然私心终有所疑。追寻中外心理学读书读之，均不足解我之疑，乃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，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，觉得人心之变化，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。从古人事迹上、今日政治上、日用琐事上、自己心坎上、理化数学上、中国古书上、西洋学说上、四面八方，印证起来，处处可通，乃创一臆说：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民国九年，写一文曰《心理与力学》，藏之箧中，未敢发表，十六年方刊入拙著《宗吾臆谈》内。兹特重加整理，扩大为一单行本。

我这《心理与力学》一书，开始于民国九年，今为民国二十七年，历时十八年，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。我研究厚黑学，始于满清末年，可说此书之成，经过三十年之久。记得唐朝贾岛做了两句诗，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。”自己批道：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”我今日发表此书，真有他那种感想。

我的思想，好比一株树；厚黑学是思想之出发点，等于树根；因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：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，等于树身；其他所写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、《考试制度之商榷》、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，与

夫最近所写的《制宪与抗日》等书，都是以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这条臆说为根据，等于树上生出的枝叶花果。故我所写的文，虽种种不同，实是一贯。

去岁遇川大教授福建江超西先生，是专门研究物理的，并且喜欢研究易学，是博通中外的学者。我把稿子全部拿与他看，把所有疑点提出请教。承蒙一一指示，认为我这种说法讲得通，并赐序一篇，我是非常感激。然而我终不敢自信，请阅者不客气的赐教。

我研究这个问题，已经闹得目迷五色，文中种种说法，对与不对，自己无从知道。我重在解释心中疑团：阅者指驳越严，我越是感激，绝不敢答辩一字。诸君赐教的文字，可在任何报章杂志上发表，发表后，请惠赠一份，交成都《华西日报》转交，以便改正。

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，富顺李宗吾，于成都。

自序二

我发表此书后，得着不少的批评，使我获益非浅，至为感谢。除全部赞成和全部否认者外，其有认为大致不差，某某点尚应该改者，我已遵照修改。有些地方，虽经指示，而我认为尚应商酌者，则暂仍其旧，请阅者再加指正。所有赐教文字，请交重庆《国民公报》转交，以便再加修改。

读者常驳我道：“人之心理，变化不测，哪里会有规律?”我说：物理也是变化不测，何以又有规律?今之科学家，研究物理，可谓极精了。我们试取一瓷杯，置之地上，手执一铁锤，请问：此锤击下去，此杯当成若干块?每块形状如何?恐怕聚世界科学家研究之，无一人能预知，所可知者，铁锤击下，此杯必破裂而已。何也?杯子内部分子之构造，无从推测也，我们不能因此就说，物理变化，无有规律。人藏其心，不可测度，与瓷杯之分子相同，所以心理变化，如珠走盘，横斜曲直，不可得知，所可知者，必不出此盘而已。人持弓箭，朝东射，朝西射，我们不能预知，但一射出来，其箭必依抛物线进行，这即是力之规

律。我所谓心理变化有规律可寻者，亦就是也。

我说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，原是一种臆说，不能说是公例。公例者，无一例外之谓也。当初牛顿发明万有引力，定出三例，许多人都不承认，后来逐渐证明，逐渐承认，最后宇宙各种现象，俱合牛顿规律，惟天王星不合，有此例外，仍不能成为公例。直到一千八百四十六年，有某天文家，将天王星合牛顿规律这部分提出，将其不合规律之部分加以研究，断定天王星之外，另有一行星，其形状如何，位置如何，加入此星之引力，天王星即合规律了。此说一发表出来，众天文家，依其说以搜求之，立把海王星寻出，果然丝毫不差错，牛顿之说，乃成为公例。心理之变化，较物理更复杂，更奇妙。我之说法，不为一般人所承认者，因为例外之事太多也。我不认为我之臆说有错，而认为人心中之海主星太多。我们亦能只握着大原则，以搜求各人心中之海王星耳。

有人说：你想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，从前许多人都做过这种工作，无奈这条路走不通。我说：苏彝士运河，从前许多人都说凿不通，卒之凿通。巴拿马运河，许多人都说凿不通，卒之也凿通。我认为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，物理上之规律，必可适用于人事，不过我个人学识不够，不能把他沟通为一罢了。学术者，世界公物，当合全世界研究之，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也。尚望读者诸君共同研究，如我这种方式走不通，希望读者另用他种方式把他弄通。我研究这个问题，如坠五里雾中，诸君其亦怜我之愚，而有以教之乎！

物理纷繁极矣，牛顿寻出规律，纷繁之物理，厘然就诸，而科学因之大进步。世界纷乱极矣，我们在人事上如能寻出规律，则世界学说，可归一致，人世之纠纷，可以免除，而文明自必大进步。此著者所为希望诸君共同研究者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八日，李宗吾，于陪都。

一 性灵与磁电

科学上许多定理，最初都是一种假设，根据这种假设，从各方试验，都是合的，这假设就成为定理了。即如地球这个东西，自开辟以来就有的，经过了若干万万年，人民生息其上，视为固然，于地球之构成，不求甚解，距今二三百年前，出了一个牛顿，发明万有引力，说："地心有引力，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，成为一个地球。"究竟地心有无引力，无人看见，牛顿这个说法，本是假定的。不过根据他的说法，任如何试验，俱是合的，于是他的假说，就成了定理。从此一般人都知道：凡是有形有体之物，都要受引力韵吸引。到爱因斯坦出来，发明相对论，把牛顿之说扩大之，说："太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，经过其他星球，也要受其吸引，由于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，于是以直线进行之光线，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。"这也是一种假说，然经过实地测验，证明不错，也成了定理。从此一般人又知道：有形无体之光线，也要受引力之吸引。我们研究心理学，何妨把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，说："我们的心中，也有一种引力，能把耳闻目睹，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，心之构成，与地球之构成相似。"我们这样的设想，则牛顿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，而人事上一切变化，就可本力学规律去考察他了。

通常所称的心，是由于一种力，经过五官出去，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，集合而成的。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，我注目视之，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，与那个物连结。我将目一闭，能够回忆那物的形状，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。由于这种方式，把耳闻目睹，与夫身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，集合为一团，就成为一个心，所以心之构成，与地球之构成，完全相似。

一般人都说：自己有一个心，佛氏出来，力辟此说，说：人莫得心，通常所谓心，是假的，乃是六尘的影子。圆觉经曰："一切众生，

无始以来，种种颠倒，妄认四大，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，为自心相。”我们试思：假使心中莫得引力，则六尘影子之经过，亦如雁过长空，影落湖心一般，雁一去，影即不留了。而我们见雁之过，能记忆雁之影相者，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，能把雁影缩住的原故。

佛家说：“六尘影子，落在八识田中，成为种子，永不能去。”这正如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，成为种子一般。我们知：谷子豆子，落在田土中，是由于地心有引力，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，是由于人心有引力。因为有引力缩住，所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，永不能去，六尘影子，落在八识田中，也永不能去。

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——考察其来源，即知无一不从外面进来，其经过路线，不外眼耳鼻舌身，虽说人能发明新理，然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，犹之修房子者，必须购买外面的砖瓦木料，才能建筑新房子一样。我们如把心中各种知识的来源，一一清出来，从目进来者，仍令从目退出去，从耳进来者，仍令从耳退出去，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，此心即空无所有了。人的心，果然能够空无所有，对于外物无贪恋，无嗔恨，有如湖心雁影，过而不留，这即是佛家所说，还我本来面目。

地球之构成，源于引力，意识之构成，源于种子。试由引力再进一步，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，由种子再进一步，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，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，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。由寂兮寥兮生出引力，而后有地球，而后有物。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，而后有意识，而后有人。我们这样的研究，觉得心之构成，与地球之构成相似，而物理学的规律，就可适用于人事了。

我们把物体加以分析，就得原子，把原子加以分析，就得电子。电子是一种力，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。人是物中之一，我们的身体，是电子集合而成，身与心本是一物，所以我们的心理，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，不能逃力学的规律。

心的现象，与磁电的现象，是很相似的。人有七情，大别之，只有好恶二种，心所好的东西，就引之使近，心所恶的东西，就推之使远，这种现象，岂不与磁电相似吗？

人的心，分知、情、意三者，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，其元素只有

知、情二者。磁电同性相推，异性相引，其相推相引，有似吾人之情，其能够判别同性异性，更是显然有知，足见磁电这个东西，具有知、情，与人之心理相同。

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，忽然来了一个阳电，要分他的阴电，他当然要把他推开；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，忽然来了一个阴电，要分他的阳电，他当然也要把他推开。这就像小孩食乳食糕饼的时候，见哥哥来了，用手推他打他一般，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。至于碰电异性相引，犹如人类男女相爱，更是不待说的。由此知磁电现象，与心理现象，完全相同。

佛说："真佛法身，映物现形。"宛然碰电感应现象。又说："性灵本融，周遍法界。"宛然碰电中和现象。又说："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"简直是物理学家所说："能力不灭"。因此之故，我们用力学规律去考察人性，想来不会错。

物质不灭，能力不灭，是科学上之定律。吾身之物质，是从地球之物质转变而来，身死埋之地中，物质退还地球。物质不灭之说，算是讲得通，独是吾人之性灵，是一种能力，请问此种能力，生从何处来？死往何处去？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。可以创一臆说，曰："人之性灵从地球之磁电转变而来。"吾人一死，身体化为地球之泥土，同时性灵化为地球之磁电，如此则性灵生有自来，死有所去，能力不灭之说，就讲得通了。世言成仙成佛者，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，能将磁电凝聚不散耳。俗云"冤魂不散"，当是一种嗔恨心，将磁电凝住，迨至冤仇已报，嗔恨心消失，磁电无从凝聚，其鬼即归消灭。

有了"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"这条臆说，则灵魂存灭问题，就可以答复了。吾人一死，身上的物质，退还地球，性灵化为磁电，则灵魂即算消灭。然而吾身虽死，物质尚存，磁电尚存，亦可谓之灵魂尚存。此庄子所说："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"也。

禅家最重"了了常知"四字，吾人静中，此心明明白白，迨至事务纷乘，此明明白白之心，消归乌有。学力深者，事务纷乘，此心仍明明白白，是谓"动静如一。"然而白昼虽明明白白，晚间梦寐中，则复昏迷。学力更深者，梦寐中亦明明白白，是谓"寤寐如一"。学力极深者，死了亦明明白白，是谓"死生如一"。到了死后明明白白，则谓之灵魂

永存可也。

楞严经曰："如来从卐字，涌出宝光，其光昱昱，有千百色，十方微尘，普佛世界，一时周通。"此宝光，盖即电光也。阿难白佛言："我见如来，三十二相，胜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。尝自思惟，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何以故？欲气粗浊，腥臊交道，脓血杂乱，不能发生胜净炒明，紫金光聚。"释迦修养功深，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凝聚体，故能发出宝光，遍达十方世界。佛氏有天眼通、天耳通之说，今者无线电发明，已可证明其非诬。释迦本身即是一无线电台，将来电学进步，必能证明释迦所说——不虚，而"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"之臆说，或亦可证明其不虚。

老子言道，屡以水为喻，佛氏说法，亦常以水为喻，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，所谓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无古今、无边际、无内外，种种现象，空气是具备了的。倘进一步，以中和磁电为喻，尤为确切。若更进一步，假定："人之性灵，由磁电转变而来。"用以读老佛之书，觉得处处迎刃而解。

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，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，实则人与物，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，身体之原素，无一非地球之物质。自地球视之，人与物并无区别，仿佛父母生二子，长子曰人，次子曰物，不过长子聪明，次子患瘫病而又哑聋罢了。我们试验理化，温度变更，或参入一种物品，形状和性质都要改变。吾人遇天气大变，心中就烦躁，这是温度的关系；饮了酒，性情也会改变，这是参入一种药品，起了化学作用。从此等处考察，人与物有何区别？

人身的物质，和地球的物质，都是电子构成的，吾人有灵魂，地球亦有灵魂，磁电者地球之灵魂也，通常所说地心吸力者，即是磁电吸力之表现。地球的物质化为植物，同时地球的磁电，即变为植物的生机。吾人食植物，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，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。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，变而为毛发骨肉，愈变愈高等。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，变而为吾人的性灵，也是愈变愈高等。虽经屡变，而本来之性质仍在，故吾身之原素，与地球之原素相同，心理之感应，与磁场之感应相同，所以本书第二章甲乙丙图，其现象与磁场相同，与地心吸力相同。然既经屡变，吾身之毛发骨肉，与地球之泥土沙

石不同，吾人之性灵，也与地球之磁电不同，何也？在地球为死物，在吾身则为活物也。所以用力学规律以考察人事，我们当活用之，而不能死用之。

老子曰："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未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"老子所谓道，即释氏所谓真如也。释氏谓：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内身外器，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，变现出来的，其说与老子正同。真如者，空无所有也（实则非空非不空）。忽焉真如不守自性，而变现为中和磁电，由是而变现为气体，回旋太空中，几经转变，而地球生焉。由是而生植物，生动物，生人类。佛氏所谓阿赖耶识的状态，与中和磁电的状态绝肖。二者都是冲漠无朕，万象森然，也即是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我们可以说：真如变现出来，在物为中和磁电，在人为阿赖耶识，犹之同一物质，在地球为泥土沙石，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也。今人每谓人之性灵，与磁电迥不相同，犹之无科学知识之人，见毛发骨肉，即认泥土沙石，迥不相同也。中和磁电，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之物，真如不可得见，我们读佛、老之书，姑以中和磁电，作为道与真如形态，觉得处处可通。

老子著书，开端即曰："道可道，非常道。"释迦说法四十九年，结果自认未说一字，归之于不可回，不可说而已。苏子由曰："夫道不可言，可言皆其似者也，达者因似以识真，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。"道与真如，不可思议者也，阿赖耶识，与中和磁电，可思议者也，借可思议者，以说明不可思议者，此所谓言其似也。

老子曰："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"我们可解之曰，道者空无所有也，一者中和磁电也，中和磁电发动出来，则有相推相引两作用，所谓二也。由这两种作用，生出第三种作用，由是而辗转相生，千千万万之事物出焉。老子曰："抱一以为天下式。"又曰："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，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。"一也，母也，都是指中和磁电，在人则为阿赖耶识。故曰："恍兮惚兮，窈兮冥兮。"又曰："渊兮似万物之宗。"老子专守阿赖耶识，故著出之书，可以贯通周秦诸子，可以贯通赵宋诸儒，可以贯通易经，贯通佛学，又为后世神仙方士所依托，据严又陵批，又可以贯通西洋学说（其说具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）。《道德经》一书之无所不包者，

正因阿赖耶识之无所不有也。佛氏则打破此说，而为大圆镜智，以“空无所有”为立足点。此由于佛氏立教，重在出世，故以“空无所有”为立足点。老子立教，重在将人世出世打成一片，故以阿赖耶识为立足点。由阿赖耶识而向内追寻，则可到大圆镜智，而空诸所有。由阿赖耶识而向外工作，则可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平天下。此二氏立足点，所由不同也。

我们假定“人之性灵，由磁电转变而来”，则佛告波斯匿王及阿难诸语，与夫宋儒所谓“如鱼在水，外面水便是肚里水，鳜鱼肚里水，与鲤鱼肚里水，只是一样”，明儒所谓“盖天地皆心也”等等说法，都可不烦言而解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喜怒哀乐皆不发，谓之中。”六祖曰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”广成子曰：“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，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”庄子曰：“心不忧乐，德之至也，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。”都是阿赖耶识现象，也即是磁电中和现象，中和磁电，发动出来，呈相推相引之作用，而纷纷坛坛之事物起矣。所以我们要研究人世事变，当首造一臆说曰：“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。”研究磁电，离不得力学，我们再造一臆说曰：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有这两个臆说，纷纷纭纭之事物，就有轨道可循，而世界纷歧之学说，可汇归为一，中、西、印三方学说，也可汇归为一。

佛氏谓：山河大地及人世一切事物，皆是幻相，牛顿造出三例，所以研究物理之幻相也；我们造出两个臆说，所以研究人事之幻相也。本章所说种种，乃是说明造此臆说之理由。第二章以下，即依据这两个臆说，说明人世事变，不复涉及本体。佛言本体，我们言现象，鸿沟为界。著者对于佛学及科学，根本是外行。所有种种说法，都是想当然耳，心中有了此种想法，即把他写出，自知纯出臆断，以佛学科学律之，当然诸多不合，我不过姑妄言之，读者亦姑妄听之可耳。

二 孟荀言性争点

孟子之性善说，荀子之性恶说，是我国学术史上，未曾解除之悬案，两说对峙了二千多年，抗不相下。孟子说：人性皆善，主张仁义化民；宋儒承袭其说，开出理学一派，创出不少迂廖的议论。荀子生在孟子之后，反对其说，谓人之性恶，主张以礼制裁之；他的学生韩非，以为礼之制裁力弱，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强，遂变而为刑名之学，其弊流于刻薄寡恩。于是儒法两家，互相诋斥，学说上、政治上生出许多冲突。究竟孟、荀两说，孰得孰失？我们非把他彻底研究清楚不可。

孟子谓："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"这个说法，是有破绽的。我们任喊一个当母亲的，把他亲生孩子抱出来，当众试验：母亲抱着他吃饭，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，如不提防，就会落地打烂。请问这种现象，是否爱亲？又母亲手中拿一糕饼，他见了，就伸手来拖，如不给他，放在自己口中，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，放在他的口中。又请问这种现象，是否爱亲？小孩在母亲怀中，食乳食糕饼，哥哥走近前，他就用手推他打他。请问这种现象，是否敬兄？五洲万国的小孩，无一不如此。事实上，既有了这种现象，孟子的性善说，岂非显有破绽；所有基于性善说发出的议论，订出的法令制度，就不少流弊。

然则孟子所说"孩提爱亲，少长敬兄"，究竟从甚么地方生出来？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，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。盖人之天性，以我为本位，我与母亲相对，小儿只知有我，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，放在自己口中。母亲是乳哺我的人，哥哥是分乳吃，分糕饼吃的人，母亲与哥哥相对，小儿就很爱母亲，把哥哥打开推开。长大了点，出而在外，与邻人相遇，哥哥与邻人相对，小儿就很爱哥哥。走到异乡，邻人与异乡人相对，则爱邻人。走到外省，本省人与外省人相对，就爱本省人。走到外国，本国人与外国人相对，就爱本国人。我们细加研究，即知孟子所说爱亲敬兄，都是从为我之心流露出来的。

试绘之为图，如甲：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亲，第三圈是兄，第四

圈是邻人，第五圈是本省人，第六圈是本国人，第七圈是外国人。细玩此圈，即可寻出一定的规律："距我越近，爱情越笃，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。"其规律与地心吸力相似，并且这种现象，很像磁场现象。由此知：人之性灵，与磁电相同，与地心吸力相同，故牛顿所创的公例，可适用于心理学。

上面所绘甲图，是否正确，我们还须再加考验：假如暮春三月，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外游玩，见着山明水秀，心中非常愉快，走到山水粗恶的地方，心中就不免烦闷，这是甚么原故呢？因为山水是物，我也是物，物我本是一体，所以物类好，心中就愉快，物类不好，心中就不愉快。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，见地上许多碎石，碎石之上，落花飘零，我心对于落花，不胜悲感，对于碎石，则不甚注意，这是甚么原故呢？因为石是无生之物，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，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、落花赋，而不作碎石歌、碎石行。古今诗词中，吟咏落花，推为绝唱者，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描写的。假如落花之上，卧一将毙之犬，哀鸣宛转，入耳惊心，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，这是甚么原故呢？因为花是植物，犬与我同是动物，故不知不觉，对于犬表特表同情。又假如归途中见一狰狞恶犬，拦着一人狂噬，那人持杖乱击。当此人犬相争之际，我们只有帮人之忙，断不会帮犬之忙，这是甚么原故呢？因为犬是兽类，我与那人同是人类，故不知不觉，对于人更表同情。我同友人分手归家，刚一进门，便有人跑来报道，先前那个友人，走在街上，同一个人打架，正在难解难分。我闻之立即奔往营救，本来是与人打架，因为友谊的关系，故我只能营救友人，不能营救那人。我把友人带至我的书房，询他打架的原因，我倾耳细听，忽然屋子倒下来，我几步跳出门外，回头转来喊友人道：你还不跑呀？请问一见房子倒下，为甚么不先喊友人跑，必待自己跑出门了，才回头来喊呢？这就是人之天性，以我为本位的证明。

我们把上述事实绘图如（乙）。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友，第三圈是他人，第四圈是犬，第五圈是花，第六圈是石，其规律是"距我越远，爱情越减，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。"与甲图是一样的。乙图所设的境界，与甲图全不相同，而得出的结果，完全一样，足证天然之理，实是如此。兹再总括言之：凡有二物，同时呈于吾前，我心不假安排，自然会以我为本位，视距我之远近，定爱情之厚薄，与地心吸力、电磁吸

力无有区别。

力有离心同心二种，甲图层层向外发展，是离心力现象；乙图层层向内收缩，是向心力现象。孟子站在甲图里面，向外看去，见得凡人的天性，都是孩提爱亲，稍长爱兄，再进则爱邻人，爱本省人，爱本国人，层层放大；如果再放大，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，因断定人之性善。故曰：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"又曰："举斯心，加诸彼。"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。孟子喜言诗，诗是宣导人的意志的，凡人只要习于诗，自然把这种善性发挥出来，这即是孟子立说之本旨。所以甲图可看为孟子之性善图。

荀子站在乙图外面，向内看去，见得凡人的天性，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，看见犬就忘了花，看见人就忘了犬，看见朋友，就忘了他人，层层缩小，及至房子倒下来，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，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，因断定人之性恶。故曰："妻子具而存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，爵禄盈而忠衰于君。"又曰："拘木待隐括蒸矫然后直，钝金待砻厉然后利。"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。荀子喜言礼，礼是范围人的行为的，凡人只要习于礼，这种恶性自然不会发现出来。这就是荀子立说之本旨。故乙图可看为荀子之性恶图。

甲乙二图，本是一样，自孟子荀子眼中看来，就成了性善性恶，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，岂非很奇的事吗？并且有时候，同是一事，孟子看来是善，荀子看来是恶，那就更奇了。例如我听见我的朋友同一个人打架，我总愿我的朋友打胜，请问这种心理是善是恶？

假如我们去问孟子，孟子一定说道：这明明是性善之表现，何以言之呢？友人与他人打架，与你毫无关系，而你之愿其共打胜者，此乃爱友之心，不知不觉，从天性中自然流出，古圣贤明胞物与，无非基于一念之爱而已。所以你这种爱友之心，务须把他扩充起来。

假如我们去问荀子，荀子一定说道：这明明是性恶之表现，何以言之呢？你的朋友是人，他人也是人，你不救他人而救友人，此乃自私之心，不知不觉，从天性中自然流出。威廉第二，造成世界第一次大战，德意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无非起于一念之私而已。所以你这种自私之心，务须把抑制下去。

上面所举，同是一事，而有极端相反之两种说法，两种说法，都是

颠扑不灭，这是甚么道理呢？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，只须绘图一看，就自然明白了。如图：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友，第三圈是他人，请问友字这个圈，是大是小？孟子在里面画一个我字之小圈，与之比较，就说他是大圈。荀子在外面画一个人字之大圈，与之比较，就说他是小圈。若问二人的理由，孟子说：友字这个圈，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，怎么不是大圈？顺着这种趋势，必会越张越大，所以应该扩充之，使他再画大点。荀子说道：友字这个圈，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，怎么不是小圈？顺着这种趋势，必定越收越小，所以应该制止之，不使之再画小。孟、荀之争，如是如是。

营救友人一事，孟子提个我字，与友字相对，说是性善之表现，荀子提个人字，与友字相对，说是性恶之表现。我们绘图观之，友字这个圈，只能说他是个圈，不能说他是大圈，也不能说他是小圈。所以营救友人一事，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，不能说他是善，也不能说他是恶。孟言性善，荀言性恶，乃是一种诡辩，二人生当战国，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，我辈不可不知。

荀子而后，主张性恶者很少。孟子的性善说，在我国很占势力，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。他说："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"这个说法，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。但我们要请问：这章书，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，何以下文只说"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"，"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"，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，是何道理？性善说之有破绽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
怵惕是惊惧之意，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，忽见前面有一人，提一把白亮亮的刀，追杀一人，我们一齐吃惊，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，这即是怵惕。因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，看见刀，仿佛是杀我一般，所以心中会跳，所以会怵惕。我略一审视，晓得不是杀我，是杀别人，登时就把畏死之念放大，化我身为被追之人，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，想救护他，这就是恻隐。由此知：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。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，莫得怵惕，即不会有恻隐，可以说：恻隐二字，仍是发源于我字。

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，共有三物：一曰我，二曰孺子，三曰井，绘之为图，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圃是孺子，第三圈是井。我与孺子，同是人类，井是无生物。见孺子将入井，突有一"死"的现象呈于吾前，所以

会怵惕，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，生出恻隐心，想去救护他。故孟子曰："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"我们须知：怵惕者自己畏死也，恻隐者怜悯他人之死也，故恻隐可谓之仁，怵惕不能谓之仁，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请问此心作何状态？不消说：这刹那间，只有怵惕而无恻隐，只能顾及我之死，不能顾及孺子。非不爱孺子也，变生仓卒，顾不及也。必我身出了危险，神志略定，恻隐心才能发出。惜乎孟子当日，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，留下破绽，遂生出宋儒理学一派，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。

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，所说的怵惕恻隐，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，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，对于第一圈之我，则略而不言。杨子为我，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，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，第二以下各圈，置之不管；墨子摩顶放踵，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，他主张爱无差等，是不分大圈小圈，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。杨子有了小圈，就不管大圈；墨子有了大圈，就不管小圈。他们两家，都不知道：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，层层包裹的。孟、荀二人，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，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，荀子说是层层缩小，就不免流于一偏了。我们取杨子的我字，作为中心点，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，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。

我们综孟荀之说而断之曰：孟子所说"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"一类话，也莫有错，但不能说是性善，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；荀子所说"妻子具而孝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"一类话，也莫有错，但不能说是性恶，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。然则学者奈何？曰：我们知道：人的天性，能够孩提爱亲，稍长敬兄，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之，适用孟子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"的说法。我们又知道：人的天性，能够孝衰于亲，信衰于友，就把这种心理纠正之，适用荀子"拘木待隐括蒸矫然后直，钝金待砻厉然后利"的说法。

孟、荀之争，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之争，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，都不错，都可见诸实用。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，只须创一条公例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"把牛顿的吸力说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应用到心理学上，心理物理，打成一片而研究之，岂不简便而明确吗？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，哓哓然争论不休。

三　宋儒言性误点

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，其时游说之风最盛，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，其游说各国之君，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，不过是口试，不是笔试罢了。一般策士，习于揣摹之术，先用一番工夫，把事理研究透彻了，出而游说，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，只说半面，成为偏激之论，愈偏激则愈新奇，愈足耸人听闻。苏秦说和六国，讲出一个理，风靡天下；张仪解散六国，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，也是风靡天下。孟、荀生当其时，染有此种气习，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，也即是“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。”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，曰性善，其说新奇可喜，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；荀子出来，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，揭而出之曰性恶，又成一种新奇之说，在学术界，又树一帜。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，遂成为对峙之二说。宋儒笃信孟子之说，根本上就误了。然而孟子尚不甚误，宋儒则大误，宋儒言性，完全与孟子违反。

请问：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（1）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”；（2）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，两个根据为出发点，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？兹说明如下：

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，共有三个场所：（1）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一个外人，同在一处，小孩对乎母亲，特别亲爱，这个时候，可以说小孩爱母亲；（2）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，同在一处，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，这个时候，可以说小孩爱母亲；（3）一个小孩，一个母亲，同在一处，发生了利害冲突，例如有一块糕饼，母亲吃了，小孩就莫得吃，母亲把他放在口中。小孩就伸手取来，放在自己口中。这个时候，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。孟子言性善，舍去第三种不说，单说前两种，讲得头头是道。荀子言性恶，舍去前两种不说，单说第三种，也讲得头头是道。所以他二人的学说，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。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齐讲之，又不能把他贯通为一，于是他们的学说，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。

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，忽然发见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，而世间小孩，无一不是如此，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，求其故而不得，遂创一名词曰："气质之性。"假如有人问道：小孩何以会爱亲？曰此"义理之性"也。问：即爱亲矣，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？曰此"气质之性"也。好好一个人性，无端把他剖而为二，因此全部宋学，就荆棘丛生，迂谬百出了……朱子出来，注孟子书上天生烝民一节，简直明明白白说道："程子之说，与孟子殊，以事理考之，程子为密。"他们自家即这样说，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？

孟子知道："凡人有畏死的天性，见孺子将入井，就会发生怵惕心，跟着就会把怵惕心扩大，而为恻隐心，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，推至于四海，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。怵惕是自己畏死，不能谓之仁，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，方能谓之仁，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，只说"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"在孟子本莫有错，不过文字简略，少说了一句"恻隐是从怵惕扩大出来的"。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，见了"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"一句，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，即是恻隐，忘却上面还有怵惕二字，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笔抹杀。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，所谓语录也，文集也，集注也，只是发挥恻隐二字，对于怵惕二字置之不理，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。

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，心想：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，究竟是甚么道理呢？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，见有"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"等语，恍然大悟道：糕饼者物也，从母亲口中夺出者，感于物而动也。于是创出："去物欲"之说，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。

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，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发出来的第一念，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畏死之心，并无所谓恻隐，遂诧异道，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，为甚恻隐之心不出来，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？要说此念是物欲，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，完全从内心发出，这是甚么道理？继而又悟道：畏死之念，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，抢母亲口中糕饼，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，我者人也，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。告其门弟子曰：人之天性，一发出来，即是恻隐，尧、舜和孔、孟诸人，满腔子是恻隐，无时无地不然，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，发出来的第一

念，是畏死之心，不是恻隐之心，此气质之性为之也，人欲蔽之也，你们须用一番“去人欲存天理”的工夫，才可以为孔、孟，为尧、舜。天理者何？恻隐之心是也，即所谓仁也。这种说法，即是程、朱全部学说之主旨。

于是程子门下，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，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，每日在台阶上跑来跑去，练习不动心，以为我不畏死，人欲去尽，天理自然流行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。像他们这样的“去人欲，存天理”，明明是“去怵惕，存恻隐”。试思：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，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，怵惕既无，恻隐何有？我身既无，孺子何有？我既不畏死，就叫我自己入井，也是无妨，见孺子入井，哪里会有恻隐？

程子的门人，专做“去人欲”的工作，即是专做“去怵惕”的工作。门人中有吕原明者，乘轿渡河坠水，从者溺死，他安坐轿中，漠然不动。他是去了怵惕的人，所以见从者溺死，不生恻隐心。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，朱子的好友张南轩、其父张魏公，荷离之战，丧师十数万，终夜鼾声如雷，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。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，所以死人如麻，不生恻隐心。

孟子曰：“同室之人斗者救之，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。”吕原明的从者、张魏公的兵士，岂非同室之人？他们这种举动，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？大凡去了怵惕的人，必流于残忍。杀人不眨眼的恶贼，往往身临刑场，谈笑自若，是其明证。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“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议论。故戴东原曰：宋儒以理杀人。

有人问道：怵惕心不除去，遇着大患临头，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？我说：这却不然，在孟子是有办法的，他的方法，只是集义二字，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，见之真，守之笃，一旦身临大事，义之所在，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。所以说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孟子平日集义，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，并不像宋儒去人欲，平日身蹈危阶，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。孟子不动心，宋儒亦不动心。孟子之不动心，从积极的集义得来；宋儒之不动心，从消极的去欲得来，所走途径，完全相反。

孟子的学说：以我字为出发点，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，内部

都藏有一个我字。其言曰：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"又曰："人人亲其亲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"吾者我也，其者我也，处处不脱我字，孟子因为重视我字，才有"民为贵君为轻"的说法，才有"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"的说法。程子倡"去人欲"的学说，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，所以有"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"的说法。孟子曰："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"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。韩昌黎久里操曰："臣罪当诛兮，天王圣明。"程子极力称赏此语。公然推翻孟子定案，岂非孟门叛徒？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子道统，真百思不解。

孔门学说："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达而达人"，利己利人，合为一事。杨子为我，专讲利己，墨子兼爱，专讲利人。这都是把一个整道理，蒙着半面，只说半面。学术界公例："学说愈偏则愈新奇，愈受人欢迎。"孟子曰："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"孔子死后，未及百年，他讲学的地方，全被杨墨夺去，孟子攘臂而起，力辟杨墨，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。在我们看来，杨子为我，只知自利，墨子兼爱，专门利人，墨子价值，似乎在杨子之上。乃孟子曰"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"，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，认为去儒家为近，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。

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，极端尊重我字，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我。其言曰："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，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"不许他人拔我一毛，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，其说最精，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。然由杨子之说，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，与孔门仁字不合。仁从二人，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。杨子学说，失去人我之关联，故为孟子所斥。

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，其道则为损己利人，与孔门义字不合。义字从羊从我，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；羊者祥也，美善二字皆从羊。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，是之谓义。事在外，择之者我也，故曰义内也。墨子兼爱，知有人不知有我，故孟子深斥之。然墨子之损我，是牺牲我一人，以救济普天下之人，知有众人之我，不知自己之我，此菩萨心肠也。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，不能行之于人人，与孔门中庸之道，人己两利之旨有异，自孟子观之，其说反在杨子之下。何也？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点也。孟子曰："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。"一本

者何？中心点是也。

墨子之损我，是我自愿损之，非他人所得干预也；墨子善守，公输九攻之，墨子九御之，我不欲自损，他人因无如我何也。墨子摩顶放踵，与“腓无胈，胫无毛”之大禹何异？与“栖栖不已，席不暇暖”之孔子向异？孟子之极口诋之者，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。然墨子摩顶放踵，所损者外形也，宋儒去人欲，则损及内心矣，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？孔门之学，推己及人，宋儒亦推己及人，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，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，遂欲天下之妇人，皆饿死以殉夫，我甘诛死以殉君，遂欲天下之臣子，皆诛死以殉君，仁不如墨子，义不如杨子。孟子已斥杨、墨为禽兽矣，使见宋儒，未知作何评语？

综而言之：孟子言性善，宋儒亦言性善，实则宋儒之学说，完全与孟子违反，其区分之点曰：“孟子之学说，不损伤我字，宋儒之学说，损伤我字。”

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，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？去私是怎么一回事？也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。私字的意义，许氏说文、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。韩非原文：“仓颉作书，自环者谓之私，背私谓之公。”环即是圈子，私字古文作厶，篆文作厶，画一个圈。公字从八从厶，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，故八者背也。“背私谓之公”，即是说：把圈子打破了，才谓之公。假使我们只知有我，不顾妻子，环吾身画一个圈，妻子必说我徇私，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，环妻子画一圈；但弟兄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，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，环弟兄画一个圈；但邻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，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，环邻人画一个圈；但国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，于是把邻人这个围撤去，环国人画一个圈；但他国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说我徇私，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，环人类画一个大圈，才可谓之公。但还不能谓之公，假使世界上动植矿物会说话，禽兽一定说：你们人类为甚么要宰杀我们？未免太自私了。草木问禽兽道：你为甚么要吃我们？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问草木道：你为甚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？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：你为甚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？你未免自私。太阳又可问地球道：我牵引你，你为甚么不拢来，时时想向外逃走，并且还暗暗的牵引我？你地球也未免自私。再反过来说，假令太阳

怕地球说它徇私。他不牵引地球，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，也不牵引了，这泥土沙石，立即灰飞而散，地球就立即消灭了。

我们这样的推想，即知道：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，通常所谓公，是画了范围的，范围内人谓之公，范围外人仍谓之私。又可知道：人心之私，通于万有引力，私字之除不去，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，如果除去了，就会无人类，无世界。宋儒去私之说，如何行得通？

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，而私字留着，又未免害人，应当如何处治？应之曰：这是有办法的。人心之私，既是通于万有引力，我们用处治万有引力的法子，处治人心之私就是了。本章（丙）图，与第二章（甲）（乙）两图，大圈小圈，层层包裹，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，厘然秩然。我们应当取法之，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厘然秩然，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，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。

人类相争相夺，出于人心之私；人类相亲相爱，也出于人心之私。阻碍世界进化，固然由于人有私心；却是世界能够进化，也全靠人有私心。由渔佃而游牧，而耕稼，而工商，造成种种文明，也全靠人有私心，在暗中鼓荡。我们对于私字，应当把他当如磁电一般，熟考其性质，因而利用之，不能徒用铲除的法子。假使物理学家，因为电气能杀人，朝朝日日，只研究除去电气的法子，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？私字之不可去，等于地心吸力之不可去，我们只好承认其私，使人人各遂其私，你不妨害我之私，我不妨害你之私，这可说是私到极点，也即是公到极点。有人问：人性是善是恶？应之曰：请问地心吸力是善是恶？请问电气是善是恶？你把这个问题答复了再说。

孟子全部学说，乃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，扩而充之，层层放大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他不主张除去利己之私，只主张我与人同遂其私：我有好货之私，则使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粮；我有好色之私，则使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宋儒之学，恰与相反，不惟欲除去一己之私，且欲除去众人之私，无如人心之私，通于万有引力，欲去之而卒不可去，而天下从此纷纷矣。读孟子之书，蔼然如春风之生物；读宋儒之书，凛然如秋霜之杀物。故曰：宋儒学说，完全与孟子违反。

四　告子言性正确

人性本是无善无恶，也即是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。告子的说法，任从何方面考察，都是合的。他说："性犹湍水也。"湍水之变化，即是力之变化。我们说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"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，早用"性犹湍水也"五字把他包括尽了。

告子曰："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"意即曰：导之以善则善，诱之以恶则恶。此等说法，即是《大学》上"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，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"的说法。孟子之驳论，乃是一种诡辩，宋儒不悟其非，力诋告子。请问《大学》数语，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？孟子书上，有"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"之语，宋儒极口称道，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，但是《大学》于尧、舜、桀、纣数语下，却续之曰："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"请问，民之天性，如果只好懿德。则桀、纣率之以暴，是为反其所好，宜乎民之不从了，今既从之，岂不成了"民之秉夷，好是恶德"？宋儒力诋告子，而于《大学》之不予驳正，岂足服人？

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，独性善二字，理论未圆满。宋儒之伟大处，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，以释氏之法治心，以孔氏之法治世，入世出世，打成一片，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，是千古不磨之功绩（其详具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一书）。宋儒能建此种功绩，当然窥见了真理，告子所说，是颠扑不破之真理，何以反极口派之呢？其病根在误信孟子。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？则由韩昌黎启之。

昌黎曰："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。"这本是无稽之谈。此由唐时佛教大行，有衣钵真传之说，我们阅《五灯会元》一书，即知昌黎所处之世，正是此说盛行时代，他是反抗佛教之人，因创此"想当然耳"的说法，意若曰："我们儒家，也有一

种衣钵真传。”不料宋儒信以为真，创出道统五说，自己欲上承孟子；告子、荀子之说，与孟子异，故痛诋之。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，传之子思，转援孟子，故《大学》之言，虽与告子相同，亦不驳正。

昌黎为文，喜欢戛戛独造。伊川曰：“轲之死不得其传，似此言语，非是蹈袭前人，又非凿空撰得，必有所见。”即曰：“非是蹈袭前人。”是为无稽之谈。既曰“必有所见”，是为“想当然耳。”昌黎之语，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，宋儒道统之说，根本上发生动摇，所以创出的学说，不少破绽。

程明道立意要寻“孔子传之孟轲”那个东西，初读儒书，茫无所得，求之佛老几十年，仍无所得，返而求之六经，忽然得之。请问明道所得，究竟是甚么东西？我们须知：“人心之构成，与地球之构成相似：地心有引力，能把泥土沙石，有形有体之物，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；人心也有引力，能把耳闻目睹，无形无体之物，吸收来成为一个心。”明道出入儒、释、道三教之中，不知不觉，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，融会贯通，另成一种新理。是为三教的结晶体，是最可宝贵的东西。明道不知为创获的至宝，反举而归诸孔子，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，加以新解，借以发表自己所获之新理，此为宋学全部之真相。宋儒最大功绩在此，其荆棘丛生也在此。

孟子言性善，还举出许多证据，如孩提爱亲，孺子入井等等。宋德则不另寻证据，徒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，满纸天理人欲，人心道心，义理之性，气质之性等名词，闹得人目迷五色，不知所云。我辈读宋元学案，明儒学案诸书，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，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，单看他内容的实质，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，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。

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，合而为一，就合乎宇宙真理了。二说相合，即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。人问：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？我说：孟子曰“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文，有妻子则慕妻子。”荀子曰：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。”二人之说，岂不是一样？孟子曰：“大孝终身慕父母，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据孟子所说：满了五十岁的人，还爱慕父母，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。请问：人性的真相，究竟是怎样？难道孟、荀之说，不能相合？由此知：孟、荀言性

之争点，只在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，至于人性之观察，二人并无不同。

据宋儒的解释，孩提爱亲，是性之正，少壮好色，是形气之私，此等说法，未免流于穿凿。孩提爱亲，非爱亲也，爱其乳哺我也。孩子生下地，即交乳母抚养，则只爱乳母，不爱生母，是其明证。爱乳母与慕少艾，慕妻子，心理原是一贯，无非是为我而已。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，不能说他是善，也不能说他是恶，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，最为合理。告子曰："食、色，性也。"孩提爱亲者，食也；慕少艾、慕妻子者，色也。食、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，求生存者，人类之天性也。故告子又曰："生之谓性。"

告子观察人性，既是这样，则对于人性之处置，又当怎样呢？告子设喻以明之曰："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"又曰："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杏卷也，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杏卷。"告子这种说法，是很对的，人性无善无恶，也即是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。譬如深潭之水，平时水波不兴，看不出何种作用，从东方决一口，可以灌田亩，利行舟，从西方决一口，可以淹禾稼，漂房舍，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。又譬如一块木头，可制为棍棒以打人，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，我们制为碗盏好了。这种说法，真可合孟、荀而一之。

孟子书中，载告子言性者五：曰性犹杞柳也，曰性犹湍水也，曰性之谓性，曰食色性也，曰性无善无不善也，此五者原是一贯的。朱子注食色章曰："告子之辩屡屈，而屡变其说以求胜。"原书俱在，告子之说，始终未变，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。朱子注杞柳章，谓告子言仁义，必待矫揉而后成，其说非是。而注公诸子章，则曰："气质所禀，虽有不善，而不害性之本善，性虽本善，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。"忽又提出矫揉二字，岂非自变其说乎！

朱子注"生子谓性"章说道：杞柳湍水之喻，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，纵横缪戾，纷坛舛错，而此章之误，乃其本根。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，俱是一贯说下，并无所谓"纵横梁戾，纷坛舛错"。"生之谓性"之生字，作生存二字讲。生存为人类重心，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。告子言性，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，由是而有"食色性也"之说，有"性无善无不善"之说，又以杞柳湍水为喻，其说最为精确，而宋儒反认为根本

错误，此朱子之失也。然朱子能认出“生之谓性”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，亦不可谓非特识。

告子不知何许人，有人说是孔门之徒，我看不错。孔子赞周易，说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朱子以生字言性，可说是孔门嫡传。孟子学说，虽与告子微异，而处处仍不脱生字，如云：“寂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”又云：“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，于王何有？”仍以食色二字立论，窃意孟子与合子论性之异同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。孟子曰：“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，二人交谊之深可想。其论性之争辩，也不过朋友切磋，互相质证。宋儒有道统二字，横亘在心，力低告子为异端，而自家之学说，则截去生字立论，叫妇人饿死，以殉其所谓节，叫巨子无罪受死，以殉其所谓忠，孟子有知，当必引告子为同调，而按程朱子门墙之外也。

宋儒崇奉儒家言，力辟释、道二家之言，在《尚书》上寻得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四语，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，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。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，这四句是伪书，作伪者采自荀子，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。阎氏之说，在经学界中，算是已定了的铁案，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，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，反欲借孔子以排老子，借孟子以排荀子，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。朱子曰：“气质所禀，虽有不善，而不害性之本善，性虽本善，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。”请问：所禀既有不善，尚得谓之本善乎？既本善矣，安用矫揉乎？此等说法，真可谓“纵横缪戾，纷坛舛错”。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，明白简易，何啻天渊！

宋儒谓人心为人欲，盖指饮食男女而言，谓道心为天理，盖指爱亲敬兄而言。朱子《中庸章句序》曰：“人莫不有是形，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。”无异于说：当小孩的时候，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；我与孺子同时，将入井，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。假如不是这样，小孩生下地即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，长大来，看见并就会跳下去，世界上还有人类吗？道理本是对的，无奈已侵人荀子范围去了。并且“人生而静”数语，据后儒考证，是文子引老子之语，河间献王把他采入《乐记》的。《文子》一书，有人说是伪书，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

著，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，不但侵人告子荀子范围，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。然则宋儒错了吗？曰不惟莫有错，反是宋儒最大功绩。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，反看不出宇宙真理，惟其极力反对老、荀、告诸人，而实质上乃与诸人融合为一，才足证明老、荀告诸人之学说不错，才足证明宇宙真理实是如此。

朱子《中庸章句序》又曰："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。"主者对仆而言，道心为主，人心为仆；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，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；听命者，仆人职供奔走，惟主人之命是听也。细绎朱子之语，等于说：我想为圣为贤，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，我想吃饭，抑或想及"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"，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，必如此，方可曰："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。"然而未免迂曲难通矣。总之，宇宙真理，人性真相，宋儒是看清楚了的，只因要想承继孟子道统，不得不拥护性善说。一方面要顾真理，一方面要顾孟子，以致触处荆棘，愈解释，愈迂曲难通。我辈厚爱宋儒，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，里面的精义，自然出现。

告子曰："食色性也，仁内也，非外也，义外也，非内也。"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，于食色二字，无一语及之，可见"食色性也"之说，孟子是承认了的。他对齐宣王说道："王如好货，与民同之，于王何有？""王如好色，与民同之，于王何有？"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，只叫他推己及人，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之私。后儒则不然，王阳明传习录曰："无事时，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，逐一追究搜寻出来，定要拨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鼠，一眼看着，一耳听着，才有一念萌动，即与克去，斩钉截铁，不可姑容，与他方便，不可窝藏，不可放他出路，方能扫除廓清。"这种说法，仿佛是：见了火会烧房子，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，立即扑灭，断绝火种，方始为快，律以孟子学说，未免大相径庭了。

传习录又载："一友问：欲于静坐时，将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，扫除廓清，恐是剜肉做疮否？先生正色曰：这是我医人的方子，真是去得人病根。更有大本事人，过了十余年，亦还用得着，你如不用，且放起，不要作坏我的方法。是友愧谢。少间曰：此量非你事，必吾门稍知意思者，为此说以误汝。在坐者惊然。"我们试思：王阳明是极有

涵养的人，平日讲学，任如何问难，总为勤勤恳恳的讲说，何以门人这一问，他就动气，始终未把道理说出？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，是稍知意思者呢？这就很值得研究了。

怵惕与恻隐，同是一物，天理与人欲，也同是一物，犹之烧房子者是火。煮饭者也是火，宋明诸儒，不明此理，把天理人欲看为截然不同之二物。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，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，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，独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作一物，这是他学说的缺点，门人这一问，正击中他的要害，所以就动起气来了。

究竟剜肉做疮四字，怎样讲呢？肉喻天理，疮喻人欲，剜肉做疮者，误天理为人欲，去人欲即伤及天理也。门人的意思，即是说："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，即把他扑灭，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，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？换言之，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，人就不会吃饭，岂不饿死吗？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，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，人类岂不灭绝吗?"这个问法，何等利害！所以阳明无话可答，只好忿然作色。此由阳明沿袭宋儒之说，力辟告子，把"生之谓性"和"食色性也"二语，欠了体会之故。

阳明研究孟、荀两家学说，也未彻底。传习录载阳明之言曰："孟子从源头上说来，荀子从流弊上说来。"我们试拿孟子所说"怵惕恻隐"四字来研究，由怵惕而生出恻隐，怵惕是"为我"之念，恻隐是"为人"之念，"为我"扩大，则为"为人"。怵惕是源，恻隐是流。荀子学说，从为我二字发出，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。荀子所说，是否流弊，姑不深论，怵惕之上，是否尚有源头，我们也不必深考，惟孟子所说恻隐二字，确非源头。阳明说出这类话，也是由于读孟子书，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的原故。

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，到了晚年，他的说法，又不同了。《龙溪语录》载，钱绪山谓"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"四语，是师门定本。王龙溪谓："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，亦即是无善无恶之意，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，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。"时阳明出征广西，晚坐天泉桥上，二人因质之。阳明曰：汝中（龙溪字）所见，我久欲发，恐人信不及，徒增躐等之

弊，故含蓄到今，此是傅心秘藏，颜子问道所不敢言。今既说破，亦是天机该发泄时，岂容复秘！阳明至洪都，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，阳明曰："吾有向上一机，久未敢发，以待诸君之自悟，近被王汝中拈出，亦是天机该发泄时。"明年广西平，阳明归，卒于途中。龙溪所说，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，阳明直到晚年，才揭示出来。因此知；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，阳明正色斥之，并非说他错了，乃是恐他躐等。

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之神秀，王龙溪极似慧能。德洪所说，即神秀"时时勤拂拭"之说也，所谓渐也。龙溪所说，即慧能"本来无一物"之说也，所谓顿也。阳明曰："汝中须用德洪工夫，德洪须透汝中本旨，二子之见，止可相取，不可相病。"此顿悟渐修之说也。龙溪语录，所讲的道理，几于《六祖坛经》无异。此由心性之说，惟佛氏讲得最精，故王门弟子，多归佛氏，程门高弟，如谢上蔡、杨龟山诸人，后来也归入佛氏。佛家言性，亦谓之无善无恶，与告子之说同。宇宙真理，只要研究得彻底，彼此虽不相师，而结果是相同的。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，卒之倡出"无善无恶心之体"之语，仍走入告子途径。儒家为维持门户起见，每曰"无善无恶，是为至善"。这又流于诡辩了，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："无善无恶，是为至恶"呢？

有人难我道：告子说："性无善无不善。"阳明说："无善无恶心之体。"一个言性，一个言心之体，何为混为一谈？我说道：性即是心之体，有阳明之言可证。阳明曰："心统性情，性心体也，情心用也，夫体用一源也。知体之所以为用，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。"性即是心之体，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，所以我说：阳明的说法，即是告子的说法。

吾国言性者多矣，以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。以医病喻之，"生之谓性"和"食色性也"二语，是病源，杞柳湍水二喻，是治疗之方。孟、荀、杨、墨、申、韩诸人，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，有喜用热药的，有喜用凉药的，有喜用温补的，药方虽不同，用之得宜，皆可起死回生。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，各种治疗技术俱学会，看病情如何变，施以何种治疗即是了。

治国者，首先用仁义化之，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，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。善心生则恶心消，犹之治水者，疏导下游，自

然不会有横溢之患。然人之天性，又可以为恶，万一感化之而无效，敢于破坏一切，则用申、韩之法严绳之，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。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，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。孟子言性善，是劝人为善；荀子言性恶，是劝人去恶。为善去恶，原是一贯的事，我们会通观之可也。

持性善说者，主张仁义化民；持性恶说者，主张法律绳民。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，但他又说道："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"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，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，不过在讲学方面，想独树一帜，特标性善二字以示异罢了。我们读孟子书，如果除去性善二字，再除去低杨、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，其全部学说，都粹然无疵。

世界学术，分三大支，一中国，二印度，三西洋。最初印度学术，传入中国，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，相推相荡，经过了一千多年，程明道出来，把他打通为一，以释氏之法治心，以孔子之法治世，另成一种新学说，即所谓宋学。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。不料这种学说，刚一成立，而流弊跟着发生，因为明道死后，他的学说，分为两派，一派为程（伊川）、朱，一派为陆、王。明道早死，伊川享高寿，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，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。

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，朱子发见了一个道理，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，只好就《大学》"格物致知"四字解释一番，说我这种说法，是为孔门真传。王阳明发见了一个道理，也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，乃将《大学》"格物致知"四字加一番新解释，说道：朱子解释错了，我的说法，才是孔门真传，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，最好的办法，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，单看他的内容。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，宋明诸儒的意思，都是说：凡人要想为圣为贤，必须先将心地弄好，必须每一动念，即自己考察，善念即存着，恶念即克去，久而久之，心中所存者，就纯是善念了。关于这一层，宋明诸儒的说法，都是同的。惟是念头之起，是善是恶，自己怎能判别呢？在程、朱这一派人说道：你平居无事的时候，每遇一事，就细细研究，把道理融会贯通了，以后任一事来，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。陆、王这一派说道：不须那么麻烦，你平居无事的时候，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如明镜

一般，无纤毫渣滓，以后任一事来，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。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。在我们想来，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，岂不是合程、朱、陆、王而一之？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，各不相下。此正如孟、荀性善性恶之争，于整个道理中，各截半面以立论，即成对峙之两派，是之谓门户之见。

孙中山先生曾说：马克思信徒，进一步研究，发明了“生存为历史重心”的说法，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已有“生之谓性”一语，这是值得研究的。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，合得到告子所说“生之谓性”。达尔文学说，本莫有错，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肉强食，成了无界域之竞争，已经达到生存点了，还竞争不已，驯至欧洲列强，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，以供其无厌之欲壑。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，倡超人主义，谓爱他为奴隶道德，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，因而产出德皇威廉第二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；产出墨索里尼、希特勒和日本军阀，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推原祸始，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。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：“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。”何至有此种流弊？

中国之哲学家不然，告子“食色性也”的说法，孟、荀都是承认了的，荀子主张限制，不用说了，孟子对于食字，只说到不饥不寒，养生丧死无憾为止，对于色字，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，达到生存点，即截然止步，虽即提倡礼义，因之有“衣食足而礼义兴”的说法，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，绝莫有西洋学说的流弊。

欲世界文明，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，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。我国改革经济政治，与夫一切制度，断不能师法欧美各国。即以宪法一端而论，美国宪法，算是制得顶好的了，根本上就有问题。美国制宪之初，有说人性是善的，主张地方分权，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，主张中央集权，两派之争执，经过许久，最终后一派战胜，定为中央集权（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），此乃政争上之战胜，非学理上之战胜，岂足为我国师法？据我们的研究，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，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，制出来的宪法，自地主看之，则为地方分权，自中央看之，则为中央集权，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，自孟子看之，则为性善，自荀子看之，则为性恶。

古今中外，讨论人性者，聚讼纷如，莫衷一是，惟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，证以印度佛氏之说，是合的。他说：“生之谓性。”律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是合的，律以马克思信徒“生存为历史重心”之说，也是合的。至于他说：“一食色性也。”现在的人，正疯狂一般向这二字奔去，更证明他的观察莫有错。我们说：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而告子曰：“性犹湍水也。”水之变化，即是力之变化，我们这条臆说，也逃不出他的范围。性善性恶之争执，是我国二千多年未曾解决之悬案，我们可下一断语曰：告子之说是合理的。

五、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

宇宙之内，由离心向心两力互相作用，才生出万有不齐之事事物物，表面上看去，似乎参差错乱，其实有一定不移之轨道。人与物，造物是用一种大力，同样鼓铸之，故人事与物理相通。离心力与向心力，二者互相为变，所以世上有许多事，我们强之使合，他反转相离，有时纵之使离，他又自行结合了。疯狂的人，想逃走的心，与禁锢的力成正比例，越禁锢得严，越是想逃走，有时不禁锢他，他反不想逃走了。父兄约束子弟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官吏约束百姓，也要明白这个道理。

秦政苛虐，群盗蜂起；文景宽大，民风反转浑朴起来，其间确有规律可寻，并非无因而至。我们手搓泥丸，是增加向心力，越搓越紧，若是紧到极点，即是向心力到了极点，再用大力搓之，泥丸立即破裂，呈一种离心现象。水遇冷则收缩，是向心现象，越冷越收缩，到了摄氏四度，再加冷也呈离心现象，越冷越膨胀，可知离心向心，本是一力之变。比方我们持一针向纸刺去，愈前进距纸愈近，这是向心现象，刺破了纸，仍前进不止，即愈前进距纸愈远，变为离心现象，此针进行之方向，并未改变，却会生出两种现象。因为凡物都有极限，水以摄氏四度为极限，纸以纸面为极限，过了极限，就会生反对的现象，父兄约束子弟，官吏约束百姓，须察知极限点之所在。

由上面之理推去，地球之成毁，也就可知了，地球越冷越收缩，到了极限点，呈反对现象，自行破裂，散为飞灰，迷漫太空，现在的地球，于是告终。又由引力的作用，历若干年，又生出新地球。我们身体上之物质，将来是要由现在这个地球介绍到新地球去的。人身体的物质，世世生生，随力学规律旋转，所以往古来今的人的心理，都是随力学规律旋转。

万物有引力，万物有离力，引力胜过离力，则其物存，离力胜过引力，则其物毁。目前存在之物，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，故有万有引力之说，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，早已消灭，无人看见，所以万有离力一层，无人注意。

地球是现存之物，故把地面外的东西向内部牵引，心是现存之物，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，小儿是求生存之物，故看见外面的东西，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。人类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见有利己之事，即牵引到自己身上去。天然的现象，无一不向内部牵引，地球也，心也，小儿也，人类也，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作用，消归乌有的，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，他那向内部牵引之力，无论如何，是不能除去的，宋儒去私之说，怎能办得到？

人心之私，既不能除去，我们只好承认其私，把人类画为一大圈，使之各遂其私，人人能够生存，世界才能太平。我们人类，当同心协力，把圈外之禽兽草木地球（如本书第三章丙圈）当作敌人，搜取他的宝物，与人类平分，这才是公到极点。也可以说是私到极点。如其不然，徒向人类夺取财货，世界是永不得太平的。

心理之变化，等于水之变化，水可以为云雨，为霜露，为冰雪，为江湖，为河海，时而浪静波恬，时而崩腾澎湃，变化无方，几于不可思议，而科学家以力学规律绳之，无不一一有轨道可循。

人的心理，不外相推相引两种作用，自己觉得有利的事，就引之使近，自己觉得有害的事，就推之使远。人类因为有此心理，所以能够相亲相爱，生出种种福利；又因为有此心理，所以会相争相夺，生出种种惨祸。主持政教的人，当用治水之法，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。得其法，则行船舟，灌田亩，其利无穷，不得其法，则漂房舍，杀人畜，其害也无穷。宋儒不明此理，强分义理之性，气质之性，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

法，无异于说，行船舟，灌田亩之水，其源出于天，出于理，漂房舍杀人畜之水，出于人，出于气。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，天理人气等字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只好说他迂曲难通。

我们细察己心，种种变化，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，狂喜的时候，力线向外发展，恐惧的时候，力线向内收缩。遇意外事变，欲朝东，东方有阻，欲朝西，西方有碍，力线转折无定，心中就呈慌乱之状。对于某种学说，如果承认他，自必引而受之，如果否认他，自必推而去之，遇一种学说，似有理，似无理，引受不可，推去不能，就成孤疑态度。

我心推究事理，依直线进行之例，一直前进，推至甲处，理不可通，即折向乙处，又不可通，即折向丙处，此心之曲折，与流水之迂回相似。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，虽是迂回百折，仍不外力学规律。我们的心，也是如此。此外尚有种种现象，细究之，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。有时潜心静坐，万缘寂灭，无推引者，亦无被推引者，如万顷深潭，水波不兴，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。此时之心，虽不显何作用，其实千百种作用，都蕴藏在内。人之心理，与磁电相通，电气中和的时候，毫无作用，一作用起来，其变态即不可思议。我们明白磁电的理，人的心理，就可了然了。

水虽是以直线进行，但把他放在器中，它就随器异形，器方则方，器圆则圆，人的心理，也是如此。人有各种嗜欲，其所以不任意发露者，实由于有一种拘束力，把他制住。拘束力各人不同，有受法律的拘束，有受清议的拘束，有受金钱的拘束，有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，有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拘束，种种不同，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，他的嗜欲，立时呈露，如贮水之器，有了罅漏，即向外流出一般。

贪财好色之人，身临巨祸，旁人看得清清楚楚，而本人则茫然不知。因为他的思想感情，依直线进行公例，直线在目的物上，两旁的事物，全不能见。譬如寒士想做官，做了官还嫌小，要做大官，做了大官，还是向前不止；袁世凯做了大总统，还想做皇帝。汉武秦皇，做了皇帝，在中国称尊，还嫌不足，要起兵征伐四夷，四夷平服了，又要想做神仙。这就是人类嗜欲依直线进行的明证。

耶教志在救人，以博爱为主旨，其教条是：“有人批我左颊者，并以右颊献上。”乃新旧教之争，酿成血战惨祸，处置异教徒，有焚烧酷

刑，竟与教旨显背，请问这是甚么道理？法国革命，以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，乃竟杀人如麻，稍有反对的，或形迹可疑的，即加诛戮，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，这又是甚么道理？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，只好求之力学规律。耶稣、卢梭的信徒，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，热情刚烈，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，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。凡信各种主义的人，都可本此公例求之。

凡事即都有变例，如本书乙甲两图，是指常例而言，是指静的现象而言，是指未加外力而言，若以变例言之，则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兄者，则有爱花，爱石，爱山水，而忘其身命者。语云："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"心中加了一个忠字、烈字，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。又云："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"慷慨者，动的现象也，从容者，静的现象也。中日战争，我国许多无名战士，身怀炸弹，见日本坦克车来，即奔卧道上，己身与敌人同尽，彼其人既不为利，复不为名，而有此等举动，其故何哉？孟子曰："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"盖我之外，另有一物，为其视线所注也。耶稣、卢梭信徒，求达目的，忘却信条，吾国志士，求达目的，忘却己身，此其间确有一定的轨道，故老子曰："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"目的可以随时转变，其表现出来者，遂有形形色色之不同，然而终不外力学规律。我们悟得此理，才可以处理事变，才可以教育民众。

人的思想感情，本是以直线进行，但表现出来，却有许多弯弯曲曲、奇奇怪怪的状态，其原因出于人群众多，力线交互错综，相推相引，又加以境地时时变迁，各人立足点不同，观察点不同，所以明明是直线，转变成曲线。例如：我们取一块直线板，放在黑板上，用白墨顺着直线板画一线，此线当然是直线，假使画直线之时，黑板任意移动，结果所画之线，就成为曲线了。我们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到人事上，就可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。

人人有一心，即人人有一力线，各力线俱向外发展，宜乎处处冲突，何以平常时，冲突之事不多见？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：有力与力不相交的，此人做甲事，彼人做乙事，各不相涉。有力与力相消的，例如有人起心，想害某人，旋想他的本事也大，我怕敌他不过，因而中止。有力与力相合的，例如抬轿的人，举步快慢，自然一致。有力与力相需

的，例如卖布的和缝衣匠，有布无人缝，有人缝无布卖，都是不行，相需为用，自然彼此相安。又有大力制止了小力的，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，父母命他作某事，他心中虽是不愿，仍不能不作，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制服了。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，小有违件，能够容忍，因为彼此间的凝结力很大，小小冲突之力，不能表现。诸如此类，我们下细考察，即知人与人相接，力线交互错综，如网一般，有许多线，不惟不冲突，反是相需相成，人类能够维系，以生存于世界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通常的人，彼此之力相等，个个独立，大本事人，其力大，能够把他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来成一个团体，成了团体以后，由合力作用，其力更大，又向外面吸引，越吸引越大，其势力就遍于天下。乐汉党人，明季党人，就是这种现象。如果同时有一人，力量也大，小受他的吸引，并且把自己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成一团体，也是越吸引越大，就成了对峙的两党。宋朝王安石派的新党，司马光派的旧党，是这种现象，程伊川统率的洛党，苏东坡统率的蜀党，也是这种现象，现在各党之对峙，也是这种现象。两党相遇，其力线之轨道，与两人相遇一样。凡当首领的人，贵在把内部冲突之力取消，一致对外，如其不然，他那团体，就会自行解散。有些团体，越受外界压迫，越是坚固，有些一受压迫，即行解体，其原因即在那当首领的人，能否统一内部力线，不关乎外力之大小。

有人说：群众心理，与个人心理不同，个人独居的时候，常有明了的意识，正当的情感，一遇群众动作，身入其中，此种意识情感，即完全消失，随众人之动作为动作。往往有平日温良谦让的人，一入群众之中，忽变而为犷厉嚣张，横不依理的暴徒。又有平日柔懦卑鄙的人，一入群众之中，忽变而为热心公义，牺牲身命的志士。法人黎朋著《群众心理》一书，历举事实，认为群众心理，不能以个人心理解释之，其实不然，我们如果应用力学规律，就可把这个道理说明。

人人有一心，即人人有一力，一人之力，不敌众人之力，群众动作，身入其中，我一己之力，被众人之大力相推相荡，不知不觉，随同动作，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，众人的情感为情感，自己的脑筋，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。因为有这个道理，所以当主帅的人，才能驱千千万万的平民效命疆场，当首领的人，才能指挥许多党徒为杀人放火的暴行。

个人独居的时候，以自己之脑筋为脑筋，群众动作，是以首领之脑筋为脑筋。当首领的人，只要意志坚强，就可指挥如意。史称："李光弼入军，号令一施，旂旗变色。"俗语说："强将手下无弱兵"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水之变化，依力学规律而变化，吾人心理之变化，也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，每每会议场中，平静无事，忽有一人登台演说，慷慨激昂，激情立即奋发，酿成重大事变，此会议场中的众人，犹如深潭的水一般，堤岸一崩，水即汹涌而出，漂房舍，杀人畜，势所不免。年以我们应付群众暴动的方法，要取治水的方法，其法有三：（1）如系堰塘之水，则登高以避之，等他流干了，自然无事；（2）如系有来源之水，则设法截堵，免其横流；（3）或疏通下游，使之向下流去。水之动作，即是力之动作，我们取治水之法，应付群众，断不会错。

两力平衡，才能稳定，万事万物以平为归，水不平则流，物不平则鸣，资本家之对于劳工，帝国主义之对于弱小民族，不平太甚，可断定他终归失败。处顺利之境，心要变危，处忧危之境，又要有一种迈往之气，使发散收缩二力保其平衡，才不失败。达而在上的人，态度要谦逊，穷而在下的人，志气要高亢，不如此则不平。倘若在上又高亢，我们必说他骄傲，在下又廉逊，我们必说他卑鄙。此由我们的心，是一种力结成的，力以平为归，所以我们的心中，藏得有一个平字，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，不过自己习而不察罢了。心中之力，与宇宙之力，是相通的，故我之一心，可以衡量万物，王阳明的学说，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的。

六　人事变化之轨道

我们既说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"，力之变化，可用数学来说明，故心理之变化，也可用数学来说明。力之变化，可绘出图来，寻求他的轨道。一部二十五史，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，我们取历史上的事，本力学规律，把他绘出图来，即知人事纷纷扰扰，皆有一定的轨道。作图之法，例如心中念及某事，即把那作为一个物体。心中念及他，即是心

中发出一根力线，与之连结。心中喜欢他，即是想把他引之使近，如不喜欢，即是想把他推之使远，从这相推相引之中，就可把轨道寻出来。

孙子曰："吴人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共济而遇风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"这是舟将沉下水，吴人越人，都想把舟拖出水来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，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。凡是历史上的事，都可本此法把他绘图研究。

韩信背水阵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是汉兵被陈徐之兵所压迫，前面是大河，是死路，惟有转身去，把陈徐之兵推开，才有一条生路。人人如此想，即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所以乌合之众，可以团结为一。其力线之方向，与韩信相同，所以韩信就坐收成功了。

张耳、陈徐，称为刎颈之交，算是至好的朋友。后来张耳被秦兵围了，求陈徐救之，徐畏秦兵强，不肯往，二人因此结下深仇。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徐方面推去，陈徐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，力线方向相反，所以至好的朋友，会变成仇敌，卒之张耳帮助韩信，把陈徐杀死在氐水之上。

嬴秦之末，天下苦秦苛政，陈涉振臂一呼，山东豪俊，一齐响应，陈涉并未派人去联合，何以会一齐响应呢？这是众人受秦的苛政久了，人人心中，都想把他推开，利害相同，心理相同，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不消联合，自然联合。

刘邦、项羽，起事之初，大家志在灭秦，目的相同，成了合力线，所以异姓之人，可以结为兄弟。后来把秦灭了，目的物已去，现出了一座江山，刘邦想把他抢过来，项羽也想把他抢过来，力线相反，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。

再以高祖与韩彭诸人的关系言之，当项羽称霸的时候，高祖心想：只要把项羽杀死，我就好了。韩、彭诸人也想：只要把项羽杀死，我就好了。思想相同，自然成为合力线，所以垓下会师，立把项羽杀死。项羽既灭，他们君臣，无合力之必要，大家的心思，就趋往权利上去了。但是权利这个东西，你占多了，我就要少占点，我占多了，你就要少占点，力线是冲突的，所以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。

唐太宗取隋，明太祖取元，起事之初，与汉朝一样，事成之后，唐则弟兄相杀，明则功臣族灭，也与汉朝无异。大凡天下平定之后，君臣

力线，就生冲突，君不灭臣，臣就会灭君，看二力之大小，定彼此之存亡。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，庄宗之力，制他不住，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。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破唐，嗣君之力，制他不住，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。这就是刘邦不杀韩、彭诸人的反面文字。

光武平定天下之后，邓禹、耿弇诸人，把兵权交出，闭门读书，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，自己先行走开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，这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，叫他们自家让开，究其实，汉光武、宋太祖的心理，与汉高祖的心理是一样。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，也不能说汉光武、宋太祖度量宽宏，中能说是一种力学公例。

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，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，岳飞想把徽、钦挽之使南，高宗想把徽、钦推之使北，高宗与秦桧，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，岳飞一人之力，不敌高宗、秦桧之合力，故三字冤成，岳飞不得不死。

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，无不遭祸，刘先帝杀张裕，诸葛亮请其罪，先帝曰："芳兰生门，不得不锄。"芳兰何罪？罪在生非其地。赵太祖伐江南，徐铉乞缓师，太祖曰："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。"酣睡何罪？罪在睡非其地。古来还有件奇事：狂矞华士、昆弟二人，上不臣天子，下不友诸侯，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这明明是空谷幽兰，酣睡自家榻上，宜乎可以免祸了；太公至营丘，首先诛之，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，挟爵禄以驱遣豪杰，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，横亘前面，这仍是阻了路线，如何容他得过？太公是圣人，狂矞华士是高士，高士阻了路线，圣人也容他不过，这可说是普通公例了。

逄蒙杀羿，是先生阻了学生之路，吴起杀妻，是妻子阻了丈夫之路，高祖分羹，是父亲阻了儿子之路，乐羊子食羹，是儿子阻了父亲之路，周公诛管蔡，唐太宗诛建成、元吉，是兄阻弟之路、弟阻兄之路。可见力线冲突了，就是父子兄弟夫妇，都不能幸免的。王猛明白这个道理，见了桓温，改仕苻秦；殷浩不然，即遭失败。范蠡明白这个道理，破了吴国，泛舟五湖；文种不然，即被诛戮。此外如韩非国秦，子胥伏剑，嵇康见诛，阮籍免祸，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考一下，又把杀韩非的李斯，杀子胥的夫差，和容忍阮籍、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，考他路线之经过，即知道，或冲突，或不冲突，都有

一定的公例存乎其间。

王安石说："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不足法。"道理本是对的，但他在当日，因这三句话，得了重谤，我们今日读了，也觉得他盛气凌人，心中有点不舒服，假使我们生在当日，未必不与他冲突。陈宏谋说："是非市之于己，毁誉听之于人，得失安之于数。"这三句话的意义，本是与王安石一样，而我们读了，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。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路上，凡有"天变"、"人言"、"祖宗"从路上经过，都被他拒绝转去。陈宏谋是把己字、人字、数字，列为三根平行线，彼此不相冲突。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，不知不觉，置身"人言不足恤"那个人字中，听了陈宏谋的话，不知不觉，置身"毁誉听之于人"那个人字中，我们心中的力线，也是喜欢他人相让，不喜欢他人阻拦，所以不知不觉，对于王、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。我们如果悟得此理，应事接物，有无限受用。

力学中有偶力一种，也值得研究。宋朝王安石维新，排斥旧党，司马光守旧，排斥新党，两党主张相反，其力又复相等。自力学言之："两力线平行，强度相等，方向相反，是为偶力作用。"磨子之旋转不已，即是此种力之表现。宋自神宗以来，新旧两党，迭掌政权，相争至数十年之久，宋室政局遂如磨子一般，旋转不已，致令金人侵入，酿成南渡之祸。我国辛亥而后，各党各派，抗不相下，其力又不足相胜，成了偶力作用，政局也如磨子般旋转，日本即乘之而入。

人世一切事变，乃是人与人接触发生出来的，一个人，一个我，我们可假定为数学上之H元，一个Y，一个X，依解析几何，可得五线：（1）二直线；（2）圆；（3）抛物线；（4）椭圆；（5）双曲线。人事千变万化，总不外人与人相接，所以任如何逃不出这五种轨道。本章前面所举诸例，皆属乎二直线，第二章甲乙两图，第三章之丙图，则属乎圆，此外还有抛物、椭圆、双曲线三种，叙述如下：

甚么是抛物线呢？我们向外抛出一石，这是一种离心力，地心吸力，吸引此石，是一种向心力，石之离心力，冲不破地心吸力，终于下坠，此石所走之路线，即是抛物。弱小民族，对于列强所走路线，是抛物线。例如：高丽人民想独立，这是对于日本生出一种离心力，而日本用强力把它制伏下去。冲不破日本的势力范围，等于抛出之石，冲不破

地心吸力，终于坠地一般。

我们抛出之石，假定莫得地面阻挡，此石会绕过地心，仍回到我之本位，而旋绕不已，成为地球绕日状态。这种路线，名曰椭圆，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。自数学上言之，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，其和恒等，此点之轨迹，名曰椭圆，其和恒等者，即其值恒等之谓也。买卖之际，顾客交出金钱，店主交出货物，二者之值相等，即可看作一物。这是顾客抛出一物，绕过店主，回到他的本位，在店主方面看来，也是抛出一物，绕过顾客，回到他的本位，成一种椭圆形，买卖二家，就心满意足了。顾客有金钱，不必定向某店购买，这是离心力，但他店中的货物，足以引动顾客，又具有引力。店主有货物，不必定卖与某客，这是离心力，但他怀中的金钱，足以引动店主，又具有引力。由引力离力的结合，顾客出金钱，店主出货物，各遂所欲，交易遂成，是为椭圆状态。

又如自由结婚，某女不必嫁某男，而某男之爱情，足以系引他，某男不必定娶某女，而某女之爱情，足以系引他，引力离力，保其平衡，也系椭圆状态。

地球绕日，引力和离力，两相平衡，成为椭圆状态，故宇宙万古如新。社会上一切组织，必须取法这种状态，才能永久无弊。我国婚姻旧制，由父母主持，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缺乏了离力，所以男女两方，有时常感痛苦。外国资本家专横，工人不入工厂作工，就会饿死，离不开工厂，缺乏了离力，所以要社会革命。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，更是不可，上古男女杂交，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这是缺乏了引力。我国各种团体，有如散沙，也是缺乏了引力，所以政治家创一制度，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。

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，其差恒等，此点之轨迹，名曰双曲线，其形状，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。凡两种学说，成两种行事，背道而驰，可称为走入双曲线轨道。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，二者恰相反对，对方俱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越讲得精微，相差越远，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，相离越远一样，究其实，无非性善恶之差，是谓其差恒等。又如入世间法，和出世间法，二者是背道而驰的，利己主义，和利人主义，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，凡此种种，皆属乎双曲线。椭圆绘出图来，有两个

心，双曲线绘出图来，也有两个心，椭圆之图，是两心相向，双曲线之图，是两心相背，所以我与人走人椭圆轨道，彼此相需相成，若走入双曲线轨道，心理上就无在不背道而驰。

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，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之路线有四：（1）不相交之线。我与人目的物不同，路线不同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，彼此不生关系。平行线，是永远不相交，有时虽不平行，而尚未接触，亦不生关系；（2）合力线。我与人利害相同，向着同一之目的进行，如前面所说吴越人同舟共济是也；（3）圆形宇宙事事物物，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。详玩甲乙丙三图，即知凡事都有一定范围，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，倘能各守界线，你不侵我之范围，我不侵你之范围，彼此自然相安；（4）椭圆形。前而所说自由贸易、自由结婚等是也。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，皆属乎此种。

四线中，第一、第三两种线的结果，是利己而无损于人，或利人而无损于己。第二、第四两种线的结果，是人己两利。我们每遇一事，当熟察人己力线之经过，如走此四线，人与我绝不会生冲突。

我们把上述四种线求出，就可评判各家学说和各种政令之得失。我国古人有所谓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者，合得到第一种线，有所谓“通功合作”者，合得到第二种线，有所谓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者，合得到第三种线，有所谓“通功易事”者，合得到第四种线。西人谓：人人自由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限，合得到第三种线，都是对的。尼采的超人主义，其病在损人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，其病在损己，律以四种，俱不合，故俱不可不行。

二直线也，圆也，抛物线也，椭圆也，双曲线也，五者，是人与人相遇之路线，而此五线是变动不居的，只要心理一变，其线即变。例如：吴之孙权，蜀之刘备，各以荆州为目的物，孙权把荆州向东拖，刘备把荆州向西拖，力线相反，故郎舅决裂，夫妇生离，关羽见杀，七百里之连营被烧，吴、蜀二国，俨成不共戴天之仇。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，约定共同伐魏，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二国感情，立即融洽，合作到底，后来司马昭伐蜀，吴还起兵相救，听说刘禅降了，方才罢兵。这就是心理改变，力线即改变之明证。

我国从前闭关自守，不与外国相通，是不相交之二直线，五口通商

而后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，欲脱其势力范围而不能，是走的抛物线，一旦起而抗战，与帝国主义成一反对形势，彼此背道而驰，即为两心相背之双曲线。我们联合被侵略者，向之进攻，即成为合力线。帝国主义，经过一番重惩之后，翻然悔悟，工业国和农业国，通功易事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无，就成为两心相向之椭圆状态。将来再进化，世界大同了，合全球而为一个国家，就成为一个圆心之圆形了。所以这几种线的轨道，是随时可以改易的，只看各人心理如何罢了。

性善说、性恶说，二者背道而驰，是双曲线状态，倘知人性是浑然一体，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即成为浑然之圆形了。入世法和出世法，背道而驰，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，背道而驰，这都是双曲线，倘能把他融会贯通，入世出世，原是一理，利己利人，原是一事，则又成为圆形了。

我们做一切事，与夫国家制定法令制度，定要把路线看清楚，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平，才不至发生窒碍。我们详考世人的行事和现行的法令制度，以力学规律绳之，许多地方都不合，无怪乎纷纷扰扰，大乱不止。

孟子说："规矩，方圆之至也，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"第一句是对的，第二句就不对。我们执规以画圆，执矩以画方，聚五洲万国之人而观之，不能说不圆，不能说不方。惟圣人则不然，孔子、释迦、耶稣、穆罕默德，皆所谓圣人也，诸圣人定下的规律，各不相同，以此圣人之规律，绳彼圣人之信徒，立生冲突，其故何哉？盖圣人之规律，乃尺也、斗也、秤也，非画圆之规，画方之矩也；诸圣人之尺斗秤，长短大小轻重，各不相同，只在本铺适用。今者世界大通，天涯比邻，一市之中，有了几种尺斗秤，此世界文化所由冲突也。所以法令制度，如果根据圣人的学说制定出来，当然不能通行世界。力学规律，为五洲万国所公认，本章所述五种线，是从力学规律出来的，是规矩，不是尺斗秤，依以制定法令制度，一定通行五洲万国。

七　世界进化之轨道

人世一切事变，从人类行为生出来的，人类行为，从心理生出来的，而人之心理，依力学规律而变化，故世界进化，逃不出力学规律。

世界进化，乃是一种力在一个区域内动作，经过长时间所成之现象也。其间共有三物，一曰力，二曰空间，三曰时间。我们可认为是数学上之三元，其最显著者，为摆线式与螺旋式。古人说：“天道循环无端，无往不复。”今人说：“人类历史，永无重复。”我们把两说合并起来，就成为摆线式或螺旋式。

凡人无论思想方面或行为方面，都是依着力学规律，以直线进行，然其结果，所表现者，乃是曲线，不是直线，这是甚么道理呢？因为向前进行之际，受有他力牵引，而两力又相等，遂成为圆形。古人说：“循环无端。”环即圈子即是说：宇宙一切事物之演进，始终是循着一个圈子，旋转不已。这个说法，可举例来说明：假如我们在地球上面，无论东西南北，任取一直线向前进行，无丝毫偏斜，结果仍回到原来之地点，因为我们站在地面，是被地心力吸着的，开步向前走，是摆脱地心吸力，而以离心力向前进行，然而仍被地心力吸着。由离心力向心力两相结合，其路线遂成为圆形，而回到原来之地点，任走若干遍，仅是如此，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然而世界之进化，则不为圆周形，而为摆线形或螺旋线形。

甚么是摆线呢？我们取一铜元，在桌上滚起走，其圆周所成之线，即是摆线。铜元能滚者，力也，滚过的地方，空间也，不断的滚者，时间也。铜元旋转不已，周而复始，是谓“循环无端”。其路线，一起一伏，对直前进，是谓“永无重复”。宇宙事物之演进，往往有此种现象，如日往月来，寒往暑来，周流不息，是为“循环无端”，然而日月递更，寒暑代运，积之则为若干万万年，虽是循环不已，实是前进不已，这算是摆线式的进化。

有人说：“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。”又有人说：“物质为人的意

志所支配。”殊不知：物质与意志，是互相支配的。欧洲机器发明而后，工业大兴，人民的生活情形，随之而变，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，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，发明家费尽脑力，机器才能出现，工业才能发达，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。这类说法，与英雄造时势、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。有了物理数学等科，才能产生牛顿；有了牛顿，物理数学等科，又生大变化。有了成、同的时势，才造出曾、左诸人；有了曾、左诸人，又造出一个时势，犹如鸡生蛋，蛋生鸡一般，看起来是辗转相生，其实是前进不已。后之蛋，非前之蛋，后之鸡，非前之鸡，物质支配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志，又支配物质，时势造英雄，英雄又造时势，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。鸡与蛋和心与物，都是一物体之两方面，鸡之外无蛋，蛋之外无鸡，心之外无物，物之外无心，二者之进化，都等于一个铜元在桌上滚起走，有点像摆线式的进化。

我们细加研究，即知日往月来，寒往暑来，和鸡生蛋，蛋生鸡这类现象，是纯粹的摆线式进化，因为日月也，寒暑也，鸡与蛋也，状态始终如一，等于一个铜元之状态始终如一，其画出之线，一起一伏，也始终如一。惟英雄造出的时势，较造英雄的时势，更为进步，物质与意志，辗转支配，也是后者较前者为进步。其现象则为历时愈久，社会文明愈进步，而政治家和科学家之智能，亦愈进步，其形式与摆线式微异，而为螺旋线的进化。

甚么是螺旋线呢？我们手执一块直角三角板，以长边为轴，旋转一周，所成体积，即是圆锥体。假如用圆锥体的钻子去钻木头，这钻子所走的路线，即是螺旋线，竖的方面越深，横的方面越宽，世界即是以此种状态而进化的。我们取一截竹子，用一针在竹上横起画一圈，此计本是以直线进行，然而始终是在这个圈上旋转不已，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假设此针进行之际，有人暗中把竹子轻轻拖起走，则此针画出之线，绝不能与经过之路线重合，是之谓“永无重复”。针之进行是力，画出之圈是空间，其拖起走，则属乎时间，但世界进化，不是在竹子上画，乃是在笋子画圈，乃是从尖笋画起走，有人持笋尖拖之，其线越画越长，圈子越画越大，因笋子即圆锥形也。

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成汤时三千国，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，春秋时二百四十国，战国时，只有七国，到了秦始皇时，天下就

一统了。其现象是：历时越久，国之数目越少，其面积越大，这即是竖的方面越深，横的方面越宽，是为螺旋式进化。竖的方面者，时间也；横的方面者，空间也。现在五洲万国的形势，绝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，由进化趋势看去，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所异者，从前是君主时代，嬴秦混一，有一个皇帝高踞其上，现在是民主时代，将来全球混一，是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。

宇宙事事物物之演变，都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作用生出来的，有一力以直线进行，同时又有一相反之力牵制之，遂不得不作回旋状态，而又前进不已，即成为摆线状态或螺旋线状态，日月迭更，寒暑代运，鸡与蛋辗转相生，是未参有人类意志的，只是循着自然之道而行，故依摆线式进化，始终如一，机器与时势，是参有人类意志，而人类天性，是力求进步的，故依螺旋式进化，历时愈久，路线愈扩大。国际之关系，全是人类的意志作用，所以依螺旋式讲化，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人类是日求进步的，社会是日益文明的，全球混一，特文明进步之一幕耳。全球混一后，社会文明，又依螺旋式前进，而无有终止，其现象亦犹日月迭更，寒暑代运，依摆线式前进，而无有终止也。

人事千变万化，都是由离心向心二力生出来的，离心者，力之向外发展也，向心者，力之向内收敛也，发展到极点，则收敛，收敛到极点又能发展，此即古人所说，盈虚消长，循环无端也。以虚为起点，由是而发展则为长，发展到极点则为盈，到了极点即收敛而为消，收敛到极点则为虚，由虚而又为长，为盈，为消，为虚，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春夏秋冬，即盈虚消长之现象也。春者长也，夏者盈也，秋者消也，冬者虚也。一部易经和老子道德经，俱是发明此理，所谓物极必反也。所以宇宙间事事物物，都是正负二力，互为消长，此古人治国，所以有一张一弛之说也。嬴秦苛虐，汉初则治之以黄老，刘璋暗弱，孔明则治之以申、韩，都是顺应此种趋势的。

我们合古今事变观之，大约可分三个时期：以婚姻制度言之，上古时男女杂交，生出之子女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这个时候的婚制，离心力胜过向心力，是为第一时期。后来制定婚制，子女婚姻，由父母主持，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向心力胜过离心力，是为第二时期。现在已入第三时期了，某女不必定嫁某男，而某男之爱情，足以系引他，某男

不必定娶某女，而某女之爱情，足以系引他，离心向心二力，保持平衡，就成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。此种婚制，本带得有点回旋状态，许多青年，看不清此种趋势，以为应该回复到上古那种杂交状态，就未免大错了。

人民的自由，也可分三个时期。上古人民，穴居野处，纯是一盘散沙，是为第一时期。后来受君主之任制，言论思想，极不自由，是为第二时期。经过一番革命，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，是为第三时期。自力学方面言之，第一时期，离心力胜过向心力，第二时期，向心力胜过离心力，第三时期，向心离心二力，保持平衡。第三时期中，参得有第一时期的自由，带得有点回旋状态。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，看见此种回旋趋势，误以为应当回复第一时期，所以他的学说，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，以返于原始自然为第一要义。他说："自然之物皆善，一入人类之手，乃变而为恶。"他的学说，有一半合真理，有一半不合真理。因其有一半合真理，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。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，所以法国革命实行他的学说，酿成非常的骚乱，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，卒至政府之干涉与人民之自由保持平衡，法国方能安定。

民主主义流行久了，法西斯主义之独裁，因而出现，这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之表现。自墨索里尼倡出法西斯主义后，希特勒和日本军阀，相继仿效，因而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战，其独裁制度，已越过时势之需要，可断言：此种独裁制，不久必将倒毙，另有一种制度代之。此种制度，一定是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种结合而成的。

人类分配货财的方法，也分三个时期。上占时人民浑浑噩噩，犹如初生小儿，不知欺诈，不知储蓄，只有公共的发财，并无个人的私财，这是有公而无私，是为第一时期。再进化，人类智识进步，自私自利之心，日益发达，把公共的货财攘为个人私有，这是有私而无公，是为第二时期。再进化，人类智识更进步，公私界限，有明了认识，把公有的发财归之社会，私有的货财归之个人，公与私并行不悖，是为第三时期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是第二时期之末，第三时期之始。关于经济方面，应该把公私界限划分清楚，公者归之公，私者归之私，社会才能相安无事。

中国从前，自诩为声明文物之邦，以为周公的制度和孔、孟的学说好到极点，鄙视西欧，不值一顾，此为第一时期。自甲午、庚子两役而后，骤失自信力，以为西洋的制度和学说，无一不好到极点，鄙视中国，不值一顾，此为第二时期。至今则入第三时期了，既不高视西洋，也不鄙视中国，总是平心考察，是者是之，非者非之，这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我国初与欧人接触，庞然自大，以为高出外国之上。自从两次战败，遂低首降心，屈处列强之下。到了第三时期，我国与列强立于平等线上，这也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

总之，世界进化，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，处在某一时期，各种现象，都是一致，犹如天寒则处处皆寒，天热则处处皆热。现在帝国主义盛行，同时资本主义也盛行，而工商界也就有汽车大王、煤油大王、钢铁大王、银行大王等等出现，民族间就有自夸大和民族是最优秀民族，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民族，凡此种种都是第二时期残余之说。跟着就入第三时期，帝国主义消灭，资本主义消灭，工商界某某大王，和某某最优秀民族，这类名词也消灭，这是必然的趋势。所以主持国家大计者，必须看清世界趋势，顺而应之，如其不然，就会受天然之淘汰。

八　达尔文学说之修正

我同友人谈及达尔文，友人规戒我道："李宗吾，你讲你的厚黑学好了，切不可涉及科学范围。达尔文是生物学专家，他的种源论，是积数十年之实验，把昆虫草木、飞禽走兽，一一考察遍了，证明不错了，才发表出来，是有科学根据的。你非科学家，最好是不涉及他，免闹笑话。"我说道："达尔文可称科学家，难道我李宗吾不可称科学家吗？二者相较，我的学力，还在达尔文之上。何以故呢？他的种源论，是说明禽兽社会情形；我的厚黑学，是说明人类社会情形。他研究禽兽，只是从旁视察，自身并未变成禽兽，与之同处，于禽兽社会情形，未免隔膜；我则居然变成人，并且与人同处了数十年。难道我的学力，不远在达尔文之上？达尔文在禽兽社会中，寻出一种原则，如果用之于禽兽社

会，我们尽可不管，而今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，我们当然可以批驳他。人类社会中，寻得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，禽兽社会中，寻不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，足证两种社会截然不同。故达尔文的学说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。”

今人动辄提科学家三家，恐吓我辈普通人。殊不知科学家聪明起来，比普通人聪明百倍，糊涂起来，也比普通人糊涂百倍。牛顿可称独一无二的科学家，他养有大小二猫，有天命匠人在门上开一大小二洞，以便大描出入大洞，小猫出入小洞。任何人都知道：只开一大洞，大小二猫俱可出入，而牛顿不悟也，这不是比普通人糊涂百倍吗？牛顿说：地心有吸力，我们固然该信从，难道他说“大猫出入大洞，小猫出入小洞”，我们也信得吗？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学说，不能不慎重审择，谨防他学说里面藏牛顿的猫洞。

因为科学家有时比普通人糊涂百倍，所以专门家之学说，往往不通。例如，斯密士岂非经济家，而他的学说就不通。我辈之话，不足为证，难道专家之批评，都不可信吗？……呜呼，诸君休矣，举世纷纷扰扰，闹个不休者，皆达尔文、斯密士……诸位科学家之赐也。

达尔文讲竞争，一开口，即是豺狼也，虎豹也；鄙人讲厚黑，一开口，即是曹操也，刘备也，孙权也。曹、刘诸人，是千古人杰，其文明程度，不知高出豺狼虎豹若干倍，他且不论，单是我采用的标本，已比达尔文采的标本高得多了。所以基于达尔文的学说造出的世界，是虎狼世界；基于鄙人的学说造出的世界，是极文明的世界。达尔文可称科学家，鄙人当然可称科学家，不过达尔文是生物学的科学家，鄙人是厚黑学的科学家罢了。

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，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、飞禽走兽，都研究完了，独于他实验室中有个高等物，未曾研究，所以他的学说，就留下破绽。请问甚么高等动物？答曰：就是达尔文本身。他把人类社会忽略了，把自己心理和行为忽略了，所以创出的学说，不能不有破绽。

达尔文实验室中，有个高等动物，他既未曾研究，我们无妨帮他研究。达尔文一生下地，我们就用采集动物标本的法子，把他连儿带母活捉到中国来，用中国的白米饭把他喂大，我们用达尔文研究动物的法子，从旁视察，一直到他老死，就可发见他的学说是自相矛盾的。

达尔文一生下地，就拖着母亲之乳来吃，把母亲的膏血吸入腹中，如不给他吃，他就大哭不止，估着要吃，这可说是生存竞争。从这个地方视察，达尔文的学说莫有错。长大点能吃东西了，母亲手中拿一糕饼，他见了伸手来索，母亲不给他，放在自己口中，留半截在外，他立会伸手，把糕饼从母亲口中取出，放在他的口中。母亲抱着他吃饭，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，如不提防，即会坠地打烂。这种现象，也是生存竞争，达尔文的学说也莫有错。若是再大点，自家能端碗吃饭了，他一上桌，就递一个空碗，请母亲与他盛饭，吃了又请母亲盛，母亲面前，现放着满满一碗饭，他再不去抢了，竞争的现象，忽然减少，岂非很奇的事吗？再大点，他自己会往甑中盛饭，再不要母亲与他盛，有时甑中饭不够，他未吃饱，守着母亲哭，母亲把自己的饭分半碗与他吃，他才好了，母亲不分与他，他断不能去抢。更大点，饭不够吃，母亲把自己碗中的饭分与他吃，他不要，他自己会拿囊中之钱在街上买食物来吃。到了此时，竞争的现象，一点莫有，岂不更奇吗？这是小孩下地时，只看见母亲身上之乳，大点即看见母亲碗中之饭，再大点即看见甑中之饭，更大点即看见街上之食物。不特此也，达尔文长大成人，学问操好了，当大学教授了，有穷亲友向他告贷，他就概然给予，后来金钱充裕，还拿钱来做慈善事业，或谋种种公益。这种现象，与竞争完全相反，岂非奇之又奇？于此我们可以定出一条原则：“同是一个人，智识越进步，眼光越远大，竞争就越减少。”达尔文著书立说，只把当小孩时估食母亲之孔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这类事告诉众人，不把他当教授时施舍金钱、周济家人，做慈善事业这类事告诉众人，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一。

达尔文当小孩时抢夺食物，有一定的规律，就是：“饿了就抢，饱了就不抢。”不惟不抢，并且让他吃，他都不吃。但有一个例外，见了好吃的东西，母亲叫他不要多吃，他不肯听，结果多吃了不消化，得下一场大病。由此知食物以饱为限，过饱即有弊害。我们可以定出第二条原则：“竞争以适合生存需要为准，超过需要以上，就有弊害。”达尔文只说当小孩时，会抢夺食物，因而长得很肥胖，并不说因为食物多了，反得下病，于是达尔文之竞争，遂成了无界或之竞争。欧人崇信其说，而世界遂纷纷大乱，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二。

达尔文说："万物都是互相竞争，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，竞争还不激烈，惟有同类之越相近者，竞争越激烈。虎与牛竞争，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；狼与羊竞争，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；欧洲人与他洲士人竞争，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。"他这个说法，证以第一次欧洲大战，诚然不错，但是达尔文创出这种学说，他自己就把他破坏了。达尔文的本传上说："一千八百五十八年，他的好友荷理士，从南美洲寄来一篇论文，请他代为刊布。达尔文读这篇论文，恰与自己十年来苦力思索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合，自己非常失望。落在别人，为争名誉起见，一定起嫉妒心，或者会湮没他的稿子，乃达尔文不然，直把这篇论文交与黎埃儿和富伽二人发布。二人知达尔文平日也有这样的研究，力劝他把平日研究所得著为论文，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七月一日，与荷理士论文同时发布，于是全国学者，尽都耸动。"本传之言如此，在替他作传的人，本是极力赞扬他，实际上是攻击他，无异于说：他的学说：根本不能成立。何以故呢？他与荷理士同是欧洲人，较之他洲人更相近；同是英国人，较之其他欧洲人更相近；他二人是相好的朋友，较之其他英人更相近；并且同是研究生物学的人，较之其他朋友更相近。荷理士的著作，宣布出来，足以夺去达尔文之名，于他最有妨害，达尔文不压抑他，反替他宣布，岂不成了同类中越相近越不竞争吗？达尔文是英国人，对于同类，能够这样退让，何以欧战中，那些英国人，竞争那么激烈？我们可以定出第三条原则："同是一国的人，道德低下者，对于同类，越近越竞争；道德高尚者，对于同类，越近越退让。"达尔文不把自己让德可风的事指示众人，偏把他本国侵夺同洲同种的事指示众人，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三。

达尔文说："竞争愈激烈，则最适者出焉。"这个说法，又是靠不住的。第一次欧战之激烈，为有史以来所未有。请问达尔文：此次大战结果，哪一国足当最适二字？究其实战败者和战胜者，无一非创痛巨深。他这个说法，岂非毫无征验？乃返观达尔文不与荷理士竞争，反享千古大名，足当最适二字，他这个公例，又是他自己破坏了。他的论文，与荷理士同时发表后，他又继续研究，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十一月发布《种源论》，从此名震全球。荷理士之名，几于无人知道，这是由于达尔文返而自奋，较荷理士用力更深之故。我们可以定出第四条原

则："竞争之途径有二：进而攻人者，处处冲突，常遭失败；返而自奋者，不生冲突，常占优胜。"达尔文不把自己战胜荷理士之秘诀教导众人，偏把英国掠夺印度的方法夸示天下，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四。

有人问：我不与人竞争，别人要用强权竞争的策略，向我进攻，我将奈何？答曰：这是有办法的，我们可以定出第五条原则："凡事以人己两利为主，二者不可得兼，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，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。"有了这条原则，人与我双方兼顾，有人来侵夺，我抱定"不损己"三字做去。他能攻，我能守，他又其奈我何？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五。

达尔文说：人类进化，是由于彼此相争。我们从各方面考察，觉得人类进化，是由于彼此相让。因为人类进化，是由于合力，彼此能够相让，则每根力线，才能向前直进，世界才能进化。譬如，我要赶路，在路上飞步而走，见有人对面撞来，我当侧身让过，方不耽误行程。照达尔文的说法，见人对面撞来，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，沿途有人撞来，沿途推翻，遇着行人挤做一圈，我就从中间打出一条路，向前而走。请问世间赶路的人，有这种办法吗？我们如果要讲"适者生存"，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，才是适者，才能生存。由达尔文的眼光看来，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，由我们的眼光看来，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，试入森林一看，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，叶叶相让，所有树枝树叶，都向空处发展，厘然秩然。树木是无知之物，都能彼此相让，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之天然性，因为不相让，就不能发展，凡属生物皆然。深山禽鸟相鸣，百兽聚处，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，彼此斗争之时少。我辈朋友往还之际，也是相安无事之时多，彼此斗争之时少。我们可以定出第六条原则："生物界相让者其常，相争者其变。"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，似乎莫有对，事势上遇着两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该取法树枝树叶，向空处发展。王猛见了桓温，而改仕苻秦，恽寿平见了王石谷之山水，而改习花卉，皆所谓向空处发展也。大宇宙之中，空处甚多，也即是生存之方法甚多，人与人无须互相争夺，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六。

依达尔文的说法，凡是强有力的，都该生存。我们从事实上看来，反是强有力者先消灭。洪荒之世，遍地是虎豹，他的力比人更大，宜乎人类战他不过了，何以虎豹反会绝迹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，德皇势力

最大，宜乎称雄世界，何以反会失败？袁世凯在中国势力最大，宜乎成功，何以反会失败？有了这些事实，所以达尔文的学说，就发生疑点。我们细加推究，即知虎豹之被消灭，是由全人类都想打他；德皇之失败，是由全世界都想打他；袁世凯之失败，是由全中国都想打他。思想相同，就成为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虎豹也，德皇也，袁世凯也，都是被合力打败的。我们可以定出第七条原则："进化由于合力。"懂得合力的就生存，违反合力的就消灭，懂得合力的就优胜，违反合力的就劣败。像这样的观察，则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，反在天然淘汰之列。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七。

达尔文的误点，可再用比喻来说明：假如我们向人说道："生物进化，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的长大。"有人问："小儿如何会长大？"我们答道："只要他不死，能够生存，自然会长大。"问"如何才能生存？"答："只要有饭吃，就能够生存。"问："如何才有饭吃？"我们还未回答，达尔文从旁答道："你看见别人有饭，就去抢，自然就有饭吃，越吃得多，身体越长得快。"诸君试看：达尔文的答案，错莫有错？我们这样的研究，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莫有错，说进化由于生存莫有错，说生存由于食物也莫有错，惟最末一句，说食物由于竞争就错了。我们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，就对了。问："怎样修正？"就是通常所说的："有饭大家吃"。平情而论，达尔文教人竞争，无有限度，固有流弊；我们教人相让，无有限度，也有流弊。问：如何才无流弊？我们可以定出第八条原则："对人相让，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，对人竞争，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。"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八。

综而言之，人类由禽兽进化而来，达尔文以禽兽社会之公例施之人类，则是返人类于禽兽，这自违进化之说，而况乎禽兽相处，亦未必纯然相争也。他的学说，可分两部分看。他说"生物进化"，这部分是指出事实。他说"生存竞争，弱肉强食"，这部分是解释进化之理由，事实莫有错，理由错了。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，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，殊不知：进化之原因多端，相争能进化，相让能进化，不争不让，返而致力于内部，也能进化。又争又让，改而向空处发展，也能进化。其或具备他种条件，如克鲁泡特金所谓互助，我们所谓合力，也未尝不能进化。达尔文置诸种原因于不顾，单以竞争为进化之惟一原因，观察未免

疏略。兹断之曰：达尔文发明“生物进化”，等于牛顿发明“地心吸力”，是学术界千古功臣；惟有他说“生存竞争”，因而倡言“弱肉强食”，流弊无穷，我们不得不加以修正。

九　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

克鲁泡特金之误点，也与达尔文相同。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状况，律之人类社会，故其说有流弊。克鲁泡特金，因为要指驳达尔文之错误，特别在满洲、西比时利亚一带，考察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状况，发明互助说，以反驳达尔文之互竞说。他能注意到人类，算是比达尔文更进步了。然而原始人的社会，与文明人的社会，毕竟不同，巴克鲁泡特金考察原始人，也是从旁观察，并未曾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；而我辈则置身文明人社会中，与之共同居处著于年，所以我辈能发见克鲁泡特金之误点，而指出其流弊。

原始人类，无有组织，成为无政府状态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，从原始社会得来，故他提倡无政府主义。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，也可分两部分看，他主张互助不错，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。

生物之进化，好比小儿一天一天的长大，由昆虫，而禽兽，而野蛮人，而文明人，好比吾人，由婴孩，而少年，而壮年。达尔文研究生物，以动物为主，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，故倡互竞说。克鲁泡特金所研究者，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，较动物更进化了，是小孩更大了点，不抢母亲口中食物，只请母亲与他盛饭，故倡互助说。至于长大成人，独立生活的现象，他二人都未看见。

一个国家之进化，也好比小孩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，弱肉强食，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。后来进化了，汉弃珠崖，是母亲分饭与他吃，他都不要。再进化，到了明初，郑和下南洋，各国纷纷入贡，希望得中国的赏赐，这是穷亲友来告贷，慨然给予。再进化，到了明朝和清朝，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，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，等于做慈善事业，把贫人子弟收来，给以衣食，延师训读一般。我国进化程

度，历历如绘。

西洋开化，比我国迟二千多年，其进化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，故其弱肉强食，与我国春秋战国极相似，而达尔文之互竞说，遂应运而生。要防小孩抢夺食物，不得不用专制手段，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，希特勒之治德意志，与商鞅之治秦绝似，而皆收同一之效果，因其为同一时期之产物故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了，仍复厉行专制，二世而亡，这是世界更进化了，等于身体长大了，再穿小孩衣服，不得不破裂；文景之世，政尚宽大，号称郅治，这是儿子长大了，父母不加干涉，他能独立成为好人。后来历代常有变乱，这是儿子长大成人，父母过于放纵，遂日流于非的原故。然因其日流于非，而遂欲以待婴孩之法，待长大成人之儿子，则又不可。故今之治国者，如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，直是师法商鞅，返吾国于春秋战国时代，是谓违反进化，是谓开倒车。

今人每谓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，很抱悲观，这未免误解。无三人以上之团体，正是人人能独立之表现，此时如用达尔文之互竞主义以治国，则是把人民当如怀中小儿，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，这是不可的。如用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以治国，则是把人民当如才能吃饭之小儿，须母亲与之盛饭，这也是不可的。今即长大成人矣，无三人以上之团体，人人能独立矣，故此时治国者，当采用合力主义。譬如射箭，悬出一个箭垛，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，是之谓合力。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，当采用此种方式，悬出一定之目的，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，根根独立，直向目的物射去，你不妨害我之路线，我也不求助于你，彼此不相冲突，不相倚赖，这种办法，才适合我国现情。非然者，崇信达尔文之互竞说，势必压制他人，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，而冲突之事以起；崇信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说，势必借助他人，养成倚赖性，而自己不能独立，于我国现情俱不合。

达尔文说：互竞为人类天性，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，这条公例，算是他自己破坏了。克鲁泡特金说：互助为人类天性，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待金自己破坏了的。请问：人类天性既是互助，为甚克鲁泡特金，要讲无政府主义，想推翻现政府，而不与政府讲互助？为甚政府要处罚他，推之下狱，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？有了这种事实，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，也不能不加以修正。

古人云："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"故考察事物，非置身局外，不能得其真相。我辈是人类，站在人类社会之中，去考察人类，欲得真理，诚有不能。达尔文用的方法，是因人为动物之一，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，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，论理本是对的，无如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，故创出之学说，不无流弊。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，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，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之社会，不能见庐山真面，乃考察原始人类社会，置身旁观地位，寻出一种原则，以适用于现今之社会，论理也是对的，无如野蛮人之社会与文明人之社会毕竟不同，故创出之学说，也有流弊。

婴儿在母胎，成形之初，其脑髓像鱼蛙之脑，再一二月则像禽鸟之脑，再一二月则像兔犬之脑，再一二月则像猿猴之脑，最后才成为人类之脑，而小儿之脑筋皱纹少，大人则皱纹多，野蛮人之脑筋皱纹少，文明人则皱纹多。小儿下地之初，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，故其抢夺食物，与禽兽相似，稍大点，脑筋之简单类于原始时代的人，故其天真烂漫，也与原始人类相似。然而禽兽之脑筋，与人类有异，故达尔文的学说，不适于人类；原始人类之脑筋，与文明人有异，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，不适用于文明社会。

禽兽进化为人类，故人类有兽性，然既名之曰人，则兽性之外，还有一部分人性。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，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。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，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，然既成为文明人，则原始状态之外，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。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，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。禽兽有竞争，无礼让，人类是有礼让的，达尔文所忽略的，是在这一点。原始人类，浑浑噩噩，无有组织，成为无政府状态，文明人则有组织，有政府，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。

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，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，有两个方法：（1）一部二十五史，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，我们熟察历史事迹，既可发见人类心理真相，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；（2）凡物体，每一分子的性质，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，社会是积人而成的，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，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，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。

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，采用互助主义，也有流弊，必须采用合

力主义。人身之组织，既是合力主义，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，每一细胞都有知觉，等于国中之人民，大脑等于中央政府，全身神经，都可直达于脑，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，每人的力线，都可直达中央，成为合力之政府。目不与耳竞争，口不与鼻竞争，手不与足竞争，双方之间非常调协，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；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，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，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，个个独立，自由表现其能力，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，也用不着。目尽其视之能力，耳尽其听之能力，口鼻手足，亦各尽各之能力，把各种能力，集合起来，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，是之谓合力主义。我国古人有曰："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。"已经发见了这个原则。

国家有中央政府，有地方政府，人身亦然。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，脚政府报告脑政府，立派右手来，把蚊子打死。万一右手被蚊子咬，自己无法办理，报告脑政府，立派左手来，把蚊子打死。有时睡着了，脑政府失其作用，额上被蚊子咬，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，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，脑政府还不知道。耳鼻为寒气所侵，温度降低，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，输送血液来救济，于是耳鼻就呈红色。万一天气太寒，输送了许多血液，寒气仍进逼不已，各地方政府协商道："我们再输送血液去，仍无济于事，只好各守防地，把输送到耳的血液，与他截留了。"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。

我说至此处，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："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，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，他的学说，何尝会错?"我说道：他讲的互助不错，错在无政府主义，必须有了政府，才能谈互助，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。举例来说：前清时，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，这可说是互助了，满清政府一倒，协饷即停止，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。并且满清政府一倒，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，由此知：在无政府之下，只能发生互竞的现象，断不会发生互助的现象。

人身有中央政府，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，脑中记忆的事，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，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，施催眠术的人，是蒙蔽了中央政府，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，所以人在催眠中，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，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。疯人胡言乱语，这是脑政府受病，中央政府失了作用，省县市区政府，乱发号令。所以疯人说的话，都是他平日的

事，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，故话不连贯；夜间作梦，是中央政府休职，各处政府的人，跳上中央舞台来了，人一醒，中央政府复职，他们立即躲藏。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，故梦中的事，也能略记一二。我们可以说：疯狂和做梦，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。

古来亡国之时，许多人说要死节，及到临头，忽然战栗退缩。因为想死节，是出于理智，从脑中发出，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；战栗退缩，是肌肉收缩，是全国人民不愿意。文天祥一流人，从容就死，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，人民与中央政府，业已行动一致了。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，及至美色当前，又情不自禁，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，情不自禁，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。我们走路，心中想朝某方走，最初一二步注意，以后即无须注意，自然会向前走去，这回是中央政府发布号令后，人民依着命令做去，如果步步注意，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，那就不胜其烦了。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古人作诗，无意中得佳句，疑有神助。大醉后写出之字，比醒时更好，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，遇有事来，不须中央指挥，人民自动作出之事，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。心理学书上，有所谓“下意识”者，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。

理智从脑而出，能辨别事理，情欲从五官百骸而出，是盲目的，故目好色，耳好声，身体肌肤好愉快，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。古代哲学家，如希腊的柏拉图等，和中国的程朱等，都是崇奉理智，抑制情欲。例如程子说：“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”又把韩昌黎“臣罪当诛，天王圣明”二语，极力称赞，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，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，与暴君之专制是一样。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，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。后来君主打倒了，民主主义出现，同时学说上也盛行情欲主义，纵肆耳目之欲，任意盲动，无所谓理智，等于政治上之暴民专制。我们读历史，看出一种通例：君主时代，政府任制人民，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欲，民主时代，人民敌视政府，同时哲学家即重情欲而轻理智。

据上面之研究，可知身体之组织，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。我们返观吾身，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，即知道：我们创设一种学说，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，不能凭着脑之空想，以虐苦五官百骸，亦

不能放纵五官百骸，而不受理智之裁判。建设一个国家，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，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；而为人民者，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。吾身之组织，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，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，与五官百骸，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。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，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，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，政府与人民，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。能这样的办理，即是合力主义，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，而与天然之理相合。

十　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

宇宙之力，是圆陀陀的，周遍世界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吾人生存其中，随时都可看见，有人看见一端，即可发明一条定理。例如看见苹果坠地，即发明万有引力，看见壶盖冲动，即发明蒸汽，看见磁铁功用，即发明指南针，看见死蛙运动，即发明电气。种种发明，可说是同出一源。因为苹果坠地，是力之内敛作用，壶盖冲动，是力之外发作用，磁气电气，是力之内敛外发两种作用。达尔文看见此力向外发展，有如水然，能随河岸之曲折，而适应环境，向前流去，故创进化论。又见进化中所得着的东西，能借收敛作用把持不失，故说凡物有遗传性。此外种种科学，与夫哲学上种种议论，都是从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生出来的。譬如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果，有人在树上摘下一花，又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枝一叶，为物虽不同，其实都在树上摘下来的。所以百家学说，归于一贯，中西学说，可以相通。

我国《周易》一书，一般人都说它穷造化之妙，宇宙事事物物，都逃不出易理，这是甚么原因？因为《易经》所说的道理，包含有力学原理，宇宙事事物物，既逃不出力学规律，所以就逃不出《易经》所说的道理。我们如就卦爻来解说，读者未免沉闷，兹特另用一个法子来说明：

假定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位圣人都是现在的人，我们把他四位请来，对他说道：现在西洋的科学，很进步了，一切物理，都适用力学规律，我们想把力学原理编译成一部书，不惟用在物理上，并且要应

用到人事上。我们订有一个编译大纲，你们照此编译。（1）西洋的力字，译作气字，正负二力，译作阴阳二气；（2）发散的现象，用阳字表示，收敛的现象，用阴字表示；（3）正负二力相等时，阴阳二电中和时，俱是寂然不动的，这种现象，译作“太极”。他动作的时候，有发散收缩两种现象，称之曰“两仪”；（4）由内向外发展，称之曰“其动也辟”，辟是开放之意。由外向内收缩，称之曰“其静也翕”，翕是收合之意；（5）凡物运动，都是以直线进行，若不受外力，他是一直永远前进的，因此可下一定例曰“其动也直”，直是不弯曲之意。凡物静止的时候，若不受外力，他是永远静止的，因此可下一定例曰“其静也专”，专是不移易之意；（6）正负二力变化，有八种状态，可把他描画下来，名之曰八卦又把这八卦，错综变化起来，把它所有的变态，穷形尽致的表示出来；（7）每一封作一说明书，把宇宙事事物物的变态包含其中，使读者能够循着轨道推往知来；（8）这部书言盈虚消长之理，由虚而长而盈，是发散作用，由盈而消而虚，是收缩作用，可定名为《易经》。易有变易交易两解，经字即常字之意，使人见了《易经》二字，即知书中所说的，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常理，换言之，即是正负二力变化的规律。以上八条，即是我们所订的编译大纲。他们果然这样做去，把书作成了，各书坊都有发售，阅者试读一部，检查一下，看与编译大纲合不合，即知与力学规律合不合。

我们说：《周易》与力学相通，更可引严又陵之言为证。严译《天演论》，曾说道：“夫西学之最切实而可以御蕃变者，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。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，质力以为纬，而合而名之曰易，大宇之内，质力相推，非质无以见力，非力无以呈质，凡力皆乾也，凡质皆坤也。奈顿（即牛顿）之三例，其一曰：‘静者不自动，动者不自止，动路必直，速率必均。’此所谓旷古之虑，自其例出，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。而易则曰：‘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。’后二百年，有斯宾塞尔者，以天演自然言化，著书造论，贯天地人而一理之，此亦晚近之绝作也。其为天演界说曰：‘翕以合质，辟以出力，始简易而终杂揉。’而易则回：‘坤，其静也翕，其动也辟。’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，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。凡动必复之说，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，而易不可见，乾坤或几乎息之旨，尤与热力平均、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，此岂可悉

谓之偶合也耶?”严氏之言如此，足为周易与力学相通之明证。

老子是周秦诸子的开山祖师，他在中国学术界之位置，等于西洋物理学中之牛顿。牛顿看见万物都向内部牵引，因创出万有引力的学说。其实这种现象，老子早已看见了。他说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天无以清将恐裂，地无以宁将恐发，神无以灵将恐歇，谷无以盈将恐竭，万物无以生将恐灭，侯王无以贞而贵将恐蹶。”老子的意思，即是说：天地万物，都有一个东西把他拉着，如果莫得那个东西，天就会破裂，地就会发散，神就会歇绝，谷就会枯竭，万物就会消灭，侯王就会倒下来。看他连下裂发歇竭灭蹶六个字，都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，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，可见牛顿所说的现象，老子早已看见。牛顿仅仅用在物理上，老子并且应用到人事上，他的观察力，何等精密！他的理想，何等高妙！

近代的数学，以X代未知数，遇着未知物，也以X代之，如X光线是也。古代的数学，以一代未知，故中国古代的天元数，和西洋古代的借根方，都是以一代未知数，老子看见万物都向内部牵引，不知是个甚么东西，只好名之为一。

老子说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。”又说：“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抟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”又说：“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这究竟是个甚么东西，值得老子如此赞叹？如今科学昌明了，我们仔细研究，才知他所说的，即是向心离心二力稳定时的现象，也即是阴电阳电中和时的现象。他看见有一个浑然的东西，本来是寂然不动的，一动作起来，就非常奇妙，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这一个东西，动作起来，就生出一发散、一收缩两个东西，由这两个东西，就生出第三个东西，由此辗转相生，就生出千万个东西了。

数学上用X或一字代未知数，是变动不居的，可以代此数，又可代彼数，故用一字代未知物，可以代此物，又可代彼物。我们研究老子书中的一字，共有两种。他说：“天得一以清”的一字，是指万物向内部牵引之现象而言。他说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”的一字，是指离心向心

二力稳定时之现象，也即是阴阳二电中和时之现象。我们这样的研究，老子书中的一字就有实际可寻了。

西人谈力学，谈电学，都是正负二者，两两对举；老子每谈一事，都是把相反之二者，两两对举。如云："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。"有无难易对举。"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"虚实强弱对举。他如：言静躁，言雌雄，言洼盈等等，无一非两两对举，都是描写发散和收缩两种状态。

正负二力，是互相消长的。老子知道：发散之后，跟着即是收敛，收敛之后，跟着即是发展，所以他说："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因强之。"他以为要想向外发展，必先向内收敛，因此他主张俭，主张啬，俭的结果是广，音的结果是长生久视，俭与啬者收敛也，广与长生久视者发展也。一般人都说老子无为，其实误解了。他是要想有为，而下手则从无为做起走，故曰："无为则无不为。"他的话，大概上半句是无为，下半句是有为。例如："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，不敢为天下先，故为成事长。"等等皆是。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去，即知他是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人事上。

我们生在今日，可以援用力学公例。老子那个时候，力学未成专科，当然无从援用，但老子创出的公例，又简单，又真确，即是用水作比喻，如"上善若水"，"江海能为百谷王"，"天下莫柔弱于水"等语，都是以水作比喻。水之变化，即是力之变化。他以水作比喻，即可说是援用力学规律。

学术是进化的，牛顿之后，出了一个爱因斯坦，发明了相对论，他的学说，比牛顿更进一步；老子之后，出了一个庄子，他的学说，也比老子更进一步。庄子虽极力推尊老子，然而却不甘居老子篱下，你看他《天下篇》所说，俨然在老子之外独树一帜，这是他自信比老子更进一步，才有那种说法。

庄子学说，与爱因斯坦酷似，所异者，一个谈物理，一个谈人事，爱因斯坦谈物理，从空间时间立论，庄子谈人事，也从空间时间立论。爱因斯坦名之曰相对，在庄子则为比较，从空间上两相比较，从时间上两相比较，比较即是相对之意，庄子和爱因斯坦，所走途径，完全相同。

庄子说："泰山为小，秋毫为大。"又说："彭祖为夭，殇子为寿。"这类话，岂不很奇吗？我们知道他是从比较上立论，也就不觉为奇了。拿泰山和秋毫比较，自然泰山很大，秋毫很小；如拿恒星行星和泰山比较，泰山岂不很小吗？拿原子电子和秋毫比较，秋毫岂不很大吗？拿彭祖和殇子比较，自然殇子为夭，彭祖为寿；但是大椿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拿彭祖与之比较，彭祖之命岂不很短吗？蜉蝣朝生暮死，木槿朝开暮落，拿殇子与之比较，殇子之命，岂不很长吗？庄子谈论事物，必从比较上立论，认为宇宙无绝对之是非善恶，世俗之所谓是非善恶者，乃是相对的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发明的原则，庄子谈论人事，早已适用了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必兼空间时间二者而言之，庄子学说亦然，泰山秋毫一类话，是从空间立论，彭祖殇子一类话，是从时间立论，所以说：庄子所走的途径，与爱因斯坦完全相同。

毛嫱西施，世人很爱他，而鱼见之则深入，鸟见之则高飞。同是毛嫱西施，人与鱼鸟之自身不同，则爱憎即异。骊姬嫁与晋献公，初时悲泣，后来又欢喜，同是骊姬，同是嫁与晋献公，时间变迁，环境改易，连自己的观察都不同。我们平日读庄子的书，但觉妙趣横生，今以爱因斯坦之原则律之，才知他的学说是很合科学的。

儒家的学说，把相对的道理忽略了，对于空间时间的关系，不甚措意，认为他们所定的大经大法，是万世不易的。庄子懂得相对的原理，故把儒家任意嘲笑，以为凡事须要看清空间时间的关系。儒家开口即谈仁义，庄子则曰："仁义先王之蔽庐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。"此等见解，实较儒家为高。

儒家最重要的，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书，《中庸》"放之则弥六合"，是层层放大，"卷之则退藏于密"，是层层缩小，具备了发散收缩两种现象；《大学》亦然。《大学》说："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减其意。"这是层层缩小。又说："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"这是层层放大。绘图如（丁），阅之自明。孔子"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"，仰观俯察，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创出的学说，极合自然之理，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遂成为儒家嫡派之书。

诚意之意字，朱子释之曰："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"而明儒王一庵、刘蕺山、黄宗羲诸人，均谓，身之主宰为心，心之主宰为意，故曰：主意。其说最确，故可绘图如（丁）：西欧学说，无论利己主义，利人主义，均以我字为起点，即是以身字为起点；中国则从身字推进两层，寻出意字，以诚意为下手功夫。譬之建屋，中国是把地上浮泥去了，寻出石底，方从事建筑；西人从我字起点，是在地面浮泥上建筑，基础未固，建筑愈高，倒塌下来，压毙之人愈多。所以由斯密士学说之结果，会酿成社会革命；由达尔文学说之结果，会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，第二次大战；如实行中国学说，绝无此流弊。（详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）

孔子问礼于老子，其学是从老子而来。老子曰："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"这是向内收敛。又曰："无为则无不为矣。"这是向外发展。《中庸》"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"，正是老子家法。老子又曰："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于家，其德乃馀，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，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，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"我们绘之为图，岂不与丁图一样？足知孔老学说，原是一贯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尧典曰："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于变时雍。"绘出图来，也与丁图一样，足知孔门学说，是尧舜家法。

西人讲个人主义的，反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。讲国家主义的，反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。讲社会主义的，反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。个人即所谓我，社会即所谓天下。西人之我也，国家也，天下也，三者看为不相容之物，存其一必去其二。而中国之学说则不然，把此三者融合为一，细玩了图，于三者之间，还要添一个家字，老子还要添一个乡字，看起来，并无所谓冲突。《礼记》曰："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。"此种学说，何等精粹。自西人眼光看来，世界处处冲突，此强权竞争，优胜劣败之说所由来也。《中庸》曰："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"处处取平行线态度，绝无所谓冲突。所以要想世界太平，非一齐走入中国主义这条路不可。

中西人士，聪明才智是相等的，不过研究的方法，稍有不同。西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物理，中国古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人事。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，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，创出物理上种种学

说；中国古人，用仰观俯察的法子，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，创出人事上种种学说。然而物理上种种学说，逃不出力学规律，人事上种种学说，逃不出心理学。我们定出一条臆说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"即可将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，也即是将中西学说沟通为一。

中国古人所说上行下效，父慈子孝，与夫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一类话，都含磁电感应原理。社会上一切组织，看似无有条理，而实极有条理，看似不科学，而实极合科学。本书所绘甲乙丙丁四图，纯是磁场现象，厘然秩然，可说中国古人是将磁电原理运用到人事上来了，西人则父子兄弟夫妇间的权利义务，都用簿式计算，以致人与人之间，冷酷无情，必须灌注以磁电，才有一种祥和之气。

中国古人，喜欢说与天地合德、与天地同流一类话。初看去，不过是些空洞的话，而今科学昌明了，大家都知道：所谓天体，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。古人窥见了真理，他说与天地合德同流，无异说：吾人作事，要与力学规律符合。

吾人作事，根于心理，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水之变化，即是力之变化，古人论事；多以水作喻，可以说：都是援引力学规律。老子曰："上善若水。"孔子在川上曰："逝者如斯夫。"孟子曰："源泉混混。"他如："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"与夫"器方则水方，器圆则水圆。"等等说法，无一不取喻于水。孙子曰："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，故兵无常形，水无常势。"故孙子十三篇，俱可以力学规律绳之。如本书第六章，举孙子所说："吴人越人，同舟济而遇风。"韩信背水阵，引孙子语："置之死地而后生。"俱可本力学规律，绘图说明。

宋儒子《孔记》中，特别提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程朱诸人，复精研易理，于真理都有所窥见。周子太极图，俨然是螺旋式的回旋状况，所以宋儒之理学，能于学术上开一新纪元。宋儒发明了理学，愈研究愈精微，到了明朝王阳明出来，他的学说风靡天下，我们只把阳明提出来研究即是了。他的学说，最重要者：（1）致良知；（2）知行合一。此二者均含有力学原理。

（1）致良知。王阳明传习录说："人的良知，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。"草木暂不说，请问瓦石是无生之物，良知安在？我们把瓦石加以

分析，除了泥沙，别无他物，细加考察，即知它有凝集力，能把泥沙分子结合拢来，对于外物有一种引力，把瓦石向空抛去，它能依力学规律向下而坠。由此知：阳明所谓良知，不外力之作用罢了。阳明所说的良知，与孟子所说的良知不同。孟子指仁爱之心而言，只是一种引力，阳明则指是非之心而言，是者自必引之使近，非者自必推之使远，具有向心离心二力之作用，故阳明学说，较孟子学说圆满。我们这样的研究，即知阳明所谓致良知者，无非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事事物物而已。

（2）知行合一。阳明说："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"他这个道理，可画根力线来说明。例如：我闻友人病重，想去看他。我心中这样想，即心中发出一根力线，直射到友人方面，我由家起身，即是沿着这根力线一直前进，直到病人面前为止。知友人病重，是此线之起点，故曰："知是行之始。"走到病人面前，是此线之终点，故曰："行是知之成。"两点俱在一根直线上，故曰："知行合一。"一闻友病，即把这根路线画定，故曰："知是行的主意。"画定了，即沿着此线走去，故曰："行是知的工夫。"阳明把明德亲民二者，合为一事，把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五者合为一事，把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八者合为一事，都是用的这个方式，都是在一根直线上，从起点说至终点。

王阳明解释《大学·诚意章》"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"二句，说道："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，只见好色时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，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，只闻恶臭时，已自恶了，不是闻后别立一个心去恶。"他这种说法，用磁电之理一说就明白了。"异性相引，同性相推"，是磁电的定例。能判别同性异性者，知也，引之推之者，行也。我们在讲室中试验，即知道：磁电一遇异性，立即相引，一遇同性，立即相推，并不是先把同性异性判定了，然后才去引之推之。知行二者，简直分不出来，恰是阳明所说"既知即行"的现象。

阳明说的"知行合一"乃是思想与行为合一，如把知字改为思想二字，更觉明了，因为人的行为，是受思想支配的。故阳明曰："知是行的主意"。所以我们观察人的行为，即可窥见其心理，知道他的心理，即可预料其行为。古人说"诚于中，形于外。"又说："中心达于面目。"又说："根于心，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旋于四体"等语。我们仔细

研究，即知这些说法，很合力学规律。心中起了一个念头，力线一动，即依着直线进行的公例，达于面目，跟着即见于行事。但有时心中起了一个念头，竟未见诸实行。这是甚么缘故呢？是心中另起一种念头，把前线阻住了，犹如起身去看友人之病，行至中途，发生障故，路线被阻一般。此种现象，在阳明目中看来，仍与实行了无异，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实行，只要动了看病人的念头，即等于行。故曰：知行合一。

阳明说："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"普通心理学，分知、情、意三者，这"好好色"，明明属乎情。何以谓之行呢？因为一动念，力线即射到色字上去了，已经是行之始，故阳明把情字看作行字，他说的"知行合一"乃是"知情合一"。所以我们要想彻底了解阳明学说，必须应用力学规律，根据他所说"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"，绘出一根直线，才知他的学说不是空谈，而是很合自然之理的。

十一 经济、政治、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

我国古代，不但哲学家的学说，合得到力学原理。就是大政治家的政策，也合得到力学原理。以春秋战国言之，其时外交上发生两大政策，第一是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，第二是苏秦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政策。这两大政策，俱合力学规律，故当时俱生重大的影响。管仲的政策是尊周攘夷，他提出尊周二字，九合诸侯，把全国力线集中于尊周之一点，内部力线，既已统一了，然后向四面打出，伐狄，伐山戎，伐楚，遂崛起而称霸了。春秋时楚国最强，齐自襄公之乱，国力微弱，远非楚敌，召陵之役，齐合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诸国以击楚，是合众弱国以攻打一个强国，合得到力学上的合力方式，所以能取胜。后来晋文公合齐来秦诸国以伐楚，也是师法管仲政策，采用合力主义。

苏秦合六国以攻强秦，这是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六国各发出一根力线，集中于攻打强秦之一点，其政策名曰合纵，是合六根力线，从纵

的方向向强秦攻去，也是一种合力主义，故他的政策实行后，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。

诸葛孔明，是三代下第一个政治家，他的外交政策，是联吴伐魏，合两个弱国，攻打一个强国。史称："孔明自比管仲、乐毅"。孔明治蜀，略似管仲治齐，以之自比，尚属相似。请问孔明生平哪一点像乐毅，为甚以之自比？我们考《战国策》：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，率燕赵楚魏宋五国之兵以伐齐；孔明的《隆中对》，主张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东联孙权，然后北伐曹魏，与乐毅和燕昭王那篇议论完全相似。可知孔明自比管乐，全是取他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这一点。这是孔明在南阳同诸名士研讨出来的政策，不过古史简略，只载"自比管仲乐毅"一句，未及详言之耳。后来孔明的政策成功，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，二人实际联合了，他正在写字，手中之笔都落了，由此知合力主义之利害。

大凡列国纷争之际，弱小国之惟一办法，是采用合力主义。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，已经成了历史上铁则。而强国对付之推一办法，是破坏他的合力主义，设法解散弱国之联盟，故六国联盟成功，秦即遣张仪出来挑拨离间，吴、蜀联盟成功，曹操即设法使孙权败盟。

弱国能否战胜强国，以弱国之合力主义能否贯到彻底为断。齐合八国之师以伐楚，晋合四国之师以伐楚，燕合五国之师以伐齐，是合力到底，故能成功。苏秦合六国以抗秦，而六国自相冲突，故归失败；吴、蜀联盟，中经孙权败盟，关羽被杀，后来虽重行联合，而势力大为衰减，故仍不能成功。

合力主义，不但施之外交，且应施之内政。齐桓之能够称霸，是由管仲作内政，寄军令，内部力线是一致的；孔明治蜀，内部力线也是一致，故魏人畏之如虎。秦自商鞅而后，内部事事一致。六国既彼此相冲突，而各国内部复不讲内政，故秦兴而六国灭。管仲与宁鲍诸人，同心一德，合得到合力主义，故成功；苏秦有一个好友张仪，反千方百计，驱之入秦，违反合力主义，故失败。

主持国家大计，贵在把全国力线，根据都发展出来，集中于中央政府，用以对外，自然绰有徐裕，所以身负国家重责的人，必须有笼罩万有的气象。古人云："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"即是此种气象，秦曰："如有一介臣，断断猗，无他技，其心体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技，

若己有之，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如自其口出。”也是此种气象。刘邦豁达大度，能把敌人方面的韩信、陈平、黥布、彭越等诸人收己用，智者尽其谋，勇者尽其力。项羽则局量狭小，不惟韩彭诸人容留不住，连一个忠心耿耿的范增也不能用。刘邦用众人之力，项羽用一己之力，故汉兴而楚灭。

武王曰：“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。”这是违反了合力主义。“予有臣三千，推一心。”这是合乎合力主义，故武王兴而殷纣灭。他如光武之推心置腹，诸葛孔明之集思广益，都可谓之实行合力主义。

互竞主义，力线是横的，彼此相互冲突；互助主义，彼此虽不冲突，然力线仍是横的，成立不起政府，不得不流而为无政府主义。若行合力主义，则力线是纵的，可以成立政府，而力线则根据直达中央，彼此不相冲突。讲尼采的超人主义，其弊流于你死我活；讲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，其弊流于你活我死。最好是行合力主义，你与我大家都活。

我国治国之术，有主张用仁义感化的，其说出于孟子一派的儒家，是建筑在性善说上面。性善说是一偏之见，故纯用仁义感化有流弊；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，其说出于申、韩一派的法家，是建筑在性恶说上面。性恶说是一偏之见，故纯用法律制裁，也有流弊。我们知道：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，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这是把性善说和性恶说合而为一，施之治国，则一面用仁义感化，等于治水者之疏瀹，使之向下流去，一面用法律制裁，等于治水者之筑堤，不使其横流。治水者，既是疏瀹与筑堤并行不悖，所以治国者仁义，法律亦可并行不悖。水之变化，即是力之变化，用治水之法治民，断不会错。

世界之所以纷争不已者，实由互相反对之两说，同时并行之故，而此互相反对之两说，大都一则建筑在性善说上，一则建筑在性恶说上。例如：个人主义经济学之鼻祖是斯密士，他说：“人类皆有自私自利之心，利用这种自私自利之心，就可把人世利源尽量开发出来。”因主张营业自由。故知《原富》一书，是建筑在性恶说上。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倡始者，是圣西门诸人，他们都说：“人性是善良的，上帝造人类，并莫有给人类罪恶痛苦，人类罪恶痛苦，都是恶社会制成的。”故知共产诸书，是建筑在性善说上，性善说与性恶说既两相冲突，故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就两相冲突。民主主义的学说，发源于卢梭。卢梭说：“自然

之物皆善，经人类之手，乃变而为恶。”这是属乎性善说。倡独裁主义者，则谓人心好乱，必须采用独裁制，才能镇压下去，这是属乎性恶说。性善说与性恶说，既两相冲突，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，遂两相冲突。达尔文倡优胜劣败之说，发挥人类自私自利之心，这是属乎性恶说。克鲁泡特金，起而反对之，说：“动物和原始人类，都知道互助。”这是属乎性善说。性善说与性恶说，既两相冲突，故达尔文学说，克鲁泡特金学说，遂两相冲突。我们试思：同一社会之中，有种种两相冲突之主张，同时并行，世界焉得不大乱？

我们要想解除世界纷争，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不可，人性研究清楚了，再来定经济政治外交三者的实施办法。我们主张：性无善无恶，算是把性善说与性恶说合而一之，因此我们拟具的经济制度，是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，拟具的政治方式，是把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合而一之。至于外交方面，我们把被侵略者联合为一，算是互助主义，进而对侵略者抗战，算是互竞主义，这可说是把克鲁泡特金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合而一之。基于经济之组织，生出政治之组织，基于经济政治之方式，生出外交之方式，由民生，而民权，而民族，三者一以贯之，而三民主义，就成为整个的了。

孙中山先生学说，业经国内学者详加阐发，独于他的学说，系根据力学原理立论，许多人都未注意。他讲五权宪法，曾说道：“政治里头，有两个力量，好比物理学里头，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。”他主张两力平衡，才能达到安全现象。他讲民权主义，以机器为喻，以机器中之活塞为喻。又说：放水制和接电纽等等，都是把力学上原理运用到政治方面，中山先生把人事与物理会通为一，故创出的学说，很合宇宙自然之理。

此书初版，对于政治经济外交三者，本着合力主义，一一拟具实施办法。此次再版，因为曾写了一本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又写了一本《制宪与抗日》，后来又总括大意，写入《我的思想统系》中。其大旨：关于政治一层，人民行使四权，先从一村一场开始。各村各场办好了，联合为区，各区办好了，联合为县，由是而省而全国。四万万五千万人，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，根根力线，直达中央，成一个合力政府。大总统去留之权，操诸人民之手；兴革大政，由全体人民裁决。大总统

违法，可由人民总投票，撤职讯办，是为民主主义。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，任何人不能违反，俨然专制时代之皇帝，是为独裁主义。像这样的办法，民主制和独裁制，即合而为一了。关于经济一层：土地、工厂、银行和经济贸易四者，一律收归国有，其他经济之组织，悉仍其旧，个人主义、社会主义融合为一。人民私有之土地，始而收归一村一场公有，继而收归全区公有，全县公有，全省公有，终而收归全国公有（详细办法，具载拙著《我的思想统系》中）。关于外交一层，由我国出来，组织“新的国际联盟”，喊出“人类平等”的口号，以弱小民族为主体，进而与列强联合，以这个新的国联为推行我国王道主义之机关，我们最终的目的，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，把全世界土地收归全人类公有。

自有历史以来，都是人同人争，其力线是横的。我们改为纵的方向，悬出地球为目的物，合全人类向之进攻，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，全人类平分，人同人争之现象，永远消灭，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。

社会问题之商榷

自 序

我从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，在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写《厚黑丛话》。每日写一二段，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来，连同新感想，融合写之。乃写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，历时九月，印了三小册，觉得心中想写的文字，还莫有写出好多。长此写去，阅者未免讨厌，因变更计划，凡新旧作品，已经成了一个系统者，各印专册。《厚黑丛话》暂行停写，其他心中想写的文字，有暇时，再写一种《厚黑余谈》。

我打算刊为专册的，计：（1）《厚黑学》；（2）《心理与力学》；（3）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；（4）《考试制之商榷》；（5）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共五种。厚黑学业于本年五月内印行，兹特将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付印。

民国十六年，我做了一篇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》，载入《宗吾臆谈》内，十七年扩大为一单行本，十八年印行，名曰：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。此书发表后，据朋友的批评，大概言："理论尚不大差，惟办法不易实行，并且有些办法，恐非数百年后办不到。"这种批评，我很承认。我以为，改革社会，等于修房子，应当先把图样绘出，然后才按照修造。如或财力不足，可先修一部分，陆续有款，陆续添修，最终就成为一个很完全整的房子了。倘莫得全部计划，随便修几间来住，随后人多了，又随便添修几间，再多又添几间，结果杂乱无章，不改修，则人在里面，拥挤不通，欲改修，则须全行拆掉，筹款另建，那就有种种困难了。东西各国，旧日经济之组织，漫无计划，就是犯了这种弊病。

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，眼光必须注及数百年后，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。斯密士著《原富》，缺乏此种眼光，造成资本主义，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。达尔文缺乏此种眼光，倡优胜劣败之说，以强权为公理，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。孟德斯鸠，缺乏此种眼光，倡三权分立之说，互相牵制，因而激成反动，产出墨索里尼、希特勒等专制魔王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，这是很可痛心的。

我辈改革社会，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，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，奋力做去，社会才能日益进化。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，大家向之而趋，步骤一致，社会才不至纷乱。

《礼记》上有《礼运》一篇，本是儒家的书，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。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，至今二千多年，并未实现。当日著书的人，明知其不容易实现，而必须这样说者，即是悬出最远大的目标，使数千年后之人，向之而趋。也即是绘出一个房子的样式，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，经过若干年，这个完整的房子，终当出现。著《礼运》的人，虽然提出此种目标，而实际上，则从小康下手，一步一步的做去。至于释迦佛所说的境界，更非历劫不能到，然而有了此种目标，学佛的人，明知今生不能达到，仍不能不苦苦修习。东方儒、释、道三个教主，眼光之远大，岂是西洋斯密士一类学者所能梦见？有了西洋这类目光短浅的学者，才会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，直接间接死了数千万人。大战过后，仍不能解决，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，如不及早另寻途径，可断跟着又要第三次大战，第四次大战。

墨索里尼，希特勒和日本少壮军人，真是瞎子牵瞎子，一齐跳下岩。我国自辛亥革命，至今已二十五年，政治和经济，一切机构，完全打破，等于旧房子，全行拆掉，成了一片平地，我们应当斟酌国情，另寻一条路来走。如果盲目的摹仿西洋，未免大错而特错。

房子是众人公共住的，我们要想改修，当多绘些样式，经众人细细研究，认为某种样式好，才着手修去。不能凭着一己的意见，把众人公住的房子，随便拆来乱修。我心中有了这种想法，就不揣冒昧，先绘个样式出来，请阅者严加指驳，将不合的地方指出；同时就说：“这个办法，应当如何修改”，另绘一个样式，我们大家斟酌。

本书前四章是理论，第五章是办法，有了这种理论，就不能不有这

种办法。十八年刊行之本，有吴郝姚杨四君的序文。本年四月再版《厚黑学》，已刻入，兹不赘刻，我有自序一首，也删去。第六章《各种学说之调和》，中间删去数段，其余一概仍旧，未加改窜。现在我觉得办法上，有许多地方，应该补充和修改，将来写入《厚黑余谈》，借见前后思想之异同。中华民国二十五年，六月十二日，李宗吾，于成都。

一　公私财产之区分

我们要想解决社会问题，首先当研究的，就是世界上的财物，哪一种应当归诸社会公有，哪一种应当归诸个人私有，先把这一层研究清楚了，然后才有办法。兹将我所研究者分述如下：

第一项，地球的生产力：地球上未有人类，先有禽兽。禽兽渴则饮水，饥则食果实。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天然物，是禽兽公有的，即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，是禽兽公有物。随后人类出来，把禽兽打败了，也如禽兽一般，渴饮饥食，地球上的天然物，归人类所有。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，是人类公有物，任何人都有享受地球上天然物的权利。后来人类繁兴，地球上的天然物不够用，才兴耕稼，把地球内部蕴藏的生产力，设法取出来，以供衣食之用。于是大家占据地球上面一段，作为私有物，就有所谓地主了。地主占据之方法有二，最初是用强力占据，后来才用金钱买卖。无论哪一种都是把地球的生产力据为私有，我们须知这地球的生产力，是人类的公有物，不惟不该用强力占据，并且不该用金钱买卖，不惟资本家不该占有，就是劳动家也不该占有。为甚么劳动家不该占有呢？例如我们请人种树，每日给以工资口食费壹元。这壹元算是劳力的报酬，所种之树，经过若干年，出售与人，得十元百元或千元。我们所售者，是地球内部的生产力，不是种树人的劳力，因为他的劳力，是业已报酬了的。当初种树的工人，即无分取树价之权。地球是人类公有物，此种生产力，即该人类平摊，故我主张的第一项，即是地球生产力，应该归诸社会公有。

第二项，机器的生产力：最初人民作工，全靠手足之力，后来机器

发明，他那生产力就大得了不得。我们川省轿夫担夫的工价，大约每日壹元，如用手工制出之货，每日至多不过获利壹元。这壹元算是劳力的报酬，如改用机器，一人之力，可抵十人百人千人之力，所获之利，十元百元或千元不等。这多得的九元，或九十九元，或九百九十九元，是机器生产力的效果，不是劳力的效果，也应该人类公有，不该私人占有。就说工人劳苦功高，有了机器，莫得劳力，他的生产力不能出现，我们对于工人，加倍酬报，每人每日给以二三元，或四五元罢了，所余的五元，或九十五元，或九百九十五元，也应该人类平摊。被资本家夺去，固是不平之事，全归工人享用，也是不平之事。因为发明家发明机器，是替人类发明的，不是得替哪个私人发明的。犹之前辈祖人遗留的产业一般，后世子孙，各有一份，我们对发明家，予以重大的报酬，他那机器，就成为人类公有物。现在通行的机器，发明家早将发明权抛弃了，成了无主之物，他的生产力，即该全人类公共享受。故我主张的第二项，即是机器生产力，应该归诸社会公有。

上面所举种树人及在工厂做工之人，是就劳力之显著者而言，若精密言之，则种树时尚有规划者，种后有守护者，砍售时有砍者售者，工厂中亦有经理监工售货种种劳工，除去此等人之报酬外，才是纯粹的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，才应归社会公有。

第三项，人的脑力体力：各人有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既算是各人的私有物。身体既是各人私有物，则脑之思考力和手足之运动力，即该归诸个人私有，不能把他当作社会公有物，不能说使用了不给代价。故我主张的第三项，即是各人的脑力体力，应该归诸个人私有。

我们把上面三项的性质研究清楚了，就可定出一个公例曰："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，是社会公有物，不许私人用强力占据，或用金钱买卖。脑力体力，是个人私有物，如果要使用他，必须给予相当的代价。"

（1）斯密士的学说，律以上述公例，就发现一个大缺点，各工厂除开支工资而外，所得纯利，明明是机器生出来的效果，乃不归社会公有，而归厂主私有，这就是掠夺了机器的生产力，是极不合理的事。又田地中产出之物，地主把他划作两部分，一部分归佃农自用，这是劳力的报酬，是很正当的，另一部分，作为租息，由地主享用，这一部分明明是使用地球的代价，乃不归社会公有，而归地主私有，这就是掠夺了

地球的生产力，也是极不合理的事，斯密士的学说。承认厂主有享受纯利之权，承认地主有享受租息之权，犯了夺公有物以归私之弊。有了这个缺点，所以欧美实行他的学说，会造成许多资本家，会酿出劳资的大纠纷。

（2）孙中山的学说，律以上述公例，就觉得他的学说，是很圆满的，是与公例符合的。阅者如果不信，试取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，反复熟读，再追览他的著作及一切演说词，无论如何，总寻不出他夺私有物以归公的地方，也寻不出夺公有物以归私的地方。

二 人性善恶之研究

大凡研究古人之学，首先要他研究对于人性之主张，把他学说之出发点寻出了，然后才能把他学说之真相，研究得出来。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，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不可，是无从评判的。孟子主张性善，荀子主张性恶，二说对峙不下，是二千余年未曾解决之悬案。所以中国学术史上，生出许多纠纷，其实二说俱是一偏之见。宋以后儒者，笃信孟子之说，一部宋元明清学案，触处皆是穿凿矛盾，中国如此，欧洲亦然。因为性善说性恶说，是对峙的两大派。所以经济学上就生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派，一派说人有利己心，一派说人有同情心，各执一词，两派就纠纷不已了。

斯密士认定人人都是徇私的，人人都有利己心，但他以为这种自私自利之心，不惟于社会上无损，并且是非常有益的。因为人人有贪利之心，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，开发无遗，社会文明，就因而进步，虽说人有自私自利之心，难免不妨害他人，但是对方也有自私自利之心，势必起而相抗，其结果必出于人己两利，各遂其私之一途。他全部学说，俱是这种主张，他不料后来资本家专横到了极点，劳动家毫无抵抗能力，致受种种痛苦。他的学说，得了这样的结果。

社会主义之倡始者，如圣西门等一流人，都是悲天悯人之君子，目睹工人所受痛苦，倡为共产之说。他们都说："人性是善良的，上帝造

人类，并没有给人类罪恶痛苦，人类罪恶痛苦，都是恶社会制成的。”我们看他这种议论，即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，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。

孟子主张性善，他举出的证据，共有两个：（1）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”；（2）“乍见孺子将入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。他这两个证据，都是有破绽的。他说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”。这话诚然不错，但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，把他的亲生孩子，抱出来当众试验。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，小儿见了，就伸手来拖，母亲如不给他，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。小儿就会伸手，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，放入他的口中。请问孟子，这种现象算不算爱亲呢？孟子又说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这个说法，我也承认，但是我要请问孟子，这句话中，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，何以下文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，“无恻隐之心非人也”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，是何道理？又孟子所举的证据，是孺子对于井，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，那个时候，我是立在旁边，超然于利害之外。请问孟子，假使我与孺子，同时将入井，此心作何状态？请问此刹那间发出来的念头，究竟是恻隐？是怵惕？不消说，这刹那间，只是有怵惕而无恻隐，恻隐是仁，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，怵惕是惊惧的意思，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。吾人怕死之心，根于天性，乍见孺子将入井，是猝然之间，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。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，心中连跳几下，这即是怵惕。我略一审视，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，不是我死在临头，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，化怵惕而为恻隐。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，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，先有我而后有孺子，先有怵惕而后有恻隐，天然顺序，原是如此。怵惕是利己之心，恻隐是利人之心，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。主张性善说者，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？既无有我，焉得有孺子？既无怵惕，焉得有恻隐？

研究心理学，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，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，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。佛家言无人无我，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，目的各有不同，故不能高谈佛理。孟子言怵惕恻隐，我们从怵惕恻隐研究起走就是了。怵惕是利己心，恻隐是利人心。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，故倡性恶说；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，故倡性善说。我们可以说：荀子的学说，以怵惕为出发点；孟子的学说，以恻隐为出发点。王阳明传习录

说："孟子从源头上说来，荀子从流弊上说来。"荀子所说，是否流弊，姑不深论。怵惕之上，有无源头，我们也不必深求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，则确非源头。怵惕是恻隐之源，恻隐是怵惕之流，王阳明所言源流二字，未免颠倒了。

孟子的学说，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，但怵惕二字，他是看清楚了的。他知道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，因教人再扩而充之，以达于四海，其说未尝不圆满。他的学说，纯是推己及人，所以他对齐宣王说："王如好货，与民同之"，"王如好色，与民同之"，又说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"，又说："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"。吾字其字，俱是己字的代名词，孟子的学说，处处顾及己字，留得有己字的地位，本无何种弊害，惜乎他的书上，少说了一句"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"。传至宋儒，就误以为人之天性，一发动出来，即是恻隐，以恻隐二字为源头，抹杀了怵惕二字。元明清儒者，承继其说，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，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，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，不免损伤己字，因而就弊端百出。

宋儒创"去人欲存天理"之说，天理隐贴恻隐二字，把他存起，自是很好。惟人欲二字，界说不清，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，想设法把他除去，成了"去怵惕存恻隐"，那就坏事不小了。程子说："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"他不知死之可畏，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。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，他发此不通之论，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。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，于怵惕恻隐四字，欠了体会的缘故。张魏公符离之败，死人无算，他终夜鼾声如雷，其子南轩，夸其父心学很精，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。怵惕是恻隐的根源，去了怵惕，就无恻隐，就会流于残忍，这是一定不移之理。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，身临刑场，谈笑自若，就是明证。

据上项研究，可知怵惕与恻隐，同是一物，天理与人欲，也同是一物，犹之煮饭者是火，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。宋儒不明此理，把天理人欲，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，创出"去人欲"之说，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。王阳明说："无事时，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，逐一追究搜寻出来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鼠，一眼看着，一耳听着，才有一念萌动，即与克去，斩钉截铁，不可姑容，与他方便，不可窝藏，不可放他出路，方是真实用功，方能扫除廓清。"这种说法，

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，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，立即把他扑灭，断绝火种，方始为快。传习录中又说："一友问，欲于静坐时，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，逐一搜寻，扫除廓清，恐是剜肉做疮否？先生正色曰：这是我医人的方子，真是去得人病根，更有大本事人，过了十数年，亦还用得着，你如不用，且放起，不要作坏我的方子，是友愧谢。少间曰："此量非你事，必吾门稍知意思者，为此说以误汝。在坐者悚然。"我们试思，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，他平日讲学，任人如何问难，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，从未动气，何以门人这一问，他会动气？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之误点指出？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？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，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，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，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，这是他学说的缺点，他的门人这一问，正击中他的要害，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。

究竟剜肉做疮四字，怎样讲呢？肉喻天理，疮喻人欲，剜肉做疮，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，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，门人的意思，即是说：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，即把他扑灭，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，请问拿甚么东西去煮饭呢？换言之，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，人就不会吃饭，岂不饿死吗？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，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，人类岂不灭绝吗？这个问法，何等利害？所以阳明无话可答，只好忿然作色了。宋儒去人欲，存天理，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。

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，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，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，并不是截然两事。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，是以怵惕为出发点，讲共产的人，说人有同情心，是以恻隐为出发点，前面曾说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，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，社会主义，个人主义之放大形。

据我的研究，人性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善恶二字，都是强加之词。我举一例，就可证明了：假如有友人某甲来访我，坐谈许久，我送他出门去后，旋有人来报，说某甲走至街上，因事与人互殴，非常激烈，现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。我听了这话，心中生怕某甲受伤，赶急前往救援。请问这种生怕某甲受伤之心，究竟是善是恶？假使我们去问孟子，孟子一定说："此种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证。因为某甲是你的朋友，你怕他受伤，这即是爱友之心。此种心理，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

出，人世种种善举，由此而生，古之大圣大贤，民胞物与，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。现在所谓爱国，所谓爱人类，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。此种心理是维持世界和平之基础，你应该把他好生保存，万不可失掉。”假如我们去问荀子，荀子一定说：“此种心理，即是性恶的明证。因为某甲是人，与某甲相殴之某乙也是人，人与人相殴，你不怕某乙受伤，而怕某甲受伤，不去救某乙，而去救某甲，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。此种心理，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，人世种种恶事，由此而生。欧洲大战数年，死人无算，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。日本在济南任意惨杀，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。此种心理，是扰乱世界和平之根苗，你应该把他铲除净尽，万不可存留。”上面所举之例，同是一事，两面说来，仅是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所以性善性恶之争，就数千年而不能解决。因为研究人性，有两说对抗不下，所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，就对抗不下。

据我的研究，听见友人与人斗殴，就替友人担忧，怕他受伤，这是心理中一种天然现象，犹如磁电之吸引力一般，不能说他是善，也不能说他是恶，只能名之曰天然现象罢了。我们细加考察，即知吾人任发一念，俱是以我字为中心点，以距我之远近，定爱情之厚薄。小儿把邻人与哥哥相较，觉得哥哥更近，故小儿更爱哥哥。把哥哥与母亲相较，觉得母亲更近，故小儿更爱母亲。把母亲与己身相较，自然更爱自己，故见母亲口中糕饼，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。把朋友与别人相较，觉得朋友更近，故听见朋友与别人斗殴，就去救朋友。由此知人之天性，是距我越近，爱情越笃，爱情与距离，成反比例，与磁电的吸引力相同，此乃一种天然现象，并无善恶之可言。我所说小儿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，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，少长敬兄的现象，俱是一贯的事，并不生冲突。孟子看见小儿爱亲敬兄的现象，未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，故说性善；荀子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，未看见爱亲敬兄的现象，故说性恶。各人看见半截，就各执一词，我们把两截合拢来，孟荀两说，就合而为一了，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，也就联为一贯了。

古今学说之冲突，都是由于人性之观察点不同，才生出互相反对之学说，其病根就在对于人性，务必与他加一个善字或恶字，最好是把善恶二字除去了，专研究人性之真相。如物理学家，研究水火之性质一般，只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来，自然就有解决的方法。假如研究物理

的人，甲说水火性善，乙说水火性恶，问他们的理由，甲说水能润物，火能煮饭，是有益于人之物，是谓性善，乙说水能淹死人，火会烧房子，是有害于人之物，是谓性恶，像这样的说法，可以争辩数千年不能解决。不幸孟子之性善说，荀子之性恶说，其争辩的方式，纯是争辩水火善恶之方式，所以两说对峙二千余年而不能解决。物理学家，只是埋头研究水火之性质，用其利，避其害，绝不提及善恶二字，此种研究法，我们是应该取法的。

著者尝谓小儿爱亲敬兄，与夫夺母亲口中食物等事，乃是一种天然现象，与水流湿火就燥的现象，是一样的，不能说他是善，也不能说他是恶。我多方考察，知道凡人任起一念，俱以我字为中心点，曾依孟子所说性善之理，绘出一图，又依荀子性恶之理，绘出一图，拿来照观之，两图俱是一样，两图俱与物理学中磁场现象相似（见拙著《心理与力学》)，因臆断人之性灵，和地球之引力，与夫磁气电气，同是一物。我们把地球物质的分子解剖之，即得原子，把原子解剖之，即得电子，据科学家研究，电子是一种力，这是业经证明了的。吾身之物质，无一不从地球而来，将吾身之物质解剖之，亦是由分子而原子、而电子，也是归于一种力而后止。吾人的身体，纯是电子集合而成，所以吾人心理的现象，与磁电的现象绝肖，与地球的吸引力也绝肖。

人有七情，大别之只得好恶二者，好者引之使近，恶者推之使远，其现象与磁电相推相引是一样的。磁电同性相推，异性相引，与人类男女相爱，同类相嫉是一样。人的心，分知、情、意三者，意是知、情的混合物，只算有知、情二者。磁电相推相引，是情的作用。能判别同性异性，是知的作用。是知磁电之性与人性相同，小儿生下地即会吸乳，与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，是一样的。小儿见了食物，伸手取来，放在口中，其作用与地心遇着物体就吸，是一样的。小儿有了这种天然作用，小儿才能生活。地球有了这种天然作用，地球才能成立。小儿夺取食物，固然是求生存，地心吸引物体，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，与夫磁电之相推相引，都是求生存的现象，不如此，即无磁电，无草木，无地球，无人类了。基于此种研究，可知孙中山说：“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。”真是不错。

物理种种变化，逃不出力学公例。人为万物之一，故吾人心理种种

变化，也逃不出力学公例。著者用物理学规律去研究心理学，觉得人心的变化，处处是循着力学轨道走的，可以一一绘图说明。于是多方考察，从历史事迹上，现今政治上，日常琐事上，自己心坎上，理化数学上，中国古书上，西洋哲学上，四面八方，印证起来，似觉处处可通。我于是创了一条臆说：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"曾著一文，题曰：《心理与力学》。所有引证及图解，俱载原作，兹不备述。我于绪论中，曾说："治国之术，有主张用道德感化的，其说出于孔孟，孔孟学说，建筑在性善说上，性善说有缺点，所以用道德治国，会生流弊。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，其说出于申韩，申韩学说，建筑在性恶说上，性恶说有缺点，所以用法律治国，也会生出流弊。我主张治国之术，当采用物理学，一切法令制度，当建筑在力学之上等语，我因此主张国家所订制度，当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，犹如地球绕日一般。地球对于日，有一种离力，时时想向外飞去，日又有一种引力，去把地球牵引着，二力平衡，成椭圆状，所以地球绕日，万古如一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就因而成立了。国家一切制度，当采用此种原理，才能维持和平。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，是谓离力，而乙男之爱情，足以系着他，是谓引力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，是谓离力，而甲女之爱情，足以系着他，是谓引力，二力保其平衡，甲乙两男女之婚姻遂成，故自由结婚之制度，是具备了引离二力的，是为最良之制度。中国的旧婚制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只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，故男女两方，均以为苦。又如欧洲资本家专制，工人不入工厂作工，就会饿死，离不开工厂，缺乏了离力，故酿成劳资的纠纷。本书第五章，主张作工与否，听其自由，这是一种离力。对于作工者，优予报酬，使人见而生羡，这是一种引力。二力保持平衡，愿作工者作工，不愿作工者听其自由，社会就相安无事了。

著者著了《心理与力学》过后，再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觉得他的学说处处与力学公例符合。他讲民族主义说："世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，人为力最大的有两种，一种是政治力，一种是经济力。我们中国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，应该设个方法，去打消这三个力量。"他处处提出力字。又孙中山演说集讲五权宪法说："政治里头，有两个力量，一个是自由的力量，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，政治中有这两个力

量，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，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，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，如果离心力过大，物体便到处飞散，没有归宿；向心力过大，物体愈缩愈小，拥挤不堪。总要两力平衡，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。政治里头，自由太过，便成了无政府，束缚太紧，便成专制，中外数千年来，政治变化，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冲动。”又说：“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，这两个力量，是主张双方平衡，不要各走极端，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，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，或者是单有向心力，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，总要两力相等，两方调和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，成现在的安全现象。”这简直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力学公例。

民权主义第六讲说：“现在分开权与能，所造成的政治机关，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，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，有管理机器的力量，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，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……像这样的分开，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，把人民当作工程师，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，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，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，人民和政府的力量，才可以此平衡。”这就是孙中山把力学上两力平衡之理，运用到政治上的地方。

他又说：“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，像火车轮船，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。蒸汽推动活塞前进以后，再把活塞推回来往不息，机器的全体，便运动不已。人民有了这选举罢免两个权，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，一面可以放出去，又一面可以调回来，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，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，一推一拉，都可以用机器的自动。”推出去是离心力，拉回来是向心力，这也是应用力学原理的地方。这类话很多，不及备引。

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：“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，在外国的大政治家，还没有见到，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，就是《大学》中所说的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，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，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，推到平天下止，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，无论甚么政治哲学家，还没有见到，都没有说出。”我们试把《大学》这段文字拿来研究，格致诚正，是我身内部的工作，暂不必说，今从我身说起走：“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试绘一图，第一圈是我，第二圈是家，第三圈是国，第四圈是天

下，层层放大，是一种离心力现象。“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”层层缩小，是一种向心力现象。这种现象，与磁场现象绝肖。孟子的学说，由怵惕扩充而恻隐，再扩充之以达于四海，又说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，又说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，都是层层放大。孟子主张爱有差等，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现象，孟的学说，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的。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，有个人而无社会，照上面之法绘出图来，只有第一圈之我，我以外各圈俱无。墨子爱无差等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，有了社会，却无个人，如果绘出图来，只有天下之一个大圈，内面各圈俱无。吾人的爱情，如磁气之吸引力一般，杨墨两家的学说，绘出图来，均与磁场现象不类，可知他们的学说，是违反了天然之理。孟子因为杨墨的学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，故出死力去排斥他。因为孔子的学说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，故终身崇拜孔子。现在欧洲讲个人主义的和讲社会主义的，都是落了杨墨两家的窠臼，把两主义看作截然不相容之二物，孙中山不取他们学说，反而取《大学》的说法，真是卓识。

他说：“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，他们的法律，对于父子弟兄姊妹夫妇，各个人的权利，都是单独保护的。打起官司来，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，只问个人的是非怎么样。再由个人放大，便是国家，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，便是空的。”我们把他绘出图来，只有内部一个我字小圈和外部一个国字大圈，不像《大学》那个圈层层包裹，故孙中山说他中间是空的。孙中山又说：“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，先有家族，再推到宗族，再然后才是国族，这种组织，一级一级的放大，有条不紊。”我们细绎“一级一级的放大”这句话。俨然把磁场现象活画纸上，我们由此知，孙中山的学说，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的。

中国的旧家庭，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为美谈，这种制度是渊源于儒家之性善说。欧洲社会主义倡始者，如圣西门诸人，都说“人性是善良的”，与儒家之学说相同，故生出来的制度也就相同。福利埃主张建筑同居舍，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，其制尤与中国家庭相似。讲共产的人，主张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，我国圣贤所创的家庭制，即是想实行此种主张，一家之中，父子弟兄叔侄，实行共产，能读书的读书，能

耕田的耕田，能做官的做官，其余能作何种职业，即作何种职业，各人所得之钱，一律归之公有，这即是“各尽所能”了；一家人的衣食费，疾病时药医费，儿童的教育费，老人的赡养费，一律由公上开支，这可谓“各取所需”了。我们试想，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亲，数人以至数十人，在一个小小场所，施行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组织，都还行之不通，都还要分家，何况聚毫无关系之人，行大规模之组织，怎么会办得好？中国历代儒者，俱主张性善说，极力提倡道德，极力铲除自私自利之心，卒之他们自己的家庭，也无一不是分拆了的，这都是由于性善说有破绽的原故。

孙中山的理想社会则不然，他主张的共产，是公司式的共产，不是家庭式的共产。他建国方略之二，结论说：“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，拟将一概工业，组成一极大公司，归诸中国人民公有。”民国十三年，一月十四日，他对广州商团警察演说道：“民国是公司生意，赚了钱，股东都有份。”又说：“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，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，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。”十三年三月十日，对东路讨贼军演说道：“把国家变成大公司，在这个公司内的人，都可以分红利。”又说：“中华民国，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，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。”由此可知孙中山的理想社会，是公司式的组织，绝非家庭式的组织，现在欧美的大公司，即可说是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。欧美各公司的组织法，比中国家庭的组织法好得多，这是无待说的，所以我们讲共产，应当采欧美公司式，不当采中国家庭式。家庭式的共产制，建筑在性善说上，带得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，公司式的共产制，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，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。欧洲人的家庭组织，与中国人不同，他不知中国家庭之弊，故理想中的社会走入了中国家庭式的轨道，孙中山是中国人，深知旧式家庭之弊，所以他的理想社会，采取欧美公司式，真可谓真知灼见。现在崇拜欧化的人，一面高呼打倒旧家庭，一面文主张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家庭式共产制度，未免自相矛盾。

孙中山民生主义，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，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，我这话，是有实证的。民生主义第四讲说：“洋布便宜过于土布，无论国民怎么提倡爱国，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，来穿土布……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，宁可愿意牺牲，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，是和经济原

则相反，是不能持久的。”我们读这一段文字，即知孙中山对于人性之观察……惟公司式的共产则不然，股东中有在公司中办事的人，予以相当的报酬，不愿在公司中办事的人，听其自由，如此则“有所能而不尽”，也就无妨于事了。股东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，由各人拿钱来买，自然不会有“取所需而无厌”的事，这就是公司式的共产远胜家庭式共产的地方。中国的旧家庭，往往大家分小家，越分越小，欧美的公司，往往许多小公司，合并为一大公司，越合越大。中国旧家庭，数人或十数人，都会分裂，欧美大公司，任是几百万人，几千万人，都能容纳，我们把这种公司制扩大，使他容纳四万万人，就可成为全国共产，再扩之能容纳十五万万人，就可成为世界共产，这即是大同世界了。

我把中国的旧家庭，看作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场所，把欧美的大公司，看作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，就试验的结果，下一断语曰：“公司式的共产制，可以实行，家庭式的共产制不可实行。”将来我们改革社会，订立制度的时候，凡与中国家庭制类似的制度，都该避免，遇有新发生的事项，我们即在欧美公司中搜寻先例，看公司中遇有此类事项，是用甚么方法解决，如此办去，方可推行无阻，著者有了此种意见，所以第五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，是采用公司制的办法。

我著《心理与力学》，创一臆说曰：“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此发表后，很有些人说我是牵强附会的，后来我曾经考得：欧洲十七世纪时，有白克勒者，曾说：“道德吸引，亦若物理之吸力。”他尝用离心力和向心力，以解释人类自私心和社交本能。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，曾有人用牛顿之引力律，以解释社会现象。可知我所说的，古人早已说过，并不是何种新奇之说。又我主张性无善无恶，这个说法，中国告子早已说了的，告子说：“性犹湍水也。”湍水之动作，纯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。我说：“心理变化、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诸人之说，归纳拢来的一句话，既是中外古人，都有此种学说，我这个臆说，或许不会大错。我用这个臆说去考察孙中山的学说，就觉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，他改革社会的办法，确与力学公例符合。兹再举两例如下：

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，他说：“令人民自己报告地价，政府只定两种条件，一是照原报的价抽税，一是照价由政府收买。这个办法，可使

人人不敢欺蒙政府，不敢以多报少，或以少报多，效用是很妙的。因为人民以少报多，原意是希望政府去买那块地皮，假设政府不买，要照原报之价会抽税，岂不受重税之损失吗？至于以多报少，固然可以减轻税银，假若政府要照原价收买，岂不是因为减税，反致亏本吗？地主知道了这种利害，想来想去，都有危险，结果只有报一个折中的实价，法则之善，是再无有复加的。”（见孙中山演说集第一编三民主义）他这个办法，即是暗中运用力学原理。地价报多报少，可以自由，这是离心力，但是报多报少，都怕受损失，暗中有一种强制方，即是向心力，两力平衡，就成为折中之价了。孙中山讲民权主义曾说：“机器之发动，全靠活塞，从前的活塞，只能推过去，不能推回来，必用一个小孩子，去把他拉转来，后来经一个懒孩子的发明，逐渐改良，就成了今日来往自如的活塞，推过去了之后，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。”这是由于从前的机器，只有推出去的离心力，没得拉回来的向心力，后来经懒孩子的发明，把二力配置停匀，机器就自能运动不已，不须派人拉动了。外国对于地价一层，设专官办理，不时还要发生诉讼之事，就像从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动一样，偶尔管理不周，机器就会发生毛病，这是由于此种制度，未把二力配置停匀之故。孙中山定地价的法子，内部藏有自由和强制两个力量，这两个力量是平衡的，所以不须派人去监督，人民自然不会报多报少，真是妙极了，非怪他自己称赞道：“法则之善，无有复加。”

更以孙中山之考试制言之，中国施行考试制的时候，士子愿考与否，听其自由，这是离力，考上了有种种荣誉，使人歆羡，又具有引力，二力是平衡的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子，政府不消派人去监督他，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发愤用功。现在的学生，若非教职员督课严密，学生就不会用功，就像从前机器中的活塞，要派一个小孩子去拉动一般。现在各省设教育厅，设省视学，各县设教育局，设县视学，各校又设校长和管理员，督促不可谓不严，而教育之窳败也如故，学生之嬉惰也如故，其所以然之理，也就可以想见了孙中山把考试制采入五权宪法，厘订各种考试制度，以救选举制度之穷，可算特识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孙中山主义，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，其观察人性，绝未落性善性恶窠臼，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去，他的主张，无一不循力学公例而行，无一不合科学原理。

三 世界进化之轨道

大凡一国之中，每一制度俱与其他制度，有连带关系，我们试把古今中外会通视之，即知每一时期的制度，都有共通的性质，都与那个时期的情形相适应，犹之冬寒夏暑一般，每一时期的饮食衣服，俱与那个时期气候相适应。我们如想改革社会，应当先把世界进化之趋势，审察清楚，一切设施，才不至违背潮流。前一章，人性善恶之研究，是置身在斯密士和孙中山学说之内部，搜寻他的立足点，这一章，是站在他们学说之外部，鸟瞰世界之趋势。譬如疏导河流者，必须站在河侧高山之上，纵览山川形势，与夫河流方向，才知道何处该疏漏，何处该筑堤。兹将我所研究者，拉拉杂杂的写他出来。我这种研究，有无错误，还望阅者诸君指正。

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成汤时三千国，周武王时，一千八百国，到了春秋的时候，只有二百几十国，到了战国的时候，只有七国，到了秦始皇的时候，就成为一统。以后虽时有分裂，然不久即混一，仍不害其为一统之局。欧洲从前，也是无数小国，后来也是逐渐合并，成为现在的形势。由此知世界的趋势，总是由数小国，合并为一大国，由数大国，合并成一更大之国，渐合渐大，国数亦渐少，由这种趋势观去，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现在国际联盟，是全球混一的动机，发明了世界语，是世界同文的预兆，这种由分而合的趋势，我们是应该知道的。

我们熟察宇宙一切事变，即知道社会进化，是以螺旋线进行，不是以直线进行。螺旋式的状态，是纵的方面越深，横的方面越宽。例如现在列强并峙，仿佛春秋战国一般，但是现在范围更广大，文化更进步，这就是螺旋式的进化。古人每说："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"可知他们已窥见这种回旋状态，但他们不知是螺旋形，误以为是环形，所以才有"循环无端"之说。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进行，都是循着一个圈子，旋转不已，怎么会有进化呢？我国古来流传有循环无端的谚语，所以才事事主

张复古，这都是由于观察错误所致。古人说："天道循环。"今人说："人类历史，永无重复。"我们把这两说合并拢来，就成一个螺旋式的状态了。

我国的兵制，可分为三个时期。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国际竞争剧烈，非竭全国之力，不足以相抗，故那时候行征兵制，全国皆兵，这算是第一个时期。后来全国统一了，没得国际的战争，虽间有外夷之患，其竞争也不剧烈，无全国皆兵之必要，故第二个时期，就依分工之原则，兵与民分而为二，民出财以养兵，兵出死以卫民，就改行募兵制。现在入了第三个时期，欧亚交通，列强并峙，国际竞争剧烈，非竭全国之力，不能相抗，又似有全国皆兵之趋势。但务必强迫人民当兵，回复第一时期的制度，社会上一定纷扰不堪。这个时期的办法，应取螺旋进化的方式，参用第一时期的征兵制而却非完全征兵制，把募兵制与全国皆兵之制，融为一致。平日用军事教育训练人民，即寓全国皆兵之意，有事时仍行招募法，视战事之大小，定招募之多寡，规定每省出兵若干，由各省酌派每县募若干，再由各县向各乡村分募，以志愿当兵者充之。我国人口四万万，世界任何国之人口，俱不及我国之多，故与任何国开衅，均无须驱全国之人与之作战，只须招募志愿当兵之人，已经够了。鼓之以名誉，予之以重赏，自不患无人应募，且此等兵出诸自愿，其奋勇敌忾之心，自较强迫以为兵者，热烈得多。否则把那些怯懦无勇的人，强迫到军中来，凑足人数，反是坏事不小。这个办法，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。当兵与否，听其自由，这是一种离力，当兵者享美名，得厚赏，又足以使人欣羡，是为一种引力。二力保其平衡，愿当兵者与不愿当兵者，各得所欲，社会上自然相安。又战事终了之后，解散军队，最为困难，如用上述招募法，事平后，由原籍之省县，设法安插，就容易办理了。

我国婚姻制度，也可分为三个时期。上古时男女杂交，无所谓夫妇，生出之子女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这个时候的婚制，只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，是为第一个时期。后来制定婚制，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夫妇间即使有非常的痛苦，也不能轻离，是为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，这是第二个时期的婚制。到了现在，已经是入了第三个时期，这个时期，是结媾自由，某女不必定嫁某男，而某男之爱情足以系引她，某男不必定娶某女，而某女之爱情足以系引他，由离心向心二力之结合，就成为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。此种婚制，本来参得有一半上古婚制，也是依螺旋

式进化的，许多青年男女，看不清这种轨道，以为应该回复上古那种杂交状态，就未免大错了。

欧洲人民的自由，也可分为三时期。上古人民，穴居野处，纯是一盘散沙，无拘无束，极为自由，是为第一个时期。中古时，人民受君主之压制，言论思想，极不自由，是为第二个时期。自法国革命后，政府干涉的力量，和人民自由的力量，保持平衡，是为第三个时期。以力学公例言之，第一时期，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，第二个时期，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，第三时期，向心离心二力，保其平衡。从表面上观之，这第三时期中，参有第一时期的自由状态，似乎是回复第一时期了，而实非回复第一时期，乃是一种似回复非回复的螺旋状态。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，看见那种回旋的趋势，误以为应当回复到第一时期，所以他的学说，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，以返于原始自然状态，为第一要义。他说："自然之物皆善，一入人类之手，乃变而为恶。"他的学说，有一半合真理，有一半不合真理，因其有一半合真理，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，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，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酿成非常骚动的现象，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，卒至政府干涉的力量，与人民自由的力量，保持平衡，社会方才安定，此乃天然之趋势。惜乎卢梭倡那种学说之时，未把这螺旋式进化的轨道看清楚，以致法国革命之初，冤枉死了许多人。

人类分配财产的方法，第二章内，曾经说明，是分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，地球上的货财，为人类公有，第二个时期，把地球上的货财，攘为各人私有，第三个时期，公有私有，并行不悖。到了第三时期，俨然是把个人私有物分出一半，公诸社会，带得有点回复第一时期的状态，实际是依螺旋式进化，并非回复到第一时期。

我们把时代划分清楚，就知道何种学说适宜，何种学说不适宜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是第二时期之末，将要入第三时期了，斯密士自由竞争的学说，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学说，都是第二时期的产物，故施行起来，能生效，其说能耸动一时，但律以第三时期，则格不相入。所以斯密士之学说，会生出资本家专制之结果，达尔文之学说，会生出欧洲大战之结果，穷则变，因而产出共产主义，以反对斯密士之学说，产出互助论，以反对达尔文之学说。这共产主义和互助论，宜乎是第三时期的学说了，而却又不然，因为第三时期之学说，当折衷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

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，确是第三时期的人应当行的轨道，惜乎克鲁泡特金，发明这种学说，是旅行西伯利亚和满洲等处，从观察动物和野蛮人生活状态得来的，他理想中的社会，是原始的状态。换言之，即是无政府状态。因之他极力提倡无政府主义，他的学说、也是有一半可取，有一半不可取。

我们会通观之，凡是反对第二时期制度之人，其理想中的社会，俱是第一时期的社会，中国人之梦想华胥国，梦想唐虞，与夫欧洲倡社会主义的人，倡无政府主义的人，倡民约论的人，俱是把第一时期的社会，作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，俱是走入相同的轨道，他们这些人，都说人性皆善，也是走入相同的轨道，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。此外凡是不满意现在制度的人，其理想中的社会，无一不是原始状态，例如打倒知识阶级，与夫恋爱自由等说法，都是回复原始时状态。我们用这种眼光，去研究现在各种学说，孰得孰失，就了如指掌了。

孙中山的学说，是公有的赀财，和私有的赀财并行不悖。他主张把那应该归公有者，归还公家，似乎是回复第一时期了，然而私有权仍有切实之保障，则又非完全回复第一时期。这种似回复非回复的状态，恰是依着螺旋进化的轨道走的。

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，当知我国情形与欧美迥然不同，我国未通商以前，无论谁贫谁富，金钱总是在国内流转，现在国内金钱，如水一般，向外国流去。例如外国运洋纱洋油，到中国来卖，我们拿金钱向他买，不久衣穿烂了，油点干了，金钱一去，永不回头，这是一种变形的抢劫。我国现在的情形，犹如匪徒劫贼，全城之人，无一不被动，不过受害有轻重罢了。我们对付外国劫城，当行坚壁清野之法，不购外货，使他无从掠夺，才是正办。外国工人，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，我国人民，也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，彼此的敌人是相同的，我国抵制外货和外国工人罢工，乃是一贯的策略，欧美工人攻其内，我们防堵于外，那些大资本家，自然就崩溃了。孙中山主张收回关税，以免外货之压迫，即是坚壁清野的办法，所以孙中山主义，在我国是很适宜的。

资本家的剩余价值，是从掠夺机器生产力得来，换言之，即是掠夺了全人类的劳力，他并莫有掠夺自己厂内工人的劳力，因为厂内工人，他给了相当的工价，就不能坐以掠夺之罪，惟有他把厂内制出之货，销售于世

界各国，全世界的人，就受其掠夺了。例如我国人口四万万，男女各半，我国女子，自古以纺织为业，自从洋纱洋市输入中国，女子纺织之事，遂至绝迹，这就是掠夺了二万万女子的职业，虽有劳力，无所用之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由此知欧美工业发达，全人类的劳力，都被资本家掠夺了，所以凡是由机器生出来的纯利，必须全人类平摊，在道理上才讲得通。

世界上的金钱，与夫一切物品，都是从地球中取出来的，我们人类，如果缺乏金钱，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，只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。不料欧洲那些讲强权竞争，优胜劣败的学者，只教人向人类夺取，不知向地球索取，真可谓误人误己。地球是拥有宝库的主人翁，人类犹如盗贼一般，任你如何劫压，主人毫不抗拒。欧洲大战，杀人数千万，恰像一伙劫贼，在主人门外，互相劫杀，你剥我的衣服，我抢你的财物，并不入主人门户一步，闹到一齐受伤，遍体流血，这伙劫贼，才讲和而散。地球有知，当亦大笑不止，推原祸始，那充当群盗谋主的达尔文，实在不能辞其责。孙中山的实业计划，是劫夺地球的策略。

世界的纷争，实由机器生产力和地球生产力不相调协，才酿出来的。欧洲工业国，机器生产力，发达到了极点，不能不在国外寻销场，寻原料，所以酿成大战；而世界之农业国，则地中生产力，蕴藏而不能出，货弃于地，殊为可惜，有了这种情形，农业国，工业国，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。无如列强专以侵夺为目的，迷梦至今未醒，奈何奈何！

列强既执迷不悟，我们断无坐受宰割之理，也无向他摇尾乞怜之理，只有修明内政，准备实力，与之周旋，一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仿苏秦联合六国的办法，去对付五大强国即是了，以修明内政为正兵，以联合弱小民族为奇兵。苏秦的方法，是“秦攻一国，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，或救之，有不如约者，五国共攻之。”现在五大强国是秦人，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国，我们把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，互相策应，多方以挠之，这个办法，有种种胜算：（1）世界弱小民族人数多，各强国人数少；（2）弱小民族利害相同，容易联合，各强国利害冲突，举动不能一致；（3）弱小民族大概是农业国，列强大概是工业国，他们的原料和销场，尝仰给农业国，可以说强国人民的衣食，仰给于弱小民族，弱小民族的衣食，不仰给于他们。以上三者，皆是弱小民族占优胜。我们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，向列强进攻，与他一个重大打击，其人手方

法，即是不供给他的原料，不购他的货物，采用甘地的办法，为大规模之组织，列强能悔祸固好，如可开衅，我们就一致动作起来，明知世界大战，终不能免，不如我们先动手，经过一次大战，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。这是弱小民族，生死关头，断无退让之理，等到各强国创痛巨深，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时候，才提出最平等之条件，与之议和，农业国出土地和工人，工业国出机器和技师，所得利益，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摊，不达到此项目的，决不与之妥协。只要弱小民族能够努力，大同世界，未必不能实现。此种办法，是顺着进化轨道走的，这种轨道孙中山看得极清楚，他主张联合弱小民族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，去攻打列强的二万万五千万人，就是顺着这轨道走的。

苏秦联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法子，是他发箧读书，经过了刺股流血的功夫，揣摹期年，才把他发明出来的，我们不可因苏秦志在富贵，人格卑下，就连他的法子都轻视了。苏秦的法子，含得有真理，是以平字为原则，与孙中山所讲民族主义相同。他说六国，纯用“宁为鸡口毋为牛后”等语，以激动人不平之气，与孙中山所讲次殖民地等语，措词相同。苏秦窥见了真理，自信他的法子会生效，所以他自己说道：“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果然出来一说就生效，六国都听他的话，以他为从约长，他的计划成了，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，这个法子的效力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可惜苏秦志在富贵，佩了六国相印，就志满意得，不复努力，以致六国互相攻伐，从约破裂，后来误信张仪之话，连袂事秦，遂一一为秦所灭。今日主张亲美亲日亲英法等，都是走入了六国西向以事强秦之轨道，可为寒心！

现在弱小民族，被列强压制久了，一旦有人出来联合，是非常容易的。威尔逊揭出“民族自决”之标语，大得世界之欢迎，但自决云者，不过叫他自己解决罢了，还没有说帮助他，我们如果揭出“弱小民族互助”的标语，当然受加倍的欢迎。《孙中山演说集》说：日俄战争的时候，俄国由欧洲调来的舰队，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，这个消息传出来，孙中山适从苏彝士运河经过，有许多土人，看见孙中山是黄色人，现出很欢喜的样子来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日本人呀？”孙中山答应道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你们为甚么这样高兴呢？”他们答应道：“我们东方民族，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，总是受痛苦，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，这次日本打败

俄国，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，日本打胜仗，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，这是一种应该欢喜的事，所以我们便这样的高兴。”（见演说集第五编大亚洲主义）我们读了这段故事，试想日本打败俄国，与苏彝士运河侧边的土人何关？日本又没有说过一句要替他们解除痛苦的话，他们表现出这种状态，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理，也可窥见一般了。我们中国，如果揭出“弱小民族互助”的旗帜，真可谓世界幸福，这种办法，是促成世界大同的动机，将来世界大同了，不但是弱小民族之幸，也是列强之幸。

世界革命，是必然之趋势，社会主义国际化，也是当然之事，而今应该由中国出来，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，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。其方法也和革满清的命一样，从宣传入手。我国人民四万万，世界各处都布散得有，宣传起来，非常容易。我们须知世界大战，爆发在即，一开战我国势必牵入漩涡，那时费尽气力，饱受牺牲，还不得好结果，不如我们早点从事此项工作，或许能够制止大战，使他不至发生，何以言之呢？因为前次欧战，列强全靠属国之兵助战，我国用宣传的方法，把他属国人民的心理改变了，釜底抽薪，未必非制止大战之一法。

现在之国际联盟，可以说是强国联盟，是他们宰割弱小民族之分赃团体，像我国济南惨案这类事，与其诉诸国际联盟，不如诉诸弱小民族，与其派人到欧美去宣传，不如派人到印度非洲南洋等处去宣传。我国在列强中，诚渺乎其小，但在被压迫民族中，则是堂堂一大国。我国素重王道，向不侵凌小国，在历史上久为世界所深信，由我国出来提倡世界革命，当然比俄国更足取信于人，兼之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学理，讲得更彻底，施行起来，任何民族都能满意。我们对世界弱小民族，以平字为原则，对五大强国，亦以平字为原则，决不为丝毫已甚之举，本着此项宗旨做去，一定收绝大效果。孙中山抱大同思想，以天下为公，将来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，实现大同，完成孙中山之遗志，发扬中国之光辉，然后才可谓之革命成功。

我格外还有层意见，也可提出来研究。古人说：“外宁必有内忧。”几乎成了一定不移之理。晋武平吴过后，跟着就有八王之乱，洪秀全取了南京，跟着就有韦杨之乱，去岁革命军取得武汉江西南京之处，跟着就宁汉分裂，现在定都南京，全国统一，而内部意见纷歧，明争暗斗，日益激

烈。大家高呼打倒某某，铲除某某，其目标全在国内，我们应设法把目标移向国际去；使全国人的视线，一致注射外国，内部冲突之事，自然可以减免。我主张由我国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，大家努力去做世界革命的工作，这即是转移目标之法，目标既已转移了，内部意见，自然可以调和。

举个例来说：刘备和孙权，本来是郎舅之亲，因为大家都以荆州为目的物，互相争夺，闹得郎舅决裂，夫妇生离，关羽被杀，七百里之连营被烧，吴蜀二国，俨然成了不共戴天之仇。后来诸葛亮提出联盟伐魏的政策，以魏为目的物，大家的视线，都注向魏国，吴蜀二国的感情，立即融洽，彼此合作到底。后来诸葛亮和孙权死了，后人还继续他们的政策，直到司马昭伐蜀，吴还遣兵相救，及闻后主降了，方才罢兵。这就是目标转移了，感情就会融洽的明证。诸葛亮和孙权，都是人杰，他们这种政策，我们很可取法。

我的主张，可以二语括之曰："对内调和，对外奋斗。"现在列强以不平等待我，故当取奋斗主义，等到他们以平等待我了，对外即改取调和主义。我们此时惟一的办法，在首先调和内部，必须内部调和，才能向外奋斗，能够向外奋斗，内部才能调和，二者是互相关联的，但是根本上调和的方法，尤在使全国人思想一致，要想使全国人思想一致，非先把各种学说调和一致不能成功。这个道理，留到第六章再说。

四　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

改革社会，犹如医生医病一般，有病之部分，应该治疗，无病之部分，不可妄动刀针，社会上有弊害的制度，应该改革，无弊害的制度，不可任意更张，致滋纷扰……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前数章俱系理论上之讨论，这一章是讨论实施办法。关于办法上应该讨论者，可分作两层，一是旧社会之经济制度，应如何结束，二是新社会之经济制度，应如何规定，本章就是在这两点上加以讨论。

土地和机器，该归公有，理由是很正当的。但是已经归入私人之土地机器，究竟该用甚么手段把他收归公家，这是亟待研究的。我国私人

的土地和机器，都是用金钱购来的，细察他们金钱之来源，除少数人，是用非理手段从人民手中夺取者外，余人的金钱，大概是由劳心劳力得来的，换言之，即是用私有的脑力体力换来的。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，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厂主的机器无代价的没收了，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，社会上当然起绝大的纠纷，当然发生流血惨祸。凡事以平为本，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抢归公有，这算是极不平之事，不平则争……关于这一点，孙中山认得最清楚，民主主义第二讲："我们所主张的共产，是共将来不共现在，这种将来的共产，是很公道的办法，以前有了产的人，决不至吃亏，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，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，都抢去政府里头，是大不相同。"

从前美国北方各省，主张释放黑奴，南方各省，也未尝不赞成，只是要求给以相当的代价。那个时候，有几百万黑奴，其代价约需银几百万万元，政府无这笔款，去偿还黑奴的主人，才发生战事。一共血战五年，双方都非常激烈，为世界大战之一。此次战争，比美国独立战争，损失更大，流的血也更多，后来南方战败，才无代价的把黑奴释放了，我们可以说释放黑奴之战，是发源于债务的关系，假如当日的美国政府，有几百万万元去偿还黑奴的主人，这种流血惨祸，当然可以避免。后来虽说把黑奴释放了，目的得达，但这五年血战中，牺牲的生命财产，也就不少了，其代价也不可谓不大，犹幸是北方战胜了，万一战败，那更是无谓之牺牲了。现在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收归公有，其事与释放黑奴相类，美国当日勒令南方各省释放黑奴，不给代价，才发生大杀戮，我们为避免大战争，大杀戮起见，当然采用孙中山办法，购归公有。

现在政局纷乱，一切改革事项，当然说不上，但是，就学理上言之，将来改革经济制度，究竟当采用何种方式呢？我们不妨预先讨论，等到有了人民可以信托之廉洁政府，才好实行。据著者个人的主张，凡是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铁道等，一律由公家办理，其有私人业已办理者，由公家照价收买，全国土地，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，私人要使用土地者，一律向公家承佃，把旧日缴与地主的租价，缴与公家，公家收得此款，作为全国人民公用，如此则全国之人，无一不享受租金之利，即是无一不享受地主之权，换言之：无一人不是佃户，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。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，就完全实现了。

但其中最困难者，就是收买的经费太大，无从筹措。现在中国工业未发达，使用机器的工厂也少，轮船铁路也少，公家收买起来，倒还容易，只是中国土地如此之广，地价如此之昂，如果照价收买，比释放黑奴的代价不知高过若干万倍，美国当日，倘若无款偿黑奴主人，我国今日，怎么会有这宗巨款，去偿还地主？关于这一层，孙中山是虑到了的，所以他于照价收买之外，再定一个照价抽税的法子。他的办法，是把地价确定了，令地主按年纳税，以后地价增涨了，多得的利益，仍归公家，遇必要时，才照价收买。他就是因为政府无这笔巨款，来收买全国土地，才想出这种照价抽税的办法，以济照价收买之穷。

现在亟须筹划的，就是款项一端，这种收买全国土地的款，究竟从何筹措呢？著者主张第一步的办法，就是规定银行由国家设立，不许私人设立，人民有款者，应存入银行，需款者应向银行借贷，其有私相借贷者，将来有赖骗等事，法律上不予保护，人民以金钱存入外国银行者，查确后，取消国籍，逐出国外。又于华侨所在地，设立国家银行，存储华侨之款，有款不存入本国银行者，取消国籍，不予保护，一面由银行发行国家钞票，内地交易，纯用国家钞票，人民持外国钞票向银行存放者，不予收受。如此则外国钞票即被驱逐了，人民的金钱，完全集中于国家之手，国家要收买土地和举办大实业，就不患无款了，孙中山所谓发达国家资本就算办到了。

银行贷出之息，与存入之息，为二与一之比，例如人民存入银行之款，定为月息六厘，人民向银行贷款，则定为月息一分二厘，如此则一进一出之间，银行可得月息六厘，人民有款放借者，无异于将子金缴一半与公家。现在购买土地者，其利也不过几厘，并且买地时须过税，每年须上缴粮，不时还有摊派逗等事，今定为银行存款，月息六厘，其利也不为薄。通常人民借贷之利，每月一分几或二三分不等，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，每当银根枯窘时，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，今定为向银行贷款者，月息一分二厘，其利也不为贵。像这样办去，公家坐享大利，而于存款者，贷款者，仍两无所损，那些用大利盘剥的人，就无所用其技了。

有人主张废除利息，这却可以不必。因为人民的金钱，是从劳力得来的，人民以金钱存入银行，由公家拿去作社会上种种公益，即无异把劳力贡献到社会上，谋种种幸福。此等人是应该奖励的，银行给予之利

息，即可视为一种奖励金。

又有主张废除金钱，发行劳动券者，更可以不必。资本家之专横，是由于土地和机器，许私人占有，才生出来的，与金钱制度何干？我们把土地机器收归公有，又不许私相借贷，虽有金钱，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也就无害于社会了。拿劳动券去换取衣食住，其实效与金钱何异？现在的金钱，我们又何尝不可把他当作一种劳动券呢？主张发行劳动券之人，其用心未免太迂腐了。

我们把银行组织好了，就可着手收买全国的土地了。照孙中山的办法，是命地主自将地价呈报到政府，我们收买之时，恐怕地主所报地价有以少报多之弊，可用投标竞佃法（川省各县教育局所辖产业，多作投标竞佃法，颇称便利），用投标竞佃，以定租金，然后据租金之多寡，以转定地价。例如某甲在乡间，有地若干亩，由政府将其地投标竞佃，假定投标结果，得年租七百二十元，以月息六厘计，即定为地价一万元。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，月付息六十元，其欲用现款者，以钞票付给之，公家收入之租息，与银行支付之利息相等，仿佛公家是替私人经管产业一般，公家本然无利可图，但经公家收买过后，可用大规模之组织来改良土地，每年增加的利益，就完全归诸公有了。

投标之时，即以地主所报之价为标准，假定某甲所报地价是一万元，投标结果，租息最高额是七百二十元，我们即认定地主所报之价是确定的，即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。如果投标结果，依租息计算，该一万一千元，我们因为他原报之价是一万元，银行只能收入某甲一万元，如果依租息计算，只该九千元，我们就认定某甲有意欺蒙政府，罚他一千元，银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帐。我们定出此种办法，地主呈报地价，自必非常审慎，绝不敢以少报多。

著者主张“全国土地，应一律由政府备价收买，不许私人占有。”向友人谈及，友人即说道：中国哪有这笔巨款来收买？我即把组织银行和集中全国金钱的办法说与他听，见得收买土地，不愁无款，听者每每驳我道：孙中山定的法子，是“照价抽税”和“照价收买”两种，你单取“照价收买”这一种，把“照价抽税”那一种抹杀了，把私人所有权完全夺去，与孙中山主义不合；并且投标竞佃之法，孙中山也莫有说过，施行起来，未免与他的办法冲突。我说道：我所说的，与孙中山主

义并无不合，办法也无冲突。孙中山的办法，是："由地主呈报地价，政府照价抽税，将来地价增加之利益，全归公家，公家如要收买，照原报之价，给与地主。"照他这个办法，则是地主报价之时，所有权已经转移与公家去了，所以日后增加之利益，全归公有，收买之时，只照原价给予，如果地主的所有权，尚未消失，则增加之利益，应归地主所有，政府收买之时，当另行议价。我们因此知"照价抽税"和"照价收买"，只算是一个办法，并不是两个办法。孙中山本来想把全国土地，一律照价购归公有，因为无此巨款，才想出照价抽税的办法，先把所有权转移了，把地价确定了。暂不付价，等到随后有钱之时才付价，我们只要有款，早点付价，又何不可之有？

土地是公有物，应该归公，金钱是私人脑力体力掉换来的，应该归私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，我可以替他下一条公例曰："金钱可私有，土地不能私有"。因此之故，他才规定以金钱给地主，把土地收归公有，所以我主张全国土地，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，与孙中山主义并无违反。至于我所说投标竞佃的法子，乃是照价收买时，一种补充办法，对于地主所报之价，予以一种测验，与孙中山的办法，丝毫没有冲突。

社会问题中，最难解决的，就是土地问题，我们只要把土地问题解决了，其余的就容易解决了，收买工厂和轮船铁道等项，都是很容易的事，我主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，可括为数语曰："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，完全归公，脑力和体力，完全归私，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，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，大商业归公，小商业归私，贷款的利息，一半归公，一半归私。"如此办理，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，两相调和，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就符合了。

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，所以凡服务社会，就该给以相当代价，不能把他的脑力体力看作社会公有物，任意没收。各人的资禀不同，才能不同，应听其择业自由，各就其性之所近，自去选择职业，欲务农者，向公家承佃土地，欲作工者，向工厂寻觅工作，其愿当官吏教员，及从事他种职业者亦同，因劳动的种类不同，所得的报酬也不同。表面上看去，似乎不平等，其实不然，这个道理，与民权主义是一样。孙中山说："天生万物，除了水面以外，没有一物是平的，各人的聪明才力，有天赋的不同，所以造就的结果，当然不同，造就既不同，

自然不能平等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，一律要平等，世界便莫有进步，人类便要退化。”所以孙中山主张的民权平等，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，不是从上面压下去，成为平头线的平等。因此我们主张的经济平等，也不是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，成为国中贫富相等，是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，使各人致富的机会平等，或贫或富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。

关于商业问题，我以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，如果一律由国家经营，那就不胜其繁了，因此我主张大商业归公，小商业归私，但是大小界限，如何划分，这是很费研究的。我主张施行之初，可定为国际贸易归公，国内贸易归私，国家向外国购买大批货物，分售与人民，人民有货欲销售外国者，由国家承买，转售与外国。我国闭关数千年，并未产生何种大资本家，可知国内贸易，并非造成资本制度之主因，故国内贸易，可以听人民自由经营。我们把国际贸易归公办到了，再看国内情形如何，并可进而规定国内某种商业，亦应由国家经营，私人不得经营。关于机器方面，亦可规定某种机器，私人不得使用。此种办法，必须到了实施之时，斟酌现情而为之，此时不能一一预定。我们不许私人购买土地，不许私人使用机器，不许私人设立银行，不许私人经营国际贸易，孙中山所谓节制私人资本，就算达到了。

依上述办法，国家把土地、机器、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公有过后，国家每年收入，当然非常之多，自当尽量扩充实业教育与增加民众利益之事。但是国家发达到了极点，每年余款，究竟作何用涂呢？我也想有一个办法，孙中山屡屡向人演说，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司，四万万人都是股东，并且说：“这个公司内的人，都可以分红利，子子孙孙，便不怕穷。”我们把土地、机器、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，那末四万万人都成为地主厂主，成为银行和国际贸易的股东，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，就出现了。这个大公司，是以每一个身体为一股，国中生了一人，即是增加一股，死了一人，即是取消一股，股权是非常明晰的。我们就可仿照公司分红的办法，政府每年除各项开支而外，其所有余款，即按照全国人口数目，平均分摊，作为生活费，其分摊数目之多少，以国家每年余款多少为断，最小限度，以能维持生活为止。

有了这个办法，社会上可以免去许多纠纷：（1）中国所谓育婴恤嫠济贫诸局，可以裁撤，外国所谓失业者救济法，教员工人养老金等

等，俱可废去了；（2）现在许多富有哲学文学科学等天才的人，每因饥寒所迫，兼营他业，或改营他业，国家受无形之损失，倘能发给生活费，使无冻馁之忧，则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，专心深造，于社会之文明，增进不少；（3）语云：衣食足而礼义兴。又云：饥寒起盗心。有了发给生活费的办法，则国民的道德可以增进。

有人问我道：人人都有饭吃，还有何人肯作工？还有何人肯努力？社会怎么能够进化？我道：人人有了饭吃，努力心或许减少一点，如谓人类就不努力。社会就不会进化，我却不以为然。请问牛顿和达尔文诸人，其目的岂是因为要吃饭，才去研究学问吗？难道他们有了饭吃，就不会研究学问吗？我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有了饭吃，才能专心研究，才能有此空前绝后的大发明。

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：第一级是需要，有衣穿才不会冷死，有饭吃才不会饿死。第二级是安适，穿的求其舒服，吃的求其甘美。第三级是奢侈，穿的要轻绡细绢，海虎貂鼠，吃的要山珍海味，鱼翅燕窝。我所说的发给生活费，只算达到第一级，其第二级，第三级，则让那些勤勉作工的人享受。

努力向上之心，人人都有，凡是稍知奋勉的人，断莫有因为免去冻馁，就可满足他的欲望，就不前进，其例甚多，无待详举。平心论之，人之天性不一，有因为生活问题解决了，就不去作工的，却也有丰衣足食，还是孳孳不已的，若谓国家发了生活费，就无人作工，这层可以不虑。假使实施之时，果然有此现象，我们少发给点款，使他们所得者，不足维持生活，就不患无人作工了。作工与否，本是听人自由，但作工者优予报酬，使人见而生羡，又不得不作工，于是作工者，不作工者，各遂所愿，社会上就相安无事了。

有人问我道：全国人民，具何种资格，有坐领生活费之权利？政府为甚么有发给生活费之义务？我说道：这有两个理由：（1）地球是人类公有物，使用土地者，对于公家缴纳租金，此项租金，即该人类平均分受；（2）发明家发明机器，是替人类发明的，由机器生出来的利益，应该人类平均分受。基于这两种理由，故人民有领受生活费的权利，政府是掌管全国土地和工厂的机关，故有发给生活费的义务。孙中山讲衣食住行四者曾说："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，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，供给不

足、无论何人，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。”可见国家有保证人民生存的义务，人民有向国家要求生存的权利。我主张发给生活费，即是国家担负人民衣食等项的责任，保证人民的生存。此种办法，与民生主义是很合的。

我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，是采用公司式的组织，这是业经说明了的。我分配资财的方法，是从自然界中两个地方取法得来：

（1）是取法身体分配血液的方法。身体中某部份越劳动，血液之灌注越多，除了弥补消耗之外，还有剩余，因此人身越劳动的部份，就越发达，这就是人身奖励劳动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对于劳动者，应该从优报酬。我们身体中，还有些无用的部分，例如男子之乳，他是无用的东西，但是既已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也不能不给以血液，不过男子之乳不劳动，灌注的血液很少，所以男子之乳，就渐渐缩小。我们发给生活费，不可过多，使不作工的人，如男子的乳一般，渐渐消缩。才合天然公理。

（2）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。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，土地草木，把他的水蒸气取出来，变为雨露，又向地上平均洒下，不惟干枯之地，蒙其泽润，就是江海池沼，本不需水，也一律散给；最妙的，是把草木中所含水分蒸发出来，又还给他，一转移间，就蓬蓬勃勃的生长了；并且枯枝朽木，也一样散给，不因为他莫得生机，就剥夺他享受雨露之权。洒在地上之水，听凭草木之根吸取，无所限制，吸多吸少，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，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。公家收入的租息，与夫银行和工商业的纯利，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，除公共开支而外，不问贫富，一律平均分给，致富的机会，人人均等，这就是取法雨露之无私。

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：（1）需要，即生存；（2）安适；（3）奢侈。现在的经济组织，是以死字为立足点，进而求生存，再进而求安适，求奢侈，因为立足点是死字，一遇不幸的事，就有冷死的饿死的。著者主张发给生活费，是以生存为立足点，进而求安适，求奢侈，照孙中山民生主义说来，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，国家倘能每年发给生活费，使人人能够生存，这就算重心稳定了，重心既稳定，社会自然安静。著者谆谆以发给生活费为言，意盖在此。

本章所拟办法，把土地、机器、银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，则拥有金钱之人，任他如何努力，决不会造到钢铁大王，煤油大王，银行大王、汽车大王，商业大王诸人的地位，每年由政府发给生活费，则劳动

家任如何不幸，决不会有冻馁之虞，像这样的办法，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级，把贫者的地位升高一级，贫富之间，就不会相差过远了。现在痛恨资本制度的人，对于有资财者，设种种法子去抑制他，我们施行此种经济制度之后，从上面削低一级，从下面升高一级，在两级中间的地方，就可任人发展，不加限制；不惟不当限制，并且还要尽力提倡，社会才能进步。我主张把国际贸易收归国有，把国内贸易留为人民活动之余地，又主张人民存款在银行者，应当付以利息，都是为提倡人民努力起见。有人说：这种办法，仍不免贫富不平。我说：惟其不平，人民才肯努力，世界才能进化，犹如水之趋入大海一般，惟其地势高下不平，才能奔趋不已，如果平而不流，就成为死水了。水不流则腐，人类不努力，世界便会退化，其理是相同的。世间至平者，莫过于水，故量物平否，以水为准，然而水之前进不已者，实在是由于不平，名为不平，实为至平。我们取水之原理，以改造社会，就与天然之理符合了。

政府每年发给生活费，其手续很麻烦，当由各都市，各乡村，分头办理，每一都市和每一乡村，应设立户籍调查所，把人口调查清楚，确定某人的籍贯，隶属某处，生活费由原籍的户籍调查所转发，即无错误了。某处死了一人，即由该处的户籍调查所查明死者籍隶何处，即通知原籍的调查所，停止他的生活费，旅行在外，生下子女，就地报告该处调查所注册，将来的生活费，即向该调查所承领，但经申请后，得由所生地的调查所，备文移归原籍。人是活动之物，转徙不常，调查之时，和发给生活费之时，从生死两点注意，就可杜绝流弊了。

我们既规定人民有款者，当存入银行，需款者当向银行借，则各都市各乡村，都要通设银行，人民取款存款，方才便利。政治方面之组织，是合各乡村而成为一县，合各县而成为一省，合各省而成为一国。经济方面，当与之相应，首都设中央银行，各省设省银行，各县设县银行，各乡村设乡村银行；各乡村之银行，隶属于县银行，各县之银行，隶属于省银行，各省之银行，隶属于中央银行。金钱是人民膏血，故银行之分布，当如脉络一般，使之成为网状，才能流通无阻。私人向银行借款者，须有担保人，担保人须银行中有存款，足供担保者，否则以借款者或担保者应得之生活费作抵押品。银行与户籍调查所，关系密切，二者宜并设一处。

施行本章所说办法，有当虑及者，土地，机器，银行，国际贸易，四者集中于国家之手，全国人民的金钱，俱归于银行，政府每年又要发给生活费，国家的权责太大，当局的人，舞起弊来，人民就受害不浅了。如果防弊的方法，尚未想好，就冒冒昧昧的着手改革，把土地工厂等项收归公有，倒不如不改革，不收归公有还好点。所以我们要改革经济制度，当先从改革政治入手，先把政治改革了，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，然后才能说改革经济制度。只要在政治方面，能把孙中山所说的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权完全办到了，则经济方面，无论甚么弊，都可防止了。本章所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，都是预定计划，不能立即就办，我们现在第一要着，就是努力去实行这四权，等到人民对于这四权能充分的行使了，再来改革经济制度，那就无有流弊了。

银行及户籍调查所之职员，与夫银行之监察员，及其他重要职员，由人民投票选举或罢免。属于一乡村者，由全乡村人民总投票，属于全县者，由全县人民总投票，属于全省全国者亦然，遇有大事，亦用总投票法公决。例如原定银行存款月息六厘，有人提议，应改为四厘，又有人提议，应改为八厘，即将三者的理由，作具说明书，公布全国，定期总投票。各人向本地户籍调查所投票，其旅居异地者，可从邮局投递，由户籍调查所开票，总计主张四厘者若干票，主张六厘者若干票，主张八厘者若干票，汇报于县，由县汇报于省，由省汇报中央。假定主张四厘者占多数，即改为存入银行者，月息四厘，向银行借款者，月息八厘。又如有人主张各人的资财，不可过多，存入银行之款，应该加以限制，又有主张不应加以限制。究竟应限制？或不应限制？如应限制，则每人存款，究应至多以若干为限，可由全国人民总投票决定之。全国是一个大公司，四万万人是公司中之股东，人人有切己利害，有分红息之希望，故投票时，不会受人运动，即使有舞弊者，亦必互相举发，在公家服务之人，如有侵蚀亏吞等弊，亦必互相稽查。假无发给生活费之规定，人民与国家，不生关系，即使他人营私舞弊，亦不愿因为公家之事，去开罪于私人。中国官吏，侵蚀公款，无人过问，其弊正在于此。今有发给生活费之规定，则人民与国家，居于利害共同的地位，侵蚀国家之款，即无异侵蚀私人之款，全国有四万万人，即是有四万万个监察员，侵蚀者无所藏其奸，孙中山主张的全民政治，即可出现。

关于遗产制一层，许多人都主张废除，如照本章所说的办法做去，土地工厂，一律归公，私人也就无所谓产业了，所有者不过银行中所存之金钱，我们只研究此项金钱，应否传给子孙就是了。此事于各个人都有关系，将来可用全民数投票法解决之。在我个人之主张，是可以听其传给的，因为我们既经承认各人的身体是各人私有物，由脑力体力换来的资财，就应该各人私有。各人所生子女，是他的身体化分出来的，当然有承受他的资财之权，如果归为公有，也就犯了“夺私有物以归公”之弊。普通人所以努力者，大都想积下资财，传之后人。如果积下的金钱，不许传之子孙，必会减少人类努力心，即是减少社会进化之速度。

富者过富，贫者过贫，欲废除遗产制，以化除贫富阶级，殊不知资本家之产生，与遗产制无甚关系。兹可举例为证：美国钢铁大王卡匿奇，为贫人子，三岁时，为丝厂工徒，一周得工资一弗二十仙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，为农家儿，六七岁时，随其母往山下拾柴，或随其父在田间拔草。铁道大王介姆舍尔，十五岁，父死，无以为生，乃入商店为学徒。韦尔德以架设太平洋海底电线，名闻天下，十六岁时，也在纽约商店为学徒。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，少时家贫，走至某银行，向主人陈述，愿执贱役，主人不许。他走出来之时，皮鞋上落下一钉，俯而拾之，主人因为他不忽细事，乃呼人，令在银行服役。美国大富豪休洼布，系小村中织毛工人之子，少时助其父工作，或佣于农家，或为邮局马夫。铜山王，章洛克，为农人子，少时随其父驱牛十余头，走数百里，夕与牛同寝，晨与牛同起。砂糖工斯布累克，德国人，十八岁时，航海至美国，抵岸后，检视衣囊，左方余砂糖数块，右方剩金三弗，一身之外，别无长物。商业大王瓦纳迈尔，为造砖工人之子，幼时家贫，无力就学，无冬无夏，皆跣行于街市。汽车大王福尔特，二十余年前，他尚为钟表职工。以上诸人，都是贫人之子，并未承受遗产。惟银行大王摩尔根之父，是美国著名富翁，但他之致富，全不依赖其父。他尝说：“余虽为斯派沙摩尔根之子，并不借此以立于世界，余必为一个独立之奇男子。”可见他之拥有巨资，也不是遗产的关系。我们细考诸人致富之源，都是掠夺地球和机器的生产力，否则经营国际贸易，抑或开设银行，惟休洼布一人，未独立营业，但他终身辅佐钢铁大王，他之资财，仍是从掠夺地球和机器生产力而来。如果把土地、机器、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

国有，那些在实业界称王的人，断不会产生，这才是根本治疗之法。

至于改革社会之程序，我主张从乡村办起走，以每一乡村为一单位，各办各的，因为改革之初，情形复杂，应该各就本地情形，斟酌办理，才能适合，如有窒碍处，随时改良。等到各乡村办好了，才把全县联合起来，各县办好了，才把全省联合起来。各省办好了，才把全国联合起来，将来世界各国办好了，把全球联合起来，就是大同世界了。

改革社会，应该注意者有两点：（1）所订法令规程，要多留各地方伸缩之余地，越苛细，就窒碍越多，越是不能实行；（2）当从劝导入手，使各地人民，喜喜欢欢的去办理，不能用严刑峻罚，强迫人民办理。其实施方法，当如下述：

政府把土地收归公有后，即统计此一乡村，共有土地若干，命全乡村之人组织一个团体，公共管理，由这个团体把土地分佃与农民，全乡村每年共收租息若干，政府责成这个团体缴交银行，如租息是谷物等项，由这个团体公共变卖，以银缴入银行，政府立于监督地位，也就不繁难了。

全国土地，由国家出资财改善者，其利益归国家所得，由各乡村出资财改善者，其利益归各乡村所得，各乡村改善土地后，增加之收入，由本乡村人民平均分受。凡购置机器，改良肥料等，所需之款，向银行息借，其息可缓至获利后偿付。若建筑马路，疏凿沟渠等项，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，所用之款，政府与该乡村各担负一半。例如某乡村因建路凿渠，向银行借款二千元，工毕之日，政府派员勘验认可后，政府担负一半，银行只列该乡村借银一千元就是了，政府名为负担一半，实则仍无所损。因为银行贷出之息与存入之息，为二与之一比。假定存入是月息六厘，贷出是一分二厘，人民向银行存款二千元，银行应付月息十二元，某乡村因筑路凿渠，借去二千元，银行只列该乡村去银一千元，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，恰与人民存款二千元之息相抵，不过政府多负担一千元无息之债务罢了，只要政府不付利息，此项债务，就多担负点也无妨。

孙中山所说农业上增加生产的方法，共计七种：第一是机器问题，第二是肥料问题，第三是换种问题，第四是除害问题，第五是制造问题，第六是运送问题，第七是防灾问题。应由政府派人到乡村去，把改良办法详加讲演，或用文字说明，务使农民心中了然，其采

用与否，听人民自由，不必用强力干涉。语云："利之所在，人必趋之。"他们知道大利所在，自然会踊跃从事。孙中山曾说："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，他们便不明白，不情愿附和，但是对他说请他去发财，便有很多人跟上来。"我们叫各乡村组织团体，叫他改良土地，就是请他去发财，人民哪有不欢迎之理？即有怀疑之人，充其量不过不遵照改良就是了，断不会出来阻挠，因为公家叫他们组织个团体，担负缴纳全乡村租息，这个团体，尽可照公家原定租额转佃出去，团体中人，不过费点力，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，并不至于赔累，他们何至出头反对？只要这层办到，乡村中的事权，渐归统一，将来一切事都好办理，也就算收了效果了。

关于增加生产的事项，他们不愿意改良，只好听之，如其加以干涉，反转多事，反会生出反响。我们总是尽力提倡，尽力劝导，听其自由采用，只要某乡村获了大利，他们自然会争先恐后的仿办起来。这类事，如果督促严厉了，反转会弊病丛生，王安石的青苗法，就是前车之鉴。宋朝那个时候的人民，于青黄不接之时，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贷，王安石创青苗法，由公家以较轻之利，借与农民，于秋收后付还，使利归公家，而农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，本是公私两利的好法子，王安石雷厉风行的督促官吏实行，据散放青苗钱之多少，以定官吏之成绩，于是那些地方官，就向民间估派，其有不需款之农民，与夫家资饶裕之富民，都强迫他领取青苗钱，闹得天怒人怨，以最良之法，收最恶之果，都是由于强迫二字生出来的。苏东坡说宋神宗求治太急，真是洞见症结之论，我辈改革社会，当引为大戒。

天下事有当强迫者，有不当强迫者，例如把土地、机器、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的时候，则当强制执行，任何人不能独异。至于乡村中改良事项，则当如上说的办法，听其自由。像这样办法，就与孙中山所主张"政府强制的力量，和人民自由的力量，双方平衡"的原则相符合了。语云：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教养人民，原是与种植树木一样，我们虽甚望树子长成，亦只能把土壤弄好，把肥料弄好，等他自家生长，我们是不能替树子帮忙的，这个道理，柳宗元的郭橐驼传，说得很明白。现在新政繁兴，民间大困，当局诸公，每每以福国利民之心，做出祸国害民之事，就是违反了柳宗元的说法。斯密氏全部学论，纯取

放任自由，他说："人民好利之心，根于天性，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碍物除去了，利之所在，人民自然会尽力搜求，一切天然之利，就因而开发出来了。"他这个学说，在欧洲是生了大效的，我们开发乡村利益的时候，本他这个学说做去，自然会生大效。

前面的办法，实行之后，一人之身，可得两重利益：（1）乡村中改善土地，增加生产的利益，每人可得一份；（2）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，这又是一份利益。有了这个原因，全乡村之事和全国之事，人民就不能不过问了。现在的人，大都是"事不关己不劳心。"革命的人，拚命去争民权，争得之后，交给人民，叫他来行使。我恐怕乡间的老百姓，还会嫌我们的多事，妨害他吃饭睡觉的时间，只好顺着他们喜欢发财的天性，把民权二字附着在发财二字上面，交给与人民，人民接受发财这个东西，顺便就把民权那个东西携带去了。他们知道官吏是替他经理银钱的管事，不得不慎选其人，遇有不好的管事，不得不更换。如此则选举权，罢免权，他们自然晓得行使了。他们知道一切章程，如不订好，就有人舞弊，公款就要受损失，他们将来就要少分点红利，如此则创制权复决权也就晓得行使了。所以政府每年必要发给生活费，人民与政府才生得起关系，才能行使民权，人人有切己关系，才不会为少数人所把持，全民政治，乃能实现。

改革社会，千头万绪，犹如钟表一般，中间的机械，只要有了点小小毛病，全部动作，都会停止。我国土地，有如此之大，各地情形不同，实施的详细办法，岂是政府中几个人能够坐而揣测的，只好划归各地人民自去斟酌办理，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针与各种进行计划宣布出来，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么样，进行的途径是怎么样，他们自然会朝着那个途径做去，各乡各县，渐渐趋于一致，就可以渐渐联合起来了。现在世界的大势，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趋去，故一切事权，当散而给诸人民，才不至与潮流违反。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，是一个东西，不可分而为二，一面又须顾及世界民族的心理，顺着大同的轨道做去，三民主义，就成为整个之物了。

五　各种学说之调和

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，冲突不已，我穷源竟委的考察，实在是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。孟子之性善说，荀子之性恶说，是互相反对的；宗教之利人主义，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，是互相反对的；个人主义之经济学，社会主义之经济学，是互相反对的。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，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，从未折衷一是，思想上既不一致，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，冲突之事，就在所不免。真理只有一个，犹如大山一般，东西南北看去，形状不同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，所说山之形状，就各不相同。我们研究事理，如果寻出了本源，任是互相反对之说，都可调和为一。性善与性恶，可以调和为一，利人与利己，可以调和为一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，可以调和为一，这是前面业已说了的。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，觉得无不可以调和。兹再举两例于下：

（甲）马克思说："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。"又有人说："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。"这两说可以调和为一的。兹用比喻来说明：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，迁移进去，某处作卧房，某处作厨房，某处作会客室，器具如何陈设，字画如何悬挂，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。我们的思想，受了屋宇之支配，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，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，也可把他另行改造，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，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。欧洲机器发明而后，工业大兴，人民的生活情形，随之而变，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，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，发明家费尽脑力，机器才能出现，工业才能发达，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。这类说法，与"英雄造时势，时势造英雄"是一样的，单看一面，未尝说不过去，但必须两面合拢来，理论方才圆满。有了物理数学等科，才能产出牛顿，有了牛顿，物理数学等科，又生大变化。有了咸同的时局，才造出曾左诸人，有了曾左诸人，又造出一个时局。犹如鸡生蛋，蛋生鸡一般，表面看去，是辗转相生，其实是前进不已的，后之蛋非前之蛋，

后之鸡非前之鸡。物质支配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，英雄造时势，时势又造英雄，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。倘若在进化历程中，割取半截以立论，任他引出若干证据，终是一偏之见。我们细加考究，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，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，鸡之外无蛋，蛋之外无鸡，心之外无物，物之外无心，唯心论，唯物论，原可合而为一的。

（乙）古人说："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。"孙中山说："知难行易。"这两说也可合而为一的。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，不去实行，就对他说道：知是很容易的，行是很艰难的，你们总是趋重实行就是了。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，党人不肯实行，孙中山就对他们说道：知是很艰难的，行是很容易的，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，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。古人和孙中山，都是注重在实行，有何冲突？"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"二语，出在伪古文尚书上，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，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，叫武丁莫行，原书俱在，可以复按。发明轮船火车的人，费了无限心力，方才成功，发明之后，技师照样制造，是很容易的，这是"知难行易"。初入工厂的学生，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，学生听了，心中很了然，做起来却很艰难，这是"知易行难"。孙中山的说法，和傅说的说法，其差异之点，即在知字的解释不同。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见真理而言，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，我们试取一"孙文学说"读之，他举出的证据，是饮食、作文、用钱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，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。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，他训诫党员，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，故说"知难行易"。傅说身居师保之位，他训诫武丁，是技师对学生说话，故说"知易行难"。就实际言之，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，交与技师制造，技师又传授学生，原是一贯的事，孙中山和傅说，各说半截，故二者可合而为一。由此知知易行难，和知难行易两说，可以调和为一，世间的事，有知难行易者，有知易行难者，合二者而言之，理论就圆满了。

著者把性善和性恶，利人和利己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，唯心和唯物，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，乃下一结论曰："无论古今中外，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，双方俱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经过长时间之争辩，仍对峙不下者，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，一定

是各得真理之一半，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，理论就圆满了。”

著者从前对于孙中山的学说，也不甚满意，故去岁著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》，系自辟蹊径，独立研究，不与民生主义相涉，自以为超出孙中山的范围了。今岁著此文时，复取孙中山学说研究之，意欲寻出缝隙，加以攻击，无如任从何方面攻击，他俱躲闪得开，始知他的学说理论圆满，他倡此种学说时，四面八方，俱是兼顾到了的，我去岁所拟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办法，已尽包括于民生主义之中。我当初讨论这个问题，自有我的根据地，并未依傍孙中山，乃所得结果，孙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，因自愧学识之陋，而益服孙中山用力之深。真理所在，我也不敢强自立异，于是把我研究所得者，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材料，阅者试取拙著《宗吾臆谈》，与此文对照观之，当知著者之信仰孙中山，绝非出于盲从。

著者幼年，极崇拜孔子，见《礼记》上有“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”等语，因改名世楷，字宗儒，后来觉得孔子学说，有许多地方不满我意，乃改字宗吾，表示信仰自己之意，对于孔子宣布独立，而今仔细研究，始知孔子的学问，原自精深，确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，远非西洋哲学家所能企及。孔子学说，最贻人口实者，不过忠君一层，其实这是时代的关系，于他的学说，并无甚损。古时主权在君，故孔子说忠君，这不是尊君，乃是尊主权，现在主权在民，我们把他改为忠于民就是了。例如孔子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我们改为“人民对政府要有礼，政府对人民要尽忠”，施行起来，就无流弊了。孙中山曾说：欧美人民，对于政府，常有反抗的态度。瑞士学者新发明一种说法，说“人民对政府要改变态度”。我们说：“人民对于政府要有礼”，也可算是新学说。像这样的替孔子修正一下，他的学说，就成为现在最新的学说了。《大学》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段话，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，孙中山称赞他是中国独有的宝贝，外国大政治家没有见到。孔子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孙中山常喜欢写天下为公四字，因为孔子理想的社会，是大同世界，孙中山理想的社会，也是大同世界，所以孙中山对于孔子，极为心折。

宇宙事物，原是孳生不已的，由最初之一个，孳生出无数个，越孳

生，越纷繁，自其相同之点观之，无在其不同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，无在其不异。古今讲学的人，尽管分门别户，互相排斥，其实越"讲越相合，即如宋儒排斥佛学，他们的学说中，参得有禅理，任何人都不能否认。孟子排斥告子，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，他说"无善无恶心之体"，其语又绝类告子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因为宇宙真理，同出一源，只要能够深求，就会同归于一。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，从他相异之点看去，草与木不同，此木与彼木不同，同是一木，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，用显微镜看之，无一朵相同之花，无一片相同之叶，可说是不同之极了，我们倘能会观其通，从他相同之点看去，则花花相同，叶叶相同，花与叶相同，此木与彼木相同，木与草相同，再进之，草木和禽兽相同，精而察之，草木禽兽，泥土沙石，由分子，而原子，而电子，也就无所谓不同了。我们明白此理，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。有人问我道：你说"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"。请问各种学说，由同而异，又由异而同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？我说：水之变化，即是力之变化，同出一源之水，可分为数支，来源不同之水，可汇为一流，千派万别，无不同归于海，任他如何变化，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，宇宙事物，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，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。

中国人研究学问，往往能见其全体，而不能见其细微。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，总括全体而言之，好像远远望见一山，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，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，就说得依稀恍惚了。西人分科研究，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，至于山之全体，却不十分了然。将来中西学说，终必有融合之一日，学说汇归于一，即是思想一致，思想既趋一致，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。现在世界纷争不已，纯是学说纷歧酿出来的，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，其下手之方法，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。所谓一致者，不在勉强拉合，而在探索本源，只要把他本源寻出来，就自然归于一致了。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，务于不同之中，寻出相同之点，应事接物，务于不调和之中，寻觅调和的方法，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，不是我们强为调和，因为他根本上，原自调和的。我看现在国中之人，往往把相同之议论，故意要寻他不同之点，本来可以调和的事，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，互相攻击，互相排挤，无一事不从

冲突着手，大乱纷纷，未知何日方止。

现在各党各派，纷争不已，除挟有成见，意气用事者外，其他一切纷争，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。要调和这种纷争，依我想，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学说，彻底研究，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，平心观察，寻觅二者异同之点，果能反复推求，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，彼此之纷争，立归消灭。因为宇宙间的真理，只有一个，只要研究得彻底，所得的结果，必定相同。假使有两人所得结果不同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，或是二人俱不彻底，如果彻底了，断无结果不同之理，大家的思想，既趋于一致，自然就没得纷争了。

现在各种主义，纷然并立，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，有了国界，此国与彼国，即起争端，有了主义，此党与被党，即起争端，将来世界各国，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，各种主义，也必融合为一而后止。无所谓国，无所谓主义，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，这就是大同世界了。著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，攻打列强，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，主张各种主义，公开研究，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。

耶教以博爱为主，后来宗教战争，同奉耶稣之人，互相焚烧屠杀，残酷到了极点，与博爱之宗旨，完全背道而驰，倡民约论的人，何尝不源于悲悯之一念，而其结果，则法国大屠杀，无复丝毫悲悯之念，并非咄咄怪事！著者求其故而不得，只好返求之于力学公例。人之思想感情，俱是以直线进行，耶稣、卢梭诸人的信徒，只知朝着他的目的物奔走，犹如火车汽车，开足了马力，向前奔驰，途中人畜，无不被其碾毙一样。现在身操杀人之柄者，与夫执有手枪炸弹者，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社会上也就受赐不少了。

欧洲新旧教之争，施行大屠杀，是学说冲突之关系，法国革命，施行大屠杀，也是学说冲突之关系，学说杀人，至于如此，真令人四顾苍茫，无从说起。宗教之说，根本上令人怀疑，欧洲殉教诸人，前仆后继，视死如归，自我们的目光看去，仿佛吃了迷药一般，而他们则自以为无上光荣。

中国学术之趋势

自 序

我生平喜欢研究心理学。于民国九年，作一文曰：《心理与力学》。创出一条臆说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"。有了这条臆说，觉得经济政治外交，与夫人世一切事变，都有一定轨道，于是陆陆续续，写了些文字，曾经先后发表。

后来我又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说，觉得学术上之演变，也有轨道可循。我们如果知道，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，即可推测：将来的学术，当向何种途径趋去，因成一文曰：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。自觉此种观察，恐怕不确，存在筐中，久未发表。去岁在重庆，曾将原稿交济川公报登载，兹把他印为单行本，让阅者指正。

我说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"。闻者尝驳我道："我的思想，行动自由，哪里有甚么规律?"殊不知我们受了规律的支配，自己还不觉得。譬如书房里，有一鸟笼，鸟在笼中，跳来跳去，自以为活动自由了，而我们在旁观之，任他如何跳，终不出笼之范围。设使把笼打破，鸟在此室中，更是活动自由了，殊不知仍有一个书房，把他范围着。汉唐以后的儒者，任他如何说，终不出孔子的范围。周秦诸子和东西洋哲学家，可说是打破了孔子范围，而他们的思想，仍有轨道可循，既有轨道可循，即是有规律。

自开辟以来，人类在地球上，行行走走，自以为自由极了。三百年前，出了一个牛顿，发明地心引力，才知道：任你如何走，终要受地心

引力的支配，这是业已成了定论的。人类的思想，自以为目由极了，我们试把牛顿的学说，扩大之，把他应用到心理学上，即知道：任你思想如何自由，终有轨道可循，人世上，一切事变，无不有力学规律。行乎其间，不过一般人，习而不察，等于牛顿以前的人，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样。

我写文字，有一种习惯，心中有一种感想，即写一段，零零碎碎，积了许多段，才把他补缀起来，成了一篇文字。此次所发表者，是把许多小段，就其意义相属者，放在一处，再视其内容，冠以篇名。因此成了四篇文字；（1）老子与程明道；（2）宋学与蜀学；（3）宋儒之道统；（4）中西文化之融合。总题之曰：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。

写文字是发表心中感想，心中如何想，即当如何写。如果立出题目，来做文字，等于入场应试，心中受了题之拘束，所有感想，不能尽情写出，又因题义未尽，不得不勉强凑补，于是写出来的，乃是题中之文，不是心中之文，我发表这本书。本想出以随笔体裁，许多朋友说不对，才标出大题目、小题目，我觉得做题目，比做文章更难，文章是我心中所有，题目是我心中所无，此书虽名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，而内容则非常的简陋，对于题义，发挥未及十分之一，这是很抱歉的。

我写文字，只求把心中感想表达出，即算完事。许多应当参考的书，也未参考，许多议论，自知是一偏之见，仍把他写出来。是心中有了这种疑团，特发表出来，请阅者赐教，如蒙指驳，自当敬谨受教，不敢答辩，指驳越严，我越是感谢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五年，七月二日，李宗吾，于成都。

一 老子与诸教之关系

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

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，第一是周秦诸子，第二是赵来诸儒。这两个时期的学术，都有创造性。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，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，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，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，俱缺乏创造性。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，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。周秦诸子，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，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，要老子才足以代表。赵宋诸儒，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，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，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。

老子一书，当分两部分看，他说致虚守静，归根复命一类话，是出世法，庄列关尹诸人，是走的这条路。他说："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"一类话，是世间法，孔子以仁治国。墨子以爱治国，申韩以法治国等等，皆是以正治国。在吴司马稷直。是以奇用兵，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。老子一书，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，一以贯之。两无偏重。所以提出老子，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。

汉明帝时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，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，愈传愈盛，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门派，相推相荡，到了程明道出来，把二者融合为一，是为宋明之理学，名为儒家，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。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，跟着就分为两大派：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，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。所以来学，要以程明道为代表，朱子不足以代表。

从周秦至今，可分为三个时期。周秦诸子，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，赵宋诸儒，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。现在已经人第三时期

了。世界大通，天涯比邻，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，相推相荡，依天然的趋势看去，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。故第三时期，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。学术之进化，其轨道历历可循，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，出以某种方式，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，当出以某种方式，我们用鸟瞰法，升在空中，如看河流入海，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。

《老子》一书是周秦学派之总纲

宇宙真理，是浑然的一个东西，最初是蒙蒙昧昧的。像一个绝大的荒山，无人开采，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，人人惊异，大家都去开采，有得金的，有得银的，有得铜铁锡的。虽是所得不同，总是各有所得。周秦诸子，都是上山开采的人，这伙人中，所得的东西，要以老子为最多。

老子是道家，道家出于史官，我国有史以来，零零碎碎的，留下许多学说，直到老子出来，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。他生于春秋时代，事变纷繁，他年纪又高，眼见的事又多。身为周之柱下史，是国立图书馆馆长。读的书又多。他自隐无名，不问外事，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，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。

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，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，定名曰道。道者路也。即是说，宇宙万事万物，非走这条路不可，把这种规律，笔之于书，即名之曰：《道德经》。德者有得于心也，根据以往的事变，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，故曰：“执古之道，广御今之有。”

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，讲出来的道理，颠扑不破，后人要研究，只好本着他的道理，分头去研究。他在周秦诸子中，真是开山之祖。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，引而申之，扩而大之，就独成一派。

前乎老子者，如黄帝，如太公，如鬻子管子等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均列入道家，算是老子之前驱，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，是韩非，非之书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两篇，把老子的话，一句一句的解释，呼老子为圣人，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。至吕不韦门客，所辑的《吕氏春秋》，

也是推尊黄老。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，彻始彻终，可用老子贯通之。老子的学说是总纲，诸子是细目，是从总纲中，提出一部分，详详细细的研究，只能说研究得精细，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。

至于老子年代问题，有人说：孔子问礼于老子，为春秋时人，著道德经之老子，为战国时人，是两人，不是一人，这层不必深问，我们只说：《道德经》一书，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。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，是诸子渊源于老子，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，或在其后。我们可说：《道德经》可以贯通诸子，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，无论他生在春秋时，生在战国时，甚或生在嬴秦时，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。

关于老子姓名问题，有种种说法，甚有谓老子姓老者。我想不必这样讲，古人的名字，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，用两个字，切出一个字，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，即知其为某人，名字之上，不必一定冠以姓，如祝鮀是名之上冠以官。行人子羽，是字之上冠以官。东里子产，是字之上冠以地，叔梁纥，是名之上冠以字。司马迁是史官，故称史迁，曾受腐刑，又称腐迁。他如髯参军，短主簿，是官职之上，冠以形貌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，即可确定其为某人，大约老子耳有异状，故姓李名耳，他是自隐无名的人，埋头研究学问，世人得见他时，年已老矣，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，因其髯发皓然，又是一个大耳朵，因呼之为老聃，聃是生前的绰号，不是死后之谥，他不是生而皓首，乃是世人得见他时，业已皓首了。一般学者，闻老子之名，都来请教。孔子也去问礼。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，发辉光大之，就成为一家之言，发表出来，尽是新奇之说，人人都去研究。老子自隐无名，其出处存亡，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。犹之四川疗平与康有为说一席话，康本其说，跟即著出《孔子改制考》，《儒学伪经考》，震惊一世，而廖之书尚未出也，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。老子年龄，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，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，老子修神养身，享年最高，或许活到二百多岁，著道德经时，已入了战国时代，这也是可能的事。

无为之意义

老子的“无为”，许多人都误解了。老子一书，是有为，不是无为。他以为：要想有为，当从无为下手，所以说“无为则无不为”。他的书，大概每句中，上半句是无为，下半句是有为。例如：“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，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”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。要想广，当从俭做起走。要想成器长，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。慈与俭，不敢为天下先，是无为；能勇，能广，能成器长，即是有为。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，阴阳动静，互相为根，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，如作文欲抑先扬，欲扬先抑，写字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一般。老子说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”。我无为，我好静，我无事，我无欲，我无为；能使民化民正，能使民富民朴，是有为，“弱胜强，柔胜刚”。弱柔是无为，胜强胜刚，是有为。老子书中，这类话很多，都是“无为则无不为”的实证。

老子所说的无为，是顺其自然，我无容心的意思。当为的就为，当不为的就不为，如果当为的不为，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，这叫做有为，算不得无为。王弼注老子，就是这种见解。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：“顺自然而行，不造不始”。注二十九章说道：“万物以自然为性，故可因而不可为也，可通而不可执也，物有常性而造为之，故必败也，物有往来而执之，故必失矣。”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。老子说：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”。（韩非本作恃，按作辅义较长）。即是《阴符经》所说：“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，因而制之”。（现在的阴符经，虽是伪书，但说的道理不错。）也即是易经所说：“裁成天地之体，辅相天地之宜”。曹参为相，日饮醇酒，诸事不为，只可谓之“不辅万物之自然”，“不裁成天地之道，不辅相天地之宜”，“知自然之不可违，因而不制之”。黄老之道，岂是这样吗？老子说：“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，其脆易判，其微易散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。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

来龙去路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事未发动，或才发动，就把他弄好了。犹如船上掌舵的人，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，只须轻轻的把舵一搬，那船就平平稳稳的下去了，这叫做无为。即是所谓，“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”，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？文景行黄老，只是得点皮毛，于“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”等工作，未免缺乏，所以不无流弊。但政治之修明，已成为三代下第一，黄老之道之大，也可想见了。

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”之意义

老子说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艾而后礼。”失字作流字解。道流而为德，德流而为仁，仁流而为义，义流而为礼，道德仁义礼五者，是联贯而下的。天地化生万物，有一定规律，如道路一般，是之谓道，吾人懂得这个规律，而有得于心即为德，本着天地生物之道，施之于人即为仁。仁是浑然的，必须制裁之，使之合宜，归为义。但所谓合宜，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，把合宜之事，制为法式，是为饰文，即为礼。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，为之奈何？于是威之以刑。万一有悖礼之人，刑罚不能加，又将奈何？于是临之以兵。我们可续两句曰：“失礼而后刑，失刑而后兵。”礼流而为刑，刑流而为兵。由道德以至于兵，原是一贯而已。

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，有得于心，故老子言道德。孔子见老子后，明白此理，就用以治人，故孔子言仁。孟子继孔子之后，故言仁必带一义字。荀子继孟子之后，注重礼学。韩非学于荀卿，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，故专讲刑名。这都是时会所趋，不得不然。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，就归咎于老子，说申韩之刻薄寡恩，渊源于老子。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，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。言仁义者无罪，言道德者有罪，我真要为老子叫屈。

孔子说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。都是顺着次序说

的，韩昌黎说："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"，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，就算弄颠倒了。

老子说："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。"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，这也是误解老子。道流而为德，德流而为仁，仁流而为义，义流而为礼，礼流而为刑，刑流而为兵。这是天然的趋势，等于人之田小孩而少年，而壮，而老，而死一般。老子说："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"。等于说："失孩而后少，失少而后壮，失壮而后老"。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，知道继续下去，就是为刑为兵，故警告人曰："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"。等于说："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"。这本是自然的现象，说此等话的人，有何罪过。

要救死只有"复归于婴儿"。要救乱只有"复归于无为"。吾人身体发育最快，要算婴儿时代，婴儿无知无欲，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，今之修养家，叫人静坐，却用种种方法，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，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。婴儿的半睡眠状态，是天然的，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，是人工作成的，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，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。我们知：复归于婴儿，可以救死；即知：复归于无为，可以救乱。

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，跟着就有不礼之人，非用刑不可，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，非用兵不可。所以到了用礼之时，乱兆已萌，故曰："乱之首"。然则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"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"。乱机虽动，用无为二字，即可把他镇压下去。老子用的方法，是："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"他这个话不是空谈，是有实事可以证明。春秋战国，天下大乱，延至嬴秦，人心险诈，盗贼纵横，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。始皇二世，用严刑峻罚，其乱愈甚，到了汉初，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，是讲黄老的人，曹参相惠帝用黄老，文景也用黄老，而民风忽然浑朴，怦然三代遗风，这就是实行"镇之以无名之朴"。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，自富自朴了，足知老子所说："复归于无为"，是治乱的妙法。"复归于婴儿"，可以常壮不老；"复归于无为"，可以常治不乱。

由道流而为德，为仁，为义，为礼，为刑，为兵，道是本源，兵是末流。老子屡言兵，他连兵都不废，何至会废礼？他说："以道住人主者，可以兵强天下。"又说："夫慈以战则胜。"慈即是仁，他用兵之

际，顾及道字仁字，即是顾及本源之意。用兵顾及仁字，才不至于穷兵黩武，用刑顾及仁字，才能哀矜勿喜，行礼顾及仁字，才有深情行乎其间，不至徒事虚文，行仁义顾及道德，才能到熙熙皞皞的盛世，不是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。我们读老子一书，当作如是解。老子用兵之际，都顾及本源，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。

老子说："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澹为主。"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；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，是说："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，不得已而用之，道德为主。"老子明知"兵之后必有凶年。"到了不得已之时，还是要用兵，即知他明知礼之后，必有兵刑，到了不得已之时，还是要用礼。吾故曰，老子不废礼。惟其不废礼，以知礼守礼名于世，所以孔子才去问礼。老子知兵之弊，故善言兵，知礼之弊，故善言礼。

用刑用兵，只要以道佐之，以慈行之，民风也可复归于朴。庄子曰："假道于仁，托宿于义，以游于逍遥之虚，……逍遥无为也"。由此知用刑用兵，也是假道于刑，托宿于兵，以达无为之域。我们识得此意，即知老子说："失义而后礼"，说："礼仁忠信之薄"，与孔子所说："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"同是一意。

绝圣弃智之作用

老子说："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，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，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"又说："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"又说："大道废有仁义，智慧出有大伪。"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，这也未免误解。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，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，一切事，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，如果不绝圣弃智，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，得出来的结果，往往违反自然之理。宋儒即害了此病，并且害得很深。例如："妇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"一类话，就是害的这个病，洛蜀分党，也是害的这个病。他们所谓理，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，戴东原说："宋以来儒者，以

己之见，硬做为圣贤立言之意，……其于天下之事也，以己所谓理，强断行之。”又曰：“其所谓理者，同于酷吏所谓法，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。”东原此语，可谓一针见血，假使宋儒能象老子绝圣弃智，必不会有这种弊病。

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，一切事顺天而动，如四时之行，百物之生，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，庄子一书，全是发挥此理，苏子由解老子说道：“大道之隆也，仁义行于其中，而民不知，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。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，而以智慧加之，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。六亲方和，孰非孝慈，国家方治，孰非忠臣，尧非不孝而独称舜，无瞽瞍也，伊尹周公非不忠也，而独称龙逢比干，无桀纣也，涸泽之鱼、相呴以沫，相濡以湿，不知相忘于江湖”。子由这种解释，深得老子本旨。昌黎说老子小仁义，读了子由这段文字，仁义乌得不小。嬴秦时代，李斯赵高，挟智术以驭天下，叛者四起。即是“智慧出有大伪”的实证。汉初行黄老之术，民风浑朴，几于三代，即是“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”的实证。

老子绝圣弃智，此心浑浑穆穆，与造化相通，此等造诣极高。孔子心知之，亦曾身体力行之，但只能喻之于心，而不能喻之于口，只可行之于己，而不能责之于人，孔子不言性与天道，非不欲言也，实不能言也，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。孔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，原是一贯。重言“天何言哉”，反复赞叹，与老子所说：“吾不知其谁之子，象帝之先”，“恍兮惕惚兮，其中有物”等言绝肖。荀子由曰：“夫道不可言，可言皆其似者也，达者因似以识真，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”。子由识得此旨，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：“解老子者众矣，而子由最高。”

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，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，寻常人自然做不到，我们既然做不到，而做出的事，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，又是要不得的，这拿来怎样办呢？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，这个法子，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，孔门教人，每发一念，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，良心认为对的即是善，认为不对的即是恶。恶的念头，立即除去，善的念头，就把他存留下，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。这种念头，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，何以故呢？人是宇宙一分

子，我们最初发出之念，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，可说是迳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，我把这个念头，加以考察，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，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，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法子，岂不简单极了呢？有了这个法子，我们所做的事，求与自然之理相合，就不困难了，所难者，何者为善念，何者为恶念，不容易分别，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，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，把眼前所见的事，仔细研究一下，何者为善，何者为恶，把他分别清楚，随着我心每动一念，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，这就是格物致知了。孔门正心诚意，格物致知，本是非常简单，愚夫愚妇，都做得到，不料宋明诸儒，他把解得玄之又玄。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，并且说："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"直是禅门的顿悟，岂不与中庸所说"愚夫愚妇，与知与能"相悖吗？我们把正心诚意，改作良心裁判四字，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，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。

盈虚消长之理

老子的学说，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，什么是盈虚消长呢？试作图说明之：如图由虚而长，而盈，而消，循环不已，宇宙万事万物，都不出道德轨道。以天道言之：春夏秋冬，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，以人事言之：国家之兴衰成败，和通常所谓"贫贱生勤俭，勤俭生富贵，富贵生骄奢，骄奢生淫佚，淫佚又生贫贱"，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。老子之学；纯是自处于虚，以盈为大戒，虚是收缩到了极点。盈是发展到了极点。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则只有发展的，这即是长了。如果到了盈字地位，则消字即随之而来，这是一定不移之理，他书中所谓："弱胜强，柔胜刚"。"高以下为基"。"功成身退天之道"。"强梁者不得其死"。"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"。"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"。"多藏必亡"。"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"。"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，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，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与之，将欲夺之，必固与

之。”种种说法，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。这个原则，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，等于瓦特发明蒸汽，各种工业都适用。

老子之兵法

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，应用到军事上，就成了绝妙兵法。试把他言兵的话，汇齐来研究，即知他的妙用了，他说：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，……善者果而已。”又曰：“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又曰：“以奇用兵。”又曰：“慈故能勇……夫慈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天将与之，以慈卫之。”又曰：“善为士者不武，善战者不怒，善胜敌者不争。”又曰：“用兵有言，不敢为主而为客，不敢进寸而退尺，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丧吾宝，故抗兵相加，哀者胜矣。”又曰：“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”又曰：“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，是以兵强则不胜。”可知老子用兵，是出于自卫，出于不得已，以慈为主。慈有二意：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；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，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，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，我才起而应之，即所谓“不敢为主而为客。”虽是起而应之，却不敢轻于开战，“轻敌几丧吾宝。”这个宝字，就是“我有三宝”的宝字，慈为三宝之一，轻于开战，即是不慈，就算失去一宝了。我既不愿战，而敌人务必来攻，我将奈何？老子的法子就是守，故曰：“以守则固”。万一敌人猛攻，实在守不住了，又将奈何？老子就向后退，宁可退一尺，不可进一寸，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，敌人还要来攻，如再不开战，坐视我的军士，束手待毙，这可谓不慈之极了。到了此刻，是不得已了，也就不得不战了，从前步步退让，极力收敛，收敛到了极点，爆发出来。等于炸弹爆裂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军士，处处是死路，惟有向敌人冲杀，才是生路，人人悲愤，其锋不可当，故曰“哀者胜矣”。敌人的军士，遇着这种拚命死战的人，向前冲是必死的路，向后转是生路，有了这种情形，我军当然胜，故曰“以战则胜”。敌人的兵，恃强已极，“坚强者死之徒”，他当然败。这真是极妙兵

法，故曰："以奇用兵"。韩信背水阵，即是应用这个原理。

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，推演出来，成书十三篇，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。孙子曰："卑而骄之"。又曰："少则逃之，不若则避之。"又曰："不可胜者守也"。又曰："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"。又曰："投之无所往，死且不北。"又曰："兵士甚陷则不惧，无所往则因，深入则拘，不得已则斗。"又曰："投之无所往，诸刿之勇也。"又曰："帅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，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，而发其机，若驱群羊，驱而往驱而来，莫知所之，聚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将军之事也。"又曰："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。"又曰：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"又曰："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"。凡此种种，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，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，都是初时收敛，后来爆发，孙子曰："将军之事静以幽"。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，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，合并而成的，足知孙子之学，渊源于老子。所异者：老子用兵，以慈为主，出于自卫，出于不得已，被敌人逼迫，不得不战，战则必胜；孙子则出于权谋，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，以激战胜之功，把老子"以奇用兵"的奇字，发挥尽致。开始凡是一种学说，发生出来的支派，都有这种现象，即是把最初之说，引而申之，扩而大之，惟其如此，所以独成一派。老子的清静无为，连兵事上都用得着，世间何事用不着。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，所以他的学说，无施不可。

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

韩非主道篇曰："虚静待令"。又曰："明君无为于上"。这虚静无为四字，是老子根本学说，韩非明明白白提出，足见他渊源所自。其书曰："若水之流，若船之浮，守自然之道，行无穷之令。"又曰："不逆天理，不伤情性，不吹毛而求小疵，不洗垢而察穷，不引绳之外，不维继之内，不急法之外，不缓法之内，守成理，因自然，祸福生于道德，而不出于爱恶"。可见他制定的法律，纯是本于自然之理，从天理

人情中斟酌而出，并不强人以所难。他说："明主立可为之赏，设可避之斗，故贤者获赏，而不肖者少罪。"可见他所悬的赏，只要能够努力，人人都可获得，所定的罚，只要能够注意，人人都可避免，又曰："明君之行赏也，暖乎如时雨，百姓利其泽，其行罚也，畏乎若雷霆，神圣不能解也，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，诚有过则虽近亦必诛。"事事顺法律而行，无一毫私见。他用法的结果是："因道全法，君子乐而大奸止，淡然闲静，因天命，持大体，上下交顺，以道为舍。"这是归于无为而止。

老子讲虚静，讲无为；韩非也是讲虚静，讲无为。黄老之术，发展出来，即为申韩，申韩之术，收敛起来，即为黄老。二者原是一贯。史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，即是这个道理。后人不知此理，反痛诋史迁，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，不伦不类。试思史迁父子，都是深通黄老的人，他论大道则先黄老，难道对于老氏学派，还会谈外行话吗？不过韩非之学，虽是渊源于老子，也是引而申之，扩而大之，独成一派。老子曰："我无为而民自化。"韩非曰："明君无力于上，群臣竦惧乎下。"同是无为二字，在老子口中，何等恬适，一出韩非之口，而凛然可畏，惟其如此，所以才独立成派。

庄子与韩非，同是崇奉老子，一出世，一入世，途径绝端相反，而皆本之于无为。庄子事事放任，犹可谓之无为，韩非事事干涉，怎么可谓之无为呢？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，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，所以谓之无为。韩非是顺应自然，制出一个法律，我即依着法律实行，丝毫不出入，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，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，因为他执行法律时，莫得丝毫通融，不象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，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。

韩非说："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，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。"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，并不苛细。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，入关之初，"除秦苛法，约法三章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""苛法"是捕鼠之物，把他除去，自是黄老举动："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"，是设柙役虎，用的是申韩手段。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，黄老与申韩，有何冲突？

老子与其他诸子

道流而为德，德流而为仁，仁流而为义，义流而为礼，礼流而为刑，刑流而为兵。道德居首，兵刑居末。孙子言兵，韩非言刑，而其源皆出于老子。我们如果知道：兵刑与道德相通，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。老子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，孔子温良恭俭让，俭字与老子同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，孔子尝言仁，即是老子之慈，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。墨子之兼爱，即是老子之慈，墨子之节用，即是老子之俭。老子曰："用兵有言，不敢为主而为客，不敢进寸而退尺"。又曰："以守则固"。墨子非攻而善守，足见其与老子相通。战国的纵横家，首推苏秦，他读的书，是阴符，揣摩期年，然后才出而游说，古阴符不传，他是道家之书，大约是与老子相类。老子曰："天之道其犹张弓乎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"。老子此语，是以一个平字立论。苏秦说六国，每用"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"一类话，激动人不平之气，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，与自然之理相合，所以苏秦的说法，能够披靡一世。老子所说："欲取姑予"等语，为后世阴谋家所祖，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，直接承继老子之学，更不待说，周秦诸子之学，即使不尽出于老子，也可说老子之学，与诸子不相抵触，既不抵触，也就可以相通。后世讲神仙，讲符箓等等，俱托始于老子，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。

汉朝汲黯，性情刚直，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，乃用黄老之术，专尚清静。诸葛武侯，淡泊宁静，极类道家，而治蜀则用申韩。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，根本上是共通的原故。孔孟主张仁义治国，申韩主张法律治国，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，其实是一贯的。诸葛武侯说："法行则知恩"，这句话真是好极了，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。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，行法即是施恩，法律即是仁义。子产治郑用猛，国人要想杀他；说道："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"。后来感他的恩，又生怕他死了，说道："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"。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？他临

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，可见猛的宗旨，至死不变，而所收的效果，却是惠字，《论衡》载："子谓子产……其养民也惠"。又讲："或问子产，子曰，'惠人也'。"猛的效果是惠，此中关键，只有诸葛武侯懂得，所以他治蜀尚严，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。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，其实最慈惠者，莫如申韩。申子之书不传，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，对照读之，当知鄙言之不谬。

韩非之学，出于荀子，是主张性恶的。荀子以为人性恶，当用礼去裁制他。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，法律的裁制力强，故变而论刑名，由此可知：黄老申韩孟荀，原是一贯。害何种病，服何种药。害了嬴秦那种病，故汉初药之以黄老，害了刘璋那种病，故孔明药之以申韩，儒者见秦尚刑名，至于亡国，以为申韩之学，万不可行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。商鞅变法，秦遂盛强，逮至始皇，统一中国，见刑名之学，生了大效，继续用下去，犹之病到垂危，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，服之立愈，病已好了，医生去了，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，焉得不病？焉得不死？于芒硝大黄何尤？于医生何尤？

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

《礼记》上，孔子屡言："吾闻诸老聃曰"。可见他的学问，渊源于老子。至大限度，只能与老子对抗，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。《史记》载："孔子适周，问礼于老子，去，谓弟子曰：'鸟吾知其能飞，鱼吾知其能游，兽吾知其能走，走者可以为网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，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，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耶。'"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，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，默然心死一样。《虬髯客传》载：道士谓虬髯曰："此世界非公世界，他方可也"。虬髯也就离开中国，到海外扶徐，另馀生活。孔子一见老子，恰是这种情形。老子曰："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"。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，莫得孔子说的，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。老子学说，虽包含有治世法，但是略而不详，他专言道德，于仁义礼三

者，不加深论。孔子窥破此旨，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，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，条分缕析的列出来。于是老子谈道德，孔子谈仁义礼，结果孔子与老子，成了对等地位。孔子是北方人，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，虽是佩服老子，却不愿居他篱下。这就像清朝恽寿平，善画山水，见了王岩谷的山水，自量不能超出其上，再画得好，也是第二手，乃改习花卉，后来二人竟得齐名。孔子对于老子，也是这样。他二人一谈道德，一谈仁义礼，可说是分工的工作。

《论语》载：子贡曰："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"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？因为性与天道，老子已经说尽，莫得孔子说的了。何以故呢？言性言天道，离不得自然二字，老子提出自然二字，业已探骊得珠，孔子再说，也不能别有新理，所以就不说了。老子说："致虚极，守静笃。"请问致的是什么？守的是什么？这明明是言心言性，一部宋元明学案，虚字静字，满纸都是，说来说去，终不出"致虚守静"的范围，不过比较说得详细罢了。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，如云"天地之间，其犹橐开乎，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"。"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"。"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孰为此者天地，天地尚不能长久，而况于人乎"。"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"。"天之道其犹张弓乎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馀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"老子这一类话，即把天地化生万物，天人感应，天道福善祸淫，种种道理，都包括在内，从天长地久，说至天地不能长久，就叫孔子再谈天道，也不能出其范围，所以只好不说了。老子所说："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"孔子也是见到了的，他赞周易，名此物曰太极，曾极力发挥，惟理涉玄虚，对门人则浑而不言，故大学教人，从诚意做起。

性与天道，离了自然二字，是不能讲的。何以见得呢？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，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，朱子毕生精力，用在四书集注上，试拿集注来研究："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"这一章，朱子注曰："性者人所受之天理，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，其实一理也"。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吗？中庸"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随。"朱注："率循也，道犹路也，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间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"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？

孟子曰："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，故者以利为本，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，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，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，如智者亦行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"。此章言性又言天道，朱注："利犹顺也，语其自然之势也，……其所谓故者，又必本其自然之势，……水之在山，则非自然之故矣，……禹之行水，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，……程子曰，此章专为智而发。愚谓事物之理，莫非自然，顺而循之，归为大智。"朱注五提自然二字，足见性与天道，离却自然二字，是讲不清楚的。老子既已说尽，宜乎孔子不再说了。

三教异同之点

春秋战国时，列国并争，同时学术界，也有百家争鸣，自秦以后，天下统一，于是学说随君主之旨意，也归于统一。秦时奉法家的学说，此外的学说，皆在所摈斥。汉初改而奉黄老。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，罢黜百家，从此以后，专奉孔子之学。而老子的学说，势力也很大。孔老二教，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。随后佛教传入中国，越传越盛，成了三大河流。同在一个区域内，相推相荡，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天然有合并的趋势，于是宋儒的学说，应运而生。

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，须先把三教异同，研究一下：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，无待我们再说，但我们可补充一下：三教均以返本为务。孟子曰："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"但返至身，还不能终止。孟子又曰："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"可知儒家返本，以返至孩提为止。老子一书，屡言婴儿，请问孟子之孩提，与老子的婴儿，同乎不同？答曰：不同。何以故呢？孟子所说之孩提能爱亲敬兄，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。老子曰："如婴儿之未孩。"说文：孩，小儿笑也。婴儿还未能笑，当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。老子又说："骨弱筋柔而握固。"初生小孩，手是握得很紧的。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，确指才下地者而言。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，

是有知识的。老子曰："常使民无知无欲。"是莫有知识的。可知老子返本更进一步，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。

前
庚——天下
己——国
戊——家
丁——身（我）（成人时）
丙——孩（提）（知爱知敬）
乙——婴儿（天知无欲）
甲—父母未生前（无人无我）
后

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，然犹有心；故曰："圣人当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"。释氏则并心而无之，以证入涅槃，无人无我为止。禅家常教人"看父母未生前面目"。竟是透过娘胎，较老子的婴儿，更进一步。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，我们可作图表示，如图：儒家由庚返至丁，再由丁返至丙。老子由丁返至乙。佛氏由丁返至甲。我们可呼此线为"返本线"。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。要说他们不同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，这是相同的。要说他们相同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，老子返至乙点丽止，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，又可说是不同。所以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，总看如何看法。

大学说："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。"从身字追进两层，直至意字，从诚意做起走。但是有意就有我，老子以为有了我即有人，人我对立，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，闹个不休。有我即身，故曰："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"倘若无有我身，则人与我浑而为一，就成了与人无忤，与世无争，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。故曰："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?"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，与夫老子谓孔子曰："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"等语，都是根据这个原理。试问如老子所说，是个什么境界呢？这就是所说的："恍兮惚兮，窈兮冥兮"了，也即是"婴儿未孩"的状态，自佛学言之，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，释氏更进一步，打破此识，而为大圆镜智，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，即是心经所说"无智亦无得"了。

据上面所说，似乎佛氏的境界，非老子所能到，老子的境界，非孔子所能到，则又不然，佛氏说妙说常，老子曰："复命曰常"。又曰："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"佛氏的妙常境界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？孔子毋意必固我，又曰："无可无不可"。佛氏所谓汝执我执，孔子何尝莫有破呢？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，终是个个独立。他们立教的宗旨，各有不同，佛氏要想出世，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，连心字都打破，方能出世，说是要出世，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，也就不详加研究了。孔门要想治世，是在人事上工作，人事之发生，以意念为起点，而意念之最纯粹者，莫如孩提之童，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来，以诚意为下手工夫，由是而正心修身，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他的宗旨，既是想治世，所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，也就不加探讨了。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，故绝圣弃智，无知无欲，于至虚至静之中，领会那寂然不动，虚而逍遥之妙，故而象于初生之婴儿。向后走是出世法，向前走是世间法。他说道："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"这个中字，即指乙点而言，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。佛氏三藏十二部，孔子诗书易礼春秋，可算说得很多了。老子却不愿意多说，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，扼着乙点立论，含有"引而不发，跃如也"的意思。他的意思，只重在把入世出世，打通为一，揭出原理，等人自去研究，不愿多言，所以讲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，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。综而言之，释氏专言出世法，孔子专言世间法，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，打通为一，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。

老子说："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后，夫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"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工夫，步步向内收敛，到了归根复命，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，所以他说："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于家，其德乃彰，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，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，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"孔子之学，得之于老子。其步骤是一样。大学说："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"这是步步向内收敛。"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"又是步步向外发展。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，与佛氏相同，从"修之于身"，以至"修之于天下"，与孔子相同，所以老子之学，可贯通儒释两家。

北方人喜吃面，南方喜吃饭，孔子开店卖面，释迦开店卖饭，老子店中，面和饭皆有，我们喜欢吃某种，进某家店子就是了。不能叫人一律吃面，把卖饭的店子封了，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，把卖面的店子封了。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，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，不过开店的目的，各有不同罢了。儒释道立教，各有各的宗旨，三教之徒，互相攻击，真算多事。

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

最初孔老二教，迭为感衰，互相排斥。故太史公说："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"到了曹魏时，王弼出来。把孔老沟通为一。他说"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，情，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，今以无累便谓其不复应物，失之远矣"（见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），"冲和以通无"，指老氏而言。"哀乐以应物"，指孔氏而言。裴说："应物而无累于物"。就把孔老二说，从学理上融合为一，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，易经是儒家的书，老子是道家的书，他注这两部分，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，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，算是一种新学说，大受一般人的欢迎，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。

人情是厌故喜新的，清谈既久，一般人都有点厌烦了，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，越传越盛，在学术上另辟一新世界，朝野上下，群起欢迎，到了唐时，佛经遍天下，寺庙遍天下，天台，华严，净土各宗大行，禅宗有南能北秀，更有新兴之唯识宗，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。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，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，道教因之很盛。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，当然也最盛行。三教相荡，天然有合并的趋势。那个时候的儒者，多半研究佛老之学，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，却不曾把此融合为一，直到宋儒，才把这件工作完成了。

戴东原谓："宋以前孔孟自孔孟，老子自老子，谈老子者高妙其言，不依附孔孟，宋以来，孔孟之书，尽失其解，儒家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。"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，但我们从这个地方，反可看出宋儒的真

本事来，最当注意的是："宋以前，孔孟自孔孟，老释自老释"二语，老释和孔孟，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，宋儒就把他融合为一，创作力何等伟大。

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，与佛老无关，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，他们学说俱在，何能掩饰。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，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，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，尽可自豪，反弃而不居，自认孔门嫡派。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。惟其是这样，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。儒释道三教，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，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，自家还不觉得，犹如河内撑船一般，宋儒极力欲逆流而上，自以为撑到上流了，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，假令程朱诸人，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，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，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，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，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。宋儒学说，所以不能磨灭掉，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，其所以为人诟病者，在里子是三教合一，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，成了表里不一致。我们对于宋儒，只要他的里子，不问他的面子，他们既建树了这等大功，就应替他表彰。

宋儒融合三教，在实质上，不在字面上。若以字面而论，宋儒口口声声，诋斥佛老，所用的名词，都是出在四书五经上，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。今人言三教合一者，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，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把三教融合了。这是甚么缘故呢？譬如吃饮食，宋儒把鸡鱼羊肉，米饭菜蔬，吃下肚去，变为血气。看不出鸡鱼羊肉，米饭菜蔬的形状，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。他人是把这些东西吃下去，吐在地上，满地是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细颗，并未融化。我们把融合三教之功，归之宋儒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世间的道理，根本上是共通的，宋儒好学深思，凡事要研究彻底，本无意搜求共通点，自然把共通点寻出，所以能够把三教融合。

由晋历南北隋唐五代，而至于宋，都是三教并行。名公巨卿，大都研究佛老之学，就是以禅宗为尤盛。我们试翻《五灯会元》一看，即知禅宗自达摩东来，源远流长，其发达的情形，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，还要盛些。王荆公尝问张文定（方平）："孔子去世百年，生孟轲亚圣，自后绝无人何也？"文定言："岂无？只有过孟子上者。"公问是谁？文定言："江南马大师，汾阳无业禅师，雷峰，岩头，丹霞，云门

是也。儒门淡泊，收拾不住，皆归释氏耳。”荆公欣然叹服。（宋稗类钞宗乘），佛教越传越盛，几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，宋儒生在这个时候，受儒道的甄陶孕育，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。

周敦颐的学问，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和道家陈抟的太极图，这是大家知道的。程伊川说：“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。”宋史说：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，读了犹以为未足，又求诸老释。这都是“儒门淡泊收拾不住”的原故。明道和横渠，都是“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。”试问：他二人初读孔子书，何以得不到真传，必研究老释多年，然后返求诸六经，才把他寻出来？何以二人都会如此？此明明是初读儒书，继续佛老书，涵泳既久，融会贯通，心中恍若有得：然后还向六经搜求，见所说的话，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，就把他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，这即是所谓宋学了。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，所以二人得着的结果相同。

著者往年著《心理与力学》一文，创一条臆说：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曾说：“地心有引力，把泥土沙石，有形有状之物，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，人心也有引力，把耳濡目染，无形无体之物，吸引来，成为一个心。”宋儒研究儒释道三教多年，他的心，已经成了儒释道的化合物，自己还不觉得，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，里子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。从此以后，儒门就不淡泊了，就把人收拾得住，于是宋学风靡天下，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，传诵不衰。他们有了这种伟大工作，尽可独立成派，不必依附孔子，在他们以为依附孔子，其道始尊，不知依附孔子，反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。

宋学含老学成分最多

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，故处处含有佛老意味。其含有佛学的地方，前人指出很多，不必再加讨论。我们所要讨论的，就是宋学所含老氏成份，特别浓厚。宋儒所做的工夫，不外“人欲净尽，天理流行”八字。天理者天然之理，也即是自然之理。人欲者个人之私意。宋儒教

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，顺着自然的道理做去，这种说法，与老子有何区别？所异者，以天字代自然二字，不过字面不同罢了。

但是他们后来注重理学，忽略了天字，即是忽略了自然二字，而理学就成了管见，此戴东原所以说宋儒以理杀人也。

周子著《太极图说》云："无极而太极。"这无极二字，即出自《道德经》。张横渠之易说，开卷诠乾四德，即引老子"迎之不见其首"二语。中间又引老子"谷神，刍狗，三十辐共一毂，高以下为基"等语，更是彰明其著的。

伊川门人尹焞言："先生（指伊川）平生用意，惟在易传，求先生之学，观此足矣，语录之类，皆学者所记，所见有深浅，所记有工拙，盖不能无失也"。（二程全书）可见易学是伊川根本学问，伊川常令学者看王弼易注（二程全书），四库提要说："自汉以来，以老庄说易，始魏王弼。"伊川教人看此书，即知：伊川之学根本上参有老学。

朱子号称是集宋学大成的人。论语开卷言："学而时习之"。朱子注曰："后觉者必效先学者之所为，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。"戴东原曰：复其初出庄子。"（东原年谱），明善复初，是宋儒根本学说，庄子是老氏之徒，这也是参有老学之证。

大学开卷言："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"朱子注曰："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虚灵不昧，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"这个说法，即是老子的说法。我们可把这几句话，移注老子。老子曰："谷神不死"，谷者虚也，神者灵也，不死者不昧也，"谷神不死"，盖言：虚灵不昧也。"具众理而应万事"，即老子"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"之意。"虚"则冲漠无朕，"不屈"则万象森然，故曰"具众理"。"动"则感而遂通，"愈出"则顺应不穷，故曰："应万事"。这岂不是老子的绝妙注脚？

中庸开卷言："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"朱注提出自然二字。论语"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"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。孟子"天下之言性也"一章，朱注五提自然二字，这是前面已经说了的。

又老子有"致虚极，守静笃"二语，宋儒言心言性，满纸是虚静二字，静字犹可说大学中有之，这虚字明明是从老子得来。

宋学发源于孙明复，胡安定，石守道三人，极盛于周、程、张、朱、诸人。程氏弟兄幼年曾受业于周子，其学是从周子传下来的，但伊

川作明道行状说："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。"又说："先生为学，自十五六时，闻汝南周茂叔论道，遂嫌科举之业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未知其要，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，返求诸六经，然后得之。"可见宋学是程明道特创的，明道以前，只算宋学的萌芽，到了明道，才把他组织成一个系统，成为所谓宋学。周子不过启发明道求之志罢了。所以我们研究宋学，当从明道研究起走。

明道为宋学之祖，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。而明道之学，即大类老子，老子曰："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"明道著定性书说："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，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。故君子之学，莫如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"此等说法，与老子学说，有何区别？也即是王迅所说："体冲和以通无，应物而无累于物。"

二程遗书载：明道言："天地万物之理，无独必有对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也。每中夜以思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"明道所悟得者，即是老子所说："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声音相和，前后相随"之理，老子书中，每用雌雄，荣辱，祸福，静躁，轻重，歙张，枉直，生死，多少，刚柔，强弱等字，两两相对，都是说明"无独必有对"的现象。明道提出自然二字，宛然老子的学说。

其他言自然者不一而足，如遗书中，明道云："言天之自然者，谓之天道。"又云"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自然之道也"皆是。故近人章太炎说："大程远于释氏，偏迩于老聃"。（见检论卷四通程篇）

宋学是明道开创的，明道之学，既近于老子，所以赵宋诸儒，均含老氏意味。宋儒之学，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？因为释氏是出世法，孔子是世间法，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，一以贯之。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，以孔子之学治世，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，把治心治世，打成一片，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。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入老氏途径，只因宇宙真理，实是这样，不知不觉，就走入这个途径，由此知：老子之学，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，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。换言之：即是老子之学，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。

伊川说："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。"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着些甚么呢？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，提出来与论语孟子，合并研究。在尚书中搜出"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"十六字。

又在乐记中搜出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”数语，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，互相研究，这即是所谓“得不传之学于遗经”了。

宋儒搜出这些东西，从学理上言之，固然是对的，但务必说这些东西是孔门“不传之学”，就未免靠不住，“人生而静”数语，据后人考证，是庄子引老子之语，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。而庄子一书，又有人说是伪书，观其全书，自是道家之书，确非孔门之书。

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：“虞廷十六字，盖纯袭用荀子，而世未之察也，荀子解蔽篇：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，故道经曰：“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，危微之几，唯君子而后能知之”。此文前文有精于道，一于道之语，遂概括为四字，复续以成十六字”。可见宋儒讲的危微精一，直接发挥荀子学说，间接是发挥道家学说。

朱子注大学说：“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。则曾子之意，而门人记之也。”朱子以前，并无一人说大学是曾子著的，不知朱子何所依据，大约是见诚意章，有曾子曰三字，据阎百诗说：礼记四十九篇中，称曾子者共一百个，除有一个是指曾子外，其余九十九个，俱指曾参，何以见得此篇多处提及曾子二字，就是曾子著的？

朱子说：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学之于书以授孟子。此话也很可疑。中庸有“载华岳而不重”一语，孔孟是山东人，一举目即见泰山，所以论孟中言山之高者，必说泰山。华山在陕西，孔子西行不到秦，华山又不及泰山著名，何以孔门著书，会言及华山呢？明明是汉都长安，汉儒著书，一举目即见华山，故举以为例。又说：“今天下车同轨、书同文”，更是嬴秦混一天下后的现象。这些也是经昔人指出了的。

据上所述，宋德在遗经中抛出来的东西，根本上发生疑问。所以宋儒的学问，决不是孔孟的真传，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，宋儒此种工作，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，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，他们极力尊崇孔孟，反对老子和荀子，实质上反替老荀宣传，由此知：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，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。我们重在考求真相，经过他们这种工作，就可证明孔老孟荀，可融合为一，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，真是不小。

我们这样的研究，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。趋势是什么？就是各种学说，根本上是共通的，越是互相攻击，越是日趋融合。何以

故？因为越攻击，越要研究，不知不觉，就把共通之点发见出来了。

宋元学案载："明道不废观释老书，与学者言，有时偶而示佛语。伊川一切摒除，虽庄列亦不看"。明道把三教之理，融会贯通，把大原则发明了，伊川只是依着他这个原则研究下去，因为原则上含得有释老成分，所以伊川虽摒除释老之书不观，而传出来的学问，仍带有释老意味。

伊川尝谓门人张释曰："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，异时欲知我者，求之此文可也"。伊川作明道行状，言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，既自称与明道同，当然也出入于老释。所谓不观释老书者，是指学成之后而言，从前还是研究过释老的。

宋儒的学说，原是一种革命手段。他们把汉儒的说法，全行推倒，另创一说，是备具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。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，仍复托诸孔子，名为复古，实是创新。路德之新教，欧洲之文艺复兴，俱是走的这种途径。宋儒学说，带有创造性，所以信从者固多，反对者亦不少，凡是新学说出世，都有这类现象。

程明道死后之派别

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，刚刚做成功，跟着就死了。死后，他的学术，分为两大派。一派是伊川朱子，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。明道死时，年五十四岁，死了二十多年，伊川才死。伊川传述明道的学问，就走入一偏，递传以至朱子。后人说朱子集宋学之大成，其实他未能窥见明道全体。宋元学案说："朱子谓明道说话浑沦，然太高，学者难看……朱子得力于伊川，于明道之学，未必尽其传也"。据此可知：朱子得明道之一偏，陆象山起而绍述明道，与朱子对抗，不但对于朱子不满，且对于伊川亦不满。他幼年闻人诵伊川语，即说道："伊川之言，奚为与孔孟不类。"又说："二程见茂叔后，吟风弄月而归，有'吾与点也'之意。后来明道此意却存，伊川已失此意。"又说："元晦似伊川，钦夫似明道，伊川锢蔽深，明道却疏通。"象山自以为承继明道的，伊川自以为承继明道的，其实伊川与象山，俱是得明道之一偏，不足尽

明道之学。伊川之学，得朱子发挥光大之，象山之学，得阳明发挥光大之，成为对抗之两派。朱子之格物致知，是偏重在外，阳明之格物致知，是偏重在内。明道曰："与其非外而是内，不若内外之两忘"。明道内外两忘，即是包括朱陆两派。

朱陆之争，乃是于整个道理之中，各说半面，我们会通观之，即知两说可以并行不悖。（一）孔子说："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"。朱子重在学，陆子重思，二者原是不可偏废（二）孟子说："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"。朱子宗的是这个说法。孟子又说："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，此天所与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"。陆子宗的是这个说法。二说同出于孟子，原是不冲突的。（三）陆子尊德性，朱子道问学，中庸说："尊德性而道问学"。中间著一两字，二者原可联为一贯。（四）从论理学上言之：朱子用的是归纳法，陆子用的是演绎法，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。（五）以自然现象言之：朱子万殊归于一本，是向心力现象，陆子一本散之万殊，是离心力现象，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。我们这样的观察，把他二人的学说，合而用之即对了。

明道学术：分程（伊川）朱和陆王两派，象山相当于伊川，阳明相当于朱子。有了朱子"万殊归于一本"之格物致知，跟着就有阳明"一本散之万殊"之格物致知，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，跟着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，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，笛卡儿之学，类象山和王阳明。宇宙真理，古今中外是一样的，所以学术上之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，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。

学术之分合

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融合众说，独成一派。老子书上有"谷神不死"及"将欲取之"等语，经后人考证，都是引用古书。他书中所说："用兵有言"及"建言有之"等语，更是明白援引古说，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，他的学说，也是融合众说，独

成一派。印度有九十六外道，释迦一一研究过，然后另立一说，这也是融合众说，独成一派。宋儒之学，是融合儒释道三教而成，也是融合众说，独成一派。这种现象，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。

大凡一种学说，独立成派之后，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。韩非说："儒分为八，墨分为三。"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。孔学分为八派，秦火而后，孔学灭绝，汉儒研究遗经，成立汉学，跟着又分许多派。老氏之学，也分许多派。佛学在印度，分许多派。传入中国，又分若干派。宋儒所谓佛学者，盖禅宗也。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。分南北两派，北方神秀，南方慧能，慧能为六祖，他门下又分五派。明道创出理学一派，跟着就分程（伊川）朱和陆王两派。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。朱子门下分许多派，陆王门下，也分许多派。这种现象，是由合而分的现象。

宇宙真理，是圆陀陀的，一个浑然的东西，人类的知识很短浅，不能骤窥其全，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，合而又分的研究，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，研究得清楚。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，就有人融会贯通，使他汇归于一的，这是作的由分而合的工作。既经汇归于一之后，众人又分头研究，这是作的由合而分的工作。

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是西洋学说，传入中国，与固有的学说，发生冲突，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。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，融会贯通，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。必定要这样。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，等到融会贯通过后，再分头研究，做由合而分的工作。

二　宋学与蜀学

二程与四川之关系

凡人的思想，除受时代影响之外，还要受地域的影响，孔子是鲁国人，故师法周公，管仲是齐国人，故师法太公，孟子是北方人，故推尊孔子，庄子是南方人，故推尊老子，其原因：（1）凡人生在一个地方，

对于本地之事，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，就成了拘墟之见。（2）因为生在此地，对于此地之名人，有精密的观察，能见到他的好处，故特别推称他。此二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，我写这篇文字，也莫有脱此种意味。

程明道的学说，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。是顺应时代的趋势，已如前篇所说。至于地域关系，他生长河南，地居天下之中，为宋朝建都之地，人文荟萃，是学术总汇的地方，故他的学说，能够融合各家之说，这层很像老子，老子为周之柱下史，地点也在河南，周天子定都于此，诸侯朝聘往来，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，故老子的学说，能够贯通众说。

独是程明道的学说，很受四川的影响。这一层少人注意，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：

明道的父亲，在四川汉州做官，明道同其弟伊川，曾随侍来川，伊川文集中，有《为太中（程子父）作试汉州学生策问》三首，《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》、《再书》及《蜀守记》等篇，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，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，二程在川濡染甚深，事实俱在，很可供我们的研究。

四川之易学

《宋史·谯定传》载："程颐之父珦，尝守广汉，颐与其兄灏皆随侍，游成都，见治篾箍桶者，挟册，就视之，则易也，欲拟议致诘，而蔑者先曰：'若尝学此乎'？因指'未济男之穷'以发问，二程逊而问之，则曰'三阳皆失位也，'兄弟涣然有所省，翌日再过之，则去矣。"伊川晚年注易，于未济卦，后载"三阳失位"之说，并曰："斯义也，闻之成都隐者。"呈观宋史所载不虚。据《成都县志》所载："二程过箍桶翁的地方，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。"

谯定传又载："袁滋入洛，问易于颐，颐曰：'易学在蜀耳，盍往求之？'滋入蜀访问，久之，无所遇，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，与语大有所得。"我们细玩"易学在蜀"四字，大约二程在四川，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，不止箍桶翁一人，所以才这样说。

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，修薛翁祠，作碑记云："……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，有云。袁道清闻蜀有隐君子名，物色之。莫能得，未至一郡，有卖香薛翁，旦荷笏之市，午辄扃门默坐，意象静深，道洁以弟子礼见，且陈所学，叟漠然久之，乃曰：'经以载道，子何博而寡要也？'与语，未几复去"。宋史云"眉邛间"，吕氏云"至一郡"，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，最后读俊仪王氏《困学纪闻》云："谯天授之易，得于蜀夷族囊氏，袁道洁之易，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，故曰：'学无常师'。宋之富顺监，即今富顺县也，是其为富顺人无疑"。（见段玉裁富顺县志）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，我们无须深考，总之有这一回事，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。（按宋史作卖酱，吕王作卖香，似应从吕王氏，因东莱距道洁不久，宋史则元人所修也。）

袁滋问易于伊川，无所得，与卖酱翁语，大有所得，这卖酱翁的学问，当然不小，论语上的隐者，如晨门，荷蒉，沮溺，丈人等，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，真实学问如何，不得而知，箍桶翁和卖酱翁，确有真实学问表现，他二人易学的程度，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，卖酱翁仅知其姓薛，箍桶翁连姓亦不传，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。

易学是二程的专长，二人语录中，谈及易的地方，不胜枚举。《宋史·张载传》称："载尝坐虎皮，讲易京师，听者甚众，一夕，二程至，与论易，次日语人曰：'比见二程，深明易理，吾所不如，汝可师之。'撤坐辍讲。"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，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，深为佩服，此翁之学问，可以想见。袁滋易学，伊川不与之讲授，命他入蜀访求，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，才自谦不如蜀人，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。

据《困学纪闻》所说，四川的夷族，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，可见那个时候，四川的文化，是很普遍的，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，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，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，这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四川之道教

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，俨然道家口吻，他扃门默坐，意象静深，俨然道家举止，可见其时道家一派，蜀中也很盛。二程在蜀，当然有所濡染。

宋儒之学，据学者研究，是杂有方士派，而方士派，蜀中最盛，现在讲静功的人，奉《参同契》和《悟真篇》二书，为金科玉律，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。

《悟真篇》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。据他自序是熙宁巳酉年，随龙国陵公到成都，遇异人传授。考熙宁巳酉，即宋神宗二年，据伊川所作《先公太中传》称："神宗即位年代，知汉州，熙宁中议行新法，州且嚣然，皆以为不可。公未尝深论也，及法出，为守令者奉行惟恐后，成都一道，抗议指其未便者，独公一人。"神宗颁行新法，在熙宁二年，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，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。平叔自序，有"既遇真筌，安敢隐默"等语。别人作的序有云："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。"又云："平叔传非其人，三受祸患。"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，青城距成都，距汉州，俱只百余里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文人或张平叔相遇，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，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。

现在流行的《参同契集注》，我们翻开一看，注者第一个是彭晓，第二个是朱子，彭晓字秀川，号真一子，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，是蜀永康人。永康故治，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。南宋以前，注参同契者十九家，而以彭晓为最先，通行者皆彭本，分九十一章，朱子乃就彭本，分上中下三卷，宁宗元年，蔡季通编贯道州，在"寒泉精舍"与朱子相别，相与订正"参同契"，竟夕不寐，明年季通卒，越二年朱子亦卒，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。

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：宋儒所讲，无极太极，河图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搏传来。朱子解易，曾言"邵子得于希夷（即陈搏），希夷源

流，出自参同契。”宋学既与参同契，发生这种关系，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，出在四川，他是孟昶之臣，孟昶降宋，距二程到川，不及百年，此种学说，流传民间，二程或许也研究过。

义和团乱后，某学者著一书，说：“道教中各派，俱发源于四川，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，在四川鹤鸣山修道，其学流传民间，分为各派，历代相传不绝。”他这话不错，以著者所知，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，还有几种传出外省；许多名人，俯首称弟子，这是历历可数的。逆推上去，北宋时候，这类教派当然很盛。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。

四川之佛教

佛教派别很多，宋儒所谓佛学者，大概指禅宗而言，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，六祖言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凭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“宋儒教人：“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”。宛然是六祖话语。

四川佛教，历来很盛，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，号圭峰，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。唐三藏法师玄奘，出家在成都大慈寺。以禅宗而论，六祖再传弟子“马道一”，即是张文定所说马大师，是四川什邡人，他在禅宗中的位置，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，有“五灯会元”可考。他的法嗣，布于天下，时号马祖，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，得道在衡岳，传道在江西，曾回什邡，筑台说法.邑人称为活佛。（什邡县志)。二程到四川的时候，当然他的流风余韵，犹有存者。什邡与汉州毗连，现在什邡高景关内，有雪门寺，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，后人于佛殿前，建堂祀二程，把寺名改为雪门，取“立雪程门”之义。(什邡县志)。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，要跑到什邡去读？一定那个庙宇内有个高僧，是马祖法师，二程曾去参访，住了许久，一般人就说他去行医读书了。

马祖教人，专提“心即是佛”四字，伊川曰：“性即理也”，宛然马祖声口，这种学理，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。

宋朝禅宗大师宗杲，名震一时，著有“大慧语录”。朱子也曾看他

的书，并引用他的话，如“寸铁伤人”之语。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，他的母亲秦国夫人，曾在大慧门下，参禅有得，事载“五灯会元”。大慧之师圆悟，是成都昭觉寺和尚。著有“圆悟语录”。成都昭觉寺，现有刻板，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，备极推崇。圆悟与二程，约略同时，二程在川之时，四川禅风当然很盛，二程当然有所濡染。

二程讲道台

二程的父亲，卒于元祐五年庚午，年八十五岁，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，年六十三岁，其时王安石厉行新法，明道曾力争不听，他们弟兄，不愿与安石共事，因为父亲年已高，所以侍父来蜀。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，伊川生于二年癸酉，二人入蜀时，年三十六七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，当然专心研究学问。王阳明三十七岁，谪居贵州龙场驿，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与二程在汉州时，年龄相同，不得志于政治界，专心研究学问，忽然发明新理，也是相同。

现在汉州城内，开元寺前，有“二程讲道台”（汉州志），可见二程在汉州，曾召集名流，互相讨论，把三教的道理，融会贯通，恍然有得，才发明所谓宋学，伊川所说的：“返求诸六经，然后得之”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。汉州开元寺，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。

宋明诸儒，其初大都出入佛老，其所谓佛者，是指禅宗而言，其所谓老者，不纯粹是老子，兼指方士而言，阳明早年，曾从事神仙之学，并且修习有得，几于能够前知，有阳明年谱可证。不过阳明不自讳，宋儒就更多方掩饰，朱子著《参同契考异》托名“华山道士邹䜣”，不直署己名，掩饰情形，显然可见。

二程是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的人，遇着箍桶匠，都向他请教，当然道家的紫阳派，真一派，佛家的圆悟派，也都请教过的。我们看程子主张“半日读书，半日静坐”。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，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。伊川少时，体极弱，愈老愈健，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，不过从来排斥佛老，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，不肯一一详说，统

以“出入佛老”一语了之，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，并笔之于书，后人方才知道。

我们从旁的书考证，宋朝的高僧甚多，乃宋史仅有方技传，而高僧则绝不一载。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，元朝修宋史的人，亦染有门户习气，一意推崇道学，特创道学传，以位置程朱诸人，高僧足与程朱争名，故削而不书，方技中人，不能夺程朱之席，故而书之。以我揣度，即使二程曾对人言：在蜀时，与佛老中人，如何往还，宋史亦必削而不书，箍桶翁加卖酱翁，不能与二程争名，才把他写上。其余的既削而不书，我们也就无从详考。

孟蜀之文化

箍桶翁卖酱翁传易，张平叔彭晓传道，圆悟传禅，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，请问为甚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？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，四川学风就很盛，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，扬州第一，四川第二，有“扬一益二”之称。唐都陕西，地方与蜀接近，那个时候的名人，莫到过四川的很少，所以中原学术，就传到四川来。加以五代时，中原大乱，许多名流，都到四川来避难，四川这个地方，最适宜于避难，前乎此者，汉末大乱，中原的刘巴许靖都入蜀避难，后乎此者，邵雍临死，说“天下将乱，惟蜀可免。”他的儿子邵伯温携家入蜀，卒免金人之祸。昔人云：“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后治”，这是对乎中原而言，因为地势上的关系，天下将乱，朝廷失了统御力，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，故谓之先乱，等到中原平定了，才来征服，故谓之后治，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，内部是很安定的。

五代时，中原战争五十多年，四川内政很修明，王孟二氏，俱重文学，《十国春秋》说王建“雅好儒臣，礼遇有加。”又说王衍“童年即能文，甚有才思。”孟蜀的政治，比王蜀更好，孟氏父子二世，凡四十一年，孟昶在位三十二年，《十国春秋》说孟昶“劝善恤刑，肇兴文教，孜孜求治，与民休息。”又曰：“后主（指昶）朝宋时，自二江至

眉州，万民拥道痛哭，恸绝者凡数百人，后主亦掩面而泣。藉非慈惠素著，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？”这是孟昶亡国之后，敌国使臣的议论，当然是很可信的。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，大书曰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。这十六字，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，颁行天下的（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），昶之盛饬吏治，已可概见。

后世盛称文景之治，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景帝在位十六年，合计不过二十九年。孟氏父子，孜孜求治，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，真可谓太平盛世。国内既承平，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，加以孟昶君臣，都提倡文学。《十国春秋》曰：“帝（指昶）所学，为文皆本于理。居恒谓李昊徐光溥曰：“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，朕不为也。”他的宰相，毋昭裔，贫贱时，向人借《文选》，其人有难色，他发愤说道：“我将来若贵，当镂板行之。”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，请后主镂板印九经，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，自己出私财营学宫，立教舍，又刻文选，初学记，白氏六帖，国亡后，其子守素斋至中朝，诸书大章于世，纪晓岚著四库提要，叙此事，并且说：“印行书籍，创见于此。”他们君臣，在文学上的功绩，可算不小。

孟昶君臣，既这样的提倡文学，内政又修明，当然中原学者，要向四川来，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，普及到了民间，二程和袁滋，不过偶而遇着两个，其余未遇着的，不知还有若干。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，所以北宋时，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镇诸人，苏子由说：“辙生十九年，书无不读。”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，他在何处寻书来读？若无名人指示门径，怎么会造成大学问？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，二程二苏，与孟蜀相距不远，他们的学问，都与孟昶有关，子夏居西河，魏文侯受经于子夏。初置博士官，推行孔学。秦承魏制，置博士官，伏生，叔孙通，张苍，皆故秦博士。梁任公说：“儒教功臣，第一是魏文侯。”我们可以说：“宋学功臣，第一是孟昶。”

隋朝智者大师，居天台山，开天台宗，著有《大小止观》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，字子微，也居天台山，著有《天隐子》，又著《坐忘论》七篇：玉涧杂书云：“道释二氏，本相矛盾。而子微之学，乃全本于释氏，大抵以戒定慧为宗，……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，实相表里，子微中

年隐天台玉霄峰，盖智者所居，知其渊源有自也”。（图书集成道教部杂录）。由此知：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，只要同在一个地方，就有融合之可能。五代中原大乱，三教中的名人，齐集成都，仿佛三大河流，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，天然该融合为一，大约这些名流，麇集成都，互相讨论，留下不少的学说。明道弟兄来川，召集遗老，筑台讲道，把他集合来，融会贯通，而断以己意，成为一个系统。就成为所谓宋学。

苏子由之学说

大家只知程氏弟兄是宋学中的泰斗，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，其成就，较之程氏弟兄，有过之无不及，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，此人为谁？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。程氏弟兄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，还要蒙头盖面，自称是孔孟的真传；子由著有《老子解》，自序著此书时，会同僧道商酌，他又把《中庸》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和六祖“不思善不思恶”等语，合并研究，自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，较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。子由之孙苏籀，记其遗言曰：“公为籀讲老子数篇曰：‘高出孟子二三等矣！’又曰：‘言至道无如五千文。’”苏籀又说：“公老年作诗云：近存八十一章注，从道老聃门下人。盖老而所造益妙，碌碌者莫测矣。”子由敢于说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，自认从道老聃门下，这种识力，确在程氏弟兄之上。苏东坡之子苏迈等，著有《先公手泽》，载东坡之言曰：“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，读之不尽卷，废卷而叹，使战国有此书，则无商鞅韩非，使汉初有此书，则孔老为一，使晋宋间有此书，则佛老不为二，不意晚年见此奇特。”我初读东坡此段文字，心想子由此书，有甚好处，值得如此称叹，后来始知纯是赞叹他融合三教的工作。

明朝有个李卓吾，同时的人，几乎把他当作圣人，他对于孔子，显然攻击，著《藏书》六十八卷，自序有曰：“前三代吾无论矣，后三代汉唐宋是也，中间数百余年，而独无是非者，岂其人无是非哉？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因未尝有是非耳。”又曰：“此书且可自怡，不可示人，故名藏书也，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，索观不已，予又安能以已耶，

但戒曰："览则一任诸君览，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。"他生在明朝，思想有这样的自由，真令人惊诧，他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，闹得书被焚毁，身被逮捕，下场至自刎而死，始终持其说不变。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，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，万历二年，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，题其后曰："解老子者众矣，而子由最高，……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一之中，宜其善发老子之蕴，使五千余言，烂然如皎日，学者断断乎不可一日去手也，解或示道全，当道全意，寄子瞻，又当子瞻意，今去子由，五百余年，不意复见此奇特。"卓吾这样的推崇子由，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。

苏子由在学术上，有了这样的成就，何以谈及宋学，一般人只知道有程朱，不知道苏子由呢？其原因：（一）子由书成年已老，子由死于政和二年壬辰，年七十四岁，此书是几经改删，至大观二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，程明道死于元丰八年乙丑，年五十四岁，伊川死于大观元年丁亥，年七十五岁，子由成书时，在明道死后二十三年，伊川死后一年，那个时候，程氏门徒遍天下，子由的学说，出来得迟，自不能与他争胜，子由书成后四年即死，也就无人宣传他的学说了。（二）那时党禁方严，禁人学习元祐学术，伊川谢绝门徒道："尊所闻，行所知可也，不必及吾门也。"连伊川都不敢宣传他的学问，子由何能宣传？伊川死时，门人不敢进丧，党禁之严可想。史称子由"筑室颖滨，不复与人相见，终日默作，如是者几十年。"据此，则子由此书，能传于世，，已算侥幸；何敢望其通行？（三）后来朱子承继伊川之学，专修洛蜀之怨，二苏与伊川不合，朱子对于东坡所著《易传》，子由所著《老子解》，均痛加诋毁，其诋子由曰："苏侍郎晚为是书，合吾儒于老子，以为未足，又并释氏而弥缝之，可谓舛矣，然其自许甚高，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以语此者，而其兄东坡公，亦以为'不意晚年见此奇特'。以予观之，其可谓无忌惮者欤！因为之辩。"（见宋元学案）中庸有"大人而无忌惮"之语，朱子说他无忌惮，即是说他是小人。此段文字，几于破口大骂。朱子又把子由之说，逐一批驳，大都故意挑剔，其书俱在，可以复按。朱子是历代帝王尊崇的人，他既这样攻击子由，所以子由的学说，也就若存若亡，无人知道了。（四）最大原因，则孔子自汉武帝而后，取得学术界正统的地盘，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，表面上仍推尊

孔子，故其说受人欢迎，子由则赤裸裸的说出来，欠了程明道的技术，所以大受朱子的攻击，而成为异端邪说，朱子痛诋子由，痛诋佛老，是出于门户之见，我们不必管，只看学术演进的情形就是了。

学术之演进

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，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，三教应该融合为一，程明道和苏子由，都是受了天然趋势的驱迫，程子读了许多书，来在四川，加以研究，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。苏子由在四川读了许多书，去在颍滨，闭门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，二者都与四川有关。这都是由于五代时，中原大乱，三教名流，齐集成都，三大河流，同时流入最隘一个峡口的原故。子由少时在蜀，习闻诸名流绪论，研究多年，得出的结果，也是融合三教，也是出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，与大程子如出一辙。可见宇宙真理，实是如此。从前佛教传入中国，与固有学术生冲突，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，朝廷明令天下毁佛寺，焚佛经，诛僧尼之事几数见，自宋儒之学说出，而此等冲突之事遂无，不过讲学家文字上小有攻讦而已，何也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。

世界第一次大战，第二次大战，纷争不已者，学说纷歧使之然也。现在国府迁移重庆，各种学派之第一流人物，与夫留学欧美之各种专门家，大都齐集重庆，俨如孟蜀时，三教九流，齐集成都一样，也都是无数河流，趋入一个最隘之峡口。我希望产生一种新学说，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而一之，而世界纷争之祸，于焉可免。（著者按：初版时，国府尚未迁移重庆，则只言：现在交通便利，天涯比邻，中国、印度、西洋，三大文化接触，相推相荡，也是三大河流，趋入最隘的峡口，中西印三大文化，也该融合为一。）

三 宋儒之道统

道统之来源

宋儒最令人佩服的，是把儒释道三教，从学理上融合为一，其最不令人佩服的，就在门户之见太深，以致发生许多纠葛。其门户之见，共有二点：（1）孔子说的就对，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。（2）同是尊崇孔子的人，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，别人说的就不对。合此两点，就生出道统之说。

宋儒所说的道统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，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。韩愈为人很倔强，富于反抗现实的性质。唐初文体，沿袭陈隋余习，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，唐时佛老之道盛行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。他取的方式，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。二者俱是反对现代学术，恢复古代学术，是一种革新运动，所以欧洲文艺复兴，是一种惊人事业。韩愈在唐时，负泰山北斗之地位，也是一种惊人事业。

韩愈的学问，传至宋朝，分为两大派：一派是欧苏曾王的文学，一派是程朱的道学。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，就是从昌黎原道篇“斯道也，何道也”那个道字生出来的。孟子在从前，只算儒学中之一种，其书价格，与荀墨相等，昌黎才把他表章出来，他读荀子说：“始吾得孟轲书，然后知孔子之道尊……以为圣人之徒没，尊圣人者孟氏而已，晚得杨雄书，益信孟氏，因雄书而益尊，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！……孟子醇乎醇者也，荀与杨大醇而小疵。”经昌黎这样的推称，孟氏才崭然露头角。

宋儒承继昌黎之说，把孟子益加推崇，而以自己直发其传，伊川作明道行状，说道：“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，道不行百世无善治，学不传千载无真儒，……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……盖自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”。史迁以孟子、荀卿

合传，寥寥数十字，于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，不一书，朱子纲目，始于适魏之齐，大书特书。宋淳熙时，朱子才将《孟子》，《论语》，《大学》，《中庸》合称为四子书，至元延祐时，始悬为令甲。我们自幼读四子书，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，及细加考察，才知是程朱诸人，有了道统之见，才把他特别尊崇的。

昌黎是文学中人，立意改革文体，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，他读孔子、孟轲的书，初意本是研究文学，因而也略窥见大道，无奈所得不深，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，字法句法，喜欢戛戛独造，因而论理论事，也要独造。他说："斯道也，何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，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孟轲死，不得其传。"这个说法，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。程伊川曰："轲死不得其传，似此言语，非蹈袭前人，非凿空撰出，必有所见。"这几句话的来历，连程伊川都寻不出，非杜撰而何？

来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，见历代传授，犹如传国玺一般，尧、舜、禹直接传授，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，则隔数百年，都可传授，心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，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？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，经过许久，果然被他寻出来了，在论语上寻出"尧曰咨尔舜，……允执其中，……舜亦以命禹"。恰好伪古文尚书，有"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"十六字。尧传舜，舜传禹，有了实据，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，究禹汤文武周公，所谓授文者安在？又中间相隔数百年，何以能够传授？又孔子以前，何以独传开国之君，平民中并无一人，能得其传？这些问题，他们都不加研究。

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，就把孟子一书，从诸子中提出来，上配论语。又从礼记中，提出大学、中庸二篇，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。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，交与孟子，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，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，一代传一代，与传国玺一般无二，孟子以后，忽然断绝，隔了千几百年，到宋朝，这传国玺又出现，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，又递相传授，这就是所谓道统了。

道统的统字，就是从"帝王创业垂统"那个统字窃取来，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，那时禅宗风行天下，禅宗本是衣钵相传，一代传一代，由释迦传至达摩，达摩传入中国，达摩传六祖，六祖以后，虽是不传衣

钵，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，某为嫡派，某为旁支。宋儒生当其间，染有此等习气，特创出道统之名，与之对抗。道统二字，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。

请问：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，怎么能够传授呢？于是创出“心传”之说。说我与孔孟，心心相传，禅宗有“以心传心”的说法，所以宋人就有“虞廷十六字心传”的说法，这心传二字，也是摹仿禅宗来的。

本来禅宗传授，也就可疑，所谓西天二十八祖，东土六祖，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。其学简易，最合中国人习好，故禅宗风行天下。其徒自称“教外别传”，谓不必研究经典，可以直契佛祖之心，见人每问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”？宋儒教人“寻孔颜乐处”，其意味也相同。

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，横渠是程子戚属，朱子绍述程氏，所谓濂洛关闽，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，后来愈传愈盛，因创出道统之名。私相推定，自夸孔孟真传，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。

朱子争这个道统，尤为出力，他注孟子，于末后一章，结句说道：“……百世之下，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。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，而终之以此，所以明其传之所在，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，其旨深哉”提出“统”字“传”字，又说“神会心得”。即为宋学中所谓“心传”和“道统”伏根，最奇的，于“其旨深哉。”四字之后，突然写出一段文字。说道：“有宋元丰八年，河南程颢伯醇卒，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，明道先生，而其弟正叔序之曰：周公没，圣人之道不行，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，道不行百世无善治，学不传千载无真儒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，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无真儒，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，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辨异端，辟邪说，使圣人之道，焕然复明于世，盖自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。然学者于道，不知所向，则孰知斯人之为功，不知所至，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。”此段文字写毕，即截然而止，不再著一语，真是没头没尾的。见得程子即是“后圣”。朱子于大学章句序，又说道：“河南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孟氏之传，虽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与有关焉。“著”“闻”字，俨然自附于“闻而知之”之列，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。

（二）道统之内幕

宋儒苦心孤诣，创出一个道统，生怕被人分去，朱子力排象山，就是怕他分去道统，象山死，朱子率门人，往寺中哭之，既罢，良久曰："可惜死了告子。"硬派象山作告子，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。

程朱未出以前，杨雄声名很大，他自比孟子，北宋的孙复，号称名儒，他尊杨雄为范模。司马光注《太玄经》说道："余少之时，闻玄之名，而不获见……于是求之积年，乃得观之，初则溟涬漫漶，略不可入，乃研精易虑，屏人事而读之，数十遍，参以首尾，稍得窥其梗概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：呜呼，杨子真大儒耶，孔子既没，知圣人之道者，杨子而谁，荀与孟殆不足拟，况其余乎！观玄之书，昭则极于人，幽则尽于神，大则包宇宙，细则入毛发，合天人之道以为一，刮其根本，示人所出，胎育万物，而兼为之母，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，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，天下之道虽有善者，其蔑以易此矣。"司马光这样说法，简直把太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，俨然直接孔子之传，道统岂不被杨雄争去吗？孟子且够不上，何况宋儒？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，怎能容杨雄得过？适因班固汉书，说杨雄曾仕新莽，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："莽大夫杨雄死"。从此杨雄成了名教罪人，永不翻身。孟子肩上的道统，无人敢争，濂洛关闽，就直接孟氏之传了。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，自料比某人不过，就清查某人的档案，说他亏吞公款，身犯刑事，褫夺他被选权一般。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杨雄的文字，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？杨雄仕新莽，作《剧秦美新论》。有人说其事不确，我们也不深辩，即使其事果确，一部紫阳纲目中，类于杨雄，甚于杨雄的人很多，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？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杨雄害了的。

从前杨雄曾入孔庙，后来因他曾仕王莽，就把他请出来，荀子曾入孔庙，因为言性恶，把他请出来，公伯宁曾入孔庙，因为他毁谤子路，也把他请出来。我所不解者，司马光何以该入孔庙？杨雄是逆臣，司马光推尊杨雄，即是逆党。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，司马光著《疑孟》一书，反孟子说的话，层层攻讦，对于性善说，公然愤疑，其书流

传到今，司马光一身，备具了公伯寮，荀卿，杨雄三人之罪，公然得入孔庙，岂非怪事？推原其故，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，哲宗即位之初，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，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，司马光为宰相，连及二程也做官，所以二程入孔庙，连及司马光也配享。司马光之人品，本是很好，但律公伯五缭荀卿杨雄三人之例，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，而今公然入了孔庙，我无以名之，直名之曰“徇私”。

宋儒口口声声，尊崇孔子，排斥异端，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甚么该入孔庙？诸葛亮自比管仲，管仲为曾子所不屑为，孔门羞称五霸，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，管仲的私淑弟子，怎么该入孔庙？又诸葛亮手写申韩，以教后主，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，太史公作史记，把申韩与老子同传，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，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，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，乃竟入孔庙，大书特书曰：“先儒诸葛亮之位”，这个儒字，我不知从何说起？

刘先主临终，命后主读商君书，又不主张行赦，他们君臣要研究的，都是法家的学说，我们通读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，寻不出孔子二字，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，独与管仲商鞅申韩，发生不少的关系，本传上说他治蜀尚严，又说他“恶无识而不贬”，与孔子所说“赦小过”，孟子所说“省刑罚”显然违反，假如修个“申韩合庙”请诸葛亮去配享，写一个“先法家诸葛亮之位”倒还名实相符。

宋儒尽排斥异端，申韩管商之学，岂非异端吗？异端的嫡派弟子，高坐孔庙中，岂非怪事吗？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，遗缺以史记上的陈余补授。史记称：“成安君儒者也，自称义兵，不用诈谋。”此真算是儒者，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，陈余一战而胜，岂不是“仁者无敌”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？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“先儒陈余之位”，无奈陈余运气不好，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，兵败身死，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。

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，偏称之曰王佐之才，明明是法家，却尊之曰先儒，岂非滑稽之至吗？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，鞠躬尽瘁，深合儒家之道，所以该入孔庙，须知托孤寄命，鞠躬尽瘁，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。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，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？这道理怎么说得通？我无以名之，直名之曰“慕势”。只因汉以后，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，诸葛亮功盖三分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就把他欢迎入孔庙，籍以光辉门面，其实何苦乃尔？

林放问“礼之本”，只说得三个字，也入了孔庙，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，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，孔子称他为“犹龙”，崇拜到了极点。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，把老子痛加诋毁，这个道理，又讲得通吗？

两庑豚肩，连朱竹蛇都不想吃，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，不过我们须知：一部廿四史，实在有许多糊涂账，地方之高尚者，莫如圣庙，人品之高尚者，莫如程朱，乃细加考察，就有种种黑幕，其他尚复何说？

宋儒有了道统二字，横塞胸中，处处皆是荆棘，我不知道统二字，有何贵重，值得如许争执。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，假使被庄子看见，恐怕又要发出些鹓鶵腐鼠的妙论。我们读书论古，当自出见解，切不可为古人所愚。

四库全书提要载：“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，宋刘敞撰，敞发明正学，在朱程前，所见皆正，徒以独抱道经，澹于声誉，朱与伊洛诸人，倾意周旋，故讲学家视为异党，抑之不称耳，实则元丰熙宁之间，卓然醇儒也。”刘敞发明正学，卓然醇儒，未与伊洛诸人周旋，就视为异党。此中黑幕，纪晓岚早已揭穿。司马光赞杨雄，诋孟子，因与伊洛诸人周旋，死后得入孔庙，此种黑幕，还没有人揭穿。

宋儒之缺点

著者平日有种见解，凡人要想成功，第一要量大，才与德尚居其次，以楚汉而论，刘邦、项羽二人，德字俱说不上，项羽之才，胜过刘邦，刘邦之量，大于项羽，韩信、陈平、黥布等，都是项羽方面的人，只因项羽量小，把这些人容纳不住，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。刘邦豁达大度，把这些人一齐容纳，汉兴楚败，势所必至。秦誓所说“一个臣”，反复赞叹，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。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。宋儒才德二者俱好，最缺乏的是量字，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，在学术界也是这样，君子排君子，故生出洛蜀之争，孔子信徒，排斥孔子信徒，故生出朱陆之争。

邵康节临死，伊川往访之，康节举两手示之曰：“眼前路径令放宽，窄则自无着身处，如何使人行？”这一窄字，深中伊川的病。宋元学案载：“二程随侍太中，知汉州，宿一僧寺，明道入门而右，从者皆随之。先生（指伊川）入门而左，独行，至法堂上相会。先生自谓：‘此是某不及家兄处。’盖明道和易，人皆亲近，先生严直，人

不敢近也。”又称：“明道犹有谑语……伊川直是谨严，坐间不问尊卑长幼，莫不肃然。”卑幼不说了，尊长见他，都莫不肃然。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？无怪洛蜀分党，东坡戏问他：“何时打破诚敬?”此语固不免轻薄，但中伊川之病。

宋元学案又说：“大程德性宽宏，规模广阔，以光风霁月为怀。小程气质刚方，文理密察，以峭壁孤峰为体，道虽同而造德因自各有殊。”于此可见明道量大，伊川量小，可惜神宗死，哲宗方立，明道就死了，他死之后，伊川与东坡，因语言细故，越闹越大，直闹得洛蜀分党，冤冤不解。假使明道不死，这种党争，必不会起。

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，连邵康节之学，他也不以为然，康节语其子曰：“张巡许远，同为忠义，两家子弟，互相攻并，为退之所贬，凡托伊川之说，议吾为数学者，子孙勿辩。”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，故程邵两家，未起争端。

朱子的量，也是非常狭隘，他是伊川的嫡系，以道统自居，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，就说他是好人，不信从的，就是坏人。苏黄本是一流人物，朱子诋毁二苏，独不诋毁山谷，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，所以要骂他，山谷之孙，黄畲，字子耕，是朱子的学生，所以就不骂了。

林栗，唐仲友，立身行已，不愧君子，朱子与栗论一不合，就成仇畔。朱子的门人，至欲烧栗的书。朱子的朋友陈亮，狎台州官妓，嘱唐仲友为脱籍，仲友沮之，亮媾谗于朱子，朱子为所卖，误兴大狱，此事本是朱子不合，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。张浚一败于富平，丧师三十万，再败于淮西，丧师七万，三败于符离，丧师十七万。又尝逐李纲，引秦桧，杀曲端，斥岳飞，误国之罪，昭然共见，他的儿子张南轩，是朱子讲学的好友，朱子替张浚作传，就备极推崇。

最可怪者，朱子与吕东莱，本是最相好的朋友，近思录十四卷，就是他同朱子撰的。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，朱子对于他的著作，就字字讥弹，如云：“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，守约恐未也。”又云：“伯恭之弊，尽在于巧。”又云：“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。”又云：“伯忝聪明，看文理却不仔细，缘他先读史多，所以粗看着眼。”又云：“伯恭于史分外仔细，于经却不甚理会。”又云“伯恭要无不包罗，只是扑过，都不精。”对于东莱，抵隙蹈瑕，不遗余力，朱派的人，随声附和，所以元人修史，把东莱列入儒林传，不入道学传，一般人都称“朱子近思

录”，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。

朱子与陆象山，同是尊崇孔教的人，因为争辩无极太极，几至肆口谩骂，朱子的胸怀，狭隘到这步田地，所以他对于政治界、学术界，俱酿许多纠纷。门人承袭其说，朱陆之争，历宋元明清，以至于今，还不能解决。

纪晓岚著四库提要，将上述黄涪，林栗，唐仲友，张浚诸事，一一指出。其评朱吕之争，说道：“当其投契之时，则引之于近思录，使预闻道统之传，及其诋悟以后，则字字讥弹，身无完肤，毋亦负气相攻，有激而然欤。”别人訾议朱子不算事，四库提要，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，清朝功令，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，康熙五十一年，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，与十哲并列，尊崇朱子，可算到了极点。乾隆是康熙之孙，纪著四库提要，敢于说这类话，可见是非公道，是不能磨灭的。纪文说：“刘敞卓然醇儒。朱与伊洛诸人，倾意周旋，故讲学家视为异党。”这些说法，直是揭穿黑幕，进呈乾隆御览后，颁行天下，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。

宋俞文豹《吹剑外集》（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）说：“韩范欧马张吕诸公，无道学之名，有道学之实，而人无闲言，今伊川晦庵二先生，言为世法，行为世师，道非不弘，学非不粹，而动辄得咎何也，盖人心不同，所见各异，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……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，以师严自居，别白是非，分毫不贷，与安定角，与东坡争，与龙川象山辩，必胜而后已。浙学固非矣，贻书潘吕等，既深斥之，又语人曰：‘天下学术之弊，不过两端，永嘉事功，江西颖悟，若不极力争辩，此道何由而得明’。盖指龙川象山也。”程端蒙谓：“如市人争，小不胜辄至喧竞……。”俞氏这段议论，公平极了。程朱的学问，本是不错，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，就在他以严师自居，强众人以从己。他说：“若不极力争辩，此道何由得明。”不知越争辩，越生反响，此道越是不明，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，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，诚诚恳恳的，公布出来，别人信不信由他，只要我说得有理，别人自然肯信，无须我去争辩，若是所说得不确，任是如何争辩，也是无益的，惜乎程朱当日，未取此种方式。

伊川晦庵，本是大贤，何至会闹到这样呢？要说明这个道理，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。东原以为：“宋儒所谓理，完全是他们的意见。”因为吾人之心，至虚至灵，着不得些子物事，有了意见，就不虚不灵，恶念固坏事，善念也会坏事，犹之眼目中，不但尘沙容不得，就

是金屑也容不得。伊川胸中，有了一个诚敬，诚敬就变成意见，于是放眼一看，就觉得苏东坡种种不合。晦庵胸中，有了一个程伊川，放眼一看，就觉得象山、龙川、吕东莱诸人，均种种不合。是就像目中着了金屑，天地易色一般。佛氏主张破我执法执，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，就是讲世间法，也当如是。然后知老子所说“绝圣弃智”，真是名言。东坡问伊川，“何时打破诚敬”？虽属恶谑，却亦至理。东坡精研佛老之学，故笔谈中，俱含妙谛。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，观于“目中有妓，心中无妓”。这场公案，即可知道。

伊川抱着一个诚敬，去绳苏东坡，闹得洛蜀分党。朱子以道统自命，党同伐异，激成庆元党案，都是为着太执着的流弊。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，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，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，例如劝人修桥补路，周济贫穷，固然是善，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，物物各得其所，自然无坏桥可修，无滥路可补，无贫穷来周济，回想那些想当善人的，抱着金钱，朝朝出门，寻桥来修，寻路来补，寻贫穷来周济，真是未免多事。庄子说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程伊川、苏东坡，争着修桥补路，彼此争得打架。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，把修桥补路的事，一手揽尽，不许他人染指，后来激成党案，严禁伪学，即是明令驱逐，不许他修桥，不许他补路。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，何至去闹到这样呢？

宋朝南渡，与洛蜀分党有关，宋朝亡国，与庆元党案有关，小人不足责，程朱大贤，不能不负点咎。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，互相攻击，很像洛蜀诸贤，君子攻击君子。各种学说，互相低斥，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。当今政学界诸贤，一齐走入程朱途径去了，奈何！奈何！问程朱诸贤，缺点安在？曰：“少一个量字。”

我们评论宋儒，可分两部分：他们把儒释道三教，融合为一，成为理学，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，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，这部分是成功了的。洛蜀分党，酿成政治上之纷争，朱陆分派，酿成学术上之纷争，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，这部分是失败了的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，无论政治上、学术上，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，决定成功，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，一定徒滋纠纷。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，从何下手。曰从量字下手。

四　中西文化之融合

中西文化冲突之点

西人对社会，对国家，以我字为起点，即是以身字为起点。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，从正心诚意做起走，即是以心字为起点。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。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，即叫他从事运动，把身体培养好。中国儒者，见人闲居无事，即叫他读书穷理，把心地培养好。西人培养身，中国培养心，西洋教人，重在"于身有益"四字，中国教人，重在"问心无愧"四字，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。

斯密士倡自由竞争，达尔文倡强权竞争，西洋人群起信从，因为此等学说，是"于身有益"的。中国圣贤，绝无类似此等学说，因为倡此等学说，其弊流于损人利己，是"问心有愧"的。我们遍寻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，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，只有庄子上的盗跖，所持议论，可称神似。然而此种主张，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。孟子曰："鸡鸣而起，孜孜为利者，跖之徒也。"自由竞争，强权竞争，正所谓孜孜为利，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异的地方。

孔门的学说："欲修其身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，先试其意。"从身字向内，追进两层，把意字寻出，以诚意为起点，再向外发展。犹之修房子，把地上浮泥除去，寻着石底，才从事建筑。由是而修身，而齐家，而治国平天下；造成的社会，是"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"。人我之间，无所谓冲突，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。

西人自由竞争等说，以利己为主，以身字为起点，不寻石底，径从地面建筑起走，基础未稳固，所以国际上，酿成世界大战，死人数千万。大战过后，还不能解决，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。

孔门的正心诚意，我们不必把他太看高深了，把他改为"良心裁判"四字就是了。每作一事，于动念之初，即加以省察，"己所不欲，

勿施于人”。孔门的精义，不过如是而已。然而照这样做去，就可达到“以天下为一家”的社会。如果讲“自由竞争”等说法。势必至“己所不欲，也可施之于人。”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，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，奉为天经地义。中西文化，焉得不冲突？中西文化冲突，其病根在西洋，不在中国，是西洋人把路走错了，中国人的路，并没有走错。我们讲“三教异同”，曾绘有一根“返本线”。我们再把此线一看，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。凡人都是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的。善心长则恶心消，恶心长则善心消，因此儒家主张，从小孩时，即把爱亲敬兄，这份良知良能，搜寻出来，在家庭中培养好，小孩朝夕相处的，是父亲母亲、哥哥弟弟，就叫他爱亲敬兄，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，扩充出去，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，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。故曰：“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”。所以中国的家庭，可说是一个“仁爱培养场”。西洋人从我字，径到国字，中间缺少了个家字，即是莫得“仁爱培养场”。少了由丁至丙一段，缺乏诚意功夫，即是少了“良心裁判”。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，就成为残酷世界。所以说：中西文化冲突，其病根在西洋，不在中国。

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者，乃是西洋文化，自相冲突，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。何以故呢？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打得九死一生，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，非中国学说酿成的。这就是西洋文化，自相冲突的明证。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，一面又痛恨战祸，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所以要想世界太平，非把中国学说，发挥光大之不可。

中国学说可救印度西洋之弊

西洋人，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，总是千方百计，想把它拿在手中，造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。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，是污浊到极点，自己的身子，也是污浊到极点，总是千方百计，想把这个世界舍去，把这个身子舍去。惟老子则有一个见解，他说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又说“多藏必厚亡。”世界上的金银，他是看不起的，当然不做抢夺的事。他说：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。”也

是像印度人，想把身子舍去，但是他舍去身子，并不是脱离世界，乃是把我的身子，与众人融合为一。故曰："圣人无常。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"因此也就与人无忤，与世无争了。所以他说"陆行不避兕虎，入军不避甲兵。"老子造成的世界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，也不是污浊可厌的世界，乃是"如享太牢，如登春台，众人熙熙"的世界。

以返本线言之：西人从丁点起，向前走，直到巳点或庚点止，绝不回头。印度人从丁点起，向后走，直到甲点止，也绝不回头。老子从丁点起，向后走，走到乙点，再折转来，向前走，走到庚点为止，是双方兼顾的。老子所说"归根复命"一类话，与印度学说相通。"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"一类话，与西洋学说相通。虽说他讲出世法，莫得印度那样精，讲治世法，莫得西人那样详，但由他的学说，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，打通为一。

我所谓："印度人直走到甲点止，绝不回头。"是指小乘而言，指末流而言。若释迦立教之初，固云"不度尽众生，誓不成佛。"原未尝舍去世界也。释迦本是教人，到了甲点，再回头转来在人世上工作。无如甲点太高远了，许多人终身走不到。于是终身无回头之日，其弊就流于舍去世界了。老子守着乙点立论，要想出世的，向甲点走，要想人世的，就回头转来，循序渐进，以至庚点为止。孔子意在救世，叫人寻着丙点，即回头转来，做由丁到庚的工作，不必再寻乙甲两点，以免耽误救世工作。此三圣人立教之根本大旨也。

孔子的态度，与老子相同。印度厌弃这个世界，要想离去他。孔子则"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，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，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，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。"这个世界并不觉得可厌。老子把天地万物，融合为一，孔子也把天地万物，融合为一，宇宙是怎么一回事，还他怎么一回事。所谓"老者安少，少者怀之。""天地位焉，万物宁焉。"就是这个道理。

曾参说："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"这几句话，与治国渺不相关，而独深得孔子的嘉许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因为这几句话，是描写我与宇宙融合的状态，有了这种襟怀，措施出来，当然人与我融合为一。子路可使有勇，冉有可使足民，公西华愿为小相，只做到人与我相安，未做到人与我想融，所以孔子不甚许可。

宋儒于孔门这种旨趣，都是识得的，他们的作品，如"绿满窗前草

不除”之类，处处可以见得，王阳明“致良知”，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，心中之理，即是事物上之理，遇有事来，只消返问吾心，推行出来，自无不合，所以我们读孔、孟、老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，满腔是生趣，读斯密士、达尔文、尼采诸人之书，满腔是杀机。

印度人向后走，在精神上求安慰；西洋人向前走，在物质上求安慰。印度人向后走，而越来越远，与人世脱离关系，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。西洋人向前走，路上遇有障碍物，即直冲过去，闹得非大战不可。印度和西洋，两种途径，流弊俱大，惟中国则不然。孟子曰：“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又曰：“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对于物质，只求是以维持生活而止，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，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，要求过度，人与人就生冲突，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。精神在吾身中，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。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，要到彼岸，脱离这个世界；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，不脱离这个世界。我国学说，折衷于印度西洋之间，将来印度和西洋，非一齐走入我国这条路，世界不得太平。

孔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温，不亦君子乎。”孟子曰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”中国人寻乐，在精神上，父兄师友间；西洋人寻乐，大概是在物质上，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。中西文化，本是各走一条路，然而两者可以调和，精神与物质，是不生冲突的。何以言之呢？我们把父兄师友，约去游公园，进戏场，精神上的娱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。中西文化可以调合，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、进戏场一般。但是不进公园戏场，父兄师友之乐仍在，即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，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。我们这样设想，足见中西文化，可以调和。其调和之方式，可括为二语：“精神为主，物质为辅。”今之采用西洋文化者，偏重物质，即是专讲游公园，进戏场，置父兄师友于不顾，所以中西文化就冲突了。

中西文化，许多地方，极端相反，然而可以调和。兹举一例为证：中国的养生家，主张静坐，静坐时，丝毫不许动；西洋的养生家，主张运动，越运动越好，二者极端相反，此可谓中西学说冲突。我们静坐一会，又起来运动，中西两说就融合了。我认为中西文化，可以融合为

一，其方式就是这样。

有人说："孔门讲仁爱，西人讲强权。我们行孔子之道，他若不依理，以兵临我，我将奈何？"我说：这是无足虑的，孔子讲仁，并不废兵，他主张"足食足兵"。又说："我战则克"。又说："仁者必有勇。"何尝是有了仁就废兵？孔子之仁，即是老子之慈，老子三宝，慈居第一，他说："夫慈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"假使有了仁慈，即把兵废了，西人来，把我的人民杀死，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？西洋人之兵，是拿来攻击人，专作掠夺他人的工具；孔、老之兵，是拿来防御自己，是维持仁慈的工具，以达到你不伤害我，我不伤害你而止，这也是中西差异的地方。

孔、老讲仁慈，与佛氏相类，而又不废兵，足以抵御强暴。战争本是残忍的事，孔、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，这种学说，真是精粹极了。所以中国学说，具备有融合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的能力。

西洋的学问，重在分析；中国的学问，重在会通。西人无论何事，都是分科研究；中国古人，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，总括全体而言之。就返本线来看，西洋讲个人主义的，只看见线上的丁点（我），其余各点，均未看见。讲国家主义的，只看见巳点（国），其余各点，也未看见。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，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。孔门的学说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以贯之。老子说："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，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，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，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"孔、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，倡出"以天下为家，以中国为一人"的说法，所谓个人也，国家也，社会也，就毫不觉得冲突。（以天下为一家二语，出《礼运》，本是儒家之书，或以为是道家的说法，故浑言孔、老。）中国人能见其会通，但嫌其浑囵疏阔。西人研究得很精细，而彼此不能贯通，应该就西人所研究者，以中国之方法贯通之，各种主义，就无所谓冲突，中西文化，也就融合了。

印度讲出世法，西洋讲世间法。老子学说，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。宋明诸儒，都是做的老子工作，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，开辟了康庄大道。我们把这种学说，发挥光大之，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，融合为一。

世界种种冲突，是由思想冲突来的，而思想之冲突，又源于学说之冲突。所谓冲突，都是末流的学说，若就最初言之，则释迦、孔、老和希腊三哲，固无所谓冲突。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，把儒、释、道三

教，希腊三哲，和宋明诸儒学说，西方近代学说，合并研究，融会贯通，创出一种新学说，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、释、道三教，成为理学一样。假使这种工作完成，则世界之思想一致，行为即一致，而世界大同，就有希望了。

就返本线来看，孔子向后走，已经走到丙点，老子向后走，已经走到乙点，佛学传入中国，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，走到甲点罢了，所以佛学传入中国，经程明道一番工作，就可使之与孔、老二教融合。

孔、老二氏，折身向前走，由身而家，而国，而天下，与西人之由个人而国家，而社会，也是同在一根线上，同一方向而走。所以中国学说，与西洋学说，有融合之可能。

西洋，印度，中国，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，印度文化，首先与中国接触，经宋儒的工作，已经融合了。现在与西洋文化接触，我们应该把宋儒的理学，加以整理，去其拘迂者，取其圆通者，拿来与西洋学说融会贯通，世界文化，就融合为一了。

中国学术界之特点

有人问道："西洋自由竞争诸说，虽有流弊，但施行起来，也有相当效果，难道我们一概不采用吗?"我说："我国学术界，有一种很好的精神，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，西洋的学说，就可采用了。"兹说明如下：

鲁有男子独处，邻有釐妇亦独处。夜雨室坏，妇人趋而托之，男子闭户不纳。妇人曰："子何不学柳下惠"?男子曰："柳下惠则可，我则不可，我将以我之不可，学柳下惠之可。"孔子闻之曰："善学柳下惠者，莫如鲁男子。"这种精神，要算我国学术界特色。孔子学于老子，老子尚阴柔，有合乎"坤"。孔子赞周易，以阳刚为贵，深取乎"乾"，我们可说："善学老子者，莫如孔子。"孟子终身愿学孔子，孔子言"性相近"，孟子言"性善"。孔子说："我战则克。"孟子则说："善战者服上刑。"孔子说："齐桓公正而不谲"，又说："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，如其仁，如其仁。"又曰："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任矣。"孟子则大反其说，曰："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。"又

曰："管仲、曾参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我愿之乎。"诸如此类，与孔子之言。显相抵触，然不害为孔门嫡系。我们可说："善学孔子者，莫如孟子。"韩非学于荀子，荀子言礼，韩非变而为刑名，我们可说："善学荀子者，莫如韩非。"非之书，有《解老》《喻老》两篇，书中言虚静，言"无为"，而无一切措施，与老子全然不类，我们可说："善学老子者，莫如韩非。"其他类此者，不胜枚举。九方皋相马，在牝牡骊黄之外。我国古哲，师法古人，全在牝牡骊黄之外。以貌取神，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。书家画家，无不如此。我们本此精神，去采用西欧文化，就有利无害了。

孟子曰："规矩方圆之至也，圣人人伦之至也。"规矩是匠师造房屋的器具，人伦是匠师造出的房屋。古人当日相度地势，计算人口，造出一座房屋，原是适合当时需要的。他并未说："传之千秋万世，子子孙孙，都要住在这个屋子内。"又未说："这个房子，永远不许改造修补。"匠师临去之时，把造屋的器具，交给我们，将造屋的方法，传给我们。后来人口多了，房屋不够住，日晒雨淋，房子朽坏，既不改造，又不修补，徒是朝朝日日，把数千年以前造屋的匠师痛骂，这个道理，讲得通吗？

中国一切制度，大概是依着孔子的主义制定的，此种制度，原未尝禁人修改。孔子主张尊君，孟子说："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"又说："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"又说："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"孔子说："入公门，鞠躬如也。"孟子曰："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，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，我得志弗为也。"孔子尊君的主张，到了孟子，几乎莫得了。孔子作春秋，尊崇周天子，称之曰天王，孟子以王道说各国之君，其言曰："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。"那个时候，周天子尚在，孟子视同无物，岂不显悖孔子的主张吗？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，说："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圣于孔子。"算是崇拜到了极点的。他去孔子，未及百年，就把孔子的主张，修改得这样厉害。孔子至今二三千年，如果后人也像孟子的办法，继续修改，恐怕欧人的德谟克拉西，早已见诸中国了。孟子懂得修屋的法子，手执规矩，把孔子所建的房屋，大加修改，还要自称是孔子的信徒。今人现放着规矩，不知使用，只把孔子痛骂，未免不情。

从前印度的佛学，传入我国，我国尽量采用，修改之，发挥之，所有"天台宗"。"华严宗"。"净土宗"等，——中国化，非复印度之

旧，故深得一般人欢迎，就中最盛者，厥惟“禅宗”，而此宗在印度，几等于无，惟有“唯识”一宗，带印度彩色最浓，此宗自唐以来，几至失传，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。我们可以得一结论：“印度学说，传至中国，越中国化者越盛行，带印度彩色越浓者，越不行，或至绝迹。”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，仍用采用印度文化方法，使斯密士、达尔文诸人，一一中国化，如用药之有炮炙法，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，单留有益这一部分。达尔文讲进化不错，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；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，错在因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。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，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，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，不合的就不采用。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，凡是先经过良心裁判，返诸吾心而安，然后才推行出去。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，中西文化，自然融合。今之采用两法者，有许多事项，律以老子之道，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，律以孔子之道，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，及至行之不通，处处荆棘，乃哓哓然号于人曰：“中西文化冲突，此老子之过也，此孔子之过也。”天乎冤哉！

圣哲之等级

我国周秦之间，学说纷繁，佛学虽是印度学说，但传入中国已久，业已中国化。就我个人的意见，与他定一个等级，名曰：“圣哲等级表”，一佛氏，二庄子，三老子，四孔子，五告子，六孟子，七荀子，八韩非，九杨朱，十墨翟。

此表以老子为中心，庄子向后走，去佛氏为近，是为出世法，孔子以下，向前走，俱是世间法，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，其湍水之喻，实较孟、荀之说为优。古来言“性”之人虽多，惟有告子之说，任从何方面说，俱是对的，故列孟、荀之上。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，退一步言之，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，或利人而无损于己，杨朱利己而损于人，故列第九。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，故列第十。此表以十级为止。近来的人，喜欢讲斯密士、达尔文、尼采诸人的学说，如把这三人列入，则斯、达二氏的学说，其弊流于损人，斯氏当列第十一，达氏当列第十二。尼采倡超人主义，说：“剿灭弱者，为强者天职。”说：“爱他主

义，为奴隶道德。”专作损人利己的工作，其学说为最下，当列第十三。共成十三级。尼采之下，不能再有了。中国之盗跖，和西洋之希特勒、墨索里尼，就其学说言之，应与尼采同列一栏。

我们从第十三级起，向上看，越上越精深，研究起来，越有趣味。从第一级起，向下看，越下越粗浅，实行起来越适用。王弼把老、孔融合为一，晋人清谈，则趋入老、庄，尤偏重庄子，这是由于老子的谈理，此孔子更精深，庄子谈理，比老子更精深的原故。程明道把儒、释、道三教，融合为一，开出“理学”一派，而宋明诸儒，多流入佛氏。这是由佛氏谈理，比孔老更精深的缘故。从实施方面言之，印度行佛教而亡国，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，西人行斯密士、达尔文诸人之说而盛强，这即是越粗浅越适用的明证，我们研究学理，当力求其深，深则洞见本源，任他事变纷乘，我都可以对付，不致错误。至于实践方面，当力求其浅，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，才行得起走。

西人崇奉斯密士之说而国富，崇奉达尔文之说而国强，而世界大战之机，即伏于其中。德皇威廉第二，崇奉尼采之说，故大战之前德国最为昌盛，然败不旋踵。现在希特勒、墨索里尼，和日本军阀，正循威廉覆辙走去，终必收同一之结果，故知斯密士等三人之学说，收效极大，其弊害亦极大。

墨子学说，虽不完备，但确是救时良药，其学说可以责已，而不可以责人，只有少数圣贤才做得到。当今之世，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流，果有少数圣贤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抱定损己利人之决心，立可出斯民于水火。墨子之说偏激，惟其偏才能医好大病，现在斯密士、达尔文、尼采诸人之言盈天下，墨子之学说，恰是对症良药。

墨子之损己，是出乎自愿，若要强迫他受损，这是不行的。墨子善守，虽以公输之善攻，且无如之何！如果实行墨子之道，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。我国学说理论之不完备，莫如墨子，然而施行起来，也可救印度学说和西洋学说两方之偏。所以要想世界太平，非西洋和印度人，一齐走入中国这条路不可。

杨朱的学说，也是对症之药，现在的弊病，是少数人争权夺利，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，听凭别人夺去，以致天下大乱。杨朱说：“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，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”守着自己的权利，一丝一毫，不许人侵犯，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。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

自然太平。孟子说："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。"君主是从每人身上，掠取些须权利，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，才有所谓君王。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，丝毫不放，即无所谓君王。犹之人人守着包裹东西，自然就莫得强盗。实行杨朱学说，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，结党营私的人，当然无从立起。各人立在地上，如生铁铸成的一般，无侵夺者，亦无被侵夺者，天下焉得不太平？不过由杨朱之说，失去人我之关连，律以天然之理，尚有未合。

孟子说："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"这个话很值得研究。因为孟子那个时代，人民所受痛苦，与现在一样，所以杨、墨的学说，才应运而生。春秋战国，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，杨、墨的学说，自学理上言之，本是一偏，无如害了那重病，这类办法，确是良药，所以一般学者，都起来研究，而杨墨之言就盈天下了。

孔子的学说，最为圆满，但对于当时，不甚切要。所以身死数十年后，他在学术上的地盘，会被杨、墨夺去。孟子说："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"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，全行变为杨、墨之徒，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，和一切长辈，都是杨、墨之徒了，因此孟子才出来，高呼："打倒杨、墨，恢复孔教。"

孟子的学说，本来较杨、墨更为圆满，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不免稍微的带了唱高调的性质，应该先服点杨、墨之药，才是对症。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，出来提倡杨、墨的学说，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，丝毫不放，天下才得太平，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，才能吃孔、孟之药，何以故呢？诸葛武侯曰："法行则知恩。"现在这些骄兵悍将、贪官污吏、劣绅土豪、奸商贵族，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，惩治一下，难免不养痈遗患，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，第十一级以下，暂不必说。

老子与西洋学说

我国学说，当以老子为总代表。他的学说，与佛氏相通，这是无待说的，而其学说，又与西洋学说相通。兹举严批老子为证：严又陵于老子第三章说道："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，来刻谷士一首，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，则知其作用，与老子同符。此不佞所以云：黄老为民主治道也。"于第十章批曰："夫黄老之道，民主之国所用也，……君主之国，未有能用黄老者也，汉之黄老，貌袭而取之耳。"于三十七章批曰："文明之进，民物熙熙，而文物声名皆大盛，此欲作之且宜防也，老子之意，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。此旨与卢梭正同。"又曰："老子言作用，则称侯王，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。然孟德斯鸠《法意》篇中言："民主乃用道德，君主则用礼，至于专制乃用刑。"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，虽老子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。于是道德之治，于君主中求之不得，乃游心于黄农以上，意以为太古有之，盖太古君不甚尊，民不甚贱，事本与民主为近也，此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，夫甘食美服，安居乐俗，邻国相望，如是之世，正在孟德斯鸠法意篇中，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，世有善读二书者，必将以我为知矣。呜呼，老子者，民主之治之所用也。"于第四十六章批曰："纯是民主主义，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，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。"据严氏这种批评，可见老子学说，又可贯通西洋最优秀的民主思想。

现在西洋经济上所实行的，以斯密士学说为原则，政治上所采用的，以卢梭学说为原则。斯密士在经济上主张自由，卢梭在政治上主张自由，我国的老子，正是主张自由的人。我们提出老子来，就可贯通斯、卢二氏之学说，斯密士的自由竞争，一变而为达尔文的强权竞争，再变而为尼采的超人主义，与中国所谓"道德流为刑名"是一样的。西洋有了自由主义，跟着就有法西斯主义，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，跟着就有申、韩之专制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知道黄、老之道德，与申、韩之刑名，原是一贯，即可把各种学说之贯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。

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，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学问。我只是提出老

子，见得各种学说，可以互相贯通，只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可把西洋的学问，尽量的研究。

学道应走之途径

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，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，因而生出理化各科。中国古人，用仰观俯察的法子，窥了宇宙自然之理，因而则定各种制度。同是窥见自然之理，一则用之物理上，一则用之人事上，双方文化，实有沟通之必要。

中国古人，定的制度，许多地方，极无条理，却极有道理。如所谓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在上者仁民爱物，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，隐然磁电感应之理，不言权利义务，而权利义务，自在其中，人与人之间，生趣盎然。西人则与人之间，划出许多界线，所以西洋的伦理，应当灌注以磁电，才可把冷酷的态度改变。中国则未免太浑囵了，应当参酌西洋组织，果能如此，中西文化即融合了。

研究学问，犹如开矿一般，中国人、印度人、西洋人，各开一个洞子，向前开采。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洞子，首先打通。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。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，中国人、印度人、西洋人，分途研究，或从人事上研究，或从物理上研究，分出若干派，各派都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。照现在的趋势看去，中西印三方学说，应该融会贯通，人事上的学说，与物理上的学说，也应该融会贯通。我辈生当此时，即当顺应潮流，做这种融合工作，融合过后，再分头研究。像这样的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，经了若干次，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，研究得毫发无遗憾，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。

宇宙真理，只有一个，只要研究得彻底，彼此是不会冲突的。如有互相冲突之说，必有一说不彻底，或二说俱不彻底。冲突愈甚，研究愈深，自然就把本源寻出，而二者就融合为一。故冲突者，融合之预兆也。譬如数个泥九放至盘中，不相接触，则永久不生冲突，永久是个个独立，取之挤之捏之，即可合为一个大泥丸。中国、印度、西洋，三方学术，从前是个个独立，不相接触。自佛法西来，与中国固有学术，发生冲突，此所谓挤之捏之也，而程明道之学说，遂应运而生。欧化东

渐，与中国固有学术，又发生冲突，此亦所谓挤之捏之也。就天然趋势观之，又必有一种新学说，应运而生，将中、西、印三方学术，融合为一。

然则融合中、西、印三方学术，当出以何种方式呢？我们看从前融合印度学术的方式，就可决定应走的途径了。佛教是出世法，儒教是入世法，二是相反的。程明道出来，以释氏之法治心，孔氏之法治世，入世出世，打成一片，是走的老子途径。苏子由著一部《老子解》，融合儒、释、道三教，也是走的老子途径，王阳明在龙场驿，大彻大悟，独推象山，象山推崇明道，也是走入老子途径。思想自由如李卓吾，独有契于苏子由，仍是走入老子途径。又明朝陈白沙，学于吴康齐，未知入处，乃揖耳目，去心智，久之然后有得，而白沙之学，论者谓其近于老庄，可见凡是扫除陈言，冥心探索的人，得出的结果，无不走入老子途径。因老子之学，深得宇宙真理故也。据严批老子所说，老子之学，又可贯通西洋学说，我们循着老子途径做去，必可将中、西、印三方学术，融合为一。

老子之学，内圣外王，其修之于内也，则曰："致虚静，万物并用，吾以观其复。"其推之于外也，则曰："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，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，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，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"孔门诚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，一以贯之，与老子之旨正同，此中国学说之特色也。佛学传入中国，与固有的学术，发生冲突，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，与佛学的明心见性，打通为一。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，国家主义，传入中国，与固有学术，又生冲突。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，打通为一。西人把个人也，国家也，社会也，看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，而三种主义，遂互相冲突。孔门则身也，家也，国也，天下也，一以贯之，于三者之中，添一个家字，老子更添一乡字，毫不冲突，此中国主义之所以为大同主义也。中印学术，早已融合，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。此种工作，一经完成，则世界学说，汇归于一，学术一致，行为即一致，人世之纷争可免，大同之政治可期。这种责任，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，西洋人和印度人，是不能担负的，何也？西、印两方人士，对于中国学术，素乏深切之研究，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，对于印度学术，研究了二千年；甲午庚子之役后，中国人尽量的研究西洋学术，已四十五年，所以融合中、西、印三方学术的工作，应该中国人出来担负，是在我国学者：顺应此种之趋势，努力为之而已。

迂老自述

（黑教主自传）

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，一般人呼我为教主。孟子曰："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。"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"自传"，而我却不敢，何也？传者传也，谓其传诸当世，传诸后世也。传不传，听请他人，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？你们的孔子，和吾家聃大公，俱是千古传人，而自己却述而不作。所以鄙人只写"自述"，而不写"自传"。众人即殷殷问我，我只得据实详述。即或人不问我，我也要絮絮叨叨，向他陈述，是之谓自述。

张君默生，屡与我通信，至今尚未识面。他叫我写"自传"，情词殷挚，我因写《迂老随笔》。把我之身世，夹杂写于其中，已经写了许多，寄文上海《宇宙风》登载。现在变更计划，关于我之身世者，写为《迂老自述》，关于厚黑学哲理者，写入《迂者随笔》。我之事迹，已见之《迂老随笔》及《厚黑丛话》者，此处则从略。

我生在偏僻地方，幼年受的教育，极不完全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东撞西撞，空劳心力的地方，很多很多，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，所以我之奇怪思想，渊源于师友者少，渊源于我父者多。

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，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，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（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，嘉应直隶州，改名梅县），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。广东一世祖敏公，二世祖上达公……十五世润唐公，于雍正三年乙巳，挈家入蜀，住隆昌县萧家桥，时年六十一矣。是为入蜀始祖，公为儒医，卒时年八十二，葬萧家桥，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。

二世祖景华公，与其兄景荣，其弟景秀三人，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，迁居自流井，汇柴口，一对山，地名糖房湾。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。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。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，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，东家即送与他。公自谓此地必发达，坟坝极宽，留供后人

建筑，坟坝现为马路占去，余地仍不小。

三世祖正芸公，也以教书为业，生五子，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，长子和第五子之子，也是秀才。第三子名煊，字文成，是我高祖，一直传到我，才得了一个秀才，满清皇帝，赏我一名举人，较之他房，实有逊色。煊公子孙繁衍，五世同堂，分家时，一百零二人，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，也算一时之盛，因为只知读书之故，家产一分再分，遂日趋贫困。

渲公长子永枋，为我曾祖，广东同乡人，在自流井修一庙，日南华宫，举永技公为总首监修，公之弟水材，以善书名，庙成，碑文匾对，多出其手，光绪中，毁于火，遗迹无存。先人著作，除族谱上，有诗文数首外，其他一无所有。距汇柴口数里，有一小溪，曰会溪桥，碑上序文，及会溪桥三大字，为永材公所书，书法赵松雪，见者皆称佳妙，所可考者，惟此而已。自流井世家，以豆牙湾陈家为第一，进士翰林，蝉联不绝，我家先人，多在其家教书，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。我父幼年，曾从永材公读。

自流井号称王、李两大姓，有双牌坊李家、三多寨李家……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，而以双牌坊，三多寨两家为最盛。民国元年，族弟静修，在商场突飞猛进，大家都惊了，说道："这个李静修，是从哪里来?"陈学渊说道："这是一对山李家，当其发达时，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。"二十八年，我从成都归家，重修族谱，先人遗事，一无所知，欲就学渊访之，不料已死，询之陈举才，云：但闻有李永材之名，他事则不知。记得幼年时，清明节，随父亲到柳沟坝扫墓，陈星二率其子侄，衣冠济济，也来扫墓，其墓在洞唐公墓之下。我辈围观之，星三指谓其子侄曰："此某某老师之祖坟也。"旋问族中长辈曰："某老师是你何人？某老师是你何人？其后嗣如何?"长辈一一答之，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，才殷殷若是。今已多年，对答之语，全不记忆，其所谓某老师者，除永材公外，不知尚有何人，先人遗事淹没，可胜叹哉!

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，族亲子弟，衣冠不整者，酒醉者，将及店门，必庄摄其容乃敢过，公见之，亦惟温语慰问，从未以疾言遽色加人。公最善排难解纷，我父述其遗事颇多。年七十，易箦时，命家人捧水进巾，自浴其面，帽微不正，手自整之，乃凭几而卒。我父为永枋公之孙，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。夜间，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。我父常举以教我，我读书能稍知奋勉，立身行己，尚无大过者，皆从此种训

话而来。我父尝曰："教子婴孩，教妇初来。"又曰："教子者以身教，不以言教。"诚名言也。

我家族谱字辈，是"唐景正文永，山高世泽长。""文"字辈皆单名火旁，而以"文"字作号名。我是"世"字辈。我祖父乐山公，务农、种小菜卖，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，沿街卖之。公身魁梧，性朴质，上街担粪，人与说话，立而谈，担在肩上，不放下；黠者故与久谈，则左肩换右肩，右肩换左肩。公夜膳后即睡，家人就寝时即起，不复睡。熟睡时，百呼不醒，如呼盗至，则梦中惊起，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，毕，则持一棍往守菜圃，其地在汇柴口，蒲家坝大路之侧。贼窃他人物经过，公见即奔逐之，贼畏甚，恒绕道避之。年终，割肉十斤，腌作新年之用。公自持刀修割边角，命祖母往摘萝卜作汤，嘱曰："大者留以出售，小者留俟长成，须一窝双生，而又破裂不中售者。"祖母寻遍园中，不得一枚。及汤熟，公自持瓢，盛入碗，复倾入锅中。祖母询之，则曰：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，苦不能遍也。数日即病卒，祖母割腌肉一方献台前，见之即大泣，自言泪比肉多。我祖父以世家子，而穷困如是，勤苦如是，其死也，祖母深痛之，取所用扁担藏之曰："后世子孙如昌达，当裹以红绫，悬之正堂梁上。"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。祖母姓曾，固高山寨（距一对山数里）富家女，其父以一对山李氏，为诗礼之家，故许字焉。归公后，挑水担粪，劳苦过黄家女，每归宁，见猫犬剩余之饭，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。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："先人一食之难，至于如此，后世子孙，毋忘也。"不肖今日，安居坐食，无所事事，愧负先人多矣！

乐山公生我父一人，父名高仁，字静安，先祖没后，即归家务农，偕我母工作，勤苦一如先祖。家渐裕，购置田地，满四十岁，得病，延余姓医生诊之，余与我家有瓜葛亲，握脉惊曰："李老表，你怎么得下此病？此为劳瘁过度所致，赶急把家务放下，当如死了一般。安心静养，否则非死不可。"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，一事不管。我父生二女，长女未出闷死，次女年十余，专门侍疾，静养三年，病愈，六十九岁乃卒。

父养病时，寻些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列国演义》这类书来看，看毕无书，家有四书的讲书，也寻来看，我父胞叔温山公学问很好，一日见父问曰："你在家作些什么？"答曰："看四书的讲书。"温山公大奖之，我父很高兴，益加研究。

我弟兄七人，我行六，三哥早卒，成立者六房，父命之曰："六谦堂。"除我外，弟兄皆务农，惟虹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，有点商性质。

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，光绪乙亥年八月，满四十。我生于己卯年正月，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，故我天性好读书。世称：苏老泉，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。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，仁宗明道二年乙亥，满二十七岁。苏东坡生于丙子十二月十九日，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，他弟兄二人，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，苏老泉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两位文豪；我父四十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一位教主，岂非奇事？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，俱是乙亥年，我生于己卯，与子由同，事也巧合。东坡才气纵横，文章豪迈，子由则人甚沉静，为文淡泊汪洋，好黄老之学，所注《老子解》，推古今杰作。大约老泉发愤读书，初时奋发踔厉，后则入理渐深，渐归沉静，故东坡子由二人，禀赋不同。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，故我性沉静，喜读老子，颇类子由。惜我生于农家，无名师指点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以是有愧子由耳。

我父病愈时，近邻有一业，欲卖与我父，索价甚昂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，故意说无钱买，彼此钩心斗角。邻人声言，欲控之官，说我父当买不买，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，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。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，买时又生种种纠葛。我七弟生于辛巳年正月甘五日，正是我父同邻人钩心斗角时代生的，世本为人，精干机警，我家父母死，哥嫂死，丧事俱他一手所办。尝对我说道："我无事，坐起，就打瞌睡，有事办，则精神百倍。这几年，好在家中死几个人，有事办，不然这日子难得过。"此虽戏言，其性情已可概见。据此看来，古人所谓胎教，真是不错，请科学家研究一下。

我自有知识以来，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，不甚作工，惟偶而扯甘蔗叶，或种葫豆时盖灰，做这类工作而已。工人作工，他携着叶烟竿，或火笼，挟着书，坐在围土边，时而同工人谈天，时而看书，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，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。每夜我父在堂屋内，同家人聚谈，我尝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，放在桌上看书，或倚神龛而看。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，也不喊我看，也不喊我不看，惟呼我为"迂夫子"而已。我之喜看书，不是想求上进，也不是想读书明理，只觉得手中有书，心中才舒服，成为一种嗜好。我看书是不择书的，无论圣经贤传，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，我都一例视之，拿在手中看。我有此嗜书之

天性，假令有明师益友，指示门径，而家中又藏有书籍，我之成就，岂如今日？言念及此，惟浩叹而已。

我父每晨，必巡行田垅一次，尝说："田膛，土边，某处有一缺口，有一小石，我都清清楚楚的。"又说："我睡在家中，工人山上做工情形，我都知道。"我出外归来，尝问我："工人做至何处?"我实未留心看，依稀仿佛对之，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。

我虽生长农家，却未做工，只有放学归来，叫我牵牛喂水，抱草喂牛。种葫豆时，叫我停学在家，帮着丢葫豆，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，碾米碾糠，我亦携书而往。我考得秀才时，照例晏客，佃户王三支，当众笑我道："而今当老爷了（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），如果再拿着书，在牛屁股后面走，我们要不依你的。老爷们都跟着牛屁股走，我们干什么?"但是我碾米碾糠时，还是携书而往。

我父所看之书，只得三本：（一）《圣谕广训》（此书是乾隆所著，颁行天下，童生进场考试，要默写，名为默写，实则照书誊），钱塘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。这是我父养病时，请徐老师誊的，字甚工楷。（二）《刿心要览》，我查其卷数，是全部中之第三本。中载古人名言，分修身、治家、贻谋、涉世、宽厚、言语、勤俭、风化、息讼九项，我父呼之为格言书。（三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招，后附遗嘱。（是椒山赴义前一夕，书以训子者，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。）此外还有一本《三字经注解》，但不甚看。椒山奏招及遗嘱亦少有看，所常常不离者，则在前二种，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。我细加研究，始知我父读书，注重实用。《三字经注解》，及椒山奏招，只可供谈助。椒山遗嘱虽好，但说得太具体，一览无余，不如前二种之意味深长。我父常常读之，大约是把他当作座右铭。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，十五日去世，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。

最奇者，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，他读的《圣谕广训》及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，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；其他三书，俱是白本，我父未圈点一句。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字，就连墨笔画的圈圈都未见过一个。我们弟兄六人，随时都有人在侧，无论写什么，他都喊儿子动笔。我看他吃饭捏筷子，手指很僵硬，且有点发颤，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。

我父常说："唐翼修著有《人生必读书》。"我考试到叙府，买得此

书，送在他面前。他也不看，还是喊我拿《圣谕广训》和格言书米，揣其心理，大约是谓：只此二书已够用了，其他皆是赘瘤。

我父常常说道："你的书读窜皮了，书是拿来应用的。'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。'你读成'书还书，我还我'去了。"我受过此种庭训，故无事时，即把书与世事，两相印证，因而著出《厚黑学》与《心理与力学》等书，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，其实不然。我等于赵括谈兵，与人发生交涉，无不受其愚弄，依然是"书还书，我还我。"

我父又说："书读那么多做甚？每一书中，自己觉得那一章好，即把他死死记下，其余不合我心的，可以不看。"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，只得三本，而三本中，还有许多地方，绝未寓目。常听他曼声念道："人子不知孝父母，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？"（《圣谕广训》中语）"贫贱生勤俭，勤俭生富贵，富贵生骄奢，骄奢生淫佚，淫佚生贫贱秽师要览中语）。应箕应尾，你两个……"（椒山遗嘱中语，应箕应尾，是椒山之子）我父常常喊我近前，讲与我听，我当了秀才，还是要讲与我听，我听之津津有味。我此次归来，将《刿心要览》，寻出细读，真是句句名言，我生平作事，处处与之违反，以致潦倒终身，后悔莫及。

我读书的方式，纯是取法我父，任何书，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，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。得着新书，把序文看了，前面看几页，就随便乱翻，中间看，后面看。每页也未细看，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，就反复咀嚼，将书抛去。一而二，二而三，推究下去，我以为：世间的道理，为我心中所固有，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。世间的书读不完，譬如：听说某家馆子菜好，我进去取菜牌子来，点几道菜来吃就是了，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？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、东大街、会府等处游玩，今日见一合意之物，把他买回来，明日见一合意之物，又把他买回来，久之则满室琳瑚，样样皆合用，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，全行购归？我这种说法，纯是本之我父，因此之故。我看书，入理不深，而腹笥又很空虚。

我在亲友家耍不惯。但只要有几本书，有一架床，我拿着书，卧在床上，任好久，我都住得惯。其书不拘看过的，未看过的，或是曾经熟读的，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。我一到他人室内，见桌上有书，即想翻来看。不过怕人讨厌，不好去翻罢了。但是我虽这样喜书，而家中储几书柜的书，成都有几书柜的书，许多都未下细看过，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，每本打开来，随便看一下就丢了，看了等于未看。

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，故喜欢购书，而购得来又不细看，徒呼负负，近年立誓不购书，而性之所近，见了就要买，买来又不看，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，及成都的书，搬来作了宗吾图书馆，供众人阅读好了。

亡弟之子泽新，对我说："我见着书，心中就糊涂；一进生意场中，心中就开朗。"我的性情，恰与相反，提着家中事务，心中就厌烦。一打开书，心中就开朗。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，而家中小孙儿、小孙女都开得起。赴人宴会归来，问我吃些什么菜，我无论如何记不全。身上衣服，尺寸若干，至今不知道，告诉我跟着就忘了。上街买物，分不出好歹，不敢还价，想买书就买得来，而买笔又买不来。别人读我厚黑学，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，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。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，还莫有脱，朋友往来，我得罪了人，还不知道。

音乐一门，我完全不懂，戏曲中，有所谓西皮、二簧，我至今弄不清楚，我当省视学，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，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，假充内行；名人字画，我分不出好歹，别人评得津津有味，我不敢开腔，不敢说好，怕人追问好处安在。我幼年订古姓女，其叔古威侯，是威远秀才，以善书名。我家接一位关老师，见着我的字说道："你这笔大挥，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？"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，我未在古府献丑。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，他一日进我房中，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，堆有寸多高。他取来一看，叹息道："你也可算勤快了，怎么字还是这样？"我听了凄然泣下。阅卷者常常批："字太劣"或"字宜学"。雷铁崖常说我："你那个手爪印确该拿来宰？"我天性上，有这种大缺点，岂真古人所谓"予之齿者去其角，傅之翼者两其足"耶。

我从师学作八股，父亲命我拿与他看。他看了说道："你们开腔即说：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，那个时候，有什么好？尧有九年之水患，汤有七年之旱灾（二语出《幼学琼林》，是蒙塾中读本）。我们农家，如果几个月不下雨，或几个月不晴，就喊不得了，何况九年七年之久！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，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？"我听了很诧异，心想："父亲怎么发怪议论？"总想：他的话也有道理。我把这个疑团，存诸胸中，久之久之，忽然想道："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诸人，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？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，孔子而后，不再出一个圣人？"由此推寻下去，方知圣人构成，有种种黑幕。因此著了一篇《我对于圣人之

怀疑》，才把疑团打破，惜其时我父已死，未能向他请问。

我父常说："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。"把书与世事，两相印证，何以书上说的："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。"征诸实事，完全相反？怀疑莫释，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。

我的思想，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，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及《厚黑学》，是属乎破坏的，厚黑学，破坏一部二十四史，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，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。所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、《考试制之商榷》、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及《制宪与抗日》等书，计包括经济，政治，外交，教育，学术等五项，各书皆以《心理与力学》一书为基础，这是属乎建设的。破坏部分的思想，渊源于我父，建设部分的思想，也渊源于我父。

我父一日问我道："孟子说：'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'这是孺子入井，我站在旁边，才是这样，假令我与孺子，同时入井，我当如何？"我听了，茫然不能答，他解释道："此时应先救自己，第二步，才来救孺子。"我听了很诧异，心想："我父怎么莫恻隐心，纯是为己之私？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，才发出这种议论，如果说出去，岂不为读者所笑？"但当面不敢驳他，退后思之，我父的话，也很有道理，苦思不得其解。民国九年，我从成都辞职归家，关门读了一年的书，把这个问题，重新研究，才知孟子之书，上文明明是"怵惕恻隐"四字，下文"无恻隐之心非人也"，"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"平空把怵惕二字摘去，这就是一种破绽。盖怵惕者，我畏死也，恻隐者，怕人之死也。乍见孺子将入井，恍如死临头上，我心不免跳几下，是为怵惕。细审之，此乃孺子将死，非我将死，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，怵惕扩大为恻隐，此乃人类天性也。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，以至于四海，立论未尝不是，只是著书时，为行文简洁起见，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，少说了一句："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。"宋儒读书欠理会，忘却恻隐上面，还有怵惕二字，创出的学说，就迂谬百出了。我父的议论，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，在学理上很有根据，我著《心理与力学》把此种议论载上去，张君默生来信说："怵惕恻隐一释，为千古发明。"殊不知此种议论，是渊源于我父。

我父上街，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桢，谢家坝谢老师文甫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。他二人俱在教私塾，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，和孺子入井的问题，未知是我父发明的，抑是同罗、谢诸人研究出来的。我父尝因讲四

书，挨了两耳光，他却深以为荣，常向我弟兄讲述，我把事实详述于下：

永枋公生五子，长子青山，父子俱死，惟其妻尚在，住糖房湾老屋，次子乐山，即我祖……第五子韫山，某年青山之妻死，其孙世兴等，邀请族人至家，人到齐，世兴等三弟兄，披麻带孝，点烛祀神毕，把棺材打开，大呼："阿婆呀！你要大显威灵呀！"把堂叔学山抓着，横拖倒曳，朝街上走，我父不知是何事，跟着追去，彼时年已五十余矣，又值冬天，穿着皮袍子，鸡婆鞋，跑又跑不得，急喊："过路的，与我拦住！"问之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，无钱办丧，拖往张家沱滚水，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。我父问明所欠若干，即说：一此款由我垫出，丧事办毕再说。"世兴等此举，全是韫山公之主张，我父不知，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，谈及此事，我父说："世兴等对于叔祖，敢于这样侮辱，真是逆伦。"韫山公厉声曰："怎么是逆伦？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，世兴等开棺大呼'阿婆'，是替死者索帐，这是嫂子向他要钱，不是侄孙向他要钱，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，世兴怎么是逆伦？"我父说道："么叔！这章书，不是这样讲的，孟子虽然这样说，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：'必要有桀纣之暴，又要有汤武之仁，才不算臣弑君，否则是臣弑君。'所谓'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也。'学山无桀纣之暴，世兴等无汤武之仁，怎么不是逆伦？"温山公是饱学先生，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，站起来，给我父两耳光，说道："胡说！"我父常对我说："偏偏这章书，我是仔细看过，道理我也仔细想过，所以么公被我问穷了。"

我父尝说：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，都是主张早起，朱柏庐云"黎明即起。"唐翼修云："早眠早起，勤理家务。"韩魏公云："治家早起，百务自然舒展，纵乐夜归，凡事恐有疏虞。"（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，系出《人生必读》书内，《刿心要览》中无之）故我父每日从鸡鸣即起，我自有知识以来，见他无一日不如此，虽大雪亦然。然时无有洋火，起来用火链敲火石，将灯点燃，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，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，日含叶烟，坐到天明，将本日工人应作的活路，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。父尝说："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寅。"盖实行此语也。我与父亲同床睡，有时喊我醒，同我讲书，谈人情物理，有时喊我，我装做睡着，也就算了。可知他独坐时，都在研究书理。但他在灯下，从不看书。我母亲引着小兄弟，在隔壁一间屋

睡，有时把我母喊醒，用广东话，谈家务及族亲的事。此等情景，至今如在目前。我父亲早起，我见惯了，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。曾国藩把早起二字，说得那么郑重，自我看之，毫不算事。我父曰："以身教，不以言教。"真名言哉！

我父亲起居饮食，有一定的，每晨，命家人于火锅开时，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。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，最益人。我父不能食白蛋，故改而食此。半少午，吃几杯酒，睡一觉，无一日不然，不肯在亲友家宿，必不得已留宿，即在辒山公家宿，辒山公都要预备。同学曾龙骧娶妻，我祖母姓曾；是亲戚，我父往贺留宿，与雷铁崖同一间屋，我父鸡鸣起来，独坐酌酒，把铁崖呼醒谈天。后铁崖间我说道："你们老太爷，是个疯子，天未明，即闹起。"一般人呼我为疯子，我这疯病，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，后来铁崖留学日本，倒真正疯了。（事见拙著《厚黑丛话》）。

我父尝对我说："凡与人交涉，必须将他如何来，我如何应，四面八方都想过，临到交涉时，任他从哪面来，我都可以应付。"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，无一次失败，处理家务，事事妥当。工人作工时间，无片刻浪费，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。我父怕工人晏起了，耽搁工作，而每晨呼之起，又觉得讨厌。他把堂屋门作得很坚实，见窗上现白色，再开歇房小门一看，天果然亮了，即把堂屋门，砰一声打开，工人即惊醒。

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，问我道："这章书怎么讲？子曰：'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'颜回朝日读书，不理家务，犹幸有箪食瓢饮。如果长此下去，连箪食瓢饮都莫得，岂不饿死了？"一连问了几回。后来我把答案想起，他再问。我说道："这个道理很明白，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。颜路极善理财，于何征之呢？论语载："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，以为之谆。"你想：孔子那么穷，家中只有一个车儿，颜渊是孔子的徒弟，他都忍心要卖他的，叫孔子出门走路，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，无微不至。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，自然可以安心读书，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，叫他经理家务，不惟不能积钱，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。"我父听了大笑。从此以后，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。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，我闭目回思，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，也是渊源之一。

我父购的基业，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，由张家山前进数里，有位王翰林，名荫槐，字植青，与宋芸子同榜，王得编修，宋得检讨。

王之父名瑞堂，与我父同当苍首，植青妹，嫁与杨姓，与我家边界相连，我往杨家，见植青书有一联云："观书当自出见解，处世要善体人情。"这二句，我常常讽诵，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。

我所引以为憾者：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，及人情物理，而进了学堂，老师初则只教背读，继则只讲八股，讲诗赋，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，只讲八股，像我父所说："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"一类话，从未说过。"孺子入井"及"尧舜禹汤"这类问题，也从未讨论过。叫我看书，只看《四书备旨》及《四书味根录》这类庸俗不堪之书，其高者，不过叫我读四史，读古文而已。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，提都未提过。迄今思之，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，不然我这厚黑教主，是当不成的。所谓"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。"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，不能满我之意，而其他学问，又无人指示门径，朝日只拿些道理，东想西想。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，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，都不能范围我，而其书中要紧之点，我却记得，马越跑得快，观的花越多，等于蜂之采花酿蜜，故能贯通众说，而独成一说，而厚黑学三字，于是出现于世。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，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。

八股文规律极严密，《四书备旨》及《味根录》等书，虽是庸俗，而却字字推敲，细如茧丝牛毛。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。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，凡是两不相关之事，我都可把他联合来成为一片。故我著书谈理，带得有八股义法。因此我在《迂老随笔》中，曾说："道家者流，出于史官，儒家者流，出于司徒之官，厚黑学，则出于八股之官。"

八股时代，有所谓考课，是用以津贴士子的，自井分县，有四季课，富顺县城，有月课，自井离县九十里，专人下去，得题飞跑回井，把文作起，连夜送进城自流井文武庙鸿文书院，及贡井旭川书院，不时也有课，我读书，米是家中挑，靠考课得奖金，作零用及购书之费。文字非翻新立异，不能夺阅者之目，故每一题到手，我即另出一说，不遵朱注，（本来清朝功令，四书文必遵朱注，及到末年，藩篱渐破。）即遵朱注，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，力求新异，兹举两例如后：

（1）有一次，月课题，"彼恶敢当我哉"。我暗用曹操伐吴，孙权拔刀斫案，起兵拒之，那个意思，把彼字指秦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六国，分作六比，其时我已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，大旨言："彼秦国如何，而我齐国则如何……彼秦恶敢当我。""彼楚国如何，而我

齐国则如何……彼楚恶敢当我。”“彼魏恶敢当我。”

（2）又一次，月课题，“子曰，直哉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，君子哉，蘧伯玉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我作了两卷，（甲）第一卷说：此章书，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，因为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，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，明日进行，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，子路温见……”众人有怪孔子所对，不该那么直率的，有怪不该立即走的。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，说道：“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，你看卫国的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。我若不直对，岂不为史鱼所笑？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，你看卫国的蘧伯王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卷而怀之，我若不走，岂不为蘧伯玉所笑？”（乙）第二卷：因为“直哉史鱼”和“君子哉蘧伯玉”的文法，与“孝哉闵子骞”是一样的，聊斋上王邑斋一段，不是曾说“孝哉即是人言”吗？因此我说“直哉史鱼”和“君子哉蘧伯玉”，都是世俗之言，而孔门家法，与世俗不同，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为直，证父攘羊不直。邦有道危言危行，邦无道危行言逊，故孔子对于史鱼，深有不满，意若曰：“你们说：‘直哉史鱼’，他不过‘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’罢了，真正的直，岂是这样吗？”春秋之世，正可谓无道之世了，面孔子志在救民，栖栖不已，见蘧伯玉卷怀而退，也是深所不满，意若曰：“你们说：‘君子哉蘧伯玉’请问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卷而怀之，‘可’乎哉？”重读可字。朱注，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，我这种说法，显与朱注违背。

这三本卷子，都被取录，我未读过古注，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，即使有也是暗合。我凡考课，都取这种方式，八股文本是对偶，我喜欢写散行文，题目到手，每一本立一个意思，意思写完，即算完事，又另换一本，这个方法，又不费力，又易夺阅者之目。至于作策论，那更可由我乱说了。我生平作此等文字，已经成了习惯，无有新异的文字，我是不喜欢写的。不过昔年是作八股，作策论，今则改作经济，政治，外交等题目罢了。张君默生信来。称我为大思想家，误矣！误矣！

我与雷铁崖（名昭性）雷民心（名昭仁）弟兄同学，大家作文，都爱翻新立异。铁崖读书很苦，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，命他在家作工。他尝对我说：“家中命我割青草，挑在盐涌井去，每挑在一百斤以上，硬把我压够了。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，有如登仙。”他请求读书，经

家中许可，免去作工，但一切费用，家中不能担任，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。故铁崖考课，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。而民心则可做可不做，使彼时无所谓月课，则铁崖将在家中作工修老矣。其留学日本，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，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。

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，铁崖则用死功，作文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我说他文笔笨拙，他说我文笔轻浅，彼此两不相下。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，长或数百言，等于作一篇文章，无一日间断；及留学日本，把笨拙脱去，遂大有文名，而我则轻浅如故，且日趋俚俗。铁崖死矣，使其见之，不知作何评语。

庚子年应县试，我与雷氏弟兄同路，在路上民心向我说道：“我们倒起身了，不知‘长案’起身莫有？”因为县试五场，府试四场，终场第一名，名曰：“案首”，俗呼为“长案”，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。第二名以下，则在不可知之数。哪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我，府试案首，就是民心，可见凡人不可妄自菲薄。铁崖县试终场第二，府试终场第七，到院试一齐入学，富顺应小试者，一千数百人，入学定额，廿四名。

我买部李善注《昭明文选》，点看了半年。县试头场题目，是“而不见舆薪，至舆薪之不见。”我作起文来，横顺都要成韵语，我也就全篇作韵语，不料榜发竟到第七。以后我循规蹈矩的做，终场竟得案首。后来富顺月课，有一次，题是“使奕秋诲二人奕，其一人专心致志。”我作了两卷，第一卷循规蹈矩的作，第二卷全篇作韵语，第一卷是用心作的，第二卷是信笔写的。后来第一卷摈落，第二卷反被取录。此卷至今尚在。文章本是要不得，我所以提及者，见得我在八股时代，作文字，常常破坏藩篱，所以今日著书也破坏藩篱。是之谓：“厚黑学出于八股之宫。”

雷民心应县试，前几场本是前十名，第四场出一题，“陈平论”，民心数陈平六大罪，六出奇计，每一计是一罪。在那个时代，应试童生，有不知陈平为何人者，民心能这样做，也算本事。哪知县官看了，说道：“这个人如此刻薄，将来入了学，都是个包揽词讼的滥秀才。”把他丢在后十名。阅卷者，是叙府知府荐来的，府试时回府阅卷，府官见了民心之卷，说道“此人文笔很好，如何列在后十名！”阅卷者说道：“他做陈平论，县官如何说，我争之不得。”县试之卷，照例应申送府，府官调来一阅，大加赞赏，因而取得案首。可算奇遇。科举废除久矣，而我絮絮言之，有如白发宫人，谈天宝遗事，阅者得无窃笑耶？然使当日

我辈不做这类翻案文字，养成一种能力，我今日也断不会成为教主。

光绪丙戌，我年八岁，从陈老师读，陈为我家佃户，是个堪舆无生，一直读了四年。庚寅年，从郑老师读，陈、郑二师，除教背读外，一无所授。辛卯年，父接关海洲先生来家，教我们几弟兄，关是未进学之童生，年薪五十串，以彼时米价言之，五十串能买十石米，我写此文时（民国卅年四月）米十石，需法币八千数百元，故在彼时，亦算重聘。后来我当了秀才，某富室欲聘我，年薪七十串。我欲应之，因入高等学堂肄业未果，彼时教师之待遇如是。

关师教法，比陈、郑二师为好，读了两年，做八股由破承而至入手，算是成了半篇，试帖诗能做四韵，关师教书，虽不脱村塾中陈旧法子，但至今思之，我受益之处，约有三点：（1）每日讲《龙文鞭影》典故四个，要紧处，用笔圈出，次日闭着书回讲，圈者须背得。我因而养成记典故之习惯，看书紧要处，即圈出熟读。（2）每日讲《千家诗》，及《四书》，命我把槐轩《千家诗注解》、《四书备旨》，用墨笔点，点毕送他改正。我第一次把所点千家诗，送他看，他夸道："你居然点断了许多，错误者很少，你父亲得知，不知若何欢喜。"我听了愈加奋勉，因而养成看书之习惯。到了次年，我不待老师讲解，自家请父亲与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。（3）关师在我父友人罗大老师处，借一部《凤洲纲鉴》来看，我也拿来看。我生平最喜看史书，其发端即在于此。关师又在别处借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我也拿来看，反复看了几次，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以孙、曹、刘为证。但所举者，是陈寿《三国志》材料，非演义中材料。关师有一次出试帖诗题，题目我忘了，中有雪字，我第一韵，用有同云二字，他在同字上，打一大叉，改作彤字，说道："'彤云密布，瑞雪纷纷'（《三国演义》中语），是这个彤字。"我说道："我用的是诗经'上天同云，雨雪零零。'"他听了默然不语。壬辰年终，关师解馆，我因病父命辍读。

我六岁时，因受冷得咳病，久不愈，遂成哮吼病，遇冷即发，体最弱，终年不离药罐。从关老师读，读几天声即哑，医数日好多了，一读即哑，所以我父命我辍读养病。癸巳年，父命四兄辍读务农，把五兄送在汇柴口茂源井（现名复兴井），七弟在家，从一个姓侯的老师读，我此时总算废学了。但我在家，终日仍拿着一本书。一日，午饭后，大兄见我在看书，就对父说道："老六在家，活路也不能做，他既爱看书，不

如送进学堂，与老五同住，床铺桌子，也是有的。向老师说明，这是送来养病的，读不读，随便他，以后学成随便送点就是了。”彼时我家尚充裕，这种用费，我父也满不在乎，就把我送去。这算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，在大兄不过无意中数语，而于我的前途，关系很大，否则我将以农人修老矣。

刘老师共三人，是三叔侄，叔公之名已忘去，学生呼之为刘二公，是个童生。叔爷名刘应文，号重三，后改为焕章，是个秀才（后乙未年考得禀生），学生呼之为七老师。侄儿名刘彬仁，号建侯，也是秀才，学生呼之为建侯老师。刘二公的文笔，是小试一派，七老师是墨卷一派，建侯老师，善写字，归于词章，尝听见他在读“帝高阳之苗育兮”，“若有人兮山之阿”等等，案头放有手写蝇头小楷史记菁华录全部，论文高着眼孔。学生的八股文，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，诗赋则建侯老师改，建侯老师高兴时，也拿八股去改。背书则随便送在那个老师面前都可。我本来是养病的，得了特许，听我自由，但我忘却了是养病，一样的用功，一样的作八股，作诗赋，但不背书而已，读书是默看，不出声。学堂大门，每扇贴一斗方红纸，一扇写的是“枣花虽小能成实，桑叶虽粗解作丝，惟有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又空枝。”一扇写的是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；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这是建侯老师写的，我读了非常感动，而同学中华相如（号相如，今在自流井商界，颇有名）等，则呼我为老好人。

我在厚黑丛话中曾说：“父亲与我命的名，我嫌他不好。”究竟是何名，我也可说一下，我自觉小时很醇谨，母亲绩麻纺线，我依之左右，母亲叫我出去耍，也不去，说我：很像女孩子。而父亲则说我小时（大约指一二岁言）非常的横，毫不依理，见则呼我为“人王”，我父把人王二字，合成一全字，加上派名世字，名为“世全”。算命先生，说我命中少金，父亲加上金旁，成为世铨。我在茂源井读书，请建侯老师，与我改号，他改为秉衡，乙未年，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，为四川总督（后未到任），刘七老师对我说道：“你的号，与总督同名，可把他改了。”七老师也会算命，他说我命中少木，并不少金，我见礼记上有“儒右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”之语，就自己命名世楷，字宗儒（后来才改为宗吾），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，俱是民声，改为世权，我不愿意，仍用世楷。余见厚黑丛话。

最值得研究的，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，我自觉在行为上，处处循规蹈矩，而作起文字来，却是横不依理，任何古圣先贤，我都可任意攻击。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，两篇文字，不说了。我著考试制之商榷，提出一种办法，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，不合我的办法，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。我著社会问题之商榷，创出一条公例，斯密士，不合我的公例，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。这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，颁出一条法令，凡遇违反法令者，都拿去斩杀一般。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，岂有生之初，我即秉此天性耶？一般人呼我为教主，得无教主之地位，与人王相等耶？释迦一出世，即说："天上地下，惟我独尊。"我得无与之相类耶！故民国元年，发表厚黑学，署名曰："独尊"。然则教主也，人王也，盖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

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，某处有私馆，就把子弟送去读，时间大概是正月二十几，到了二月底，或三月间，老师才请众东家，来议修金，名之曰："议学"，议学之时，众东家你劝我，我劝你，把修金说定，开单子与老师送去，老师看了无话，就算议定了。学生数十人，最高额是十二串，我五兄（名世源）出了最高额。议到我名下，我父声明这是送来养病时，随便写了几串，把单子送与老师看，老师传话出来，说："全堂中惟有李世铨读得，应该比李世源多出点。怎么才出这点。"我父也就写了十二串。老师这样重视我，很出我意料之外，精神上很受一种鼓动。

我觉得教育子弟，不在随时责斥，责斥多了，使他精神颓丧；不在随时劝勉，劝勉的话大多，成为老生常谈，听者反不注意；也不可过于夸奖，奖之太过，养成骄傲心；总在精神上，予之以鼓动，而此种鼓动，不知不觉，流露出来，乃能生效。建侯老师呼学生必级以娃娃二字，如云华上林这个娃娃，李世源这个娃娃等等，对学生常出以嘲弄态度，独对于我无此种态度，不过呼我之名，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。有夜，三位老师都睡了，学生还在嬉笑，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问道："那么夜深，你们还在闹，不知干些什么！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，我也就放心了。"这些地方，很使我自尊自重。

刘二公人甚长厚，七老师性严重，建侯老师，对刘二公常常嘲弄之，对七老师则不敢，但不时也要说一二句趣话。有一次，宴会归来，建侯老师对七老师说道："今天席上，每碗菜来，二公总是一筷子两块三块，独于端碗肉圆子来，二公用筷子，把一个圆子，夹成两半个，我

心想：二公这下，怎么这样斯文了。那知他把半个圆子，搭在一个整圆子上面，夹起采，一口吃了。”我听了，非常有趣，我生性木讷，现在口中和笔下，随便都是诙谐语，自然有种种关系，才造成这样的，建侯老师，也是造成之一。

我作文章，很用心，得了题目，坐起想，站起想，睡在床上想，睡在板凳上想，稿子改了又改，一个题，往往改两三次稿，稿子改得稀滥。而今写报章杂志文字，却莫得那么费力了，读我文章的人，有说我天资高，其实是磨练出来的，天资并不高。五兄往往叫我代笔，我就把不要的稿子，给他誊去缴，次年，甲年，五兄辍读务农，七弟同我在茂源井读一年。

甲午年，我往罗大老师家，把《凤洲纲鉴》借来看，同学王天衢见了，也买一部来看，建侯老师看见，责之曰：“你怎么也看此书，李世铨这个娃娃，是养病的，才准他看，此等书，须入丁学，方能看，我若不说，别人知道，还说我是外行。”此话真是奇极了，于此可见当时风气。

王天衢的父亲，是井灶上的掌柜，甚喜欢读书，期望其子甚殷，训教很严，一日到学堂来，我等在天衢房中耍，他父亲见着很客气，我等要走，天衢悄悄说：必不可走，一走了，我就要挨骂。”及我等一转背，其父即骂道：“你个杂种……”天衢尝对我说：“我宁去见一次官，不肯见我父亲。”后隔多年，我遇着天衢问道，你们老太爷的脾气，好点莫有？”他说道：“也莫有什么，不过他老人家，每日早膳后，照例要做一坛法事罢了。后来天衢卒无所成。由此可见：我父对我，不甚拘束，真是得了法的，我悟得此理，故著《心理与力学》，曾说：“秦政苛虐，群盗蜂起，文景宽大，民风反浑朴起来，官吏管理百姓，要明白此理，父兄管理子弟，要明白此理。”这是我从经验上得来的，然则父兄对于子弟，竟可不管吗？我父有言曰：“以身教，不以言教。”

我的心，随时都放在书理上，有一次，建侯老师率众学生，往凤凰坝某家，行三献礼，老师同众学生，在茶馆内吃茶，我一人在桥头上独步徘徊，回头见老师同众人望着我笑，我不知何故，回到茶馆，悄悄问华上林：“老师笑我何事？”答曰：“老师说你很儒雅，将来一定会入学。”我当日本把秀才看得很高，听了不胜惊异。

晚上行三献礼，照例应讲书，死者是祖母，建侯老师，登台讲“孝哉闵子骞”一章，把闵子的事讲完，跟着说道：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……”这明明是用太史公屈贾合传的文法，我站在台下听讲，老师

讲至此处，目注于我，微作笑容，意若曰："此等文法，众学生中，只有你才懂得。"此事我当日印象很深，老师形态，至今宛然在目，这都是精神上予我一种鼓励。

建侯老师的文章，注重才气，选些周犊山及江汉炳灵集的八股，与我读。一日，我对罗大老师说："我在读江汉炳灵。"他说："这些文章，小试时代，不可读，读了花心，做起文章，就要打野战。"于此又可见当时风气。我又说："我现在买有部书经体注，自己点看，惟有禹贡水道，真不好懂。"他说道：你当然懂不得，如果要懂得，须看禹贡锥指。"禹贡锥指，是清朝有名的著作，他曾看过，可见也不孤陋。我订古姓女，未过门即死，罗大老师有意把他的女订于我，我五兄很赞成，说他家藏书很多，借此可看些书，不知何故我父不愿意。

罗大老师之弟罗二老师，号德明，学问比他更好，二老师吃鸦片烟，睡在烟盘子侧边，学生背四书五经，错了一字，他都知道。背四书朱注，错了一字，也都知道。（其时考试，四书题，要遵朱注，童生进场，片纸不准夹带，只好都背得。）不但此也，庚寅年，我五兄在他塾中读，夜间讲诗经，点一盏清油灯，命学生照着书，他在暗处坐起讲，口诵朱注，说道："你们看书上，是不是这样?"学生看之，也莫有错，可见他是用过苦功的。壬辰年，我家关老师因病耽搁一个月，我父请罗二老师代教，我们要读八股，他就把昔人作的八股默写一篇出来，熟读了，又默写一篇，试帖诗亦然。其时已五六十岁了，不知他胸中有若干八股，有若干试贴诗。而他弟兄二人，连一名秀才，都莫有取得。二人都是我父的好友，会着即谈书。

我在茂源并共读了两年，甲午年某月，学堂中忽纷传有鬼，某生某生，听见走得响，伙房也看见。建侯老师得知，说道："你们这些娃娃，真是乱说，哪里会有鬼。"因此众人心定，鬼也不见了。年终解馆，前一夕，师徒聚谈，建侯老师说："这个地方，很不清净，硬是有鬼，有一夜，响起来，我还喊，'七爷！你听！'我口虽说无鬼，心中也很怕。"其时我正读《凤洲纲鉴》，心想，符坚以百万之师伐晋，谢安石围棋别墅，坦然若无事者，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，于此深悟矫情镇物之理。后来我出来办事，往往学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。

（编者按：教主写至此处，即不食而升天，故本稿未完。）

我的思想统系

民国元年，我发表厚黑学，受的影响，真是不小，处处遭人疑忌，以致沦落不偶，一事无成，久之又久，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，才与我相忘于无形，但是常常有人问我，发表此文，动机安在？目的安在？是否愤时嫉俗，有意同社会捣乱，抑或意在改良社会，特将黑幕揭穿。我说："我写此文，最初目的，不过开玩笑罢了。"

满清末年，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，与同班友人，张君列五，（名培爵，民国四年，在北平殉义，重庆浮图关，有衣冠墓）加入同盟会，光绪三十三年毕业，列五对我说道："将来我们起事，定要派你带一支兵。"我听了很高兴，就用归纳法，把历史上的英雄（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）一一考察，寻他成功秘诀，久之，无所得，宣统二年，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，（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）一夜卧在监督室，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，恍然大悟，就把厚黑学发明了。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，以供笑乐，友人王君简恒云："你说的道理很不错，但是我要忠告你，你照着你的说法，埋头做去，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，更不可形诸笔墨，否则于你种种不利。"雷君民心也说："厚黑学，是做得说不得的。"后来我不听良言，竟把他发表了。

辛亥年武昌起义，重庆响应，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，成都跟着反正，成渝合并，列五赴省，退居副都督，专管民政，我在自流井家中，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，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，办一报曰：《公论日报》。我住报社内，社中人，叫我写点文章，我想不出什么文章，众人怂恿我，把厚黑学写出，我初时很迟疑，绪初说："你可以写出，我替你作一序。"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，绳趋矩步，简恒民心诸人，俱呼之为"廖大圣人"。我想，圣人都说写得，当然写得。就写出来开玩笑，哪知所生影响，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。

我发表此文，用的笔名，是"独尊"二字，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。以为我会如何如何，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，反成了天地鬼神，临之在上，质之在旁，每想做一事，才一动念，自己想道："像这样做

去，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？”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，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，根源实在于此，厚黑学，真把我误了。

后来我才悟得：厚黑二字，确是成功秘诀，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。用此种技术，以图谋一己之私利，我们名之曰厚，曰黑，用此种技术，以图谋众人之公利，则厚字即成为“忍辱负重”，黑字即成为“刚毅果断”。自古圣贤豪杰，皆忍辱负重者也，皆刚毅果断者也。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，一眼注定众人公利，放手做去，举世非之而不顾，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？无奈悟得时，年已老矣，机会已过矣，回想生平，追悔莫及，只好著书立说，将此秘诀，传之于人，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，写《厚黑丛话》，反反复复，说明此理。我是生性好辩的人，《厚黑学》，是以荀子“性恶说”为立足地，许多人以孟子“性善说”来驳我，我说道，“孟子说：‘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’。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，把他亲生的孩子，抱出来，当众试验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，小孩一见，即伸手来拖，母亲不给他，放在自己口中，露半截在外，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，放在自己口中，请问：这种现象，是否爱亲？小孩坐在母亲怀中，食乳食糕饼，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请问：这种现象，是否敬兄？只要全世寻得出一个小孩，不这样干，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，让孟子的‘性善说’成立，既是全世界小孩，无一不这样干，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。”我口虽这样的说，然而心中也自怀疑，小孩的天性，何以会这样呢？

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，都取来朝日中送，心想：此等现象，岂不等于地心吸力，把外面任何物件，都朝内部吸引一般？因忆在学堂时，教习讲心理学，曾说：“人是莫得心的，心中一切知识，都是从外面来的。例如：看见花，知是香的，是我曾经闻过，看见盐知是咸的，是我曾经尝过，某种事该做，某种事不该做，是我曾听某人说过，抑或在书上见过。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，一一考察其来源，从耳入者，仍从耳退出去，从目入者，仍从目退出去，其他从嗅觉味觉感觉入者，一一从其本来路退出，此心即空无所有了。”又忆圆觉经云：“一切众生，自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妄认四大，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，为自心相。”我从此着想，就觉得心之构成，与地球之构成，完全相同。牛顿说：“地心有引力，能将泥土沙石，有形有体之物，吸集之而成为地球。”我们何妨说：“人心也有引力，能将耳闻目睹，无形无体之物，

吸集之而成为心。”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，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应用到人事上来，果然处处可通。我把孟子的“性善说”，荀子的“性恶说”和宋儒的“去私说”，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，才知人心现象，纯是“万有引力”现象，并无善恶之可言，民国九年，著一文曰：《心理与力学》，载入《宗吾臆谈》内，创一臆说：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，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，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。

人事千变万化，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，一个我，一个人，是为数学上之二元，一个X，一个Y，依解析几何，可得五种线：（1）二直线，（2）圆，（3）抛物线，（4）椭圆，（5）双曲线，人世一切事变，总不出此五种线。我详加考察，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，只有四种，直线两种，曲线两种，除此四线而外，任走何种路线，皆是冲突的，至于世界进化，则为三元，一曰力，二曰空间，三曰时间，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。我们每作一事，须把力线考察清楚，才不至与人冲突，主持国家大政的人，规定法令制度，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，施行起来，才不至处处窒碍。

达尔文倡互竞主义，其弊流于互相冲突，克鲁泡特金，倡互助主义，其弊流于互相倚赖，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，如射箭然，悬一箭垛，支支箭向之射去，彼此不相冲突，而又不相倚赖，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，而无其流弊。达尔文讲进化不错，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，克鲁泡特金，讲互助不错，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，互竞和互助，其力线是横的，成立不起政府，由达尔文之学说，有时亦能成立政府，而其政府，则是极端专制的。国中力线，郁而不伸，断不能永久安定，我们讲合力主义，具力线是纵的，全国有若干人民，即有若干力线，根据力线，直达中央，成一个极强之政府，是为政治上之合力，例如经济也，外交也，亦须取合力主义，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。自有历史以来，皆是人与人相争，其力线是横的，我们应取纵的方向，悬出地球为目的物，合全世界人，向之进攻，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，取出来，全人类平分，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，著者本此主张，曾作一篇：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》，十六年载入《宗吾臆谈》，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，曰：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。二十五年，我写《厚黑丛话》，内面会涉及国际问题。二十六年，定期十一月十二日，召集国民代表大会，制定宪法，我写了一篇：《制宪私议》。从六月二十九日起，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，以

供参考，我打算写一篇：《外交私议》，方着手写，七七事变发生，乃改写一篇：《抗日计划之商榷》，是年九月合刊一册，曰：《制宪与抗日》，这些书现已售罄，此外我还写有《中国民族之特性》，和《从战国说起》等文，在日报上发表，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。我原想写一本：《中国主义》，现已不想再写，兹把各种文字的大意，分经济，政治，国际，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。

（甲）关于经济方面：我们改革经济制度，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，何者应归公有，何者应归私有，划分清楚，公者归之公，私者归之私，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。

第一项，地球生产力：洪荒之世，地球是禽兽公有物，人类出来，把禽兽打败，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。所以地球这个东西，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，根本上不能用金钱买卖，资本家买去，招佃收租，固是侵占公有物，劳动家买去，自行耕种，也是侵占公有物。何以故呢？以川省言之，七七事变以前，请人工作一日，每日工资伙食，至多不过大洋二元，（抗战期中，生活程度高涨，是暂时现象，当以事变前为准）假令我们请工人，在荒山上种树一日，给以大洋二元，他得了报酬，劳力即算消灭，树在山上，听其自然生长，若干年后，出售得价百元，或千元，此多得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，地球为人类公有物，此多得之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即该全人类平摊，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，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，所以说：劳动家买去耕种，也是侵占了公有物。因此之故，全国土地，应一律收归公有，由公家招佃收租，其利归全社会享受，方为合理。

第二项，机器生产力：替人作工一日，得大洋二元，作手工业，每日获利，也不过大洋二元，这算是劳力之报酬，若改用机器，每日可获利百元，或千元，此多得之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，非工人之劳力也，当初发明机器之人，业将发明权抛弃，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，此九十八元，或九百九十八元，即该全人类平摊，旧日归诸厂主所有，是为侵占了公有物，我们应该收归公有，给工人以相当代价，由机器生出之利益，归全社会享受，方为合理，劳力既得代价，即与普通人无异，所以“劳工专政”之说，是不合理。

第三项，脑力和体力：世间之物，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，由身体发出来，有两种力：一曰，脑之思考力，二曰，手足之运动力。这两种

力，即是个人私有物，社会上欲使用之，非出相当代价不可，并且出售与否，各人有完全自主权，不能任意侵犯之。

基于上面之研究，括为二语曰："地球生产力，和机器生产力，是社会公有物，脑力和体力，是个人私有物"。我们持此原则，以改革经济制度，社会与个人，自然相安无事。

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，个人之脑力和体力，可以尽量发展，这层是合理的，而他同时主张：有金钱的人，可购上地以收佃租，可购机器以开工厂，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。

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意，定出一原则曰："金钱可私有，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。"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，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，就成为"共将来不共现在"了，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，土地如此之广，购买之款，从何而出呢？

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，银行由国家设立，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，存之银行，需款者，向银行贷用，其有私相借贷者，法律上不予保障，因借贷而涉讼者，其款没收归公，藏巨款于家，而被劫窃者，贼人捕获时，其款亦予以没收，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，查确后，取消国籍，华侨所在地，设立国家银行，存储华侨之款，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，如此则人民金钱，集中国家银行，可供一切应用。

银行月息多少，依现情为准，兹假定月息一分，以便说明。存入银行，月息一分，贷出为一分半，或二二分，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，缴所得税三分之一，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。

首都设中央银行，各省设省银行，各县设县银行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，川省有场而无村，则设场银行，银行法既确定，即着手收买。

（1）私人银行，一律取消，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，给以月息。

（2）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，火车，矿山，铁道等，一律收归公有，私人股本，存入国家银行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，悉仍其旧，不予变更，只将红息缴归国家，手续是很简单的。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。

（3）全国土地房屋，一律照价收买，例如：某甲有土地一段，月收租银一百元，即定为价值一万元，存入银行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；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，向公家承佃。其有土地自耕，房屋自住者，则公共估价，抑或投标竞佃，以确定其租息，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。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，无一人不是佃户，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，是之

谓："平均地权。"

（4）国际贸易归公，国内贸易归私。出口货，由人民售之公家，转售外国，入口货，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，听其自由销售，不再课税。盖价值之高低，公家操纵在手，取多取少，可适合国家之需要，无须多设机关，多用冗员，向销售者琐琐征取，徒滋中饱营私之弊，而阻商业之发达也，执简驭繁，固应如此。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，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。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，外货以百元购得者，以一百五十元，或二百元，售之人民，即无异值百抽五十，值百抽百。

综计收归国有者，凡土项：（1）银行，（2）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，（3）土地，（4）国际贸易。自学理言之，四地和机器，当然收归国有，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，则本于中山先生"发达国家资本，节制私人资本"之主张。至其他私人资本，应当如何节制，则俟此四者办到后，再酌量而行之。

上面四者，办理完毕后，即可按照全国人口，发给生活费，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，（实施时，除未成年，及老年人外，对于壮年人，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，分别酌发，以防怠工等弊）因为人民既将土地，机器，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之收益，交之国家，国家即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。法国革命，是政治上要求人权，我们改革经济制度，则注重生存权。孙中山先生，把生活程度，分为三级，（1）需要即生存，（2）安适，（3）奢侈。现在的经济制度，人民一遇不幸，即会冻死饿死，是以死字为立足点，进而求生存，进而求安适和奢侈。我们发给生活费，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，进而求安适，求奢侈，中山先生说："生存为社会中心"，人人能生存，重心即算稳定。

旧日贫富悬殊，我们把土地、工厂、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。收归国有，则富者削低一级，全国人民，一律发给生活费，则贫者升高一级，高低二级之间，为人民活动余地。语云："饥寒起盗心"。我们发给生活费，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，衣食足而礼义兴，风俗可日趋醇厚，学问家不忧衣食，可专心深造，事业家无内顾忧，可一意图功。如此则社会文明，必蒸蒸日上。

改革社会，犹如医病，有病之部分，该治疗，无病之部分，不可妄动刀针。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，将土地，机器，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，收归国有，这即是有病之处，加以治疗，其余则悉仍其旧，私人生活，

非有害于社会者，不加干涉。这即是无病之处，不动刀针，如此办去，就与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。

世界富豪，除银行大王摩尔根，其父为富人，承受有遗产外，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、钢铁大王卡匿奇、铁道大王福介舍尔、汽车大王福尔特、商业大王瓦纳迈尔、铜山大王章洛克、砂糖大王斯布累克、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、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，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。我们把上述四者，收归国有，这些大王，就无从出现了，欧美之银行大王，煤油大王等，养成了雄厚之势力，欲推翻之而不能，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，然而业已萌芽了。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，韩非曰："设押非所以备鼠也，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"。订立法令规章者，如果对于鼠则防之惟恐不周，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，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，我们规定：土地，工厂，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，即所以防虎也。

大凡规划国家大计，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，否则施行一二百，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，国家所受牺牲，也就不小了，现在地主之土地，如果不收归国家，而移转佃农手中，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，抑或经营国际贸易，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，负有改革之责者，幸思之！思之！又深思之！

孔子倡大同之说，目光注及数千年后，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走。孔子死后，二千余年，大同尚未出现，其学说之价值，不惟不灭，反益觉其伟大。何也？悬出一个目标，使人望之而走，数千年俱走不到，数千年后之人，俱有路可走。不似达尔文、尼采和斯密士诸人，所创学说，行之数十年，或百余年，即处处碰壁，无路可走，只好彼此打战，规划国家大计，犹如修一大房子，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，按照修之，即说财力不够，可先修某部分，次修某部分，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。

孙中山先生讲"民权主义"曾说："天生万物，除了水平面以外，莫有一物是平的。各人聪明才力，有天赋之不同，……如果把他们压下去，一律要平等，世界便没有进步，人类便要退化。"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主权平等，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点平等，不是从上面压下去，成为平头的平等。我们把此种原则，适用到经济方面，不把平等线，放在平头上，使国中贫富相等，而把平等线，放在立足点，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。欲务农者，向公家承佃土地，欲作工者，向工厂寻觅工作，为官吏，为教员，为商贾，悉任自由，不加限制。因劳动种类之不同。所

得之报酬即不同，或富或贫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。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心，而国家可日益进步。犹之水然，地势高下不平，就滔滔汩汩，奔趋于海，一若平而不流，即成死水。

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，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，利用此种自私心，就可把世间利源，尽量开发出来，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，社会主义创始者，如圣西门诸人，皆谓人有同情心，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。而社会主义之发生，根本原于性善说，故个人主义经济学，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，不外性善说，和性恶说之冲突。我们知道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"。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，即是合善恶而为一。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，即应将个人主义，和社会主义，合而一之，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。

（乙）关于政治方面：我国辛亥革命而后，改为民主共和国，意欲取法欧美，这是一种错误。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，办法很简单，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，打一个颠倒，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。君主专制国，是一个人做皇帝，我们行民主共和制，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，把一个皇帝权，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，每人各执一块，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。

我国从前的皇帝，要想兴革一事，就把他的主张，提交军机处，由军机大臣议决了，就通饬各省，转饬各县，以及乡村照办，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。民主共和国，以乡村议会，为人民的军机处，乡村议员，为人民的军机大臣，川省有场而无村，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，即提交场议会，经场议员议决了，即提交区议会，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，而国会，经国会议决了，即施行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，与君主专制国，恰成一反对形式。

君主专制时代，军机大臣议决之案，须奏请皇帝批准，方能施行。民主共和时代，国会议决之案，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，方能施行。小事由国会议决之，大点的事，由各省议会议决行之，再大的事，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，顶大的事，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。最困难的，是如何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，直接投票，直接发表意见，不致为人操纵舞弊，这就大费研究，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，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，这种麻烦，是无法避免的。

第一要紧的，是整顿户籍，每县分若干场，场之下分若于保，母保

分若干甲，每甲辖十家，投票不分男女老幼，一人有一投票权，一生下地，而取得此权，投票时，以家长为代表，某甲家有十人，某甲一票即算十票，某乙家有八人，某乙一票，即算八票。用联二票，记名投票，甲长亲到各家收票，列榜宣示，某甲家十票可决，某乙家八票否决……榜末合计，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，否决者共若干票，投票之家，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，甲长送之保长，保长又列榜宣示，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，否决者若干票，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，否决者若干票，……榜末合计，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，否决者共若干票，将榜送之区长，由是而县，而省，而中央，层层发榜，最终以多数决定。此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，关于省县市之事，仿此办理。

我国人民，对于国事，向不过问，要他裁决大政，判定可否，他是茫然不解的。所以必须训政，训之者何人呢？在他省为乡村议员，在吾川则为场议员，场议员，一方面为军机大臣，一方面又为太师，太傅，太保。凡是场议员，其知识当然比农民为高，对于国事能明了，每当裁决大政时，就由场议员公开讲演，使众人了解真相，应投可决票，或否决票，由各人自行判断，归家书票，等候甲长来取。以川省习惯言之，每三天赶场一次，乡村农民，无事都要赶场，场上发生一事，顷刻传遍全场，有未赶场者，亦可转相告语。所以施行此种办法，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。议会设立在场上，人民有议案，直接向之提出，有不了解之事，可向议员请问，于人民很便利。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，复决权之实施办法。

选举大总统，由四万万五千万人，直接选举，投票时，也以家长为代表，每票举三人，如投票人意中，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，或二人，则票上只写一人，或二人，例如某甲上写赵一等三人，某甲家有十口，则赵一等，即为各得十票，某乙票上，写钱二等二人，某乙家有八口，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，用联二票，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，即列榜书明：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，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……榜末合计，赵一共若干票，钱二共得若干票……各家持存根，查对无误后，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。保长又列榜宣示：第一甲，赵一得若干票，钱二得若干票……第二甲，孙三得若干票，李四得若干票……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……由保而区，而县，而省，而中央，层层发榜，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，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，大总统任期四年，如中途病故，或经全国人民，总投票撤职，即以副总统代理，以凑满四年为止。第一任

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，以后每满四年，于该月该日，新任大总统，必须就职，旧任大总统，得票最多数，可以连任。

人民欲弹劾大总统者，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，经场议员议决，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，区议会议定，以全区名义，向县议会提出，由是而省议会，而国会，经国会议决，弹劾案成立，送交大总统，令其自行答辩，由国会将弹劾案，及答辩书，加具按语，刊印成册，发布全国，由人民裁决之。对于大总统，或留任，或免职，仍总投票，层层发榜，取决于多数。省长，县长，以至保长，甲长，人民行使选举权，罢免权，亦参酌此法办理。

大总统违法，经人民总投票，正式免职后，可以交付审判，处监禁，处枪毙，都是可以的。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，大总统，在职权内，发出之命令，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，有敢违反者，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。

凡办事当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远处着眼，近处着手，我们一眼看定大同世界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走，我国人民，向来不问政治，然而也有办法。我们规定，中央设中央银行，各省设省银行，各县设县银行，县之下设区银行，区之下设场银行，人民有钱者，应存之本场银行，又规定，人民的土地，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，欲使用土地者，向本场场长投佃。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，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。场银行行长，由政府委任，副行长和场长，由人民投票选充，不称职者，投票撤换，则选举权，罢免权，人民自能行使了。银行办法大纲，和收买土地，承佃土地办法大纲，由政府规定，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，有不合处，共同修改，则创制权，复决权，人民田自能行使了。人民行使四权，以本场为见习之地。有旧式县长，监督其上，自不至发生流弊，即生流弊，亦易救正。

每年应纳租税，总数若干，责成场长缴纳，其整理土地，所得赢余，归各场公用。各场办好了，联而为区，土地收归全区公有。土地余利，归全区公用，区银行副行长，和区长，由全区人民公举，再进则联而为县，土地归全县公有，土地余利，归全县公用，县银行副行长，和县长，由全县人民公举。由是而省，而全国，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，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，则中华民国之宪法，即告完成。倘能再进而将土地，收归世界公有，全世界之大总统，由全世界人民公举，则世界大同矣。

银行，工厂，和国际贸易，收归国有，尚属容易，惟乡土地，纠葛万端，故第一步，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，本地人熟悉情形，容易处理，

政府握定大纲，自会厘然就绪，只要各村各场办好，则基础稳固，以下自迎刃而解。

民主共和国，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，君主时代，知县有司法权，我们即当以司法权界之县长，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，为司法官，司法官对县长负责，县长对人民负责，审判不公，人民弹劾县长，撤换县长就是了。昔日衙门黑暗，人所尽知，今之司法机关，也易受人蒙蔽，往往事之真相，本地人士，昭然共见，而法庭调查之结果，适得其反，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，加之场长和区长，人民有争执事件，诉诸场长，场长调查明白，予以调解，如不服诉诸区长，场长应将调查所得，及调解经过情形，备文送之区，再调查，再调解，如不服，诉诸县长，区长备文送之县，如仍不服，诉诸省，诉诸中央。场长区长，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，县以上，则以国家法律解决之。

人民对于任何机关，如有疑点，都可自请往查，假如：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，或中央银行，疑其有弊，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，该局或该行，有某点可疑，我要亲往彻查，场议会询明议决，即向区议会提议，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，区议会开会议决，即向县议会提出，由县而省议会，而国会，国会开会议决后，即行知该局或该行，听候彻查，某甲查出有弊，即依法提出弹劾案。如无弊，即中央报纸声明，我所疑者某点，今日查明无弊，倘不提弹劾案，又不声明无弊，则某甲应受处分。倘某甲声明无弊，嗣经某乙查出有弊，则某甲亦应受处分，其他省县市所辖机关及工厂等，仿此行之。

现在民主主义，和独裁主义，两大潮流，互相冲突，孙中山先生讲“民权主义”，曾说：“美国制宪之初，主张地方分权者，认为人性是善的，主张中央集权者，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。”故知民主主义，和独裁主义之冲突，仍是性善性恶问题之冲突。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，无善无恶，所以我们制定宪法，应当将地方分权，和中央集权，合而一之，上述的办法，如能一一办到，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，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，直达中央，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，大总统在职权内，发出的命令，人民当绝对服从，俨然专制国的皇帝，是为独裁主义，大总统去留之权、操诸人民之手，国家兴革事项，由人民议决，是为民主主义，如此则两大潮流，即合而为一。

中山先生曾说：“政治里头，有两个力量，一个是自由的力量，一

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，好似物理学里头，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。”又说：“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，这两个力量，是主张双方平衡，不要各走极端，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，互相保持平衡一样。”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，运用到政治上，是一种新发明。物理上，离心力，向心力，二者互相为用，故政治上，也是放任与干涉，二者互相为用。从前欧洲国家，对于工商业，行干涉主义，以致百业凋敝，斯密士起而著《原富》一书，力持放任主义，欧人行其说，骤致富强，无如放任太过，酿成资本家之专横，社会上扰攘不安。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，把土地，工厂，银行，和国际贸易，一律收归国有，强制行之，此所谓专制也。私人生活，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，一切放任，非有害于社会者，不加干涉，此所谓自由也。两力平衡，自然安定。

黄老是放任主义，申韩是干涉主义，二者皆是医国良药，用之得当，立可起死回生，嬴秦苛虐，民不聊生，汉承其后，治之以黄老，刘漳暗弱，刑政废弛，孔明承其后，治之以申、韩，因病下药，皆生了大效。我国今日，病情复杂，嬴秦之病，是害得有的，刘津之病是害得有的，又兼之人心险诈，道德沦亡。应当黄、老、申、韩、孔、孟，三者同时并进。以申、韩之法，治贪官污吏，悍将骄兵，奸商贵族。以黄老之道，治老百姓，而正人心，厚风俗，孔孟之书，更不可少。果如此，则中国之病，自霍然而愈。

（丙）关于国际方面：现在的五洲万国，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，古之春秋战国，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。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，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，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，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，是如何解决。

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，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成汤时三千国，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，春秋时二百四十国，战国时七国，到秦始皇时，天下就一统了。历时越久，国数越少，国之面积越大，这即是螺旋式进化。“竖的方面越深，横的方面越宽”，竖的方面者，时间也，横的方面者，空间也，照这样趋势看去，现在的五洲万国，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，所异者，古时是君主时代，嬴秦混合为一，是一个人做皇帝，将来五洲万国，混合为一，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，而为大同之世界。

目下世界大战，一般人很抱悲观，殊不知：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。如：数个泥丸，放在盘中，不相接触，永久是个个独立。我们取而

挤之捏之，就成为一个大泥丸。战国七雄，竞争剧烈，此挤之捏之也，跟着嬴秦之统一出现，今之五洲万国，竞争剧烈，亦所谓挤之捏之也。我们看清此种趋势，顺而应之，才不至为螺旋进化中的牺牲品。

将来地球这个东西，一定是收归全人类公有的，一定是全球十八万万人，共同做皇帝的。我们顺应此种趋势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的走去。土地一层，始而收归一场一区公有，继而收归一县一省公有，终而收归全国公有。对于政治一层，所有创制，复决，选举，罢免四权，始而行使于本场本区，继而行之于本县本省，终而行使于中央，公举一个大总统。我国的宪政，即算完成。我们办到这步，再看国际十八万万人，公举一个大总统，世界就大同了。世界趋势，显然如此，彼希特勒也，墨索里尼也，日本军阀也，不过昙花一现，终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而已，犹江河之奔流入海，而欲以人力障塞之，无非多杀人畜，多毁田庐禾稼，而其奔流入海，则依然如故也。

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，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，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，何者不适合，兹讨论如下：

世界文化，分三大区，一印度，二西洋，三中国。印度地偏热带，西洋地偏寒带，中国则介居温带，三方气候不同，民族性不同，因而产出之主义，亦遂不同。温带折衷寒热二带之偏，故中国主义，能够折衷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。

寒带天然物少，人不刻苦，不能生活，故时时思征服自然，因而产出侵略主义；热带天然物丰富，生活之需，不虞不足，故放任自然，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。请问：我国产出的，是何种主义？要答复这个问题，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，是何种态度？《易》曰：“裁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”。所谓天地之道，天地之宜，皆自然也。对于自然，不征服之而辅相之，不放任之而制裁之，因而产生之主义，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，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。此由中国古人，生居温带，仰观俯察，创出学说，适应环境，不知不觉，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。其他民族，亦有生居温带者，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，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，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。

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，是抵抗而不侵略，尽人皆知，老子言无为，孔子言仁义，当然不侵略，而两家之书，皆屡屡言兵。老子曰：“抗兵相加，哀者胜矣。”孔子曰：“我战则克。”所谓克也，胜也，皆抵抗之谓也。

战国时，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，杨之言曰：“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。”此抵抗之说也：又曰：“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”此不侵略之说也。墨子非攻，当然不侵略，同时墨子善守，公输九攻之，墨子九御之，公输之攻已穷，墨子之守有余，则又富于抵抗力。二人的主张，都是抵抗而不侵略，不过宣传主义时，杨子为我，偏重在抵抗，墨子兼爱，偏重在不侵略罢了。战国纷乱情形，与现在绝似，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，一般学者研究，觉得合了杨朱主张，别无办法，所以“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”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，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，别无办法。

孟子曰：“善战者服上刑。”而孔子则曰：“我战则克”。正是所谓善战者，这两说岂不冲突吗？只要知道中国主义，是抵抗而不侵略，自然就不冲突了。孔子尝说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他说“我战则克”，是就抵抗方面言之。孟子把那些“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”的人，痛恨到极点，他说：“善战者服上刑”。是就侵略方面言之。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孟子曰：“善战者服上刑”。等于说：“日本军阀，一律该枪毙。”孔子曰：“我战则克”，等于说：“抗战必胜”。

中国崇奉儒教，儒教创始者为孔子，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，孔子学术，本与管仲不同，因其能尊周攘夷，遂称之曰：“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又称之曰：“民到于今受其赐”。推崇备至，何也？为其能抵抗也。南宋有金人之祸，隆兴元年，朱子初见孝宗，即言：“金人与我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当立即断绝和议”。这些地方，都是儒教精神所在。

中国主义，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，养成一种民族性，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，无不合乎此种主义。例如：秦皇汉武开边，历史家群焉非之，为其侵略也，汉弃珠崖，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，为其不侵略也；秦桧议和，成为千古罪人，为其不抵抗也；岳飞受万人崇拜，为其能抵抗也。唐人诗云“年年战骨埋荒外，空见葡萄入汉家”。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；又云：“边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开边犹未已”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，至云“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。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，及至受人侵略，则又变成力主用武，南宋有金人之祸，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：“出师一表千载无，远比管乐盖有余。世上俗儒宁辨此，高堂当日读何书。”直是斥南宋诸儒，只讲理学，不谋恢复。临

死示儿云："五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"。中国诗人，这类作品很多，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，要从哲学家、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，才考察得出来，至于政治舞台的人，时或发生变例，秦皇汉武之侵略，秦桧之不抵抗，皆变例也。

西洋人性刚，印度人性柔，中国古人，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，易经一书，以内刚外柔为美德，泰卦内阳而外阴，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，谦卦山在地下。既济水在火上，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。孔、老为中国两大教主，老子被褐怀玉，孔子衣锦尚䌹，皆深合易旨。老子和光同尘，而曰："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冗。"孔子恂恂如也，而曰："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"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。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，养成一种民族性，故中国人态度温和，谦让有礼，此外柔之表现也。一旦义之所在，奋不顾身，此内刚之表现也。惟其外柔也，故九、一八以来节节退让，若无抵抗能力，惟其内刚也，故卢沟桥事变而后，全国抗战，再接再厉，为世界各国所震惊。我国民族性，既已如此，所以丑胡也，辽金也，蒙古也，满清也，虽肆其暴力，侵入我国，终而无一不被驱出，故我国对日抗战，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。

西人倡天演竞争之说，知有己不知有人，盖纯乎利己主义也。印度教徒，舍身救世，知有人不知有己，盖纯乎利人主义也。中国主义则不然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盖人己两利也。印度学者，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，其目光未免太大，看出世界以外去了，而其国因以灭亡。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，讲个人主义者，看不见国家和社会，于是乎个人也，国家也，社会也，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，因而生出种种纠纷。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以贯之，个人也，国家也，社会也，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。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论。这种主义，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。

印度实行其主义，而至于亡国，西洋实行其主义，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事实之昭著，既已如此，而今只有返求之中国主义，中国主义者，大同主义也。我们应将这种主义，在国际上，尽量宣传，使世界各国，一齐走入中国主义，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，而谋永久之和平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纯是"武力战争"。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，曰："心理战争"。三国时，马谡曰："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"这是"心理战争"学说之起点，而其原理，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。孟子一书，纯是讲"心

理战争”。其言曰：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，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如此之语，不一而足，皆心理战争之说也。曰：“可使制挺，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。”以秦楚之甲坚兵利，而日制挺可挞，岂非怪话？而孟子深信不疑，决然言之，果也，孟子死后，不及百年，陈涉吴广，揭竿而起，立把强秦推倒，孟子的说法，居然实现，嬴秦之兵力，惟灭六国而有余，陈涉等乌合之众，振臂一呼，而一统之江山，遂土崩瓦解，不败于武力，而败于心理，孟子有知，当亦掀髯大笑。

春秋时，兵争不已，遂产出孙子的“兵战哲学”。战国七雄，运用孙子学说，登峰造极，斗力斗智，二者俱穷，于是又产出孟子的“心战哲学”。惜乎，当时无人用之，现今的形势，绝像战国七雄时代，我们正该运用“心战”之说。问：如何运用？曰：只须把中国主义，发扬出来就是了。暴秦亡国条件，德意日三国，是具备了的，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，同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中国主义，一发扬出来，一定倾心悦服，就成了“心战”妙用。

我国业已全面抗战，应当于“武力战争”之外，再发动一个“心理战争”。在国际上，成立一个“中国主义研究会”，请世界学者，悉心研究，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，敌人“攻城”，我们“攻心”，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，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，敌人国内之人民，倾心此种主义，是为内部溃变。日本军阀，自然倒毙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，也自然倒毙。

凡是一种大战争，必有一定的主义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应该把他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。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，世界大同之基础，就算确定了。十九世纪，上半世纪，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，下半世纪以后，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，就进化趋势观之，盖决然无疑者。

现在五洲万国，纷纷大乱，一般人都说：“非世界统一，不能太平”。战国情形，也是如此。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：“天下恶乎定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定于一”。即是说：“要统一才能安定”。但统一之方式有二。梁襄王问孟子：“孰能一之？”孟子曰：“不嗜杀人者一之”。这就是“非武力的统一”。主张“武力统一”者，是用一个“杀”字来统一，说道：“你不服从我，我要杀死你。”人人怕死，不得不服从，故“杀”字能统一。主张“非武力的统一”者，是用一个“生”字来统一，说

道："你信从我的主张，你就有生路。"人人贪生，自然信从，故"生"字也能统一。人之天性，喜生而恶杀，主张"杀"字统一者，人人厌弃，主张"生"字统一者，人人欢迎，孟子学说，惜乎无人用之。后来赢秦统一，是用"杀"字统一的，然而不久即亡。今者德意日三国，正循着亡秦途径走去，我们正好运用"生"字统一之学理，乘其弱点而推陷之，兵战心战，同时并进，德意日三国，不败何待？

中西主义，极端相反，西洋方面，达尔文之弱肉强食，尼采之超人主义，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等，都是建筑在"杀"字上面，中国方面，孔子言仁，老子言慈，杨朱为我，墨翟兼爱等等，都是建筑在"生"字上面。我们读达尔文，尼采诸人之书，满腔是杀机，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，满腔是生趣。医生用药，相反才能相胜，方今西洋主义盛行，无处不是杀机，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，以一个生字，统一世界。

西人对社会，对国家，以"我"字为起点，即是以"身"字为起点，中国儒家，讲治国平天下，从正心诚意做起走，即是以"心"字为起点，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，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，即叫他从事运动，把身体培养好，中国儒者，见人闲居无事，即叫他读书穷理，把心地培养好，西洋人著书作事，注重"于身有益"四字，中国人著书作事，注重"问心有愧"四字，达尔文讲竞争，倡言"弱肉强食"，尼采讲超人主义，倡言："剿灭弱者，为强者天职"。西人群起信从，为其"于身有益"也，中国绝无此等学说出现，为其"问心无愧"也。西人在物质上求愉快，中国则在精神上求愉快，西人以入剧场跳一场为乐，中国则以读书为乐，为善为乐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为乐，故中国文化，询足救西洋末流之弊。

孔子的学说，"欲修其身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，先诚其意。"从身字追进二层，把"意"字寻出，以"诚意"为起点。犹之修房子，把地面浮泥除去，寻着石底，才从事建筑，由是而修身，而齐家，而治国平天下，造成的社会，是"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"。人我之间，无所谓冲突。西人学说，以利己为主，以身字为起点，不寻石底，径从地间建筑，造成的房子，终归倒塌。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，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西洋主义，遂告破产。

孟子曰："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"。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，孟子复生，亦不能否认，但孟子学说，一达到生存点，即截然而止，其

言曰："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"。人民到了不饥不寒，即教以礼让，推行王道。达尔文盛言"优胜劣败"，超出生存点以上，成为无界域之竞争，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，以供一己之欲壑。尼采学说，继之而起，几不知公理为何物。德国威廉第二和希特勒，从而信之，墨索里尼，和日本少壮军人，又从而信之。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了也。

孟子曰："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"由此知：中国主义，有两个原则：（1）人人争生存，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；（2）人人争优胜，以不违背公理为限。我们把此种主义，发扬出来，全世界恍然觉悟，知道：舍了中国主义，别无出路，此即"攻心"之法也。

中国主义，沉埋已久，应当聚全国学者，尽量开掘之，整理之，去其不合现情者，撷其精华，成为系统，在国际上尽量宣传。从前中山先生革命，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，只因主义完善，宣传得力，遂不血刃而成功，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。

世界纷纷大乱者，病根有三：（甲）经济方面。（乙）政治方面，民主主义，和独裁主义，互相冲突。（丙）国际方面，掠夺者和被掠夺者，互相冲突。我们一面抗战，一面制定宪法。宪法内容：（甲）经济方面，国中的土地，工厂，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，一律收归国有，其他经济上之组织，悉仍其私。（乙）政治方面，四万万五千万人，直接行使四权，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，直达中央，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，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，融合为一。（丙）国际贸易，收归国家经营，入口出口，两相平衡，入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，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，今定为出入平衡，无掠夺者，亦无被掠夺者，国与国即相安无事。宪法制成，一面实行，一面昭示万国，世界人士，正寻不着出路，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，一定跟着走来，希特勒，墨索里尼，和日本军阀，三个恶魔，不打自倒，这即是心理之战胜。

孙中山先生，分出军政，训政，宪政三个时期。现在国难严重，三者当同时并进，对日全面抗战，是为军政。在抗战期中，制定宪法，从一村一场，实行起走，是为宪政，村议员，场议员，负训练人民之责，是为训政。一村一场办好了，扩大为区，再扩大为县，为省，为国，迨及扩大为国，宪政即算完成，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，就算大同了。

国际战争有三种：（1）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。（2）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。（3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。上次大战，属于第

一种，这次大战，属乎第一种和第二种。另外还有第三种，隐藏着跃跃欲动。若不将这三种问题，同时解决，恐怕第二次大战终了后，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大战。“威尔逊于上次大战之末，提出“民族自决”之主张。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，可惜未能实现。巴黎和会，特订一个“劳工规约”，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，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，可惜不彻底。

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，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，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，军阀对平民不平等。孙中山先生曾说：“我们今日，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，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。”我们本三民主义，制出一部宪法，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，而本国的人民，在经济上，在政治上，立足点也平等，这三种不平等之事，就算打平了。我们把这部宪法，宣布出来，即成了我国的“抗战宣言”，也即是预定的“战后和约”。倘若世界各国，也走上这条路，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，即彻底拔除。

有了春秋那种形势，管仲“九合诸侯”的政策，应运而生，有了战国那种形势，苏秦“联合六国”的政策，又应运而生。此二者皆“合力主义”也。管仲揭出“尊周攘夷”的旗帜，把全国之力线，集中一尊周”之一点，然后向四面打出，伐狄，伐山戎，伐楚，齐桓公遂独霸中原。后来晋文称霸，亦沿袭其策，连孔子修春秋，也秉承“尊周攘夷”之主旨。他这个政策，直贯穿了春秋全部。

到了战国，情形变了，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，“尊周”二字说不上，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，此时更不能说“攘夷”的话，于是苏秦引锥刺股，揣摹期年，从学理上研究出“合纵”之策，齐楚燕赵韩魏六国，发出六根力线，取纵的方向，向强秦攻打，此种政策，一经告成，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。战国策曰：“当此之时，天下之人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决于苏秦之策。”又曰：“廷说诸侯之王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抗”。战国时百家争鸣，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，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时，岂是莫得真理吗？无奈他莫得事业心，当了纵约长，可以骄傲父母妻嫂，就志得意满，不复努力，以致未克成功。有了苏秦之“合纵”，才生出张仪之“连横”，连横成功，而六国遂灭，可以说：苏秦的政策，贯穿一部战国策。苏秦的政事，可分两部分看，自引锥刺股，至当纵约长，是学理上之成功，当纵约长以后，是实行上之失败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，也说苏秦的政策，是很好的，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。三国时，鲁肃和孔明，主张孙刘联合，原是抄写苏秦的古

本，曹操是千古奸雄，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，二人实行联合了，正在写字，手中之笔，都吓落了。这个政策之厉害，可想而知。

现在五洲万国，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，故威尔逊的“国际联盟”，也就应运而生。他是老教授出身，也是学理上成功，实行上失败，他的十四条原则，一宣布出来备受世界欢迎，绝像苏秦之受欢迎一般。无奈他在巴黎和会，欠了外交手腕，成立的国际联盟，反成了分赃的团体。其最大原因，则由于美国之立场，根本与弱小民族相反。威尔逊“民族自决”之主张，不能实现，理固然也。我们熟察国际形势，仍非走管仲，苏秦和威尔逊，这条路线不可，应由我国出来，发起“新的国际联盟”，以弱小民族为主体，进而与强国联合，把威尔逊的原则，修正之，扩大之，喊出“人类平等”的口号，以替代“民族自决”四字，这样一来，决定成功。何也？我国立场与弱小民族相同故也？有孔、老以来，绝好的主义，有汉弃珠崖，这类绝好的事实，为世界各国所深信故也。

世界纷争之际，必有一个重心，才能稳定，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。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处，应当（1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“中国主义研究会”为宣传机关。（2）发起“新的国际联盟”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，喊出“人类平等”的口号，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，和被压迫的劳工与平民，一齐唤醒起来，与我们同立在一根战线上，如此，则我国就为世界重心了。孟子谓：“制挺可挞秦楚。”盖纯乎“心理战争”也，我国今日，则“武力战争”与“心理战争”同时并进，无异于以武力推行中国主义，则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，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，亦决然无疑。

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伐狄，伐山戎，是用武力解决，召陵之役，是用政治解决。我们把“新的国际联盟”组织好，德、意、日三国，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，则用政治解决。否则师法苏秦故智，率全人类向之攻打，暴秦亡国条件，德、意、日三国，是具备了的，不败何待？

世界祸机四伏，念之不寒而栗，上次大战，一告结束，而战胜国之劳工，反暴动起来。法国首相，克利满梭，绰号“母老虎”，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，巴黎和会，充当主席，为法国增光不少，反遭国人行刺，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。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，带起徽章，横行都市。专制魔王，墨索里尼，乘机出现。美国人民要暴动，威尔逊调兵弹压，方才平息。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，船上水手，结成三角同盟，布起阵势，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，害得英国首相，鲁意乔治，驾着飞

机，今日回伦敦弹压，明日赴巴黎开会，一夕数惊，疲于奔命。其原因，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，一般劳工，都觉悟起来，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，一方面举出代表，在中立国交换意见，主张言和，及到战事终了，劳工觉得白白牺牲，所以处处发生暴动。巴黎和会，正在开会，而各国的劳工，也举代表，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。巴黎和会，见此情形，才订一个“劳工规约”列入和约，与自己国中之劳工言和。上次大战，情形如此，此次大战，可想而知。上次威尔逊提出“民族自决”之主张，巴黎和会，列强食言，弱小民族之心理，则又不言可知。此种祸根，若不彻底拔除，战争是永无终止的。要拔除此祸根，舍了中国主义，别无他法，除了中国出来，肩此责任，也别无他人。

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，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，其所以进化迟滞，大同久未出现者，可用比喻说明之：凡铁条皆有磁气，只因内部分子凌乱，南极北极相消，故磁力发不出来。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，引导一下，南北极排顺，立即发出磁力，现在全世界分子，凌乱极矣。我们用中国主张，引导一下，分子立即排顺，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，而大同可早日出现。

地球为万宝之库，我们需要财货，向之劫取，他是绝不抵抗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乃是一伙劫贼，在主人门外，你剥我的衣服，我抢你的器械，互相厮杀，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，地球有知，当亦大笑不止。请问是谁之罪？曰：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。

凡事以“平”为本。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，纯是建筑在一个“平”字上面，这个“平”字，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“平”字生出来的。民族主义，民权主义，是向人类争平等，一到“平”字，即截然而止，转其目标，向地球劫取实物，所以民生主义，言开垦，言种植，与夫水力发电等等，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，故三民主义一书，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，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，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。

“新的国际联盟”者，大同世界之过渡机关也。世界纷纷扰扰，是由地球生产力，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，不相调协生出来的。我们组织“新的国际联盟”，把这四种力线，一一排顺；历若干年，调整完毕，然后破除国界，把土地和机器，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，技师出脑力，工人出体力，把地球蕴藏的宝物，取出来，全人类平分，像这样办去，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，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，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，人与人战争之祸，永远消除。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

义，于是完成。

以上经济，政治，国际三者，俱以合力主义为本。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：（1）考试制之商榷；（2）中国学术之趋势。其大意如下：

我以为国家立法，须把力线考察清楚，把离心力，向心力，配置平衡，我国从前考试时代，士子读书与否，听其自由，这是一种离心力，考试及格，有种种荣誉和利益，足以动人敬羡，又具有向心力，两力平衡，故其时，国家并未规定学课，读书之子，也不须有人监督，他自己会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用功。这就像地球绕日，离心向力，二力平衡，不须外力推动，自能回旋不已。则校中学课，严密规定，又派教职员严密监视，而学子之用功，未见胜过科举时代，且流弊百出，这就是离心力，向心力，配置不平之故，今之一切制度，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，故规章愈密，监察愈严，而流弊反越多，言之慨然。

照现行学制之规定，欲取得毕业资格者，必须捐弃百事，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，历若干年，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。于是贫家子弟，在所摈弃，富家子弟，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，亦在所摈弃。国家施行此种制度，四十年矣，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，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，设一个考试制，把考试标准，明白规定，等于悬出一个箭垛，使人向之而射一样，每届小学，中学，及大学，举行毕业考试时，在校生，私塾生，自修生，一体与试，不问学年，不问年龄，只问程度，严格考试，只要及格，即给予毕业文凭。并于各地适中场所，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，理化试验室，延聘导师，常住其中，俾自修生，有所请问。如此办去，则贫民子弟，工商界学徒，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，只要自家肯用功，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，半工作，半自修，而各人之能力，可尽量发展，国家文化，可日益进步。中山先生讲“民权主义”，曾说：“各人聪明才力，有天赋之不同，如把他们压下去，一律要平等，世界便莫有进步，人类便要退化”。现在学校内，把天才生，劣等生，混而为一，同样授课，同时毕业，压为平头的平等，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诫条，足使国家退化。因此主张：现行学制，应彻底改革，统以考试制汇其归，曾写了一本《考试制之商榷》。我写此文，有一段趣事，是被木棒痛打一顿，才写出来的，不妨把原委写出来，用博一粲。

我从民国五年起，即当四川省视学（现改名省督学），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，我即把我的主张，提为议案，俱未通过。民国十二年，我

上一呈文胪陈理由十六项，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，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，十三年，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，各县遂次第举行。十四年年假时，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，我往主试，考了几场，一夜，学生多人，手持木棒哑铃，把我拖出寝室，痛打一顿，其时全场静静悄悄，学生寂无一语，我也默不一语，惟闻乒乒乓乓之声，学生临去骂道："你这狗东西，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?"我睡在地下想道："只要打不死，又来!"跟即请宜宾知事来验伤，伤单粘卷，木棒哑铃存案备查。次晨，我电呈上峰，末云："自经此次风潮，愈见考试之必要。视学身受重伤，死生莫卜，如或不起，尚望厉行考试，挽此颓风，生平主张，倘获见诸实行，身在九泉，亦当引为大幸。（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，第一卷，第一期，）我稍愈，即裹伤上堂，勒令学生一律就试，不许一个借故不到，场规更加严厉，试毕将首要学生，送交宜宾知事讯办，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，兹不具述。事后，我自咎欠了宣传，特写一文《考试制之商榷》，呈由四川教育厅，印作单行本，发交各县研究。

民国十四年，川省颁布"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"。规定：小学会考，于年暑假举行，不分学校与私塾，一体与试，中学修业年满，委员到校主试。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，故先举行小学会考，俟小学有了成效，再开放中学。二十三年，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，取消小学会考制，成都，华阳，……理番，松潘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，以"会考制度，行已数年，成效显著"等语，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，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，奉指令"始准试行一年"。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。谓："川省小学会考，有悠久之历史，著有成效。"陈列理由五项，请予保留，复文"姑准再办一年"。二十五年全川各县，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。

我主张的考试制，有两种意义：（1）学校内部的学课，太不认真，用考试制以救正之；（2）现行的学制，太把人拘束紧了，用考试制以解放之。现行的会考制，有前一种意义，后一种则无之，二十五年九月，我将所著《考试制之商榷》，重行印出，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，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，省公署先后令文，成华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的呈文，暨教育处。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，附载于后，成为一本，交成渝书店发售，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。

现在既厉行会考制，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："举行会考时，私塾生和自修生，一律与考，不问年龄，只问程度。"只要有此种法令出

现，现行学制，就算彻底改革了。

我写那篇《考试制之商榷》，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。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，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、遂有百计营谋者，同时有许多学生，求人学校而不可得，每次招考，异常拥挤，录取者少，摈弃者多，并且招考时，关说之信函，纷来沓至，校长深以为苦。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，闹得来读书须钻营，教书须钻营，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。从前地方官，对书院山长用聘，待之以师礼，京朝大官回籍者，往往乐就斯席，为地方造人才，盖师位甚尊故也。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，校长对之用呈，学校变成官厅，教员附庸，师道凌夷，一至于此。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，与正式学校，并行不悖，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。东主聘我否，我设馆有人来学否，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，而风俗可日趋醇厚。

现在全面抗战，秀杰之士，或赴前方军营，或在后方工作，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，将来战事终了，机关裁撤，此项人才，消归何处？上次欧战终了，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，戴着徽章，莫得面包吃，处处暴动，墨索里尼，乘机组织棒喝团，因之窃得政权。此可为前车之鉴。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。允许私塾之成立，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和裁撤之人员，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，富厚之家，暴其声望，自必厚具修脯，延请训课子弟，抑或自行设馆授徒，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。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，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。一面可消除隐患，一面可以培植人才，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。我们何苦而不为？

至于我写的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，大旨言：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，第一是周秦诸子，第二是赵宋诸儒，这两个时期的学术，都有创造性，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，而加以研究，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，而加以研究，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，而加以研究，俱缺乏创造性。

从周秦至今，可划为三个时期：周秦诸子，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，赵宋诸儒，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，融合时期。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，世界大通，天涯比邻，中国，印度，西洋，三方面学术，相推相荡，依天然的趋势看去，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，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。进化是有轨道可循的，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，出以某种

方式，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，当出以某种方式。我们用鸟瞰法，升在空中，如看河流入海，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。

周秦诸子中，当推老子为代表，孔子不足以代表，一部道德经，包含世间法和出世法两部分，他说："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"，是世间法，孔墨申韩孙吴诸人，是走的这条路。他说："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"是出世法，庄列关尹诸人，是走的这条路。他是入世出世，打成一片，我们提出老子，就可贯通周秦诸子全部学说。

赵宋诸儒中，当推程明道为代表，朱子不足以代表。明道把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，融合为一，成为所谓宋学，明道死后，才分出程（伊川）朱和陆王两派，故提出明道，就可贯通全部宋学。明道以释氏之法治心，以孔氏之法治世，治心治世，打成一片，恰走入老子途径。近人章太炎曰："大程远于释氏，而偏迩于老聃。"故中国学术，彻始彻终，可以老子贯通之。

世人以佛老并称，则老子学说，又可贯通印度学术。严又陵批老子，于第十章曰："黄老之道，民主之国之所用也。"于三十七章曰："此旨与卢棱正同。"于四十六章曰："纯是民主主义，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，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。"足知老子学说，又可贯通西洋学术，我不是说：我国有了老子，就可不去学西洋学问，我是说：西洋学问，与老子相通，我们可以尽量去学。

我们从周秦诸子中，把老子提出来，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，沟通为一。有人说：著《道德经》的老子，是战国时人，不是春秋时人，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，生在战国时，我只是说：一部《道德经》，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。知其可以贯通，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。

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，应用到人事上来，而老子则早已用之，他书中屡以水为喻，水之为物，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。牛顿所说"万有引力"的现象，老子早已见之，其言曰："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天无以清将恐裂，地无以宁将恐发，神无以灵将恐歇，谷无以盈将恐竭，万物无以生将恐灭，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。"裂发歇竭灭蹶六字，俱是"万有引力"那个"引"字的反面字，也即是离心力那个"离"字的代名词，老子看此等现象，不知其为何物，因以"一"字代之，古代算

术，凡遇未知数，皆以“一”字代之，老子言道亦然。其所谓“一”，即牛顿所谓“引力”也。

自然界以同一原则，生人生物，牛顿寻出这个原则，用之物理上，老子寻出这样原则，用之人事上。西人谈力学，谈电学，必正负二者对举，老子言道，常用有无，高下，阴阳，静躁，贵贱，刚柔等字，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对举。牛顿之后，有爱因斯坦，老子之后，有庄子，庄子的学说，含有相对论原理，如“泰山为小，秋毫为大；彭祖为夭，殇于为寿”一类话，都是就空间上，时间上，相对而言之。我们会通观之，即可把人事与物理，沟通为一。

牛顿发明万有引力，定出公例，纷繁之物理，厘然就绪，而科学遂大进步。牛顿的原理，老子早已发明，惜乎沉埋已久，我们把他发掘出来，制成公例，纷繁之人事，一定厘然就绪，而文明必大进步。

从前印度学说，传入我国，我国尽量采用，修正之，发挥之，所有“华严宗”，“天台宗”，“净土宗”等，一一中国化，非复印度之旧，故深得一般人欢迎，就中最盛者推禅宗，而此宗在印度，几等于无。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，仍用采用印度学说方法，使达尔文，斯密士诸人，一一中国化，如用药之有炮炙法，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，单留有益这一部分。达尔文讲进化不错，错在倡言弱内强食，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，错在发达个性，而妨害社会，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。

孔门学说，是诚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，一以贯之。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，传入中国，与固有学说，发生冲突，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，与之沟通为一。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，国家主义传入中国，又与固有学说，发生冲突，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，与之沟通为一，始而沟通，终而融合。如此则学说不至纷歧，而人事之纷争可免。融合之后，再分头研究，如一株树然，知道枝叶花果，同在一树上，即无所谓冲突了。

宇宙事物，原是孳生不已的，由最初之一个，孳生无数个，越孳生，越纷繁。自其相同之点观之，无在其不同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，无在其不异，古今讲学的人，尽管分门别户，互相排斥，其实越讲越相合，即如宋儒排斥佛学，他们的学说中，含有禅理，任何人都不能否认，孟子排斥告子，王阳明是孟子信徒，他说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。”其语又绝类告子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因为宇宙真理，同出一源，只

要能够深求，就会同归于一，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。从他相异之点看去，草与木不同，同是一木，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，用显微镜看去，无一朵相同之花，无一片相同之叶，可说是不同之极了。我们倘能会观其通，从他相同之点看去，则花花相同，叶叶相同，花与叶相同，此木与彼木相同，再精而察之，草木禽兽，泥土沙石，由分子，而原子，而电子，也就无所谓不同了。世间的学说，由同而异，由异而同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，可分为数支，来源不同之水，可汇为一流，千派万别，无不同归于海。

中国人研究学问，往往能见其全体，而不能见其细微，古时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，总括全体而言，好像远远望见一山，于山之全体，是看见了的，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，就说得依稀恍惚了。西人分科研究，把山上之一草一木，看得非常清楚，至于山之全体，却不十分了然，中国重在综合，西洋重在分析，二者融合为一，就可得真理之全了。

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，冲突不已，我们穷源竟委的考察，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。性善说与性恶说，是互相反对的，个人主义经济学，和社会主义经济学，是互相反对的，民主主义，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。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，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，从未折衷一是，思想是既不一致，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，冲突之事，就在所不免了。真理只有一个，犹如大山一般，东西南北看去，形状不同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，所说山之形状，就各不相同。我们研究事理，如果寻出本源，任是互相反对之说，俱可折衷为一。我们可定一原则曰：“凡此互相反对之二说，争辩了数十年，数百年，仍对峙不下，此二说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，一定可合而为一”。如性善说与性恶说。

有人说：“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。”又有人说：“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。”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。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，迁移进去，某处作卧房，某处作厨房，某处作会客室，器具如何陈设，字画如何悬挂，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，我们的思想，受了屋宇之支配，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，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，也可把他另行改造，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，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。欧洲机器发明而后，工业大兴，人民的生活情形，随之而变，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，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，发明家费尽脑力，机器才能出现，工业才能发达，这又是人的意志，支配了物质。这类说法，与“英雄造时势，

时势造英雄。”是一样的，单看一面，未尝说不下去，但必须两面合拢来，理论方才圆满。有物理数学等科，才能产出牛顿，有了牛顿，物理数学等科，又生大变化。有了咸同的时局，才造出曾左诸人，有了曾左诸人，又造出一个时局。犹如鸡生蛋，蛋生鸡一般，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，其实是前进不已的。后之蛋非前之蛋，后之鸡非前之鸡，物质支配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，英雄造时势，时势又造英雄，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。倘于进化历程中，割取半截以立论，任他引出若干证据，终是一偏之见。我们细加考察，即知鸡之外无蛋，蛋之外无鸡，心之外无物，物之外无心，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，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，原可合而为一。

伪古文尚书上《说命》一篇，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”。孙中山先生则曰：“知难行易”。一般人都说：两说是冲突的，其实并不冲突，两说可相辅而行。傅说的意思，是说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，你赶快实行好了。”孙中山先生的意思，是说：“知是很难的，行是很容易的，你赶快实行好了。”二者俱是勉人实行，有何冲突？难易二字，本是形容词，傅说和孙中山先生，站在各人的立场上，因听话者的情况，各有不同，故用这种形容词，加强其语气，而归根于叫人实行。我们明白了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，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。

就实质言之，世间的事，有知难行易的，有知易行难的，例如：发明轮船火车，何等艰难，发明之后，叫技师依样制造，那就很容易了，是谓知难行易。学制轮船火车的人，在课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，心中很了然，到工场实地去做，那就很难了，是谓知易行难。

傅说说：知易行难，孙中山先生说：知难行易，这两个知字的意义，迥乎不同，傅说的“知”字，是指“听话了解”而言，孙中山先生的“知”字，是指“发明新理”而言。孙文学说中，所举饮食，作文，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，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。孙中山先生，是革命界先知先觉，他训诫党员，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。意若曰：“艰难的工作，我已经做了，你们当技师的，依样制造，是很容易的。”故曰：“知难行易”。傅说身居师保，他训诫武丁，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，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，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，武丁说道：“你的话很好，我很了解。”傅说因警告之曰：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。”即是说：“课堂上了解不算事，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”。傅说和孙

中山先生，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，无非趋重实行而已。

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，叫技师依样去做，技师做成之后，又招些学生来学，这原是一贯之事，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，傅说说的是后半截，所以说：两说并不冲突。

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：“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，知易行难，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，知难行易。”例如：我们对画师说：我家有一小孩，形状如何如何，叫他画，他画来总不肖，把小孩牵来与他看，他一画就神肖，是谓知难行易。因画师以画为业，与他的习惯并不违反也，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，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，看得明明白白，而画来总不肖，又成了知易行难。因斯人素未习画，与习惯违反故也。革命志士，牺牲生命，在所不惜，所苦者，不知采用何种方法，始能成功，是谓知难行易。普通人，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，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，对他讲进行的方法，他也很了解，但叫他去实行，他就不肯干，是谓知易行难。何也？杀身成仁之事，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，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。

据上面的研究，傅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，原是各明一义。我们当反躬自问，如果自己是技师，是革命志士，就诵孙中山先生之语以自警；如果是学徒，是普通人，就诵傅说之语以自警。

再者：王阳明主张“知行合一”，说：“即知即行”。孙中山先生则主张“知行分工”。说：“知者不必自行，行者不必自知。”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，其实也是并行不悖。以作战言之，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，立即发布命令，指挥将士进攻，是为“即知即行”。主帅不必亲临战场，是为“知者不必自行”。战场上的将士，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，是为“行者不必自知”。这也是一贯的事。王阳明说：“知行合一”。是就主帅本身言之。孙中山先生说：“知行分工”，是就指挥将士言之，如果本身都要分工，那吗，孙中山先生著了一部：《三民主义》和《孙文学说》，就可闭门高卧了，而他十次失败，十次起事，可知他本身是实行“知行合一”的，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，是主帅对将士说话，才有“知行分工”的说法，全军之中，只有主帅一人，才能这样说。其他将士，奉命作战，“即知即行”。如果也说：“知行分工，知者不必自行。”那就误事不小了。我们这样的研究，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，原是各明一义，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，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。

一部《孙文学说》，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。所有“知难行易”和

"知行分工之说"，都是按照当日情事，为党员痛下砭针，有了这种病，才下这种药，至于傅说和王阳明所说的，其病情又自不同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，才不至自误误人，凡读古人书，俱当如是。

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："关于人事上之处理，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，一定是一主性善说，一主性恶说"。孟子主张仁义化民，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，韩非主张法律绳人，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；个人主义经济学，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，社会主义经济学，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；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，民主主义，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；达尔文之互竞主义，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，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，是以性善说为立足地。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。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，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，欲解除学说之纠纷，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。

人性本来是浑然的，无所谓善，无所谓恶。也即是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。孟子出来，于整个人性中，截半面以立论，曰性善，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，于学术界，遂独树一帜，但是遗下了半面。荀子出来，把这半面提出来，曰性恶，也是一种新奇学说，于学术界，又独树一帜，成为对峙之派，此二派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何也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。孟子之性善说，已经偏了，王阳明致良知之说，则更偏，学术界通例，其说愈偏者愈新奇，愈受人欢迎，所以王阳明之说，一倡出来，风行一世。荀子之性恶说，已经偏，我的厚黑学则更偏，阳明向东偏，我向西偏，其偏之程度恰相等，所以厚黑学三字，遂洋溢乎四川。后来我著《心理与力学》。说："人性无善无恶"。阳明晚年，也说："无善无恶心之体"譬之攻城，阳明从东门攻入，我从西门攻入，入了城中，所见景物，彼此都是一样，阳明讲致良知，说得头头是道，我讲厚黑学，也说得头头是道，其实皆一偏之见也。

我研究人性，由《厚黑学》而生出一条臆说："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"。由此臆说，生出"合力主义"。本此主义，而谈经济，谈政治，谈国际，谈考试，谈学术趋势，与其他种种，我的思想，始终是一贯。所谓厚黑学者，特思想之过程耳，理论甚为粗浅，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，或称许，或诋斥，啧啧众口，其他作品，则不甚注意，白居易云"仆之诗，人所爱者，悉不过杂律诗，长恨歌以下耳，时之所重，仆之所轻。"我也有同样的感慨，故把我思想之统系写出，借释众人之疑。


华傲祥工作室
Hax Book Distribution Center

责任编辑：张 馨





ISBN7-5034-1359-X/K·0929
定价：568.00元（本册：18.00）